

MAKESI ZHU YI
ZHE XUE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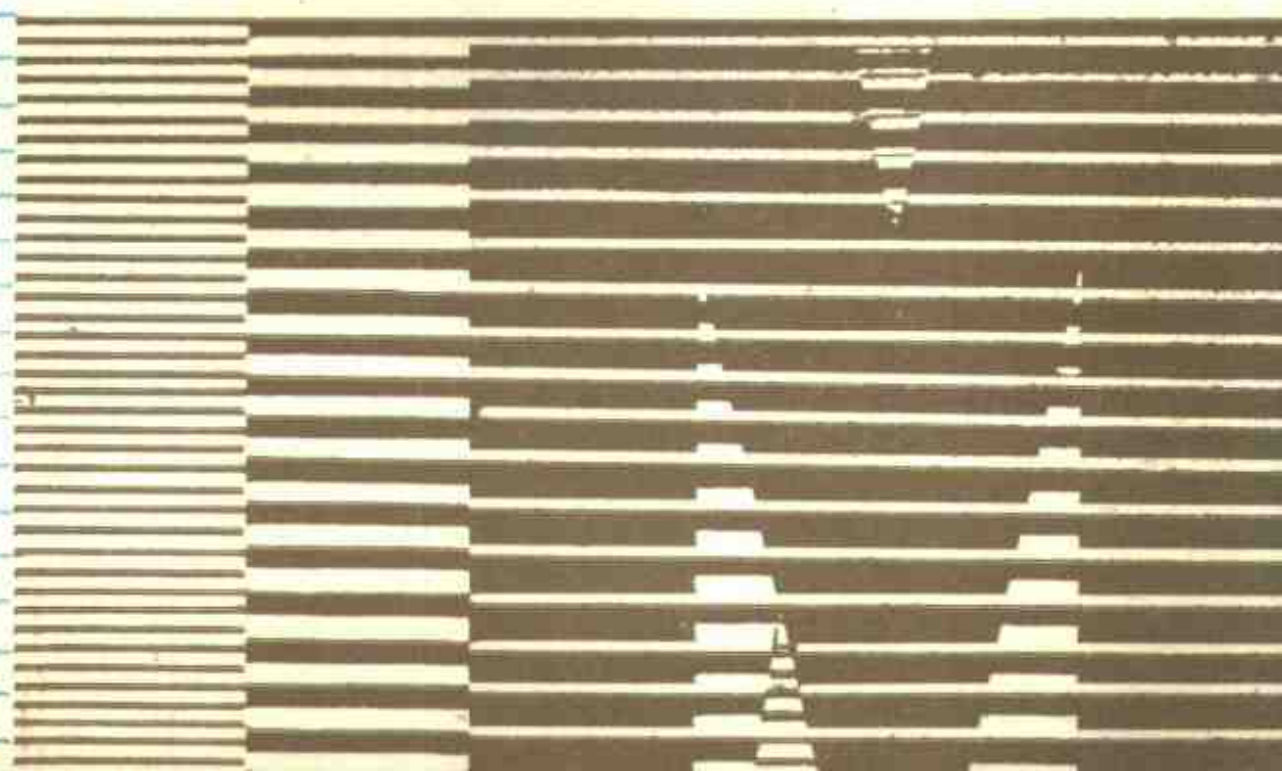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

北京出版社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本卷主编 徐 琳 高齐云

第三卷



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三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巴黎公社后的传播和发展

北 京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三卷，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871年到1895年的发展，深入地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和发展，指出根据时代特点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并做出了历史贡献。本书还探索了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想，以及他在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方面的特殊贡献。书中还论述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阐发和创造性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三卷）

Makesi Zhuyi Zhexueshi (Disanjuan)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本卷主编 徐 琳 高齐云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496,000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20

ISBN 7-200-01258-0/B·24

定 价：（平装）11.60元

总 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一门其他科学一样，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的萌芽、产生、形成、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人物、著作和思想摆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其含义、意义、是非得失和历史地位。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我国哲学界十多年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写就是这些活动中的一个项目。

本书的编写是1983年作为我国六五计划中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科研重点项目之一确定下来的，1986年又列入七五计划。全书编写人员55人，全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科研等一线的哲学工作者，都努力把编写过程同教学过程、科研过程密切结合起来。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规律，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科学性和战斗性统一，逻辑和历史统一，观点和材料统一，使本书对我国四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占有翔实而丰富的历史资料，一切论断均有充分材料作根据，同时，经过鉴别，充分吸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使本书能达到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对每一本重要的哲学著作和每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都做

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价，恰当地估计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从而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反对形而上学的非历史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

四、以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但也给予他们的战友、学生和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应有的地位和足够的篇幅，特别是对当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应给以充分的重视。

五、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为主，但对其他部分如自然辩证法、军事辩证法、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哲学史思想等也视各个哲学家思想的不同情况给予适当的介绍和评价。

本书共八卷，八卷的顺序与时间的顺序不完全一致，这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特色。八卷内容可以分为四部分：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一、二、三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战友和学生的思想），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第四、五卷），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第六、七卷），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国外的研究和发展（第八卷）。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40周年，决定1989年先出版第六、七卷，其他各卷按顺序随后陆续出版。此外，还将出版与正文配套的资料八卷。

编者的话

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时期。在广度上，它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广泛传播，而且涌现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培育下成长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深度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提出新的哲学观点，而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的总结使之日趋完善和系统化。因此，从20世纪20—30年代以来，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热点。其间虽有起伏，但至今不衰。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充分表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丰富的宝藏。我们在撰写本卷的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分析、吸取现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努力于发掘新的资料，和对已有的资料进行新的综合、概括，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作出新的解释、阐述。希望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新的前进。

本卷征求意见稿油印出来后，曾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审稿和提出修改意见。就本卷的编写提出书面意见的专家教授有：余少波、陈先达、陈柏灵、罗定虹、黄顺基。他们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分别对本卷有关部分进行了严格、细致的审阅，提出了许多深刻、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在修改和统稿、定稿时，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思考。在这里，我们再次向上述专家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卷各章的作者是：第一章，马绍孟、李金鑫；第二章，高

齐云；第三章，金羽、薛雨川（第四节）；第四章，徐琳、金顺尧（第五节）；第五章，余其铨。吴策中曾参加本卷写作大纲的拟定。黄柳婴为本卷第二章做了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张宁、陈焜玉为本卷第五章提供了某些资料。本卷各章在作者多次进行认真修改的基础上，由徐琳、高齐云统稿和定稿。最后，由黄楠森、庄福龄、林利审定。

由于编写者的学识与水平的限制，本卷难免存在疏漏、不当之处甚至错误，敬请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本卷主编

1990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中的发展	2
一、巴枯宁的国家观及其哲学基础	2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过程	7
三、论革命政权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	12
四、论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6
五、论权威	2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法权观念的理论在批判米尔伯格改良主义中的发展	25
一、米尔伯格在住宅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	25
二、恩格斯论经济现象和法权观念的关系	27
三、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城乡对立	33
第三节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理论	35
一、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36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过程	42
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	49
四、论“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	53
五、《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意义	56
第四节 在批判“苏黎世三人团”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阶级斗争理论	61
一、“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	61

二、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63
三、论掌握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重要性	66
四、《通告信》的历史意义	67
简短的结论	69

第二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丰富和发展	71
--------------	----

第一节 杜林主义的出现和内容	72
----------------------	----

一、杜林主义的形成	73
-----------------	----

二、杜林的哲学思想及其折衷主义特征	83
-------------------------	----

第二节 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	102
---------------------	-----

一、杜林主义对德国工人党的严重侵蚀	103
-------------------------	-----

二、反对杜林主义斗争的历史过程	106
-----------------------	-----

三、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批判	114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	
------------------------	--

系的构想	137
------------	-----

一、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要求	138
---------------------------	-----

二、《反杜林论》体现出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145
------------------------------	-----

三、对恩格斯建构的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	182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	--

的阐明	189
-----------	-----

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部“百科全书”的主要 贡献	190
--------------------------------------	-----

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 的相互作用	202
---	-----

三、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各个部分的内容相互制约 而构成的有机整体	207
--	-----

简短的结论	212
-------------	-----

第三章 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创立自然辨

证法的理论和方法	213
----------------	-----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	213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	214
二、《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创作过程、体系结构和历史地位	222
三、揭示自然界辩证法是恩格斯的独特贡献。驳斥对《自然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	230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	237
一、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历史必然性	238
二、揭示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	249
三、自然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	255
第三节 物质运动的理论和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相互联系的辩证法	266
一、关于物质运动的基本原理	266
二、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275
三、数学在科学分类中的地位及其辩证性质。马克思《数学手稿》的意义	279
第四节 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	285
一、劳动创造了人	285
二、劳动使猿转变为人的具体过程	291
三、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296
第五节 辩证逻辑和认识论问题	300
一、关于辩证逻辑的一些基本原则	300
二、关于认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	303
三、逻辑方法和科学假说的意义	308
第六节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313
一、《自然辩证法》一书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指导意义	314
二、恩格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	322

简短的结论	327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哲学研究	329
第一节 马克思晚年的笔记	330
一、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和趋向	331
二、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基本内容	339
三、马克思晚年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352
第二节 恩格斯探索资本主义辩证发展的新趋势， 制订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方针	354
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征兆	354
二、坚持辩证法，制订无产阶级活动的新方针	361
第三节 恩格斯论人类早期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规 律	374
一、原始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发展的趋势	374
二、家庭的起源和演变	380
三、论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形成	383
四、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趋势	385
第四节 恩格斯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 的规律	388
一、批判“复活”德国古典哲学消极因素的反动思潮	389
二、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	393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404
四、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	419
五、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423
第五节 恩格斯批判庸俗社会学，保卫和发展历 史唯物主义	433
一、坚持社会发展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原则， 批判把唯物史观庸俗化	433
二、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	441
三、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历史发展“合力”论	452
第六节 恩格斯的伦理学思想	455
一、论道德的根源和本质	456
二、论原始道德的特征 婚姻家庭道德的演变	461
三、批判旧伦理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道德的具体性和历史 史性	466
四、论道德观念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	469
第七节 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西方“马 克思学”的歪曲	471
一、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	471
二、反对恩格斯哲学思想，旨在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477
简短的结论	484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的哲学思想	486
第一节 约瑟夫·狄慈根哲学思想	488
一、狄慈根的理论活动和思想转变	488
二、“宇宙万有”学说	491
三、以物质为基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496
四、普遍联系的辩证法	504
五、狄慈根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513
第二节 弗兰茨·梅林哲学思想	519
一、梅林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519
二、梅林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和阐发	522
三、梅林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分析批判	528
四、梅林对哲学史一些问题的研究	536
五、梅林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失误	540
第三节 保尔·拉法格哲学思想	543
一、拉法格的革命活动和思想转变	543
二、批判饶勒斯的唯心史观，捍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549
三、提出两种环境理论，阐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555

四、论思想观念的起源	560
五、拉法格的无神论思想	567
六、拉法格的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	572
第四节 卡尔·考茨基早期哲学思想	574
一、考茨基生平及其政治理论活动	574
二、用唯物史观指导经济学研究	578
三、哲学观点的阐发	582
四、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分析	589
五、对拉萨尔机会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及其局 限性	593
第五节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哲学思想	597
一、拉布里奥拉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	598
二、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实质	602
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	606
四、对历史辩证法的阐述	611
五、论社会意识的根源性和独立性	614
六、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616
七、拉布里奥拉的理论错误	619
第六节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肖莱马等人的哲 学思想	621
一、李卜克内西的理论活动	621
二、倍倍尔的理论活动	622
三、肖莱马的理论活动	626
简短的结论	628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开始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欧和北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新成就，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愈来愈占居主导地位，“钢铁时代”取代了“棉纺织时代”。与此同时，激烈的竞争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列强”之间为扩大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争斗不已。生产和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也因激烈的竞争而加速进行，各种垄断组织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经济危机更加普遍和深刻。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加剧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和对殖民地的掠夺，而且在政治上强化反动的国家机器，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社会主义者的迫害。在思想领域，垄断资产阶级极端害怕和仇视革命真理，千方百计地攻击、诋毁马克思主义，并宣扬各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反民主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垄断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等等。针对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捍卫、发展革命理论，积极开展反对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的斗争，大力推动工人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回击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新挑战，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更好

地指导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工作重点放在进行巨大的理论创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各项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阐发。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以来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第二、三卷等，都明显地带有进一步总结和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这正是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70至90年代的发展时，应当着重把握的重要的历史特点。

本章着重研究和阐述在资本主义转向相对“和平”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70年代批判巴枯宁主义、米尔柏格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拉萨尔主义和“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和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反对 巴枯宁主义斗争中的发展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逐步成为工人运动中的突出问题。斗争的焦点是围绕国家问题展开的。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否定一切政治斗争，并试图占据第一国际的领导地位，分裂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集团及其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一、巴枯宁的国家观及其哲学基础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年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年轻时，巴枯宁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奥格辽夫、别林斯基等交往甚密。巴枯宁自夸一贯具有迥非寻常的抽象

思维的才能，1836年参加了以青年哲学家尼·弗·斯坦凯维奇为首的哲学小组，成为费希特和黑格尔哲学的信徒。1840年，巴枯宁去德国，结识了魏特林、蒲鲁东和卢格等人，1844年经卢格介绍在巴黎会见了马克思。1848—1849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巴枯宁非常活跃，1849年5月，巴枯宁参加德累斯顿起义时被捕，两次被判处死刑，后由奥地利政府引渡给沙皇俄国。在监禁期间，巴枯宁先后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尼古拉二世写过“忏悔书”，因此被免除死罪，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亡英国，成为红极一时的传奇人物。此后，巴枯宁开始在理论上、组织上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65年，巴枯宁在意大利组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同盟——“国际兄弟会”（“国际革命协会”），1867年在日内瓦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和平与自由同盟”，次年，他组织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加入了第一国际。1872年，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因搞阴谋分裂活动被开除出第一国际。接着，他指使一些人成立了所谓“无政府主义国际”，公开同第一国际相对抗。1874年，巴枯宁表示永远退出政治舞台，1876年病逝。

巴枯宁生活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时代，他的思想同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反映了破产小资产阶级在社会急剧变化时代的疯狂性和破坏性。巴枯宁主义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等地很有市场。后来，巴枯宁的思想对19世纪60—70年代俄国的民粹派、涅恰也夫的阴谋组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工团主义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无政府主义国家观是巴枯宁主义的核心。这与巴枯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相关。巴枯宁责难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了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将消灭国家作为进行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国家，国家规定并保障了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使一个阶级的财产越积越多，使资

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成为可能。因此，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消灭资本主义，主要是指消灭资本主义国家。

有感于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事实，巴枯宁将对国家的仇视推到极端的地步。他认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国家。从国家的对外关系上看，其本质必定是军事的国家。而军事国家不可避免要成为侵略国家；如果它不侵略别国，也将被别国侵略。因此，国家只能破坏整个地球上人类的团结。从对内关系上看，不管是君主制的、立宪的或共和制的国家，也不管是哪个王朝的、哪个阶级的或哪个民族的国家，都只是意味着统治、剥削和压迫。因此，国家是群众的敌人，国家同社会主义原则水火不相容，社会主义者谈论国家就是妥协和投降。

巴枯宁从抽象的自由、平等原则出发，认为国家同人类的自由本性相矛盾，国家和神学一样，建立在对人类的不信任基础上，把人类看成本质上是坏的、邪恶的，人类不存在自由、正义和道德，需要国家出来管理人类。因此，巴枯宁说国家是对人类的“最恶毒、最冷酷和最彻底的否定”，是人类的奇耻大辱；国家是地上的教会，是对它的所有成员的个人自由的否定的总和，哪里开始有国家，那里的个人自由就要结束。

巴枯宁还认为，国家和平等原则相矛盾。国家规定和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而继承权使每个人获得了不平等的发展条件，促使土地和其它社会财富发生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的异化，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因此，必须废除国家，实现各阶级和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平等，实现公平的竞争。

巴枯宁激烈反对马克思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他责问马克思：“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

治、新的国家”^①。他认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社会主义原则自相矛盾。他攻击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仍然是自上而下统治人民，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必然导致把财产集中在自己手里，并在给人以德性和使之文明的借口下，对人进行奴役、迫害、剥削和腐蚀。他胡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将用武力把群众像动物似地赶到一起，专门追求物质的目的，对精神生活一无所知。

巴枯宁还认为，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里，农民文化程度最低，被排除在管理过程之外，成为国家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工人则是管理国家的特权阶层。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不能消除民族奴役的压迫形式。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对农民和少数民族的专政。

为了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理论，巴枯宁提出了他的“自由联邦”、“世界联邦”的构想。他认为，未来社会将取消一切与国家相关联的形式，如废除国家法庭，取消银行和其它一切国家信贷机构，取消一切中央管理机关、官僚机关、常备军和国家警察，实行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使国家在政治、司法、官僚机构和财政方面彻底破产。那时，人们根据自愿原则组成公社，由公社自由联合成省，省联合成民族，民族联合成欧洲联邦，并进一步建立世界联邦。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是“自治”。在世界联邦中，每个公社是“自治的”，在公社中，每个人又是彻底地“自治的”，一旦社会组织侵犯了公社和个人的自治，个人可以自由地退出公社，公社可以自由地退出联邦。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能、需要和意志实行最充分的自治，在各民族之间实行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彼此间建立紧密的兄弟同盟，从而建立一个伟大的自由的机体。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

巴枯宁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哲学实际上是折衷主义的大杂烩。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三种要素，或三个基本原则：（一）人的动物性；（二）思想；（三）反叛。和第一个要素相对应的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和第二个要素相应的是科学；和第三个要素相应的是自由。他认为，同动物相比，人类具有两种更高级的能力即思想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巴枯宁极力强调反叛的欲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破坏的热情就是创造的热情，没有广泛和热烈的破坏，就不会有革命。社会主义者要培养“邪恶的激情”，要放纵一切恶欲，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他认为，反叛的欲望是追求自由的表现。他极力推崇黑格尔关于人类历史是自由精神的自由的必然的发展结果的思想。不过，他的自由观既不同于马克思的辩证自由观，也不同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合理利己主义的自由观，而是极端个人主义和一意孤行的本能发泄。巴枯宁认为，自由没有限度，不为全体人类的利益所限制，“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他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①。他认为，人性中存在着能够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只要让这种力量解放出来，就能够推动历史前进。在现代世界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文明的污染，他们是人性的代表，愤怒的农民和工人的自发暴动将会拯救这个世界。他把走向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农民身上。

巴枯宁用这套唯心主义哲学来说明整个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人性对人的动物性的不断否定。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尚未摆脱动物特性的原始的奴役状态，这是人类文明的初期；第二个阶段是受宗教和国

^① 《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和原则》，《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1928年俄文版，第3卷。

家统治的神性的奴役状态，这是指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社会；第三阶段是摆脱了所有权力的无组织的自由社会。人类历史正在走向第三阶段，在这个时期的革命纲领应该是立即爆炸一切国家，反对一切权威，实现绝对自由和普遍平等的原则。巴枯宁极端仇视宗教和国家这两个名词。他用宗教来说明国家的起源。他认为，上帝和国家都是以人性本是恶的作为前提，都同人的自由截然对立。国家则是教会的直接结果，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任何历史必然性，纯粹是人为制造的。

可见，无论是在国家起源问题上，还是在国家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对待无产阶级国家的态度问题上，巴枯宁主义都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过程

巴枯宁主义是第一国际后期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无论在理论上或组织上都直接威胁到国际工人协会的生存。因此，从1869年到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斗争。

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的某些方面还是抱有一些好感的。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恩格斯说，在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起义中，起义群众“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监牢里。”^①马克思后来也说：“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0页。

运动特别是参加德累斯顿起义给予应有的评价”^①。在第一国际成立之初，马克思在信中对恩格斯说：“我于十六年之后，昨天第一次见到他。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②。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有这些说法，是因为巴枯宁是当年德累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和俄国革命斗争的代表者。必须同时指出，无论是在1848年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上，还是在对俄国问题的认识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巴枯宁是始终存在着分歧的。

1864年第一个国际成立以后，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巴枯宁认为推行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公开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直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对工人运动的威胁主要来自组织方面。马克思认为巴枯宁本人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③，“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于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④。巴枯宁不停地建立一个又一个组织，作为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工具。每次国际代表大会前，巴枯宁都四处活动，拉帮结派，试图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争高低。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的指导地位和国际的内部团结。

1867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加入“和平与自由同盟”之后，建议同盟加入第一国际，试图通过“和平与自由同盟”控制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和平与自由同盟”没有理由单独存在。

1868年，巴枯宁又召集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主义者，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9年9月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试图通过以下两个问题来鼓吹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第一，提出了关于废除财产继承权的决议；第二，要求国际总委员会放弃对爱尔兰问题的直接干涉，放弃对国际各个支部的领导权。但是，会议的结果使巴枯宁的计划完全落空。马克思于1868年12月22日起草了题为《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通知，发给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提出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1870年3月28日，马克思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撰写了《机密通知》，揭露了巴枯宁及其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阴谋活动。马克思指出，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完全是一个欺骗活动，巴枯宁是一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瓦解国际的工具，“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①。巴枯宁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应当退休，巴塞尔代表大会将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也就是说，国际将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变成他私人的工具。恩格斯认为，巴枯宁的这种欺骗行为，是想建立国中之国，建立两个总委员会，甚至两个代表大会。这就必然导致国际的分裂。恩格斯指出，对于这些钻进国际的家伙，最好是冷静而坚决地加以拒绝。

1870年的巴黎起义和里昂事件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标志着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里昂起义后，巴枯宁就匆忙宣布彻底废除国家机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说，“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纸废除国家的命令还远不足以实现这一切美妙的诺言。但是，只用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两个连，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创造奇迹的命令赶忙溜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

日内瓦去了”^①。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将责任推给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诬蔑国际总委员会正在成为勾心斗角的策源地，要求国际总委员会仅仅成为一个“通讯机关和统计中心”。1871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打击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阴谋和派别活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开幕前，巴枯宁将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说马克思从脚跟到头顶都是个“权威主义者”、“独裁者”、“教皇”、“爱好虚荣和嫉妒”、“搞自我中心主义”等等。海牙大会就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及国际总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展开了争论，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由于巴枯宁主义者常常以最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阴谋活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从组织上清除巴枯宁主义时，也在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年），《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1869年）；恩格斯的《论权威》（1872—1873年），《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1873年）和《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法格协助下完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继承权这个私有制社会的最直接存在形式。马克思认为，继承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的原因，恰恰相反，“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3页。

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①。继承权是私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社会革命的最终结果应当是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上层建筑作斗争。废除继承权是在社会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改造旧经济基础时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如果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引诱工人阶级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

《政治冷淡主义》批判了政治冷淡主义和经济冷淡主义以抽象原则反对工人从事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在这里详细地阐述了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巴枯宁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就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或阻止降低工资，就是承认了雇佣劳动制度。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妥协和迁就，同自由、自治、无政府原则相矛盾。经济冷淡主义则认为，争取提高工资的要求同“工资数额决定商品价格”的永恒原则相矛盾；联合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矛盾；阶级间的鄙视和仇恨同互助王国的原则相矛盾。马克思认为，这种“革命”的抽象原则只能导致工人阶级袖手旁观，以真正基督徒的苦行主义精神来忍受资本家的剥削，等待最终的社会清算。

《巴枯宁〈国家制度 and 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一文在批判巴枯宁主义国家观的同时，集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马克思认为，巴枯宁国家观的思想基础是：“逆序法”，即把后面的、以后的当作最初的、前面的，把实际的顺序颠倒过来，否认事物具体的、历史的发展过程，用幻想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分析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态度，得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结论，预测了未来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4页。

专政国家的性质、任务等具体内容。这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反对巴枯宁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在稍后反对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恩格斯则选择了另一个问题即《论权威》，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恩格斯具体分析了权威产生的原因、权威的发展过程、权威的各种存在形式以及权威的作用。恩格斯认为，权威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除了具有政治的含义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的含义。现代化大生产需要权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存在权威。

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恩格斯分析了巴枯宁主义领导西班牙起义失败的原因，论证了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巴枯宁主义者不去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却幻想以无政府主义原则一下子消灭所有国家，消灭普通的国家概念。当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时，巴枯宁主义者就不得不抛弃自己的纲领。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说教，泰然自若地参加显然是纯粹资产阶级的运动，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会议。但是，由于他们是在没有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结果，巴枯宁主义者或者阻碍了革命运动，或者是参加了没有计划的荒唐起义，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无政府状态和自由联合的原则又分散了革命力量，让政府把各个城市一一击破。

总之，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与权威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并对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论革命政权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

巴枯宁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反对建立无产阶级

专政国家，不懂得革命政权的性质和作用。马克思指出，不能笼统地谈论一切国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不能从国家本身研究国家。在缺乏相应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要求废除国家政权，同要求建立国家政权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失去意义的手段。”^①这些手段之一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运用革命政权的力量。无产阶级由于还没有最终脱离旧的经济基础，所以在上层建筑领域内也不可能彻底抛弃旧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最终被消灭，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阶级镇压的工具，否则，“就会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够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建立国家政权同国家消亡，建立阶级统治同消灭阶级，目的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巴枯宁将目的和手段完全等同起来，认为“自由只有通过自由来创造”，只有通过自由化的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自由化的秩序，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发展和组织城乡劳动群众的非政治的、社会的因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439页。

也是非政权的方式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实际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一方面，无产阶级加强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统治，对付一切残留的落后因素；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必须为最终消灭阶级，包括消灭无产阶级自身创造条件，逐渐清洗自己身上的一切阶级性的特征。无产阶级将“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了革命政权存在的长期性。他们认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的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②不仅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立即取消国家政权是不可能的，在没有最终消灭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时也不可能取消国家，而彻底改变和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建立、发展和完善新的经济基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存在也将是长期的。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内容和职能。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③在形势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马克思自然强调革命政权的暴力性质。马克思指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他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6、639、443页。

改造的过程。”^①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不能剥夺自己采用暴力的权力，相反，在这种暴力能够加速阶级最终消灭的情况下，应该毫不迟疑地使用革命的暴力。同其它手段相比，国家政权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具有普遍性和组织性，效果更为显著。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②。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忽视革命政权作用的另一方面。他在强调革命政权的镇压功能时，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社会经济革命”功能。巴枯宁片面地理解国家的上层建筑性质，将国家的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国家与整个社会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同样也要组织生产，以便在经济关系中最终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运用国家政权，“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礎”^③。这样，马克思就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上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历史地位。

巴枯宁将无产阶级专政与其它剥削阶级的统治并列，将无产阶级政治还原为资产阶级政治，认为它们都是专制、奴役和压迫，同自由、民主截然矛盾。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性质。他们认为，不从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而把革命看作是少数几个人的密谋的暴动，自然也就推论出革命政权是暴动者对整个社会的专制。政权本身的性质并不取决于名称，而是取决于相应的经济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6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少数人的专政，而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①，是“阶级统治的新形式”，是对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人的专政两者的统一。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政治镇压职能将逐渐减少，其重心将从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到最后，“（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②。

对农民的态度也是衡量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巴枯宁从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出发，硬是捏造了所谓无产阶级的专政将包括对农民的统治的论断。马克思指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是：“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③ 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只有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的联合提供了条件，才能最终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

四、论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无产阶级怎样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巴枯宁认为，通过工人阶级的总罢工和农民的自发暴动，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天之内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指出，“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④。因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7、6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6页。

力，社会革命才有可能。”^①无论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都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解放。经济发达的英国虽然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广大工人却缺乏自觉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落后国家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在分析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策略时，恩格斯指出：“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发展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②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政治斗争来缩短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过程，却不能完全抛弃政治斗争。

巴枯宁有一种奇怪的逻辑，认为无产阶级组织政党、进行罢工、限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就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为进行这样的活动，不但无助于消除目前的社会状况，反而会巩固这种状况，并使矛盾尖锐化。恩格斯指出，这完全是诡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我们承认与否，它并不在乎。对无产阶级来说，主要任务不在于承认或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而是通过实际的行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土地贵族和资本家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并不仅仅依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而且还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军队、警察和法庭。而巴枯宁则要求实行总罢工，即采用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治的武装力量，这完全是徒劳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敌人进行斗争，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2页。

夺取政权作为最终目的”^①。工人阶级应该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斗争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放弃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并不存在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之外的第三条非政治的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政治，就必然投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②。革命事业与政治行动紧密相联，放弃了政治行动，也就放弃了革命事业。在社会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之后，鼓吹放弃政治，只能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巴枯宁主义者在1873年西班牙起义中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巴枯宁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放弃政治行动，他们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参加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去。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进行政治斗争包括合法的政治斗争就显得更为迫切。然而，巴枯宁却看不到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事实和前景，悲叹革命的时刻过去了，群众中缺乏革命的热情和希望，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因无力从事政治活动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

马克思分析了工人运动的历史，认为进行政治斗争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最初的社会主义者那里，“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政治运动”^③。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局限性是历史条件所致，我们不能对他们苛求。但是，当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仍然奢谈排斥一切政治斗争，就只能贻害工人运动了。政治斗争是在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更为高级、更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6、384—3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7页。

为有效的斗争形式,是工人阶级成熟性的表现。马克思认为,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是“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①。政治斗争的特点是广泛的组织性和自觉性,是“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②。政治运动也是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单靠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不可能对付资产阶级的强力镇压,必须通过政治行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巴枯宁放弃政治行动,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处于分散状态,等待资产阶级各个击破。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巴枯宁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进行政治斗争是不相容的。马克思认为,排斥经济斗争的经济冷淡主义和排斥政治斗争的政治冷淡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抽象的永恒原则反对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马克思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运动密切联系着的”^③。政治斗争与其它斗争形式包括经济斗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共同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这个最终目标。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当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④。经济解放是最终目的,政治运动是手段,这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地方。另一方面,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通过政治斗争取得政治统治是过渡到经济解放的必经阶段。

建立政党是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①,工人政党是与资产阶级的政党直接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组织,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突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认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②。只有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彻底摆脱旧政党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恩格斯在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的信中说,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到处都发生过,而“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③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要充分利用一切形式的政治因素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唯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对立在斗争策略问题上表现为:是从现实中还是从思辨的想象中寻找斗争的力量。巴枯宁主义者排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可利用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都是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并不符合被无政府主义者用自由、自治或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工人阶级的“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④。恩格斯说:“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⑤。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将这些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利用这些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4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1页。

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恩格斯还提到了普选权，认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①。关于议会斗争，马克思认为，如果工人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中受到压制，那么就会对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工人阶级争取到了在议会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么全世界都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为工人运动建立巨大的威信。马克思认为，社会越发展，利用政治因素，特别是合法因素进行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政治自由、普选权、议会等合法因素，而是号召无产阶级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一切合法因素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

五、论权威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结论是反对一切权威。巴枯宁认为：“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任何由官方强加于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威的影响，都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他夸大权威作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的作用，认为权威是社会堕落的根源。行使权威必然使人堕落，屈从权威必然使人受辱。恩格斯与巴枯宁对待权威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不是用权威来说明整个社会，而是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来说明权威。一定的权威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空谈权威，自然不能发现权威问题的实质，在相应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化之前要求消灭权威，也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分析了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认为权威的存在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他认为，现代经济活动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联合的相互依赖的活动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1页。

如，庞大的工厂工业正在取代分散的小作坊，火车取代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轮船取代帆船等等。但是，联合起来就需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需要作为组织者的权威。权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恩格斯以纺纱厂、铁路和航海为例来说明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在纺纱过程中，各个工序之间的互相配合，机器的正常运转，各个车间之间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统一的劳动时间的制定，这些问题都要靠权威来解决。在现代工业的命脉——铁路运输中，为了避免不幸事故，需要强有力的权威进行统一管理。恩格斯认为，最有力地确证权威存在的，便是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轮船了。在危急关头，为了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因此，现代社会中的权威，首先是从现代大工业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巴枯宁所说的权威和专制，不过是大工厂里的机器的“专制”、“蒸汽权威”，而“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①。消灭权威的口号反映了破产小资产阶级对现代化大生产的仇恨和愤怒。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由于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权威不仅不会被消灭，它的范围反而会进一步扩大。

恩格斯分析了权威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形式。权威存在着施动者和受动者、强制与服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②。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在未来社会里则是建立在个人意愿基础上的权威。权威既可以是一个代表，也可以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的决议的委员会。权威活动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既可以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1页。

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也可以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就是说，权威与下属沟通的方式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权威。经济生活中有经济权威，政治生活中有政治权威，思想领域中有思想权威等等。巴枯宁为了缓和自己的彻底反权威论断，试图用折衷主义的办法规定权威概念。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权威，而且对于这些专门知识，应该向他们请教，“但是我既不允许鞋匠，不允许建筑师，也不允许学者把他的权威强加于我”。^①这就割裂了权威活动的强制与服从这两方面特征。巴枯宁将权威概念简单化，认为权威必然是某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是少数人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压迫他们，并以此得出消灭权威的结论。这就否定了权威存在形式的多样性。

恩格斯还阐述了权威与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巴枯宁片面地将权威与自治对立起来，认为权威是绝对坏的东西，而自治是绝对好的东西。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组织，每个人都是自治的。恩格斯指出：“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②。绝对的“自治”是不存在的。权威和自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抽象概念，“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而改变”^③。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权威的存在以牺牲个人自由为前提，权威与自治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并不是巴枯宁所认为的那种外在对立，似乎要消灭权威，首先必须实现个人自治，而要实现个人自治，又要首先消灭权威。恩格斯认为，权威的发展与自治的实现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

① 巴枯宁：《上帝与国家》，纽约大地出版社1916年英文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

威与自治是统一的，权威的行使以个人自治为基础，并通过个人的自治来实现，同时自由的个人又必须服从一定的权威。

如果说否认经济权威明显地违背经济活动的常识，那么，在巴枯宁看来，政治权威的存在则为他提供了否定权威的理由。但是，恩格斯所说的消灭政治权威同巴枯宁的消灭政治权威有着不同的性质。首先，巴枯宁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恩格斯则认为：在旧的社会关系废除之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彻底消除政治权威。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必须进行革命斗争，而“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它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权威政权，而是因为它没有充分运用这个权威的力量。其次，巴枯宁从否认政治权威出发否定一切权威。恩格斯认为，不仅剥削阶级社会存在着权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权威，只不过这两种权威具有不同的性质和阶级内容。在剥削阶级社会，政治权威与经济权威是合二为一的。在未来社会中，政治权威和权威的政治性质将消失，权威变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恩格斯还揭露了巴枯宁否认一切权威的险恶用心和消极影响。巴枯宁的反权威理论是为他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作准备的。他反对领导当时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特别是协会的主要领导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个“权威主义者”、“独裁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他把威信极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夺取第一国际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可是，他一方面反对别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试图建立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权威，以无政府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法权观念的理论在批判米尔伯格改良主义中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机器大工业逐渐挤垮并代替了旧的家庭工业，大批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被迫涌向成为现代工业中心的大城市，使城市对住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为了修建工厂和道路，旧的住宅却在不断被拆除。于是，出现了工人、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严重的“住宅缺乏”现象。蒲鲁东主义者米尔伯格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扎克斯乘机在住宅问题上散布自己的观点，在工人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如何看待和怎样解决“住宅缺乏”现象，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也反应了两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对立。

一、米尔伯格在住宅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

阿尔图尔·米尔伯格（1847—1907），原来是一位德国的医生，1872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米尔伯格在住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具体说来，他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使每个承租人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有了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工人就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

立地位，有了可独立支配的领域，有了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就会摆脱受市面情况的变动和自己雇主的摆布；就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种种危险；就从无产者阶级上升为有产阶级。似乎工人有了自己的住宅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第二，房屋收到的房租费用大大地高于房屋的最初费用，这违背社会的“永恒公平”原则，应该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消除房屋的最初费用与最终实际收到的房租的差额。这样，工人购买住宅时除了支付房屋的实际费用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外，就不再需要别的额外偿付了。

第三，造成工人住房状况恶化的原因是道德败坏和无知。一方面是有产阶级虽然有资金却不肯建造房屋供劳动者享用，他们不知道工人生活状况造成的疾病流行也同样危及到自身；另一方面是工人本身缺乏卫生要求，为了少花钱而宁肯住进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同时却又把收入浪费在喝酒和种种无聊的娱乐方面。只要资本家懂得了工人住房状况的恶化对环境的危害性，工人懂得了一些卫生常识，他们就会自动起来建造住宅。工人政党应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

米尔伯格的文章在德国工人党机关报上发表后，在工人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为了挽回声誉，德国工人党机关报请求恩格斯撰文批判米尔伯格。恩格斯于1872年6月至1873年12月连续在《人民国家报》发表了三篇论文，系统批判了米尔伯格等人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三篇文章后来以《论住宅问题》为标题出版了单行本。

米尔伯格的改良主义是以蒲鲁东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蒲鲁东主义者，但是他的论文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同样也是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继续

和补充。

恩格斯在论战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述。

二、恩格斯论经济现象和法权观念的关系

同蒲鲁东一样，米尔伯格也是用一些抽象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而不是作具体的、实际的分析。米尔伯格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永恒公平”：“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則，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原則，指导、保护、排斥、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則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这个原則在我看来就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呢？这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①他把“公平”上升到理论中的最高地位，认为“公平”是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原则。凡是符合这个原則的就应保留，凡不符合这个原則的就应被废除。他没有具体地分析房租的经济根源，认为房租是通过“永恒的法权理由”获取的，这种“法权理由”与“永恒公平”原則相矛盾。因此，社会改良的任务是取消“法权理由”，实现“永恒公平”。恩格斯说：“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②

所谓不符合“公平”原則的“法权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指“资本生产率”。米尔伯格不懂得剩余价值理论，他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抄袭了“资本生产率”的模糊概念，硬说资本本身也有一定的生产率，也能产生价值。恩格斯指出，房租的来源是剩余价值，它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1）地租；（2）建筑资本的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5页。

利益，包括承建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4）随着房屋逐渐破旧无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利润在内。可见，即使废除了“资本生产率”，对房租来说也丝毫不受影响。因为货币借贷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而且“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①。降低或者废除“资本生产率”，并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优惠，只是确立一种新的办法在资本家之间分配从工人那里获得的剩余价值，使工业资本家比食利者获得更多的优惠。

米尔伯格理论上的错误在于把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等同于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承租人和房主的关系是两个公民之间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不象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关系中会有剩余价值存在，工人在这里是作为有钱的人来活动的。米尔伯格既然只是在纯粹的交换活动中兜圈子，便不可能发现房租的来源和住宅问题的实质。

米尔伯格由于不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它的改良措施最多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而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却丝毫没有触及。恩格斯认为，住宅问题的关键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即资本家怎样能靠自己的那些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要消除“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

“住宅缺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宅缺乏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6页。

象就不可能存在。米尔伯格幻想用使工人阶级提高到有产阶级的水平来消除“住宅缺乏”现象，实际上是抹杀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就无产阶级这一事实。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①资本家并没有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似乎只是在改良主义呼吁和祈求之后才这样做。相反，资本家一开始就把修建工人的住宅作为必要的投资，因为这种投资能为他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住宅缺乏”也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持续存在，因为这种现象同投资修建工人住宅一样能为他带来经济利益。工人即使有了可供自身支配的住宅也不会成为资本家，因为房子并不能为他带来剩余价值。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被消灭，不关痛痒的社会改良措施就不能真正改善工人的状况。恩格斯以严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们。”^②改良主义认为，如果为工人提供免费住宅，工人的生活费用就会降低，他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恩格斯则指出，这些社会改良办法一旦推行，工人的工资也会相应地降低；他节约多少，他所得到的工资就降低多少，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

米尔伯格的“永恒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性质还在于：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所谓“永恒公平”的原则，即每个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已经很难实现。首先，单个的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难以计算；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蒲鲁东主义者所向往的两个生产者之间的简单商品交换。米尔伯格推崇小商品生产，充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94、524—525页。

暴露了他的那个“反动的蒲鲁东主义原则”，“这个原则以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条件是一种病态的赘疣，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无非是要理想化地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①。米尔伯格恢复小生产方式的目的是要把工人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阻止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工人无声无息、安于现状。

米尔伯格只是对工人阶级的状况作一些道义上的愤慨，抱怨“现时代的惨状”，对历史必然性唱“悲歌”，说现行社会中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加以证明的东西，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伯格却在说教和哀诉。”^②恩格斯从“住宅缺乏”中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他说，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主要区别是，我们在描述经济关系的时候，同时也说明这些关系是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③。社会的发展不是依据“永恒公平”原则，而是依据实实在在的经济规律；现代大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向也不是小手工业生产方式，而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相适应的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大工业把原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一个没有财产，完全摆脱一切枷锁的无产者。这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首要条件。只有无产者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同时，正是由于大工业的存在，“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5页。

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①。那时的“公平”不是指单个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所有者，而是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

米尔伯格说在解决住宅问题时要“从现有情况出发”，要实际些，他要恩格斯“脱离抽象的社会主义”。他的目的是要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对资本主义的既成事实作一些点滴的改良，在住宅、食品这样一些细节性问题上大作文章。因此，恩格斯说：“‘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意思应该是：废除）’出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啊”^②。我们现在所能断定的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旧的所有制关系也将灭亡。至于凭空推想未来社会将怎样调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必然要陷于空想。甚至向未来社会过渡时期的措施也必须适应当时的经济关系。米尔伯格的构想愈是具体，就愈是不可避免地走向空想。

恩格斯在批判米尔伯格的唯心主义后，论述了法律和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及历史过程。他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③ 法律是对既成的生产活动的概括，国家则是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479页，第5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用来维护法律本身的强制性权力机关，两者都是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唯心主义的自然法权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的根源。他说：“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象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①首先，法律越来越完备，它自身便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存在着，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法律本身的独立性掩盖了它对经济生活条件的依附，由于独立的职业法学者阶层的出现，将法学等同于实际的法律，将法律条文的制定等同于法律的产生过程；第三，各个历史阶段法律的共同性掩盖了它们的具体的时代的差别。这就是自然法权观念产生的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

史前提和认识论根源。一切资产阶级理论家正是借助于自然法权观念使现存制度神秘化、永恒化，从而达到欺骗工人运动的目的。

三、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城乡对立

《论住宅问题》在批判米尔伯格时，阐明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米尔伯格之所以选择住宅问题作为他宣扬改良主义路线的借口，是因为工人住房状况的恶化更明显地表现出，这是个不仅仅与工人有关的问题。不卫生的居住条件引起的疾病流行同样影响着资产阶级的健康。因此他说：在住宅问题上，“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中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在租赁住宅的压迫的桎梏下，各中等阶级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①。只要资产阶级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出来帮助工人阶级改善工人状况。工人阶级也不应该谈论“阶级政策”、“阶级统治”。恩格斯指出，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的唯一出路，住宅问题也不例外。为此，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

“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阶级政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②米尔伯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把自己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外，而投入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行列之中了。

米尔伯格等蒲鲁东主义者除了祈求资产阶级大发慈悲外，对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9页。

国家也抱有幻想，指望国家能够帮助工人解决住宅问题。恩格斯指出：“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和权力”，“总和的资本家，即国家”^①。资本家不愿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当然也不愿做。改良主义者又幻想：在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恩格斯分析了普鲁士国家的性质。他说，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至今还没有在德国取得统治权；与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并存的，还有一个不断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是旧专制君主制度存在的条件；同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又是波拿巴主义产生的前提。德国就是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条件的混合体，它本身在急剧地由专制君主国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国，俾斯麦政府就是它的实现。因此，不能幻想普鲁士国家对工人有什么作为，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的经验也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米尔伯格认为，巴黎公社是蒲鲁东主义原则的实现，德国工人运动不应应对蒲鲁东主义抱有偏见。恩格斯反驳说，巴黎公社实践的是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②。公社最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不是来源于抽象的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公社实行的唯一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它却是公社灭亡的原因之一。

与住宅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城乡对立。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

消灭城乡对立是解决住宅问题的前提。米尔伯格不懂得这一点，他完全抛开消灭城乡对立来孤立地解决住宅问题，幻想在保留资本主义造成的城乡对立的情况下解决住宅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因此，恩格斯指出：“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①

米尔伯格认为城乡对立是自然的、历史上产生的，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他的目的是既想改革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又保留农民。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②。只有以社会主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城乡对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每天都在提出消灭这种对立的实际要求，“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③。只有消灭了城乡对立，才能解决住宅问题；同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最终消灭城乡对立。

第三节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理论

拉萨尔主义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尤其在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拉萨尔本人虽然已经过世，但德国党内的拉萨尔派和拉萨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02—503、5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3页。

尔主义仍然严重危害党在政治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团结和思想上的纯洁。而随着70年代初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党面临着团结对敌、领导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紧迫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不消除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德国党和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不朽篇章。

一、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生于德国东普鲁士布勒斯劳城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迅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资产阶级试图利用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去反对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同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同，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比较晚，也比较缓慢，当它开始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冲击的时候，它在政治上的更为强大的对手——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登上德国政治舞台，公开同它较量。因此，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得十分软弱、动摇和妥协，总是想在这种左右两难的境地中搞投机，想方设法为自己捞取一点暂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他们伟人辈出的早期思想家们相反，德国资产阶级目光短浅、极端利己主义，一开始就沾染了十足的庸人习气。历史造成的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性在拉萨尔身上也充分表现出来。

拉萨尔少年时天赋聪颖，被人称为“神童”。写作才能出众，自己独立地阅读了哥德、席勒、卢梭等人的进步作品。在生活上放荡不羁、吃喝玩乐、酗酒赌博，同时对普鲁士社会的陈规旧习、特别是摧残人性的旧的教育制度深恶痛绝。在学校里，桀

桀不驯的拉萨尔总是受到压制和排挤，并因此而多次转学。这种压抑的环境不断助长拉萨尔对整个社会的反抗情绪，这对拉萨尔后来走上背叛社会的道路有很大影响。

但是，一开始，拉萨尔对社会的反抗情绪就具有两重性。有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可以勇敢地为民主自由事业而呐喊；有时，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虚荣和独裁的欲望又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既反对贵族专制，又向往贵族式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生为王子或公爵，我将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但是，我不过是个普通市民的儿子。因此，我将是当代的民主主义者。”^①他用极端个人主义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拉萨尔“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其次，力图挤上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②。极端个人主义是他后来走向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1842年，拉萨尔考入布勒斯劳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柏林大学，并立即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1846年，拉萨尔以原告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并因此而名声大振。1848年革命爆发后，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向市民和农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因此而被捕入狱，后又很快出狱。这是拉萨尔第一次直接参加革命活动。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拉萨尔一直处在德国工人运动之外而专心于学术研究。1857年，拉萨尔发表《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释赫拉克利特哲学，并跻身于学术界。1862年，拉萨尔以《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工人纲领》）为标题的演讲，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本书为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带来了一定的声

① 《拉萨尔日记》，1918年柏林——维麦尔多夫德文版，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页。

誉，他借机加入到重新兴起的工人运动中去。1863年，拉萨尔应即将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之邀撰写《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把机会主义观点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标志着拉萨尔主义正式形成。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拉萨尔为主席。之后，拉萨尔几次同新上台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秘密会谈，为俾斯麦的内外政策出谋划策，并要求工人阶级支持俾斯麦政府。这使得拉萨尔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越来越孤立。1864年8月，拉萨尔在瑞士追求巴伐利亚驻瑞士联邦代办的女儿，在与姑娘未婚夫的决斗中受重伤后去世。

拉萨尔终其一生都是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和策略的哲学基础。在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曲解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时，拉萨尔说：“正是绝对的生成对现实的生成的这种关系使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成为一种唯心的哲学，使得他的绝对的东西成为理念，使得绝对的东西对现实的东西的关系成为一种唯心的关系。”^①他把理念看成是“万能的”，可以完成各种任务，而他自己的任务就是使“理念”在现实中确立。他认为历史是“概念的客观的自我运动”，概念的运动以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在历史中起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概念产生客观世界的过程。

他用概念的变化说明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从古代基督教世界到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到共产主义，都是主观性的权利、能力观念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结果。君主政体向共和政体的发展，就是伦理的国家意志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实现，是王权自身的内在本性进一步演变的结果。共产主义社会首先是一种“理念”的体现，是概念运动的一个阶段，“观念在失去后又返回本身，使这种客观性（物质、东西、货币）作为一开始就属于个人的东西无

^① 《拉萨尔全集》，1920年柏林德文版，第8卷，第44—45页。

条件地服从主观性——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观念”^①。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形成一个社会阶段，仅仅是一种观念。神、国家和法是概念客观运动的终结，是普遍精神在外部世界中的体现。现存的君主政体就表现了伦理的国家意志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概念，尽管它是以一种偶然的、经验的、通过血统的继承来确定的。

很明显，拉萨尔的哲学是源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但是，为了使他的哲学进一步具体化并介入到实际活动中去，拉萨尔又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拼凑和融入到他的哲学之中。他说，自我或者纯粹思维是真正的自在之物，是一切存在的绝对自在。概念范畴的每一次运动都由特定的代表人物来体现和实现。他鄙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阶级，夸大英雄的作用，甚至将反动统治者俾斯麦看作是统一德国的民族英雄。拉萨尔贵族气息很重。他认为，追求荣誉是伟大人物的天性。荣誉是现实的无限性，是感性存在的继续和延伸，只有在“荣誉”中才能达到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个人的成就和名望高于一切。拉萨尔后来走上出卖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路线，与这种人生哲学不无关系。

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心点是国家帮助建立工人合作社理论。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国家的迷信而提出的。他认为，国家是为一切人而存在的机关，它把“一切人的状况”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国家的援助和促进下实现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这是工人等级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②。

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并不是现存的国家，而是未来的国家，这种国家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实现，“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不仅是你们的政治原则，也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帮助的基本条件。这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

① 《拉萨尔遗书遗文集》，1921年斯图加特——柏林版，第1卷，第131—132页。

② 《拉萨尔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80—81页。

段。”^①他极力主张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反对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争。认为农民的斗争表面上看来是革命的，实际上是极其反动的；工人阶级的起义是“野蛮的无产阶级革命”、“仇恨的和粗暴的长裤汉的狂怒的爆发”等等。他一面对工人说：“必须卸下你们脚上的镣铐，但是只能和平地、通过知识界的主动性、而且在有产阶级的同情和帮助下进行，”一面又向资产阶级和普鲁士王朝呼吁：“你们有产者和知识分子必须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解除我们的这些镣铐”。^②这实际是一种阶级妥协和阶级调和的道路。后来，他在与俾斯麦的密谋中，要求俾斯麦尽快实现普选权，防止发生暴动和起义，同时又拿俾斯麦政府来威胁工人阶级。从拉萨尔这副奴颜婢膝、跪着造反的丑态中可以看出，拉萨尔并不是工人运动的真正的领袖，而是俾斯麦反动政府在工人中的代理人。

如果拉萨尔将争取普选权作为争取工人解放的一种手段，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并不为过。因为，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尽管工人运动再次高涨，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848年革命的失败及50年代的低潮时期，工人运动原有的各种基础遭到很大破坏。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在1864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③。问题在于，拉萨尔将争取普选权作为唯一目标，而且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和策略以唯心主义的对国家的迷信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归根结底，它不是策略的灵活性的体现，而是在出卖原则。

① 《拉萨尔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88—89页。

② 《拉萨尔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在法与社会的关系上，拉萨尔也是坚持唯心主义的立场的。他认为，法律是全民权利意识的体现，法的唯一源泉是全民的共同意识、普遍精神，法律所依靠的是思维和意志自由。后来，在德国的“宪法冲突”时期，拉萨尔也想以唯物主义解释宪法问题，认为宪法问题不是法的问题，而是力量问题。实际的宪法，即实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书面的宪法就要改变。谁的力量大，谁的权利就大，力量先于法。1848年革命的缺陷就在于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起草宪法方面，而没有把君主控制的军队变成人民掌握的工具。在此，拉萨尔虽然在思想中加进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总的说来，他没有真正领会唯物史观，而是使它庸俗化。拉萨尔所说的“力量”概念主要指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也就是俾斯麦所极力推崇的“铁和血”，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拉萨尔关于力量先于法的观点本来是批评反对封建统治不够坚决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激励工人阶级去彻底地反对封建统治，而是引导人们屈服于普鲁士王朝的高压统治。他认识不到人民群众身上的“力量”。

拉萨尔的另一个理论是“铁的工资规律”。他认为，工人的工资永远围绕着按照每个时代的需要、属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这个极限波动，时而稍高于这个极限，时而稍低于这个极限。这是一个“铁的”规律。他看到工人生活相对贫困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他用人口的自然增减说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认为，如果实际工资长期高于这个极限，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就会刺激人口增长，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工资重新下降到极限以下；反之，如果实际工资长久低于这个极限，就会减少生育，劳动力供应短缺，工人工资又上升到极限以上——这样，他就走到了唯物史观的反面。为了消除这种状况，只要通过国家建立生产合作社，将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得给予工人，工人成为自己的企业主，工资和利润的区分就会消失，“铁的”规律就会被废除。拉萨尔

实际上是用普遍的私有制代替个人私有制。

以上就是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些基本观点。实际上，这些观点在提出的当时很多都是直接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是为了同唯物史观相抗衡的。为了消除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激烈斗争。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过程

拉萨尔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和危害，直到拉萨尔去世后仍未消除。拉萨尔的追随者施韦泽等继续在工人中推行拉萨尔的路线。梅林、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时期内也没有认清拉萨尔主义的实质，甚至还为拉萨尔辩护。因此，揭露拉萨尔主义的实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引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就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克思同拉萨尔的交往是从马克思编《新莱茵报》时开始的。当时拉萨尔正在办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件，《新莱茵报》曾拿出一定篇幅报道案件的情况。马克思的目的是想通过揭露封建贵族内部丑闻进行革命宣传，绝不是对拉萨尔本人抱有什么好感。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拉萨尔身上存在着的恶劣本性，恩格斯后来回顾说，我们“断然拒绝同一个从事这种声名狼藉的案件而势必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合作。无论马克思或者我都从来没有同拉萨尔合作过”^①。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拉萨尔曾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勇气，他隐藏被追捕的同志，帮助他们逃跑，救济被捕工人的家属，让自己的住所成为工人聚会的场所，与在伦敦的马克思通信，通报国内情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19页。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以很高的评价。1850年6月，马克思主张吸收拉萨尔为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但是拉萨尔所在地区的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向马克思指出了拉萨尔的许多毛病，反对接受拉萨尔，马克思也并未勉强。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始终是客观的和谨慎的。在早期，当拉萨尔的恶劣本性还不曾对工人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时，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拉萨尔的功劳，说：“拉萨尔虽然‘但是’很多，却是坚强而精力充沛”，“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而他的那些卑下的、从属的情欲和私事（他将在为公的借口下永远醉心于这些东西），是众所周知的”^①。对于拉萨尔在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更是积极加以肯定，认为这是他的“不朽功绩”，是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极大贡献。恩格斯说：“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②。同时，恩格斯对于拉萨尔的难以改变的本性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③。1856年，当拉萨尔的恶劣本性逐渐暴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不满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他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而是要准备跟他“决裂”了。

在思想上，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对拉萨尔持批判态度。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学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出版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27、2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

马克思评价说：“这本书充满了老年黑格尔派的精神”^①，“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说的绝对没有加进一点新的东西”^②。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恰恰击中拉萨尔唯心主义的要害：“我很想在这本书中找到你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批判态度的证明。既然这种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那末，另一方面，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③当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出结论之后，拉萨尔仍然在这个问题上持错误态度，足以证明拉萨尔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巨大“鸿沟”。

在《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中，拉萨尔试图建立一个永久有效的“形式法律逻辑学”，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旧的法律制度走向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对此，恩格斯说：“这家伙很迷信——还相信‘法的观念’，绝对的法。……即使从纯哲学观点来看，他也应当懂得，只是过程而不是过程的仅仅暂时的结果是绝对，这样，除了历史过程本身以外，他就不能得出任何别的法的观念了。”^④

拉萨尔唯心主义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上表现为明显的颂扬“天赋王权”和亲俾斯麦倾向。他不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前提出发，而是从所谓的概念的运动出发，认为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极端利己主义相比，王权更能体现国家作为伦理意志的整体性和统一性。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过分相信资产阶级。在拉萨尔看来，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俾斯麦为首的封建容克贵族。对此，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同样关心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与资产阶级结成反封建的联盟，决不能被普鲁士政府为了分化革命力量而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波拿巴主义措施所迷惑。“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7、263、54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06页。

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①

1862年，拉萨尔发表《工人纲领》，为自己在工人运动中赢得了巨大声誉。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②。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创始人和领导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拉萨尔。拉萨尔抄袭马克思为工人运动所创立的科学思想，并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招摇撞骗，这是他能够获得工人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工人纲领》，马克思说它“无非是把《宣言》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禅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③。1862年7月，拉萨尔同马克思建议，在德国工人中宣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的理论，受到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说：“我们在政治上，除了某些非常遥远的终极目的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④。由于拉萨尔坚决推行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于1862年同他断绝了长期以来保持的通信来往。

1863年，拉萨尔参与组织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得到马克思的很高评价。马克思说：“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马克思同时也批评了拉萨尔犯有很大的错误，指出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⑤为了防止德国工人运动进一步走入歧途，马克思积极支持德国党内威·李卜克内西等人反对拉萨尔的斗争，计划揭露拉萨尔的阴谋，解除他的职务。

拉萨尔去世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著作和文章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5—2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8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0、27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

判拉萨尔主义，但是，在很多著作中，有些论述是直接针对拉萨尔的。如《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德国农民战争》再版序言等。在这一时期，对拉萨尔的批判主要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他们给第三者及给拉萨尔本人的信的方式进行。拉萨尔的意外死亡使它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没有发展到公开决裂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此时仍然给拉萨尔一些肯定的评价，这从他们对拉萨尔之死的反映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拉萨尔的许多阴谋在当时还鲜为人知。在1865年，马克思说：“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比我们过去怀疑的还要密切得多。”^①另外，为了替十分脆弱的德国工人运动着想，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暂时替拉萨尔辩护，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敌人的敌人”。只是到了1875年，浸透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哥达纲领》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公开地、系统地、彻底地从理论上清算了拉萨尔主义。

拉萨尔主义没有随着拉萨尔本人的去世而消失，相反，拉萨尔的门徒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等人仍然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推行机会主义。为了孤立和打击拉萨尔主义，1869年8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下，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此后，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别：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1875年5月，一方面是为了壮大工人革命斗争的力量，另一方面，拉萨尔派自身力量日渐衰弱，要求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于是两派在哥达城召开合并大会，并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合并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告诫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合并的基础是以科学共产主义原则改造拉萨尔派，而不是以拉萨尔主义改造爱森纳赫派。但是，李卜克内西不听劝告，向拉萨尔派作了妥协和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5页。

步，在大会上通过了以机会主义为基础的纲领，即《哥达纲领》。为此，马克思于1875年4—5月写下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交给德国工人党的领导人白拉克、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传阅。恩格斯也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信集中批判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对拉萨尔主义的第一次全面批判。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反动的一帮”理论。拉萨尔曾说：对工人阶级来说，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指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下述思想的严重歪曲：“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①。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中得出这种结论的。他们同时认为，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的封建主和中间阶级来说，是被当作革命阶级来看待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之所以是革命的，是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

第二，批判《纲领》完全抛弃了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拉萨尔主义者以狭隘的民族观点对待工人运动，认为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活动，各民族的联合只是自然而然的最终结果，只字不提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马克思指出国际主义原则是大工业生产形成的世界性联系对工人运动的必然要求。为了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的国际阴谋政策，工人运动更应该坚持国际主义原则。

第三，批判拉萨尔“铁的工资纪律”。马克思指出，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①拉萨尔不懂得：工资并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盖形式。调节工资的规律非常复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说明，根本不可能象拉萨尔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二语来解决。

第四，批判拉萨尔的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理论。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是拉萨尔主义的核心。在合并大会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合并的条件是拉萨尔派必须首先放弃“国家帮助”的幻想。实际上，这种理论并不是拉萨尔的独创，而是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那里原封不动地剽窃来的。他把社会主义降到了资产阶级的水平，从工人运动的立场退到了宗派运动的立场。而且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实际上是俾斯麦的军事专制国家，这就更加暴露了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性质。

第五，批判“纲领”忽视工会的作用。拉萨尔否定工会的阶级性质，主张工会同资产阶级一样去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指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象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②

在批判拉萨尔主义时，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最重要的成果是《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明确论述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页。

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是在他的思想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出发，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神圣家族》区分了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种理解。《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把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从而与各种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时，马克思的思想侧重点是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作论证，还没有明确地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经过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特别是经过《资本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深入考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地依照经济成熟程度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并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的新思想是从批判《哥达纲领》的唯心主义开始的。纲领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所以未来社会的准则应当是，劳动所得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指出，这种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设想所依据的准则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只有当劳动本身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者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自然界时，劳动才能成为财富的源泉。任何劳动都是以自然界为前提，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撇开自然界或劳动对象而空谈抽象的“劳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说法”。资产阶级撇开社会关系，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正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事实，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作论证的。

第二，所谓“劳动所得”应当属于社会，完全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适合于一切阶级和一切时代。把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口

号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原则，显然与工人运动鲜明的阶级性质相矛盾。用“劳动所得”来说明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另外，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不切实际的。为了保证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① 另外还要扣除一些公共消耗：“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②。只有排除这些因素之后，才能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那部分消费资料。

第三，所谓“公平”原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洞口号。马克思指出，不是经济关系由法权观念来调节，而是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观念。“公平”本身所包含的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要阐明自己同已有的对这个原则的解释的差别，而不是重复资产阶级的说教。

通过对“纲领”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结论：在预想未来社会时，“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0页。

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①。对社会历史形态的考察必须依据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滥用的诸如公平、平等之类的一般概念，这是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据此，马克思分析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经济特征。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特点在于，“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②。这是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据此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③。按劳分配原则具有两重性。从形式上看，这种原则是一种平等的原则，生产者本身的权利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他从社会中领得与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但是，由于每一个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差别，依照劳动量而分配给每个劳动者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另外，由于劳动者的家庭和子女数量的差别，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一些，因此，这种平等从内容上来说又是一种不平等。它只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即作为劳动者去看待人，而把其他一些方面都撇开了。马克思称按劳分配从原则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0、10—11页。

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产品还不丰富，单纯用劳动尺度衡量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条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因素在新社会中还起作用，因此，这时的分配原则只能是按劳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马克思批判了纲领宣扬的“劳动所得”、“公平”、“权利”等抽象概念，赋予这些概念以具体的社会经济内容，从而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同样是马克思所列举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产物：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十分充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被消灭；片面的分工被消灭等等。

马克思批判了把分配看作是经济活动的本质，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③。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工人阶级只有人身的生产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13页。

件，结果必然是资本家以获取利润的方式剥削劳动者。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同样要产生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经济形态上的差别。这是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同高级阶段的共同之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同资本主义的天壤之别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是在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对比的前提下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恰恰是“纲领”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说明未来社会。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个人劳动同劳动对象不再分离，它们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其次，等价交换原则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①。它们不再意味着剥削和被剥削。第三，对于“平等的权利”这一概念来说，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相互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等价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个别的交换常常偏离这一原则，等价交换的原则与每一个别交换活动是矛盾的，生产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价交换在每一个别的交换活动中都得到体现，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经济活动中的形式的平等得到充分保证。社会生产在计划的指导下进行，个人不再担心不能掌握自己的劳动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条件被充分调动起来。

四、论“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时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到了“过渡时期”概念，认为从私有制的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社会有一个“过渡时期”。1852年，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地将“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后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但是，较为系统地提出和阐述这个问题的，还是《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列宁曾经指出，《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光辉的著作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关系作了最详尽的分析。^①

拉萨尔主义的一个基本策略是通过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它把国家看成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②。《哥达纲领》寄希望于“自由国家”，即实现了普选权的国家。由“自由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拉萨尔主义为工人指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纲领”所要求的“自由国家”，从理论上说是荒谬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代国家在每个国度各不相同，在普鲁士德意志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美国不一样。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同一的国家。如果说现存的不同文明国度中的国家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它们具有一些共同性，但这些国家无疑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不是“纲领”幻想的“自由国家”。

拉萨尔主义者总是用一些纯粹民主主义的词汇来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例如“自由国家”、“人民国家”、“信仰自由”等等。马克思认为“纲领”充满了“对国家的忠顺信仰”和“对民主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页。

奇迹的信仰”。他们不愿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对工人阶级来说，不是要重复这些被资产阶级滥用的口号，而是要对这些口号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超出它们。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①。对国家也是一样，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只是使国家神秘化、永恒化，对旧有国家做一点修修补补的事情，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使国家消亡。

马克思指出，拉萨尔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由国家”或“人民国家”要么是空想的，要么是已经实现了的。说它是已经实现的，是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在德意志帝国境外的瑞士、美国等已经实现了。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而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还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向这种国家乞求社会主义，并且坚持用合法手段，只能是反动的空想。

说它是空想，是因为拉萨尔主义将“自由”与“国家”这类相互矛盾的概念纠合在一起来表达自己对未来国家制度形式的设想。恩格斯指出：“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它本身就是自由与不自由、平等与不平等、民主与不民主的混合体。用自由来界定国家，只能导致思想混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的阶级性。国家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如果离开国家的阶级属性，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①。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现存社会是现存国家的基础，未来社会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因此，对我们来说，具有实际意义的国家只有两种，一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一是工人运动所极力争取的未来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后，新型国家自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它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的“自由国家”或“人民国家”。这种新型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未来国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全面转变这样一个革命时期的产物，是与这一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政权形式。未来的国家也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用来保卫革命成果、镇压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强有力工具。

马克思的“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途径问题。

五、《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意义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于肃清19世纪后半期在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起了关键作用。尽管此书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内部传阅，但是工人运动此后实际上是依照《哥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1页。

达纲领批判》所指明的路线前进的。到1890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抛弃《哥达纲领》，决定重新起草一个新的纲领草案。而这时，

“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①。1891年，恩格斯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反对而首先发表了此书。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尽管这个纲领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它肃清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贯彻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工人运动纲领。这些成果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哥达纲领批判》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又一光辉典范。它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正如《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样，《哥达纲领批判》以唯物主义原则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勾勒了一个基本的轮廓。马克思的科学预见不断为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实。

《哥达纲领批判》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意义在于：“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共产主义从遥远的将来转变为工人阶级实际追求的目标，从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反抗转向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机关。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2页。

践一再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阶段，怀疑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要走到机会主义的老路上去。

马克思在论述“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还为社会主义者留下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①这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紧迫理论课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文章本身的论战性的缘故，马克思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马克思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对“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作了科学的预见。对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考察，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总生产的分配规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论述，进一步清除了笼罩在共产主义之上的空想的光环。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成为后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理论依据。列宁一再重申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将要经历“长久的阵痛”，经历从“第一阶段”到“高级阶段”的理论。他指出，对于经济落后的俄国来说，不可能不经过中间环节而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过渡时期”将是一个更长、更艰巨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也将经历一个发展过程，首先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后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都是《哥达纲领批判》的运用和进一步发展。

《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它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

发展观，就是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发展过程来对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还只是一种科学的预测，比较笼统。但是，马克思在此遵循的认识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无论是在一百年前的过去，还是在今天，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从不对未来社会妄加推测，他的每一论断都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马克思在预测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前，首先通过对“纲领”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确立了预测未来社会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为马克思预测未来提供了素材。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①。马克思一方面正视和承认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存在的“弊病”，另一方面又决不因为“弊病”存在的必然性而影响寻求克服它们的积极性。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阶段理论的更深刻的哲学含义在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艰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这是贯穿《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中心思想。马克思从来没有为工人阶级具体设计一个绝对完美的理想社会。他在指明了激励人们前进的奋斗目标时，也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列宁在评价《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意义时写道：“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也没有从事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②共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94页。

主义是我们向往的伟大目标，但它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东西，而是依靠共同的奋斗才能达到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于，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从总体上看，它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它又是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种历史造成的客观情形使它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形态又有区别，使它同旧社会的残余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不断得到发展的。从这种实际状况出发，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只能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清除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但从原则上来说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人的全面平等。因此，按劳分配原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种矛盾是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矛盾在分配原则上的体现。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过去与将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体。如果片面夸大矛盾的某一方面，就会容易导致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忽视社会主义与它从中脱胎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系，忽视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的发展，就不能建立牢固的社会主义基础，甚至会使工人阶级通过斗争得来的成果丧失掉；一是忽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将一些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具备的特征强行移植到社会主义阶段，在条件还不成熟时就追求向高级阶段过渡。这两种倾向在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都曾反复出现过，危害极大。

《哥达纲领批判》是我们批判右的和“左”的思想倾向，积极、稳步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任何否定和歪曲《哥

达纲领批判》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倾向都是错误的。

第四节 在批判“苏黎世三人团”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阶级斗争理论

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迅速增长，引起俾斯麦政府的严重不安，他们寻找各种机会来对付日益强大的德国工人政党。1878年5月和6月间，发生了两起谋杀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俾斯麦便把它归罪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非法组织，其成员不得不转入地下或移居国外。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德国工人运动面临着新的考验。

面对普鲁士政府的强行压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莫斯特、哈赛尔曼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极力反对利用议会和合法机会进行斗争，鼓吹个人恐怖手段；一是因统治的高压政策惊慌失措，不敢向统治阶级的强权抗争，幻想用一些温和的措施做一些不致激怒反动政府的补缀工作。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苏黎世三人团”。他们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德国工人运动中当时存在的拉萨尔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新代表新康德主义者如布伦坦塔、杜林、朗格等人的思想，直接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阶级。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批判。

一、“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

“苏黎世三人团”是指卡·赫希伯格（1853—1885）、爱·伯恩斯坦（1850—1932）。卡·奥·施拉姆三个人。在俾斯麦政府

宣布“非常法”之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决定在苏黎世创办一份党的机关报，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为了争夺对报纸的控制权，便在共同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于1879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以三颗星花署名的赤裸裸地宣扬右倾投降主义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实际上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彻底否定。它认为，德国工人党对于反社会党人法也负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①。现在，反社会党人法为党提供了一个“间歇”，党应该明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应该进行“忏悔”，重新制定自己的纲领。然后，他们就为工人运动制定了一套彻底的机会主义纲领。

第一，工人运动应当是“全面的”，即“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②。拉萨尔就是这样做的。他死后，工人运动“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工人运动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忽视在上层社会中进行宣传。它应该在上层社会中寻找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人物，把领导权委托给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人。

第二，工人阶级应该放弃阶级斗争，走合法的或改良的道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说：“正是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在批评现行制度时要“平静、客观和慎重”，以免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就是一个错误，它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7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页。

“怨恨”，并使那些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过去的宣传方式是“谩骂”，太“伤风败俗”。应该停止对资产阶级的过分攻击，因为他们“只是时代的产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不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不偏不倚的方针。^①

第三，工人阶级应当把最终理想暂时搁置起来，用全部力量来达到某些最近的能够带来好处的目标。这样，资产阶级和工人就不会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就会大批地投靠我们。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太遥远，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没有意义，应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

为了驳斥“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9年9月17—18日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揭露了赫希伯格等人试图控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的阴谋，批判了他们为报纸制定的机会主义纲领。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二、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贯穿“苏黎世三人团”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和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工人政党的阶级特征，放弃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争取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有力的批驳，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的重要理论。

恩格斯指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出现绝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行为“过失”，而是因为统治阶级撕去了伪装的面纱，是他们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6—187页。

的阶级本性的充分暴露。高压政策并没有使工人“退却”，而是打破了可能产生的对宪法自由的幻想。“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①。同时，俾斯麦政府的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将会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阶级斗争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统治阶级最害怕的东西；“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②。反社会党人法的颁布并不证明俾斯麦政府的强大，而是说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惧怕。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恰中俾斯麦政府之意，然而上当的只能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工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作用。在反社会党人法之前，德国工人阶级通过合法斗争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事实。但是，这是工人连续不断斗争的结果，工人运动每前进一步，都是通过斗争实现的。如果象“三人团”要求的那样放弃阶级斗争，就决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合法活动，有了人民的选举，就可以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实际上，合法斗争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恩格斯在后来总结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工人运动时指出，工人阶级应该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重新争取合法手段，德国工人不应丧失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的机会，“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页。

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遍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①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充分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来争取胜利。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阶级斗争这个最有力的武器。

“三人团”要求无产阶级停止对资产阶级的“攻击”，说他们“只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②。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苏黎世三人团”的这些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他们与1845年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1848年革命中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是同一类。正是他们在1848年和1849年革命中的怯懦表现使运动遭到失败。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同政府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论断结束。这些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6页。

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①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共产党宣言》、1852年给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线索。

三、论掌握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政党是以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新型政党，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的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但是，“苏黎世三人团”竭力否认并取消这一点，鼓吹让有教养、有知识的资产阶级领导工人政党，妄图改变党的阶级性质，把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党。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对这种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原来属于统治阶级的人加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于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②。但是，如果党的纲领取消了党本身特有的阶级性质，把争取“诚实的”资产阶级加入作为纲领的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自己出卖自己”。同时，“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么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条件是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指出：“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8、189页。

观”^①。为此，其他阶级中要求加入工人政党的人，必须要经过一个思想的改造和转变过程，承认党的纲领，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熏陶。赫希伯格等人却要求以“仁爱精神”、“博爱”等资产阶级的空话作为加入党的条件，党应该坚决地加以拒绝。

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态度是：把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结成同盟与让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两件事区别开来。资产阶级有权利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同它们谈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结成联盟，但绝不能让他们影响党独立地开展工作，而且要对最终必然与他们发生的分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重申了他们在第一国际明确规定了的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工人阶级并不放弃争取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工人运动中来，也不笼统地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但是这些必须以不放弃原则为前提。工人阶级政党绝不能产生对所谓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依赖思想，而是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依靠自身的斗争实现彻底的解放。

四、《通告信》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写于俾斯麦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法刚刚颁布的时候。这个反动法令持续了十二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也经受了一个严峻的考验。《通告信》为工人运动如何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展活动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通告信》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每当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挫折时，修正主义就会死灰复燃，一次次地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虽然它们的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式可能有所变化，其理论基础实际上一直沿袭了“苏黎世三人团”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中提出的一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通告信》所阐明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反对机会主义、保障社会主义前进的正确方向的重要理论文献。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攻击和谩骂的部分。幻想放弃阶级斗争而仍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不仅在无产阶级通过顽强的斗争而赢得了一些成功时需要坚持阶级斗争，而且在处于高压统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会带来更大危险时，也需要坚持阶级斗争；不仅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时要坚持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取得了阶级统治、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也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坚持或放弃阶级斗争，这本身就是实际的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体现。如果放弃了阶级斗争，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事业。当然，阶级斗争在不同时期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以及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具体策略，是会不断变化的，这需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前进，工人阶级政党也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工人政党的纯洁性的保证。恩格斯指出，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①。思想统一性是组织上统一的前提。党组织和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增强自身的战斗力和抗腐蚀能力，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6页。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前后同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论战，贯穿着两种历史观、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为工人运动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而且从世界观上揭露了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错误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权威观，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指出了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针对米尔柏格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住宅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论证了经济基础决定法权观念的唯物主义原理，指明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差别是解决住宅问题、消除城乡对立的根本途径。

针对拉萨尔主义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和对未来社会的唯心主义空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指出“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并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个经济上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来看待，为认识未来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针对苏黎士“三人团”否定阶级斗争、放弃革命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的重要思想，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依靠革命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有力地回击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挑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工人阶级，促进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推动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第二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 富和发展

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不仅在理论上继续得到丰富、发展，而且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开始在工人运动中取得支配的地位。1875年5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胜利的重要的体现。从此，马克思主义对工人政党、工人运动的指导，成为它们健康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关键。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大力地提倡各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德国，在所谓“新理论”、“新哲学”的幌子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种种理论，各种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体系纷纷涌现。它们竭力影响刚刚实现统一的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重新泛滥，妄图把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引向歧途。19世纪70年代形成并发生恶劣影响的杜林主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的代表。

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就集中地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世界观的问题上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形势的要求，亲自参加和指导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德国工人党、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反杜林论》就

是这场斗争的产物，并且在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彻底批判了杜林主义，而且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杜林主义的出现和内容

杜林主义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德国出现和发生影响的。要理解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的深刻意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斗争中的巨大贡献，必须先了解杜林主义在什么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它的特定的内容、性质。

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通过由上而下的方式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妥协的结果。统一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迅速发展，70年代至80年代的德国工业赶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哲学和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学说都活跃起来，并竭力向社会各阶级、阶层渗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无产阶级加强了经济上的剥削和思想上的侵蚀。

但是，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使德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巴黎公社以后，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因遭受镇压而暂时沉寂，英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因受工联主义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德国的工人运动却迅速兴起。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通过合并，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成果，又为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恩格斯在1874年7月写道：“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

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①。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揭示了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总的特点和它在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地位。

可是，当时德国的工人政党、工人运动还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和弱点，即理论上的不成熟。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迫长期流亡于德国之外，被剥夺了同德国广大产业工人的直接的接触与交流。再者，到70年代中期为止，用德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只有《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等，印数多为一千册。这对德国工人群众直接学习、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理论，显然是有局限的。在建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原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虽然明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无原则的妥协，在新的纲领中包容了不少拉萨尔主义的观点。不少拉萨尔派分子参加了党的各种机构和积极开展活动，在党内继续坚持和宣传拉萨尔主义的观点。这样，两派合并在某程度上降低了工人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杜林主义正是在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大肆泛滥的条件下形成，在德国工人政党、工人运动理论上不成熟和不一致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的。

一、杜林主义的形成

杜林主义是一种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以折衷主义哲学和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潮，欧根·杜林（1833—1921）是它的主要的代表。

杜林于1853—1856年在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在柏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市法院从事法律工作。1861年，他以题为《论时间、空间、因果性兼论微分逻辑》的论文，在柏林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因严重的眼疾而双目失明。1863年，他先后申请参加柏林大学哲学系和经济系的教授备选资格考试，都被大学当局拒绝。1863年冬，他取得柏林大学私人讲师的资格。从此，在该大学讲授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课程。1877年7月，他因批评德国大学的教授选聘制度和对柏林大学的某些教授进行人身攻击，被当时的俾斯麦政府以“侮辱大学和大学教师”为理由取消了私人讲师的资格。后来，他移居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以著述终了此生。

杜林成为杜林主义的头面人物，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的思想的演变，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杜林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开始到1870年，这是杜林主义的孕育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871年杜林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开始到1877年，这是杜林主义形成和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在杜林离开柏林大学以后，这是杜林主义的衰退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内，杜林出版了相当多的著作，如《自然辩证法》（1865年）、《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65年）、《生命的价值》（1865年）、《资本和劳动》（1865年）、《关于经济合作和社会结社的条陈》（1865年）、《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1866年）、《哲学批判史》（1869年）等。涉及的学科领域，主要是哲学、经济学。杜林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一种独立的、尚待建立的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因为经济生活只是政治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所以，杜林在研究国民经济学时，考察和阐述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改革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杜林打着“社会改革”的旗号，大力宣扬“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社会改革”和“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与后来的杜林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但在这个

时期的思想中，又孕育、具备了杜林主义的某些特点：在政治上，坚持非暴力的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立场；在经济上，宣扬把分配作为重点的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在哲学上，奉行只深究、确定世界的模式、形式的实证主义方法。总之，杜林第一个时期的思想，为杜林主义的形成、出现作了初步的准备。

1871年至1877年，是杜林思想演变的第二个时期，也是杜林主义的形成时期。杜林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如《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年）、《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年）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笼的。杜林主义作为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他的著作和活动中形成和充分地表现出来。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的面目出现，贩卖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货色。

在60年代中、后期，杜林虽然大肆鼓吹所谓“社会改革”和“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但除了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注意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并无明显的影响。于是，到70年代，他装扮成“社会主义的行家”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家”，宣称要改变雇佣劳动制和暴力国家，抛出“共同社会”的体系，不但具体描绘了“共同社会”的未来图景，还着力设计了“共同社会”的实施方案。可见，这种新货色不过是在阶级合作的基础上构筑“未来社会”的幻想。

首先，杜林认为社会主义出于人类本性和自然规律的要求，否认社会主义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具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杜林鼓吹人的本性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最初的两个人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的意志不能也不应支配另一个人的意志。他说：“在我们的关于两个人的模式中，任何一个人都没

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①在杜林看来，单独的个体是组成一切社会机体的原子，个人的自由意志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最高裁决者。他说：“个人是一切权利的唯一起点和终点，而联合形式只是从个人出发向个人前进的中介。每个结合有多少真正的生命力，就看它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体现个人的自由意志”^②。杜林认为社会主义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相结合的产物，个人之间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显然，这种社会主义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幻想和唯心主义的虚构。

其次，杜林认为社会主义是消除人对人的支配和实行平等分配，否认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杜林闭口不讲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是大肆鼓吹消灭“暴力的所有制”。杜林认为暴力所有制是一种统治形式，它不仅禁止人们使用天然的生活资料，而且强迫人们去从事奴隶的劳役，其本质在于依靠强制、暴力实现人对人的占有和支配，具体表现在劳动产品的不公平的分配上。在杜林看来，一切困难和祸害都不是在生产领域中，而是在分配领域中。因此，只要废除雇佣奴役制，即废除人对人的占有和支配，使每个人既可以平等地参加各项生产活动，又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劳动的全部所得，这就是社会主义。杜林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描绘过的。

再次，杜林认为可以利用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否认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炸毁旧社会的上层建筑。杜林鼓吹“到达完全自由的社会之前，可以说不得不继承暴力国家，并把它现有的中央集权制变成改变人民生活的起点”^③。他认为，一方面，可以组织工人联合会，并使它变成政治的工人运动的支柱，对国家立法施加影响。他说：“这样的一些结构可以逐步地挤进

① 杜林：《哲学教程》1978年商务版，第161页。

② 杜林：《哲学教程》1875年莱比锡版，第237页。

③ 杜林：《哲学教程》1875年莱比锡版，第326页。

压迫的国家的框框里去，这些结构不仅对压迫的国家来说将成为致命的东西，而且将为自由社会准备良好的基础”^①。另一方面，他认为还可以利用立宪制度、暴力国家以至包含在军国主义中的力量，为达到最终目的服务。如，通过国家制定工人法，调停劳资争端，干预企业活动，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等等。杜林的这套方案不仅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阶级合作去扼杀社会主义。

杜林的上述理论观点表明，他的社会主义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想社会主义。

第二，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侵袭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力图控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由于在前一时期没有得到德国统治阶级的实际重用，杜林在这个时期转向德国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进行政治投机。因此，杜林改变了前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攻击的矛头公开指向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居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企图以杜林主义取而代之。到了19世纪70年代，杜林就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对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极尽歪曲、诋毁的能事。

在哲学方面，杜林诬蔑马克思的理论是“黑格尔的非逻辑学”的再版，是“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马克思利用它“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杜林还恶意地歪曲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捏造事实说：“由于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点，所以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显得多么滑稽”^②。在这里，杜林一方面攻击马克思把辩证法当作现成的公式去剪裁事实，另一方面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因

① 杜林：《哲学教程》1875年莱比锡版，第308页。

② 转引自《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4—137页。

袭，妄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在经济学方面，杜林集中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由于剩余价值学说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的，因此杜林首先否定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在1867年发表的关于《资本论》的评论中，杜林就声称“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并非无可争议”^①。杜林在歪曲、否定劳动价值论后，进一步直接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证明，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就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工人的劳动力的消耗即劳动去创造商品的价值，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工资用以维持工人的生活，而剩余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占有，所以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可见，只有运用剩余价值的理论，才能真正揭示资本的本质。但是，杜林却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②。

杜林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妄图动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以便进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杜林从攻击马克思的经济学进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在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对抗规定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与此相反，杜林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中鼓吹：“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第二等的反作用……只要人们把政治分派看作不是达到自己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末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8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0页。

反动性”^①。杜林所谓的“隐蔽的反动性”，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经济的必然性，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依靠工人阶级的软弱，即依靠资本家不断加强剥削和工人生活的日益贫困。显然，这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而是杜林的彻头彻尾的曲解、伪造，是杜林强加于科学社会主义的。

其次，杜林还从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攻击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辩证法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运动的历史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通过剥夺直接生产者和否定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私有制而产生的，这是第一个否定；现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将要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否定的否定。杜林在《哲学教程》中抓住这一论述，攻击马克思借助辩证法的拐杖的支撑才得以制造出未来的社会主义。他说：“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②。这当然又是杜林的歪曲和臆造，是经不起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的。恩格斯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杜林在1867年发表的关于《资本论》的评论和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中对于《资本论》的批判都没有进行这一攻击，只是到1875年出版的《哲学教程》中才抛出这一捏造和诬蔑。这暴露杜林这时为了急于用他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的社会主义去支配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的和荒谬的攻击，决不仅仅是出于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3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2页。

纯粹的理论上的对立。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杜林要用他的所谓的“终极真理”去侵蚀、支配德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这种政治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杜林在其著作和讲课中都以激进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同时极力虚构种种关于未来社会的方案，以迎合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坚定或不成熟的年轻人的心理。果然，爱·伯恩施坦在读了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与《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以后，认为它们阐述了马克思没有阐述过的某些问题，对之赞叹不已，觉得受到鼓舞。1874年，伯恩施坦去拜访杜林。在初次的访问中，他就请求杜林讲授有关社会主义的课程，把时间安排得便于职工听讲。对此，正中杜林下怀。杜林立即对伯恩施坦说明，很高兴能有较多的党员来听讲课，并且要伯恩施坦经常去他那里。杜林甚至使用了“党员同志”的说法，装扮出社会民主党的战友的样子，并以全体党员的导师自居。杜林的这些言行，充分暴露了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野心。

第三，打着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旗号，拼凑反科学的杜林主义的理论体系。

第一个时期虽然在观点和方法上出现了杜林主义的某些特点，但还没有形成杜林主义的体系。在第二个时期，出于用自己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进而支配德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杜林竭力拼凑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年）、《哲学教程》（1875年）是他构造体系的主要著作，因而它们也是杜林主义的代表作。在这些著作中，杜林一方面公然地窃取各有关学科的历史上和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许多成果，把它们当作其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另一方面又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横加指责甚至全盘否定，把自己标榜为超越他们的“终极的真理”的发现者，并厚颜无耻地吹嘘他的理论体系是“最后的、终

极的真理”的体系。显然，运用这种反科学的态度和手法炮制出来的所谓“理论体系”，必定是庞杂错乱、矛盾百出的折衷主义货色。

在第二个时期，杜林从阐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来构造他的理论体系，这表明他的体系是以其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共同社会”体系是杜林在其思想演变的第二个时期中炮制出来的。

“共同社会”（“Socialitaet”）这个词就是由杜林生造的，它与 Socialismus（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相同而词尾不同。杜林抛出“共同社会”体系，一方面，是为了表明其社会主义思想与已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显示其“独创性”；另一方面，是用以对抗、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妄图使它成为德国工人政党的纲领和旗帜。

杜林吹嘘他的社会主义“真正同普遍的和科学的基础相结合”，也就是说同他的国民经济学相结合。他说：这种精确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理论和政治，这种理论和政治迟早一定会同国民经济学的幼芽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尽管可能是长在相互分离的枝干上的知识领域”。他还宣称他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承认固有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是以社会状况为出发点的。那末，杜林从社会状况出发，应用他的新的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呢？首先，他反对生产决定分配的科学观点，鼓吹现代社会的一切祸害都是不公平的分配产生的。这种不公平的分配，一是表现在生产的分配上重视上流社会所需的奢侈品，而忽视劳动者所需的低廉消费品的生产；二是由上述情况引起的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低下。其次，他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科学观点，宣扬由于工人的利益的完全一致，资本家难以长期把工资压低在仅仅维持最低生活的水平上。而生产的扩大又有利于劳动力的使用，从而促进工人工资的增长。再次，他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首

先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科学观点，宣扬在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社会自助”开始未来新社会的建设。他主张一方面把工人联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统一的整体，按照合作的方式组织生产；另一方面由中央国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立法来促进这种联合和生产，这样就可以实现所谓的“经济公平”。杜林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从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勃朗、拉萨尔和庸俗经济学家凯里那里抄袭、拼凑而成的陈旧货色。

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中，杜林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企图对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加以经济学的论证。在上一本书里，杜林主要是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它的经济学基础。在这本书的1876年第2版中，杜林抛出了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即所谓“共同社会”体系。在这里，杜林的个别的细小的观点有所改变，但仍然继续坚持、发挥他的基本观点。他不得不承认，经济状况的最新发展阶段对于工人经济状况的改善是不利的，机器等先进技术装备的运用使工人的竞争加剧和使工资降低。但他又认为在现存经济制度下，存在着工人摆脱雇佣奴隶制的可能性，这主要依靠工人的社会自助。关于社会改革的途径、前景，杜林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一种是对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基本上不加触动，只是加进一种反作用去弥补现存制度的缺陷。例如，他认为工人的工资提高，可以改变现有生产的方向。另一种是以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为前提条件。即在改变雇佣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新社会。杜林的“共同社会”体系，就是从阐述这种可能性去展开的。在杜林看来，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基本上全面的阐述和理论的论证。

这些，就是杜林作为新发现向人们兜售的货色。其实，它们却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那里抄袭来

的陈旧货色。如果一定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深深地打上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烙印。然而，杜林主义作为一种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时，以折衷主义哲学和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这个时期才拼凑完成的。

1878年后，是杜林思想演变的第三个时期，也是杜林主义的衰退阶段。在这个时期里，除了某些再版的著作外，如《现实哲学》（《哲学教程》1895年新版），还有《逻辑和科学理论》（1878年）、《事业、生活和敌人》（1882年）、《用完满的东西代替宗教》（1883年）等。在这个时期，杜林不仅放弃了“共同社会的体系”，而且从第二个时期的“激进社会主义”和第一个时期的“社会改革”的立场蜕变到公开地维护旧的社会制度的立场。首先，他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在第二个时期，他认为个别人对积累起来的社会劳动产品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支配权，是对天赋公平的严重损害。在第三个时期，杜林认为给土地和资本提供的任何补偿，是非常自然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其次，他对待“暴力国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第二个时期，他尖锐地批判和力图否定“暴力国家”。在第三个时期，他鼓吹最坏的国家也胜过如果取消有关秩序而产生的混乱状态。杜林思想的蜕变和杜林主义的衰退，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偶然现象，这是由杜林思想和杜林主义的内在本质决定的。

通过对杜林主义的历史的考察，我们认识到对杜林主义的分析、批判，必须集中于形成时期的杜林主义。恩格斯正是这样展开对杜林主义的批判的，因而能够抓住重点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并在批判中捍卫、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杜林的哲学思想及其折衷主义特征

杜林的哲学思想，主要地和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著作《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

“本书是阐述全部哲学问题的。它的立论形式和我的体系中的立论形式是一致的。……它展示出一种不仅在体系上，而且在历史和批判上都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①因此，从这部著作中，可以了解杜林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它在杜林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它的基本特征。

杜林的《哲学教程》有前言导言、跋和正文八篇22章，共约40万字。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哲学导论，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关于人的学说等四个部分。

杜林关于哲学的意义、哲学的对象、哲学的成分等有关哲学一般问题的阐述，构成他的哲学导论的具体内容。正如他所说的《哲学教程》的立论形式和他的整个体系的立论形式一致那样，都是从概念、原则出发的。杜林先给出哲学的定义，然后对哲学的定义展开论述，从中说明哲学的一般问题。杜林认为，“哲学是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②杜林的哲学定义首先表明，他的哲学思想力图避开世界的本原、本性等哲学本体论的问题，而着重探讨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等观念性的问题。可见，竭力说明意识的本质、内容、作用，并以此为中心去解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般理论，这就是杜林哲学的基本思想。

杜林宣称要了解他的哲学定义的深邃含意，应当给“意识”这个简单的词汇以详尽的说明。杜林鼓吹意识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杜林认为思维和认识的形式都是由简单的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在任何只要可以被认识中都起作用，它们的各种混合就构成真理。意识的至上性就在于它可以发现这些简单的元素，同时确定所有知识的组成和成分，从而掌握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杜林认为哲学的意识包括思想意识和科学知识两种不同要素，哲学就是在思想意识和科学知识两大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前进

①② 杜林：《哲学教程》1978年商务版（以下未作注明者，均为此版），第5、7页。

的。杜林从哲学意识的双重要素去论述哲学的双重任务；说明哲学承担着认识、裁判和改革、创造的双重使命。从杜林关于哲学的意识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他重视哲学的人道主义内容和哲学的改革、创新的功能，但他把这些归结于哲学的无条件的真理权和最高裁判的功能，这就表明它未能跳出旧哲学的窠臼。

为了突出和阐述意识元素在哲学中的重大意义，杜林对哲学的对象和哲学的体系的论证，还是紧紧地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杜林提出哲学的对象应该是关于存在的形式的原则。他说：“哲学所关心的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想象为简单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愿。”^①为了说明他对哲学对象的这种规定，杜林从两方面进行论证。一方面，杜林从事物的构成和对事物的认识来谈。他认为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我们可以直接知道和可以接触到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感觉以外的一切东西，以至对于理性的幻想在其他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仍然可以想象的一切东西也都有意义。他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原则中获得关于组成全部存在的基本材料和相互联系的基本形式。哲学分析听得出的那些原则模式和元素……对于无限制地了解事物应该是够用的。”^②杜林把关于存在的形式的原则规定为哲学的对象，这正是他的先验主义的一种表现。

在杜林的哲学体系中，关于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首先体现为逻辑模式论。杜林说：“完美的世界模式论的构成问题，取决于成功地把存在和思想理解成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里，现实的过程有逻辑的方面，逻辑的过程有现实的意义。”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也为给建构世界模式论提供依据，杜

①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33页。

林宣扬事物的体制和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它同概念的一般逻辑关系是相应的。他说：“事物——作为整体来说——有一个系统的排列和内在的逻辑上的统一性。自然界和历史都有自己的体制和发展。这个体制和发展的本质绝大部分同所有概念的一般逻辑关系是相应的。”^①这样，杜林就得出了一个逻辑的世界模式论。杜林认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的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②自然界和人类世界正是杜林运用其原则的领域，于是在一般的世界模式论之后，杜林又有了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学说。

“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③由此可见，杜林的哲学思想及其体系，完全是建立在关于意识元素的假设、假想之上的。这样，也就从总体上规定了杜林哲学的主观性、先验性、虚幻性。

杜林从对哲学的一般问题的论述中，得出了世界模式的结论。接着，他在“存在的基本形态”一篇里，从存在的基本概念、存在的逻辑特性、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等不同侧面，对一般的世界模式论的内容进行阐述。

杜林的一般世界模式论，从阐述存在是什么或存在的基本概念开始，这是符合他的体系的从原则出发的立论方法的。首先，杜林给出存在的定义：“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④在杜林看来，这是存在的基本概念，也是存在的根本特性。所谓“存在是唯一的”，是指存在是自满自足的和自身等同的。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并列或在它之上。它自身绝对等同，没有任何特殊性的规定。存在既然是唯一的，因而也是包罗万象，因为世界就是万象森罗。那么，杜林是怎样从“包罗万象的存在”推导出“存

①②③ 杜林：《哲学教程》，第35、40页。

④ 杜林：《哲学教程》，第41页。

在是唯一的”结论呢？他说：“这个唯一性是从每一个思维的统一点中推论出来的。”杜林认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思维的“最一般的特性就在于，它可以在没有特殊素质的情况下，得出普遍的统一观点和独一无二的世界概念。”^①这就是说，在杜林看来，思维可以用综合的力量把世界以及可能存在的一切世界纳入它的范围，任何进入这个思维统一体的东西都不能保持自身的两重性，这样就得出了“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的世界概念。

从这里可以看到，由于杜林没有掌握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不了解或不承认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因而陷入了双重的错误和混乱。一方面，他把包罗万象的存在的本质、根本特性归结为唯一性，陷入同义反复；另一方面，他把存在与存在的概念等同起来，依靠思维的统一性引导出存在的唯一性，陷入了以思维决定存在和使存在依赖于思维的错误。其实，从思维的统一性出发，只能得出统一的存在概念或世界概念，并不能证明存在自身是唯一的并得出存在的唯一性的结论。这说明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推论出存在的唯一性是毫无根据的，“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观点是没有得到证明的。

杜林认为，存在的唯一性是指宇宙的唯一存在，存在的统一性是指宇宙的多种多样变换状态之间的联系。这样，杜林就从论述存在的唯一性进到论述存在的无限性。他说：“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可以同另一个状态连结在一起，而无限性就在于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杜林对无限性的理解和论述同样是形而上学的，充满混乱的。他把存在的无限性和数学中数的无限序列等同起来，用数列的无限积累去阐述存在的无限性的本质和特点，从而根本曲解了存在的无限性。他说：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41—42页。

“没有矛盾的加以考虑的无限性的最明显的形式，是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无限性的本质就在于，它根本没有结尾和完结。”^①从这种理解出发，杜林叙述了无限性的若干特点。第一，他认为顺序排列是无限性能够进行的唯一形式。他说：“一个简单的个位数，尽管有时也能表现出无限性，但本身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顺序排列是无限性能够进行的唯一有效形式。”这就是说，无限性只能是象数列那样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作顺序排列。第二，他认为无限性只有一个向前的方向。他说：

“这种被确切的加以思考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的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虽然对我们的思维来说，设想这种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也是无关重要的，可是这种向后倒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的想象。”^②这就是说，无限性只能是向前的方向是无限的，不能有向后的无限性。第三，他认为存在的无限性是有开端的。他说：“既然存在或曰宇宙是从数那样的排列着的状态中产生的，那末这类状态中就应有那么一个排列在第一位的状态，否则就会出现一个不容许出现的虚假的无限性。”^③这就是说，要排除具有两个相反的积累方向的虚假的无限性，就必须承认真实的无限性是有开端的，宇宙有最初的“第一位状态”。承认存在、宇宙有开端，这是杜林形而上学和简单化地理解、阐述存在的无限性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杜林的一般世界模式论在阐述存在的基本概念后，接着对存在的逻辑特性进行阐述。他认为存在的逻辑特性与前面论述的存在的基本概念有所不同，“这些特征比较简单，只能在思想联系的逻辑形式上才能进一步阐明。假如不以逻辑的联系性和可能的原则为出发点，存在的基本特性则根本无法发现，至少无法认识

①②③ 杜林：《哲学教程》，第44、45页。

它的独特性。”^① 其实，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杜林在阐述存在的基本概念时早就使用着这种从原则出发的方法。同时，为了显示所谓“独特性”，杜林在这一部分毫无根据地否定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竭力生造一些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使这一部分的内容更显得不知所云和混乱不堪。

第一，杜林否认事物的矛盾，鼓吹所谓“力的对抗”，他声称：“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逻辑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② 他认为事物中不存在任何矛盾，矛盾只是逻辑的矛盾。就是说矛盾的东西只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的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他把现实的矛盾看作是人们臆造出来的东西，把它斥责为荒谬，等等。那末，杜林是怎样解释所谓对现实的矛盾的臆造呢？他宣称这是误解了自然的逻辑限制，把自然界的不协调的东西当作协调的东西。在杜林看来，自然界存在着大量不协调的东西，这些不协调的东西的存在是事物的状态及其局限性和可测度性的基础。他说：“假如把这些不协调的东西当成它们的反面，即当成协调的东西，那就是把臆想的矛盾塞进世界中来。”^③ 为此，杜林以杠杆作为例证。他说：“假如杠杆运动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那末杠杆是不会保持平衡的。如果一方面设想杠杆的平衡，同时又设想导致杠杆产生运动的重量的配置，就叫做在思想上承认矛盾的东西是一致的。”^④ 这就是说，在杜林看来，杠杆或是平衡或是不平衡，二者是不协调的，如果设想二者是协调的，即认为杠杆既平衡又不平衡，那就是臆造现实的矛盾。从这个例子，正好可以看到杜林的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和思维上的浅薄。其实，杠杆由于它的独特的结构，就使它具有机械运动中平衡和不平衡这两种特性，它们作为对立面统一存在杠杆之中，并且当条件变动时，平

①②③④ 杜林：《哲学教程》，第55、57、68页。

衡与不平衡就互相转化。杠杆的平衡与不平衡虽然是简单的矛盾，但却是现实的矛盾。由此可见，杜林用以否定现实的矛盾所谓理论和例证，都是没有根据和毫无说服力的。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规定，使他无从理解辩证的矛盾；另一方面则由于他要通过“矛盾的排除”，以抛出他的“力的对抗”的法则。

杜林鼓吹，“按相反方向相互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生物的存在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又说：“对抗是世界状况的一个基本模式。”但是，关于这个“力的对抗”的含义是什么和它为什么是“世界状况的一个基本模式”，杜林却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是告诉人们，“纯粹的逻辑范畴及其传统形式，已经不宜于直接地解释事物的这种基本状况。”“在重视一切过程的比较明确的自然特性，特别是它们的数学要素，要想清楚的了解对抗的法则是不可能的。”在说了许多大话空话之后，杜林声称，“我们把世界存在的这个基本形式的问题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放在直接讨论自然界时再来解决。”^①可是，在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中，杜林并未能就“力的对抗”讲出什么新的东西。其实，杜林的所谓“力的对抗”的法则不过是把机械运动中作用与反作用这种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夸大到绝对化，当作普遍规律的结果。这种把从简单的东西而抽象形成的理论观点简单化和庸俗化，是杜林哲学的又一独特性。

第二，杜林否认规律的客观性和因果联系的普遍性，鼓吹所谓“存在中的普遍论证”。杜林在结束了“力的对抗”后，紧接着又提出了“普遍的论证”的原则。杜林的“普遍的论证”究竟是什么货色，我们可以先从他如何提出这个原则和他对这个原则的含义的解释来考察。杜林是依据存在的逻辑特性和思维紧密联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58—59页。

系，来提出“普遍论证”的原则。他说：“在我们把逻辑和观念联系的特性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地方。我们将把下面的命题作为原则形式牢牢地放在显要地位上：在现实的存在中以及单纯的思维中，有一个普遍的论证”^①。这就是说，存在中和思维中都有所谓“普遍的论证”，但必须从逻辑和观念联系的特性出发才能理解和把握它。杜林正是这样去解释“普遍论证”的含义的。他说：“这个无所不包的存在中的毫无例外的论证所具有的含意，无非就是逻辑联系中的可论证性。”^②可见，所谓“普遍的论证”，是说存在的逻辑特性必须在思维中才可以得到完全的论证。在这里，杜林不是承认存在特性的客观性，而是强调它在思维中的可论证性，这就是“普遍的论证”的秘密所在。由于杜林这样理解“普遍的论证”，所以他反对“把这个普遍的论证当作因果法则”或“说成是事物过程的牢不可破的规律性和必然性”^③。认为这两种说法和表述是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陈旧的形而上学的代表言论。杜林在这里所攻击的“陈旧的形而上学”，就是指对规律的客观性和因果联系的普遍性的承认。

第三，杜林否认对思维和思维形式的批判的和辩证的态度，鼓吹观念体系中认识和存在的“终极的统一”。在阐述存在的逻辑特性时，杜林多次批评康德的所谓“急躁病”。杜林所批评的“急躁病”究竟指的什么，他为何要批评这种“急躁病”，这是必须加以考察的问题。杜林说：“为了发挥思维的力量，使其成为真实的活动，首要防止的就是急躁病。由于这种急躁病，悟性的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就会失去它对世界本质和联系的认识的绝对作用。康德学说就是这类急躁病中的一种最大的急躁病。他对于悟性所抱有的怀疑，今天已被大家看穿。”^④从这些话里可以看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59页。

②③ 杜林：《哲学教程》，第61、59页。

④ 杜林：《哲学教程》，第66页。

到，杜林对康德的指责，在于他认为康德对悟性抱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在于他认为康德不承认悟性的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对世界本质和联系的认识具有绝对作用。这就是杜林批评的“急躁病”，这就是杜林和康德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所在。杜林指责康德的“急躁病”，正是康德在哲学认识论上的主要的历史贡献。康德通过对思维、认识能力和形式的批判地考察和辩证地分析，去探究认识的性质、起源和范围，开始揭示出人类认识的内在矛盾，既批判了独断论，又批判了怀疑论，把哲学认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康德在认识论的某些问题上陷入了先验主义和不可知论的错误，但却不能否定他把辩证法引入认识论的历史功绩。而杜林所反对的，正是康德在认识论上的辩证思想，即对悟性抱批判的态度和否认悟性的基本范畴对认识世界本质与联系的绝对作用。杜林指责康德，是因为他坚持康德批判过的形而上学观点，是因为他要重新贩卖独断论的货色。

杜林鼓吹的“终极的统一”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的货色。通过对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等问题的阐述以及他对有关对立观点的批判，杜林得出了一个结论：“世界观争论的中心已不再是个别的悟性概念以及它能否被应用的问题，而是必须延伸到思维体系和全部知识形式的一切本质部分和概念上了。”^①因此，杜林要提出一种观点、理论，去说明思维和知识的体系同存在的体系是完全统一的。为此，他鼓吹思维、悟性具有绝对的意义和作用，声称悟性认识的体系形式就是世界联系的存在形式。他说：“必须把一切悟性认识的整个体系形式同时看做世界联系的存在形式。”^②只有承认思维就是存在，才能在形式上（并不是实际上）说明二者的完全的终极的统一，杜林正是这样理解和解释的。他说：“观念的体系也是一切现实性的模式论。假如观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65页。

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66页。

念的体系不是合理的必然性的联系，那末，整个存在中就没有什么联系可想了，体系就主观关系而言，是知识最完美的形式；就客观关系而言，是各种存在的唯一可能的包罗万象的形式。现在，在观念的体系中已经出现了终极的统一”^①。这个把思维和存在完全的和终极的统一起来的普遍的体系，就是杜林吹嘘的结束其原则性引论的总概念。可以说，这个“普遍的体系”的总概念，正是杜林在本章开头提出的只能在思想联系的逻辑形式才能阐明存在的特征这一观点，经过“普遍的论证”，最后完全展开和充分阐发的结果。这个总概念是杜林的一般世界模式论的全部观点的总依据，也是他的一般世界模式论的全部荒谬的总暴露。

杜林的一般世界模式论的最后一章，是谈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一章中，杜林已从多方面阐述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并且作出了总括性的结论。因而杜林在最后一章里，只不过就这个问题作了补充的阐述。在这里，他首先阐述存在和思维的区别与联系。他说：

“物质的概念永远也不能是物质本身”。“存在和思维不能，也不应当是一回事；但是，它们能够而且也应该相互依存。”^② 这表明杜林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具有坚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一面，但是由于缺乏辩证法，他不能贯穿唯物主义原则，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唯物主义者，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热衷于追求思维与存在的完全的和终极的统一。

杜林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主要是在“自然知识原理”和“意识的元素”两篇中阐述的。他对于自然原则的论说，大致可以区分两个方面或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从他的哲学原则特别是一般世界模式论的原则出发，对自然哲学的某些理论以及某些自然科学家的哲学观念进行所谓的“批判”以至攻击；另一个部

^{①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66—67、70页。

分、也是主要的部分是，把他关于哲学和世界模式论的基本观点生搬硬套到自然界来，提出和阐述所谓的“宇宙的基本规律”、

“有机物的发展规律”和“意识的元素”。杜林在阐述自然知识原理方面，为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束缚而无法解脱，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坚持的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一些问题上则走向主观主义以至唯心主义。

杜林认为研究自然知识原理的出发点，是“把自然看成是自满自足的整体”。他肯定“这个整体除了它自身之外，没有其他前提；它不需要其他存在来作所谓的补充。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个独立自主的存在。”在这里，杜林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他又认为，“由自然科学所证实的关于这个以自身为根基的存在的规律性和特性，是绝对的、终极的真理。”^①这样，又暴露了杜林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形而上学特征。

杜林认为，“应当区分两种认识自然的基本概念”。第一种是由纯数学的范畴组成，“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动，都是第一种概念要研究的问题”^②。在阐述这种范畴时，杜林提出了所谓的“定数律”。杜林对其“定数律”的阐述，在根据和内容上极其贫乏、空洞，表面上好象可以说明一切东西，实际上没有说明任何东西；而在观点和方法上则极其浅薄、僵化，表面上似乎概括了众多的科学成果，实际上不过是把数学中无限序列夸大为整个自然界的规律。

杜林认为，认识自然的基本概念的第二种由机械的范畴组成，“物质和机械力——作为主导的模式论——则是第二种概念所要研究的问题”^③。第一，杜林强调物质和机械力在认识自然上的重要性，宣称它们是“主导的模式论”和“两个基本概念”。在杜林看来，数、空间、时间等是表述自然的量的特性的

①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89、92页。

③ 杜林：《哲学教程》，第92页。

范畴，物质和机械力是表述自然的结构特性的范畴，只有借助后者才能获得大自然组成的终极成分。拆穿来看，杜林就是把物质和机械力看作是组成大自然的终极成分。他认为原始的宇宙介质状态就是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他说：“弥漫阶段体现了一个充满了变化的宇宙。因此，在向后的方向上，它要求有一个边界线，弥漫阶段产生于宇宙介质状态。这一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意义下的纯粹静态的，也不能理解为动态的。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状态，是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①杜林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把物质和机械力看作组成自然的终极成分，并把物质和机械力归结为完全受数学定律的支配，这表现了杜林对当时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观念的无批判的吸收和搬用。

第二，杜林阐述物质和机械力的涵义以及二者相互关系，宣称物质和力“是一个现实存在物的两个方面”。杜林说：“何谓物质？我们的回答是，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承担者。……各种物质的差别，绝不损害物质的普遍概念。因为构成一切存在的真正基石的那种东西，可以借助这一切区别坦露出来。”^②杜林对物质的涵义的解释，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把物质和一切现实的东西联系起来，用后者去定义前者，这表明杜林对物质的涵义的理解持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它把物质解释为一切现实物的承担者，而不是理解为一切实物的总和。这就是说，在杜林看来，物质与一切现实物之间存在区别，区别在于物质是“构成一切存在的真正基石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杜林象自然科学的机械论那样，把物质归结为某种“最后质点”，而一切现实物都是以这种“质点”为基石构成的。这样，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113页。

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102—103页。

杜林对物质涵义的解释又表明他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机械论的。

杜林认为物质和力是紧密联系的，“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他把机械力区分为狭义上的机械力和广义上的机械力：

“狭义上的机械力，是变化的原因”；“广义上的机械力，即把纯静止状态的原因也包括在内。”^①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到，杜林反对把物质和力等同起来，特别反对把物质归结为力，从而以力取消物质的唯心主义倾向。他把力定义为“物质的一种状态”，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倾向。但是，他未能把力解释为物质的运动，而把力解释为“各种能的动因”，这样就偏离了唯物主义观点。因为物质的变化和静止的原因、根据都在于物质自身，而不在于物质之外的“力”。杜林还认为，“我们在现实哲学中就要首先禁止把机械力的既定概念同各种各样的特殊的力相混淆。归根结蒂，机械力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根基。”^②这种看法显然是同当时自然科学中力图把已知的引力、热、电、原子等运动都归结为机械力的机械论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杜林阐述对自然规律的理解，着重鼓吹他的三个“不变律”。杜林首先批评了对规律性的片面理解，要求再现规律概念的全部意义。他认为自然规律不限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宣扬“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使用我们前面已经阐述的两分法：不变律和变化律。”^③杜林在肯定他的不变律和变化律全面地表达了自然规律的概念后，就应用它们去解释宇宙、自然界的不变和变化问题，杜林认为，不变律和变化律“两个模式论始终共处在一个对象中”，但在宇宙中展现的首先是不变律。他说：“宇宙，即现在所说的整个天体——如果把整个天体中的有机界除外，并把它视作一个完整的机械的和化学的物体——展示给人们的首先是不变的要素，其次才是变化的要素。”^④杜林阐述的宇宙原始状态的根本错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103、102页。

②③④ 杜林：《哲学教程》，第103、105页。

误，在于把变和不变、动和静二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杜林企图在宇宙的变化状态和宇宙的不变状态之间，“插入连续性的桥。以便向后倒退，直到变化过程消失。”^①然而，这种概念的游戏是不能科学地阐明从不变得变的过渡的。杜林也不得不承认：“到现今为止，在合理的力学中还没有一座从严格的静到动之间的桥。”^②他不得不悲叹在这里“进入黑暗之中”。我们知道，牛顿企图用“第一推动力”来解决天体从静到动的变化。杜林没有这样做。表明他还具备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只有抛弃所谓的“宇宙的自身等同状态”和“不变律”，科学地理解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才能摆脱杜林的“黑暗”。然而，杜林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那样意味着否定他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杜林坚持宇宙的终极要素是绝对不变的，他热衷于论证宇宙的“不变律”。在这里，他又抛出“三种不变律”，他说：“迄今为止，我们提出了三种不变律，或曰三个固定律；提出了一切发展变化的基本特性——事物体系的模式属性。一般物质的量 and 单纯的（化学的）元素的量和机械力的量，都是不变的。这就是说，不管在过去的任何时期或者将来的任何时期，都可以把它们设想成同一个东西。”^③在杜林看来，不变是绝对的，变化是相对的。他所谓的变化，不过是在质和量上都是不变的终极要素。通过组合的方式和量的增减，形成自然界的事物。杜林坚持这种道尔顿的原子论的哲学翻版，就只能始终停留在黑暗中。

杜林关于有机界和意识的发展规律的阐述，除了继续搬用一般模式论的基本概念之外，没有在哲学上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在这里，我们不作专门的评述。

关于人的学说，在《哲学教程》中占有五篇十三章，与前述三部分比较，它所占的篇幅最多，从涉及的范围来看，有人类的历

①②③ 杜林：《哲学教程》，第107、109、110—117页。

史、现状和未来，有经济、政治、道德、法律、文艺、教育、科学和哲学，有民族、国家、家庭和个人等等，极为广泛。由于在这许多问题上杜林继续坚持贯彻一般世界模式论的观点，因而出现的错误就更多也更严重。我们在这里就一些基本思想加以评述。

实现高尚的人性和塑造高尚的人类模型，是杜林关于人的学说的中心。杜林认为，“迄今为止还缺乏一个合理的历史观”^①。他的关于人的学说，就是要提出一个合理的历史观，用以去阐明人类已有的历史和创造人类未来的历史。他的合理的历史观确定以什么为中心，这是他必须解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一般世界模式论中，他以存在的唯一性和存在的体系性为中心。在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中，他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为中心，在关于人的学说中，他以人性为中心。就是说，他把人性作为决定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根本要素，并围绕着它而展开关于人的各种问题的阐述。

第一，杜林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性的演变的历史。杜林认为人生来就有一定的天性，人与人之间具有天然的感情，在他看来，人生而自由、平等，这是人的本性和不可侵犯的个人主权。

“人和人的关系，从本性上看，冷淡和友爱多于仇恨。”“在这里，人的本性就是关心和怜悯别人的苦难。”^②因此，他强调在确定道德法则和解释社会历史等问题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两个完全平等的人”^③。杜林认为在以自私自利为基础的社会里，人类在利己的、不正当的生存斗争中发生道德的颓废，因而人性衰微以至消失。在杜林看来，人性是人类道德和人类权利的根本内容，而人性的衰微以至消失则是人类道德颓败和人类权利丧失的根本原因。因此，杜林认为“为高尚的人性而斗争，超越了为

①②③ 杜林：《哲学教程》，第16、144—145、139页。

人类赢得最急需的伦理风尚和最急迫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①杜林把人生而具有的天性当作决定人类活动和人类进步的根本要素，把人类历史看作人性演变的历史，把为高尚的人性而斗争作为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未来社会的关键，这就完全抛弃了他在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中尚能坚持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彻头彻尾地投进了唯心主义的怀抱。

第二，杜林宣扬人性与非人性的最后根源在于性的结合和选择。在杜林看来，制约着人的天性的有多样的因素，先辈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发生重要的影响等。杜林认为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由风俗习惯和传统而形成的文化教育，而是规定人的天然质量的血缘。他说：“血缘对于优良的或者低劣的特殊体和混杂组合的产生和消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②杜林把优良的人类个体、低劣的人类个体、兼具优良与低劣的人类个体的产生和消亡都归结为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这是一种极其唯心主义的和反动的种源论，杜林认为人性与非人性的最后根源在于性的结合与选择。因为血缘关系正是通过生育，繁殖而形成的。所以，杜林得出结论说：“鉴于繁殖对持续、淘汰、混合以至对质的新的创造性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人性或非人性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中寻找，此外，还必须在对保证或防止一定生育结果的顾虑中寻找。”^③这样，杜林实际上否认环境、后天对人性和人的素质的形成、改善的重要作用，只承认环境、后天在破坏人性和人的素质上的作用。这种观点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

第三，杜林鼓吹用暴力去塑造高尚的人类模型。杜林认为为高尚的人性而斗争，就是要塑造高尚的人类模型，塑造“获得了最大限度自由的纯粹的人”^④。杜林所谓“纯粹的人”，实际上是指

①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149页。

③④ 杜林：《哲学教程》，第151、155页。

纯粹的人种。而他的“塑造”的途径，则是通过性的高尚的组合去达到人种的纯化。为此，杜林公然鼓吹用暴力去淘汰低劣人种和混杂人种。他说：“对于丑恶的特征，如果不加以取缔或给予破坏；对于不适宜生存的混杂体，如果不促进其死亡，那末它是不能除去的，对于高尚的组合应当主动积极地关心。但是，这种关心如果不在同时对丑恶的东西的延续、根源和流传施加毁灭性的暴力，那么这种关心是不够的。”^①这是反动的种族主义理论，杜林的狂热的反犹倾向正是这种反动的种族主义思想的露骨地表现。从唯心主义走向种族主义，这就是杜林的“合理的历史观”的思维逻辑进程。

发现、实行宇宙统一的和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是杜林关于人的学说的基本内容。杜林在鼓吹性的组合和生育、繁殖是实现高尚的人性的根本途径的前提下，也反复宣扬伦理道德对制约人类活动和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作用，并且作了许多阐述。因此，关于道德法则的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就成为杜林关于人的学说的基本内容。

第一，杜林认为道德世界具有终极的、简单的要素，正如在一般世界模式论和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中宣扬在存在和自然中具有简单的终极的要素那样，杜林也把这一套搬到道德的世界中来。他说：“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尽管都有其缺陷和不够之处，但却都有它们的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②那么，杜林是怎样去确定道德的终极要素呢？他认为道德和人性紧密相联，因而他从对人的本性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程度去确定道德的终极要素。由此，他把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平等与不平等、良心、义务和责任等当作道德的终极要素。他说：“那种能够全面或者部分改进他的本性的连续的善良行为就是善；任何图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150页。

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136页。

谋损害他人的行为都是邪恶”^①。因此，“互不损害，也就是说，尊重别人的意愿就象尊重自己的意愿一样，是公共道德的第一个基本法则。”^②在道德领域里，杜林的出发点仍然是两个平等的人。对平等的尊重、维护还是对平等的侵犯、破坏，是杜林区分道德与不道德的根本标准。

第二，杜林宣扬道德的终极要素是永恒不变的和适用于整个宇宙的。杜林认为道德的认识和数学的认识是同样的，只要掌握它的终极的要素，就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他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而且可以永远这样设想：它们在任何时候，对于自身所有的条件都是适用的。甚至，那些不能说明普遍关系，只能说明个别的、纯粹个人问题的真理，也是永恒的。……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这样。”^③在这里，杜林割裂了一定的道德原则和形成这一道德原则的具体条件的内在联系，进而把具体的道德原则抽象化和绝对化。杜林还认为在道德问题上，同样必须坚持关于所有天体的物质和意识结构的宇宙统一性的设想。也就是说，必须承认道德的终极真理对于一切天体、一切民族、一切地区的所有人的普遍适用性。他说：“道德的要素是一些简单的决定，并且必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重新出现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中”^④。其实，所谓道德的真理是对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进行认识的科学成果，时间、地点及情况的不同或变化，不仅制约道德意识，而且首先制约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杜林的脱离具体的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而又不受时间、地点和情况制约的道德基本原则，不是客观的真理，而是根据先验原则推论出来的主观臆想，因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适用。

第三，杜林吹嘘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的天然的推动力。杜林认为，人类以本能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动必须加以调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133页。

②③④ 杜林：《哲学教程》，第139、136—137、133页。

整，而道德的基本原则就是能动的悟性进行自觉调整的思想力量。所以，他说：“关于道德的原则是否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这些原则是真正的、从一开始就起作用的天然的推动力。”^①然而，正如我们在上述的分析中所揭露的那样，杜林的许多的阐述实际上否认了他所吹嘘的道德原则的推动作用。杜林宣扬人的本性中的伦理机能缺陷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善意成为不可能，他甚至鼓吹用毁灭性的暴力去消除不适宜于生存的混杂体等，这是对他自己的全部道德说教的自我揭露和自我否定。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杜林关于人的学说的根本错误，在于它脱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去解释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问题，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去解释人性的问题，脱离社会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经济地位去解释伦理道德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解释和结论必然是错误的。杜林的哲学就是由自然观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混杂而成的折衷主义货色，而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折衷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的。

第二节 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

杜林主义在理论上对抗、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在实际上取代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地位和作用，从而把它们引向歧途。因而它在形成的同时，竭力通过各种渠道去侵袭德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工人党内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杜林主义及其恶劣的影响，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

^① 杜林：《哲学教程》，第136页。

持、参预下，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撰写了第一批批判杜林的哲学观点的科学论文。后来，又接着撰写了批判杜林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论文。威·李卜克内西等为论文的发表，同党内的杜林主义分子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他们还向党内一些受影响的同志做好说服工作，帮助他们认清杜林主义的反动本质。经过坚决的多方面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杜林主义的进攻，使德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得到巩固和进一步的发展。

一、杜林主义对德国工人党的严重侵蚀

杜林为了对德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施加影响，除了撰写、出版多本标榜“科学变革”和“激进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外，还通过讲课和个别交往大肆贩卖其假科学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由于德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在理论上思想上还不成熟和不一致，因此杜林主义一时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杜林主义对德国工人党的侵蚀，是先通过党内一些理论上不成熟和思想上不坚定的分子，如爱·伯恩斯坦、阿·恩斯、约·莫斯特等去传播、扩散的。根据伯恩斯坦自己回忆说，他读了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与《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以后，认为“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①。伯恩斯坦还把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寄送给倍倍尔、莫斯特等人，吹捧这是一本对宣传社会主义很有影响的书。他还亲自去听杜林在柏林大学的讲课，宣扬“杜林在讲述中则完全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在评论党的时候，他完全是坚决地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①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15页。

的”^①。并积极地鼓动党内同志和青年大学生去听杜林的讲课，以扩大杜林主义的影响。伯恩斯坦后来承认，“对于70年代中期席卷了一批积极的党员同志的杜林崇拜”，没有任何人比他“起过更大的促进作用”^②。莫斯特也是狂热的杜林主义分子，他在鼓吹杜林主义上同样起了很坏的作用。据他自己承认，他在狱中就研究了杜林的著作。1876年6月出狱后，取得了对柏林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报纸《柏林自由新闻报》编辑部的领导权。他寄给李卜克内西一篇题为《一位哲学家》的吹捧杜林的《哲学教程》的长文，要求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遭到李卜克内西拒绝后，他就把它发表在《柏林自由新闻报》上。他还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题，在柏林举行讲演，吹捧杜林。在《一位哲学家》的文章中，他把杜林吹嘘为“不倦的活跃的科学战士”，“沉重地打击腐朽思想的代表”，等等。此外，还有恩斯、弗里茨舍、瓦耳泰希等人也在德国工人党内积极地鼓吹杜林主义。正是这些狂热的杜林主义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杜林主义的宗派集团。

在狂热的杜林主义分子的宣扬、鼓吹下，德国工人党内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包括某些领导成员）无法认清杜林主义的反动实质，把它当着激进的社会主义看待，有的人甚至也为其作宣传，从而扩大了它的影响。1874年初，倍倍尔在狱中阅读过伯恩斯坦送去的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后，不仅未能识穿其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反而撰写了一篇颂扬这本书的文章，以《一个新的“共产党人”》为题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虽然对该书对马克思的评论提出了异议，但对作者及该书的基本观点都予以肯定。文章认为杜林在自己的最新著作中已经“站到社会主义者左翼一边来了”，“他的观点同科学共产主义理解的

① 见《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三联书店1980年版（下同），第155页。

②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7页。

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在今天国家的价值、议会制度的本质、国家权力的党派特性、巴黎公社等问题上同我们的看法也完全一致”。文章最后声称，“他的基本观点是出色的，我们完全赞同。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所以，我们赶紧推荐研究他这本书。”^①虽然，这篇文章发表时未署上倍倍尔的名字。但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如此肯定杜林及其基本观点的论文，势必为杜林主义在党内扩大了影响。威·白拉克在1877年5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一年前我听过杜林的几次讲课，……他给我的印象是：头脑敏锐，知识丰富，具有真诚的共产主义思想。”信中还指出，“杜林的真正追随者和朋友们……在柏林这里更是为数不少”^②。伯恩施坦后来在评述莫斯特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的讲演时也说到，“莫斯特的观点在柏林不仅没有碰到任何反对意见，反而博得一片赞同声。……此外，他还在……《一位哲学家》中对杜林进行了颂扬。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所说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他在柏林从事写作和讲演活动的大部份社会民主党人的想法而已。”^③上述情况说明，杜林主义严重地侵蚀了德国工人党的许多活跃分子。

更为严重的是，在杜林主义的侵蚀下，党内的杜林主义分子公然要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876年7月，莫斯特在同杜林交谈后，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吹捧杜林“是一个有创见的人”，声称在党内不应该对马克思搞“个人崇拜”^④。1876年8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哥达代表大会上，杜林主义分子弗里茨舍公然责问党的领导机关为什么对杜林讳莫如深，为什么不让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宣扬杜林的文章，等等。伯恩施坦后来也承认，“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牵涉到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学说的根

①②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34—41、149页。

③④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27、153—154页。

本时，就开始用杜林的批判眼光去评论他们，也就是按照杜林的解释去谴责他们。”^①

马克思、恩格斯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必须进行保卫德国工人党和保卫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的斗争。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的转变，就是说……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②恩格斯在后来也谈到，当时“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③这样，一场原则性的、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开展起来了。

二、反对杜林主义斗争的历史过程

杜林主义对德国工人党的侵袭，必然地引发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这场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和亲自参加的，它经历了一个包括若干阶段的演变过程。必须了解不同阶段的斗争的特点，才能加深对整个斗争的理解，并认清马克思、恩格斯在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斗争的开始阶段。《人民国家报》1874年3月13日和3月20日的

①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9页。

两期刊出了《一个新的“共产党人”》一文，这是杜林主义侵袭德国工人党的公开暴露。当时，在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获悉这一情况后，便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指责^①。同年6月至7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写信给威·布洛斯、赫普纳，警告他们防止杜林对德国工人党的影响，并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②。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活动，揭开了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的序幕。但李卜克内西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他在1874年6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解释说，关于杜林，“你们是否有根据认为，此人是个无赖或暗藏的敌人呢？我了解到的关于他的情况使我深信，他虽然有些糊涂，但十分诚实，并且坚决站在我们一边。”关于倍倍尔的文章，他同样解释说，“那篇受到你们指责的文章并不是完全正确和令人太高兴的，不过，意思无疑是好的，也没有产生什么坏影响”^③。布洛斯在1874年5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解释说，

“我自己只是粗略地翻阅了一下杜林的书。但是由于杜林的党内同志，包括议员们都赞扬他，去听他讲课，因此我想，既然迄今常常颂扬雅可比，也就不应轻视杜林。李卜克内西也表示了这种意思，于是，我就刊登了这篇文章。”布洛斯还告诉恩格斯，这篇文章是倍倍尔撰写的，认为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崇拜的意思，而只是很平常的承认功绩而已”^④。由于党的领导层对面临的斗争缺乏认识，未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3月2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转载了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中有关巴黎公社的部分。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在斗争的开始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坚定地明确地表示自己

①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01页。

③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29页。

④ 切尔诺夫：《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史略》，载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德国工人运动》，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

的态度外，主要的任务在于引导党的领导层承认和认识面临的这场斗争及其严重的性质，并且争取他们中的多数人积极地参加这场斗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复帮助和杜林主义分子的不断进攻下，李卜克内西、白拉克、倍倍尔等终于清醒了，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从而积极地展开斗争。李卜克内西从1875年4月到1876年5月间，多次致信恩格斯，认识到对“杜林瘟疫”进行“清算”是必要的，要恩格斯“下决心收拾杜林”，说明“急须在《人民国家报》刊登详细批判杜林的文章”，请恩格斯“尽快和尽量彻底地批判杜林的著作”^①。白拉克也在1876年8月致信恩格斯，说明如果必须批评杜林，“那就必须马上动手，不然就太迟了”^②。这样，就为反杜林主义的斗争进到第二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斗争的决胜阶段。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杜林主义，这是斗争的决胜阶段的主要任务。恩格斯收到李卜克内西多封请求他写文章公开批判杜林的来信后，与马克思进行了商量，共同决定彻底批判杜林，把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推进到决胜阶段。1876年2—3月，恩格斯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中公开表明他准备批判杜林。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在收到李卜克内西同年5月¹⁶日的来信后，立即致信马克思表示公开批判杜林的意愿，指出莫斯特等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倘若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那就会显得是对他的人身攻击进行报复！”显然，恩格斯感到不能陷于这种圈套和束缚。否则，“结果是，杜林愈蛮横无理，我们就应该愈温顺谦让”。^③马克思于同年5月25日立即复信给恩格斯，明确表示对莫斯特等人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

①②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31、1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3页。

来”；并且指出杜林“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①恩格斯经过进一步的考虑，于1876年5月28日致信马克思，谈及他批判杜林的总计划，决定“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他并向马克思表明对杜林的批判，将先从《哲学教程》着手。因为“莫斯特对杜林的《哲学教程》的吹捧已明确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②李卜克内西在1876年8月举行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宣布恩格斯将出来反对杜林。从1876年9月初到1877年1月初，恩格斯写作了批判杜林的《哲学教程》的一系列论文。《前进报》从1877年1月3日到5月13日的各期，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题，发表了恩格斯的这一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成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引论和第一编。1877年7月，上述有关哲学篇的论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这是射向杜林主义的**第一批重型炮弹**，给杜林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李卜克内西1877年1月12日致信恩格斯，说他的“文章是出色的，各方面都令人满意”，还表示想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发行^③。

但是，德国工人党内的杜林主义分子极力地阻挠、破坏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由于恩格斯的批判杜林主义的文章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杜林主义分子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攻击、反对。1877年2月，杜林主义分子阿·恩斯写了一篇题为《恩格斯对人的健全理智的谋杀，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科学上的破产》的文章，要求《柏林自由新闻报》发表。然而，由于恩斯的文章内容十分空泛和攻击极其恶毒，使这家深受杜林主义影响的报纸也不敢发表。于是，恩斯只得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篇文章。此外，其他一些杜林主义分子则抓住恩格斯的文章的语调，向李卜克内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5、18页。

③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32页。

西等进攻。对此，恩格斯致信李卜克内西说：“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反驳他们，向他们指出杜林先生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驱者的语调，而且特别要指出，我是在论证，而且是详细地论证，而杜林却简直是歪曲和辱骂自己的先驱者。”^①

杜林主义分子酝酿的最大的阴谋，是计划在定于1877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行动，使《前进报》停止刊登恩格斯的批判杜林的文章。在这方面，杜林本人更加以纵恿、支持。杜林主义分子奈塞尔首先在代表大会上发动攻击，诬蔑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对读者不合适，而且不符合大家的愿望”。稍后，杜林主义分子莫斯特公然提出一项提案，胡说“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前进报》大多数读者是不感兴趣的，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接着，杜林主义分子克勒希又提议：“关于莫斯特的或者有关提案的辩论，只应限制在材料是否适宜和有无好处的问题上，而决不应涉及到原则性和科学性的问题上去。”^②可见，杜林主义分子的图谋是避而不谈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文章的原则性质和科学意义，而制造这些文章对鼓动性报纸不适宜和对读者不合适的藉口，来争取停止刊载恩格斯的论文，以维护杜林主义在德国工人党内的影响。杜林主义分子瓦尔泰希就公然攻击刊登恩格斯的 文章是失策，认为这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宣扬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是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③

对于杜林主义分子有关的发言、提议、提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反驳，谴责了他们对恩格斯的 文章的攻击。李卜克内西强调指出，恩格斯的这些论文关系到要全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23页。

②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01—102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98页。

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并且要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驳倒他的整个体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①为了挫败杜林主义分子不让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文章在《前进报》发表的阴谋,李卜克内西提议在《前进报》的学术附刊继续登载恩格斯的有关论文。由于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相当数量的杜林主义分子和受其影响的人,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一项妥协性的决定:“应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发表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这些文章应在《评论》上或其前身即《前进报》的学术附刊上发表,或以单行本形式发表。”^②这个决定挫败了杜林主义分子停止在《前进报》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的阴谋,使恩格斯的有关论文得以在《前进报》上继续发表,取得了反对杜林主义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代表大会上许多人对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文章的评论,不谈这些论文的原则性质和科学意义,只从报纸的营业性观点考虑,暴露了德国工人党在合并后和在杜林主义影响下的理论素质的降低,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重不满。1877年7月31日,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们的人中**大多数**不希望有真正的科学。我说的是**党**,而党本身正是象它在报刊和代表大会上让公众所看到的那样。……党在精神和理智上的衰退是从合并时开始的;如果当时表现得稍微慎重和理智一些,这种衰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③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致布洛斯的信中也说:“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类事件,……毕竟使我们要小心对待‘德国的党内同志’^④。”

斗争的结束阶段。1877年7月7日,德国政府教育部根据柏林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98页。

②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02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63—264、289页。

大学的请求，以“侮辱大学和大学教师”为理由，取消了杜林的柏林大学私人讲师资格。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大学生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纷纷集会抗议反动当局侵犯科学自由。《前进报》早在6月13日就对传闻杜林可能被免职一事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措施是对科学自由的侵犯，是主谋者的耻辱，是柏林大学的永久的耻辱。”^①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杜林主义分子又趁机掀起了吹捧杜林的浪潮，力图挽回杜林主义的影响。在这些活动中，《柏林自由新闻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欧根·李希特尔在《前进报》撰文指出：“社会主义的《柏林自由新闻报》千方百计地把杜林吹捧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拥护者，并力图在某种程度上把他描绘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殉难者。”^②因此，必须继续和完成从理论上对杜林主义的清算，扫除杜林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帮助下，恩格斯约于1877年6—8月写完政治经济学编，约于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写完社会主义编。政治经济学篇的最后一章（《批判史》论述），是由马克思亲自撰写的。《前进报》的学术附刊在1877年7—12月，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编；在1878年5—7月，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了社会主义编。1878年7月，第二编和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年7月，全书由恩格斯写了序言，在莱比锡出版，书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自己指出，批判杜林的著作的撰写和出版，表明“在理论方面，我对他的清算已告结束”。^③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全面地深入地揭露、批判了杜林主

①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19页。

② 切尔诺夫：《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史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页。

义的伪科学，系统地科学地论证、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清除杜林主义及其影响和武装共产党人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上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1877年5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海伊尔在反驳莫斯特等人的滥言时就说明，“即使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对恩格斯的文章感兴趣，仍然有数以百计的工人非常专心地阅读这些文章”^①。白拉克在1877年5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读这些文章并有成果的是少数人。这少数人会把取得的认识逐渐灌输到群众中去。”^②马克思在1877年4月更高度地评价了恩格斯的反杜林的著作，认为“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③。恩格斯的论著帮助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真正与杜林主义划清了界限。1877年11月17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选举委员会发表声明，就杜林声称社会民主党创办的《未来》杂志应该“按照他的事业和以他的名义”来编辑和胡说社会民主党从他身上找到了自己所缺少的“精神资本家”等谎言，加以驳斥和澄清，否定“党的称职的代表”、“党的领导”同杜林以及杜林主义之间有任何联系^④。以上的事实，表明反对杜林主义斗争的胜利结束。

对反杜林主义斗争的各个阶段的考察，可以看清这不仅是维护德国工人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的实际斗争，并且是捍卫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斗争极其复杂、曲折。可是，由于有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和参加，保证了把斗争进行到底。特别是恩格斯批判杜林主义的著作，在上述两个方面取得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①②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05、1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42页。

④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第127—128页。

三、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批判

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以下称《反杜林论》）的撰写进行的。《反杜林论》在粉碎杜林主义的进攻，从理论上清算杜林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总结反对杜林主义斗争的历史，还必须着重地研究恩格斯在该书中对杜林主义的批判。研究《反杜林论》对杜林主义的批判，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可以采用。一种是把着重点放在了解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具体观点的揭露、批判上，另一种是把着重点放在了解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主要特征的揭露、批判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来看，应该在概括恩格斯批判杜林主义的具体观点的基础上，阐明恩格斯如何揭露、批判杜林主义的主要特征，由此学习、掌握恩格斯批判杜林主义的基本方法。

1. 揭示杜林主义出现的社会根源。恩格斯指出，杜林是在1875年“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并且认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①。1875年是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后的第四个年头，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无产阶级为解放自己而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却深深地震撼着当时的欧洲。这种震撼表现在当时的德国，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社会主义运动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如在1875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广大群众进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如新康德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庸俗唯物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等假科学得以流行一时。恩格斯指出：“近来在德国，天体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页。

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嚣声中。”^①作为这种假科学的典型的杜林主义，如果说与其他的假科学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影响的混杂产物。杜林主义，一方面反对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和宣扬共同社会体系，体现了某些社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上都攻击马克思主义，图谋取代马克思主义对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集中地反映了德国反动统治阶级的猖狂进攻。

2. 揭露杜林主义的反科学的和反动的目的。杜林主义出现的社会根源决定了它的社会性质，而杜林主义的社会性质又规定了它的内在的目的。恩格斯正是通过对杜林主义的内在目的的揭露，去进一步暴露它的社会性质。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目的揭露，分别从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着手。在理论方面，恩格斯着重揭露杜林主义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反科学的目的。恩格斯指出，当时德国的假科学的“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②而作为当时德国假科学的典型的杜林主义，则妄图发现、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为了揭露杜林主义这一目的的反科学性，恩格斯从多方面展开批判。

首先，恩格斯指出这种目的的反科学性，是由于它的提出不是出于探讨理论问题的善良愿望和诚恳态度，而是出于妄自尊大和大言不惭。恩格斯揭露杜林在《哲学教程》的第一页，“就把自己说成是现代的和‘可以见到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认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9页。

为他所说的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①恩格斯指出，

“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说出自己的思想而让往后的发展来评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硬把自己说成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很不寻常的人物，如果人们不愿意堕入最不可饶恕的异教，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学说。”^②恩格斯认为象杜林这样公然地吹嘘自己和妄自尊大的人，在哲学史上确实是罕见的。

其次，恩格斯指出这种目的的反科学性，在于它是以超越个人主观局限性为依据，而实际上杜林受到多方面的局限。杜林吹嘘他的哲学具有这样的特性，“竟使杜林先生能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恩格斯指出，“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但是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实现。”^③对杜林的排除、超越个人主观局限性的观点，恩格斯从两方面进行了揭露、批判。在理论上，恩格斯说明人的认识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从人类认识的无限延续来看是至上的，从个别人的认识来看则是非至上的。恩格斯写道：“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上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④在实际上，恩格斯通过对杜林的一系列的“终极的真理”的发现进行剖析，证明杜林未能排除主观上受到的多方面的局限性。恩格斯指出，“这位在思维方式上‘排除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哲学家，不仅在主观上被他的已经证实的是极端贫乏的认识、被他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32—33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32、94页。

所限制,而且甚至被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所限制。”^①

再次,恩格斯指出这种目的的反科学性,还在于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发现,是以毫无根据地对先驱者进行恶意的诋毁、否定作基础的。恩格斯根据杜林的有关著作揭露,在哲学方面,杜林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先驱者诸多诋毁;在自然科学方面,杜林攻击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在经济学方面,杜林痛骂李嘉图,否定他关于劳动价值的发现;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杜林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诬为“社会炼金术士”,等等。杜林这样做,是为了把他自己的货色标榜为“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恩格斯指出,杜林因其定数律的“发现的重要性而自鸣得意”,然而,“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很著名的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在178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按上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他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②

最后,恩格斯指出这种目的的反科学性,集中地表现在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过是各种谬误的堆积。恩格斯揭露杜林的“世界模式论”的要害在于,“他以为, he 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③恩格斯通过具体剖析杜林的种种谬误后,作出结论说:“‘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54、42页。

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看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①恩格斯认为杜林的妄自尊大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因为“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思维方式”，因为“自身还完全被分工所奴役的杜林先生也还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②。恩格斯所作的上述的深入的揭露和批判，有力地证明杜林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企图，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的妄想。

在揭露杜林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理论上的反科学性的同时，恩格斯还注意揭露其政治上的反动性。对杜林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反动政治目的的揭露，恩格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恩格斯揭露杜林为了确立其“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面的恶毒的攻击。

在哲学方面，杜林恶毒地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以黑格尔辩证法为理论来源并加以根本改造而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因而杜林对马克思的新哲学的攻击，集中地指向他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指出，杜林的攻击手法之一，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③。杜林在1867年开始这样做了，到《哲学教程》中做得更为放肆和恶劣。他公然地歪曲、篡改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从而攻击马克思是靠引证黑格尔的观念，“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恩格斯通过剖析杜林怎样曲解马克思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论述后，指出“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他同样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④。

在经济学方面，杜林肆意地曲解、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结构，揭示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7、318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5、138页。

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② ④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它则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因此，杜林通过先曲解劳动价值论，进而否定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劳动则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然而，杜林却攻击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是完全不清楚的”，进而把马克思的观点“解释”为承认劳动时间、劳动都具有一种价值，并且胡说马克思主张按这种观点去调节未来社会的分配。对此，恩格斯批判说，杜林“把这种鬼解说成是马克思想据以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调节生活资料的分配的基本原则，那末这种无耻的⽆事⽣⾮只有在专事诽谤的出版物⾥才可以见到。”^③ 在恶⼼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后，杜林进⼀步攻击、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从⽽揭露了资本的本质、奥秘在于造成、占有剩余价值。杜林却诬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引起混乱”。^⑤ 恩格斯通过具体的分析，说明造成混乱的正是杜林⾃⼰。杜林歪曲、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产⽅式辩护。

在社会主义理论⽅⾯，杜林力图否定马克思阐明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卷中通过科学的论述，揭示正象以往⼩⽣产由于⾃⾝的发展⽽必然造成剥夺⼩⽣产、即消灭⼩⽣产的条件⼀样，现在资本主义⽣产⽅式也⾃⼰造成剥夺⾃⼰、即使⾃⼰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认为这是⼀个历史的过程，⼜是⼀个否定的否定的过程。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私有制，⽽是在协作和⽣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3、217、220页。

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去揭示、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与以“正义”、“公平”等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根本区别开来。但是，杜林却攻击马克思是依靠黑格尔的辩证法“执行助产婆的职务”，使“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诬蔑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一种“既是个人又是公共的所有制”^①。恩格斯指出，“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是“把他一手制造的东西硬加给马克思”。杜林这样歪曲、诋毁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用他自己的“置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空想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深刻地揭露说：“不论在上面所引的登载于《补充材料》的对《资本论》的批判中，还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载的对该书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没有发现‘既是个人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就是说在三读《资本论》的时候才发现的；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修订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让马克思就未来社会组织发表尽可能荒唐的荒唐意见，以便能够与之对立地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经济公社’（他也是这样做的）”^②。这样，恩格斯就从揭露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攻击，进到揭露杜林妄图用杜林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阴谋。恩格斯通过具体的分析，说明马克思主义和杜林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一是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标准发展的国家中”去认识社会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而杜林主义只是从普鲁士的酿酒业和甜菜制糖业去了解工业的发展，从书籍市场上的涨落去了解商业危机。二是它们的性质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地改造世界，承认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2、144—145页。

暴力在历史中的革命作用，认为“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而杜林却反对根本地改造世界，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根据这些分析，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杜林“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①杜林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并使它堕落为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②

从恩格斯上述的揭露和批判可以看到，把杜林主义吹嘘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用杜林主义去曲解、取代马克思主义，迫使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杜林主义，这就是杜林主义的内在目的，而这种目的又集中地暴露了其反动的社会本质。

3. 批判杜林主义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不仅注意揭示其反科学的和反动的性质，而且深入地剖析其思维方式，以进一步暴露形成其反科学的和反动的性质的思想、认识根源。恩格斯认为，杜林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以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本特征的，并且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揭露、批判。恩格斯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③杜林的这种方法正是彻头彻尾的先验主义方法。

首先：这种先验主义表现为，不是依据外部世界的提示，而是从思维中去构造出关于对象的原则。恩格斯指出：“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示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0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5、40—41页。

122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二卷

杜林关于存在的最简单要素的原则，“并不是通过客观现实的分析综合得出的结论，而是从他作为对象的存在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这不过是过去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①杜林的这种先验主义方法，就其来源上割裂并否认了思维、意识对人和自然界的依赖关系。因为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是人脑对于外部世界的反映，而人本身又是自然界的产物。杜林“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②。

其次，这种先验主义又表现为，把从思维中构造出的原则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要求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这些原则。杜林在先验地确立其原则之后，就把这些原则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由此构成了他的哲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关于人的学说。杜林运用其原则的特点，是把原则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使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其原则，这是先验主义的又一表现。恩格斯指出，杜林“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③在这里，杜林从割裂原则与现实、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进而颠倒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原则应当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杜林却把原则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原则只有在适合于现实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杜林却要求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41、39、37页。

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①。

再次，这种先验主义还表现为，从原则出发，虚构现实世界的图景。杜林把原则运用于现实，要求自然界和人类适应其原则。然而，自然界和人类不可能适应杜林的原则，它们只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因此，杜林只能从原则出发，去虚构自然界和人类的运动图景。这是坚持先验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先验主义的集中表现。杜林关于存在的统一性的阐述，就是运用这种先验主义虚构而来的。在杜林看来，“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②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妄想，……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妄想家，……世界的统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必须是先验地、根据思维公理加以证明的。由此产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③恩格斯的剖析，揭露了杜林的先验主义的思维进程和奥秘。杜林正是先从头脑中思维中构造出关于存在的基本形式的原则，并把它当作客观现实所固有的，从而以它为依据去重新构造出现实世界来，其要害在于颠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2页。

倒了原则与现实、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由于杜林在认识论上、在思维方式上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他虽然承认自然界的本原性，却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陷进唯心主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杜林主义哲学。

杜林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结合，它的先验主义主要表现在思维出发点的选择上，它的形而上学主要表现在对思维所涉及的各种关系的处理上。思维作为物质自然界的产物和外部世界的反映，必然要涉及和处理许多关系。其中首先要涉及和处理的是思维 and 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是所有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在这里，杜林虽然承认物质自然界的本原性，但却从原则出发去解释、构造现实世界的图景，因而主要表现为先验主义。其他要涉及和处理的，还有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和思维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如运动和静止、无限和有限、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等。杜林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往往把它们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陷入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因此，恩格斯对杜林的思维方式的批判，通过剖析从原则出发，主要揭露它的先验主义；通过剖析片面性、绝对化等，主要揭露它的形而上学。恩格斯在论述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特征时指出：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①杜林把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哲学领域，不可避免地陷进了无法解脱的矛盾和荒谬之中。恩格斯正是以上述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

点为指导，展开对杜林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首先，批判杜林否认对象之间的客观联系，特别是否认思维和现实世界的内在联系的主观主义和孤立化的思维方式。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时，首先注意揭露它和先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联系，着力揭露杜林以先验主义为指导必然要采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采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又必然导致先验主义结论。恩格斯指出，杜林确立其存在的基本形式的原则，是以纯数学作为科学根据的。因为在杜林看来，纯数学所处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学具有“脱离特殊经验和现实的世界内容而独立的意义”^①。这就是说，杜林认为哲学象纯数学那样，可以脱离现实世界，进行自由的创造和想象。对杜林否认纯数学和现实世界的联系，鼓吹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从而为其先验主义作论证的做法，恩格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恩格斯指出：“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②在这里，恩格斯从科学与生产实践的内在联系，论述了数学产生于现实世界。数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同生产实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数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生产实践的需要。正如恩格斯论述的那样，由于古代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中丈量土地、计算时间、测量容积、制造器皿等需要，推动了数学的产生。另一方面，人类生产实践又为数学的产生提供、积累了经验的材料。正是在生产实践中，人们长期地反复地接触具体的数和形，然后才逐步形成数和形的概念。恩格斯说：“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③可见，“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页。

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①恩格斯从不同的侧面、充分地论证了数学和现实世界的内在联系之后，进一步揭露了杜林否认这种联系的主观主义。恩格斯指出：

“杜林先生以为，他可以不加入任何经验的成分，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再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②然而，杜林否认数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并不能为他的先验主义提供象样的论据，而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的主观主义和孤立化的思维方式。

其次，批判杜林否认事物的矛盾，把矛盾双方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性思维方式。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然而事物之间联系的形式是多样的，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事物联系的重要的方式。杜林否认事物的矛盾，认为矛盾只归属于思想范畴。恩格斯坚决地批判了杜林关于“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和矛盾就是背理的观点，并且用对各种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的具体分析给杜林以有力的驳斥。在这里，恩格斯特别剖析了杜林由于不承认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统一，无法解答他自己提出的世界怎样从静转变为动的问题，从而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杜林完全割裂运动和静止之间的联系，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从而设想出不变的自身等同状态。这种形而上学的设定，就使他“失去了从静到动的桥”。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形而上学地思维的悟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对他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③对杜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恩格斯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具体的揭露和批判。恩格斯认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

杜林的形而上学的错误，首先在于割裂了物质与运动的联系，设想出“物质的不动的状态”。恩格斯指出：“物质的不动的状态，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之一，是纯粹的‘热昏的胡话’。”^①因为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认为杜林之所以设想出没有运动的物质，是由于他不了解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把机械运动这一种形式和物质的运动等同起来。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②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是相对的。杜林的错误在于，“把从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终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做某种绝对的东西而转移到宇宙。”^③恩格斯认为，杜林形而上学的错误，还在于割裂运动和静止的联系，设想“从绝对不动中产生运动”。恩格斯指出，绝对的静止和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运动和静止是相互联系的对立面，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④但是，由于杜林用通常的力学观点来理解宇宙的运动，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的错误。因为“在通常的力学中，从静到动的跃是外来的推动。”^⑤杜林从这种狭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也是“从绝对不动中产生出运动”。杜林“正象地道的形而上学者一样，他先在运动和平衡之间划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然后就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制造的鸿沟上找到一座桥。”^⑥同样，杜林还否认无限和有限的对立统一，否认无限是由有限组成的，因而把世界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理解为数学上的无限序列。对此，恩格斯批评说，“杜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67、68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68页。

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①可见，杜林否认对立面的统一，用矛盾的一方排斥、否定另一方，这就陷进了片面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再次，批判杜林否认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把认识的能力和作用无限夸大的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人的认识能力和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它们都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但是，杜林在认识问题上也坚持反辩证法的观点，这集中表现在他大肆鼓吹“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问题上。杜林声称：

“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而且可以永远这样设想：它们在任何时候，对于自身所有的条件都是适用的。甚至，那些不能说明普遍关系，只能说明个别的、纯系个人问题的真理，也是永恒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为是受时间和现实的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的。”^②对此，恩格斯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恩格斯认为：“杜林先生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的所有这些华丽的词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那末是哪些产物能这样。”^③恩格斯指出，要科学地解答这个问题，应该先了解什么是人的思维以及它具有什么特点。恩格斯说：人的思维“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着”^④。这就是说，人的思维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页。

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136—137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3—94、94页。

身就是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从思维的整体来看，人的思维是个人的思维和人类的思维的对立统一。从思维的能力来看，是个别人的非至上的思维能力和人类的至上的思维能力的对立统一。从思维所达到的结果来看，是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人的思维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造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①但是，杜林不了解或者拒绝承认思维的辩证法。一方面，他“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都要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②；另一方面，又企图证明他自己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发现者。

针对杜林的企图，恩格斯还具体分析了人类思维在各类不同学科领域所达到的认识成果。通过对各类科学发展情况的分析，恩格斯最后总结说：“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能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象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的没有错误。”^③显然，在恩格斯看来，杜林鼓吹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仅是由于他的无知，而且也由于要求承认他个人是没有错误的。杜林的这种思维方式，正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

恩格斯通过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批判，不仅进一步揭露了杜林主义的反科学性，而且揭露、剖析了杜林主义赖以建立的思想支柱，给杜林主义特别是杜林的“现实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4、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9页。

哲学”以最有力的打击。

4. 揭露和批判以空话、大话、谬论为特色的杜林主义的内容。杜林把杜林主义宣扬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体系，这是以无知为基础的。恩格斯在批判关于最后的终极真理的鼓噪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为此“只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就够了”^①。由于无知和先验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制约，杜林必然地把各种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以致荒唐无稽的东西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因而从体系的内容来看，杜林主义以充塞种种空话、大话、谬论为其特色。对此，恩格斯也进行了准确的、尖锐的甚至辛辣的揭露、批判。

说空话是杜林主义的一大特色，恩格斯具体地剖析了杜林玩弄空话的种种手法。恩格斯指出，杜林说空话的一种常见手法，是玩弄同义反复。杜林在世界模式论中首先提出的一个命题是：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这是典型的同义反复的空话。杜林在主词中声明：存在包罗万象；而在宾词中又断定：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这一存在之外。恩格斯讽刺说：“如果同义反复，即在宾词中简单地重复主词中已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末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②象这样同义反复的空话，在杜林的著作中不胜枚举。如，杜林为了证明他的关于机械力的量永远不变的观点，他又先抛出一个同义反复的公理：“在数量属于存在的不变要素的地方，这种数量在它的规定性方面保持不变。”^③这种同义反复的空话不仅不能给人们提供任何新的思想，甚至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不同的内容。给人所皆知的内容贴上杜撰的标签，这是杜林玩弄空话的又一种手法。杜林在自然哲学中，宣扬一般物质的量、单纯的元素的量和机械力的量都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5、71页。

不变的，并称这是“现实哲学所获得的自然界的三个不变律”^①。恩格斯指出：“关于物质及其运动的量守恒是许多唯物主义者早就论述过的，甚至笛卡儿也阐述过运动的量守恒。”恩格斯说：“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所不知道的正是：这是‘不变律’，而且作为不变律来说，是‘事物体系的模式属性’。……杜林先生拿出了某种尽人皆知的古董，贴上了杜林的标签，而称之为：‘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根本性的科学’。”^②这种名为“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而实为老生常谈的货色，在杜林的著作中还有许多。这样做不仅是制造了许多空话，而且不可避免地制造出许多谬论。把物质及其运动的量守恒说成是“不变”，把生物机体的发育称之为“结合”，都不仅不能准确地表述而且曲解了对象及其特性，这就难免陷于谬误之中。臆造没有肯定内容和不能运用的所谓“理论观点”，是杜林玩弄空话的第三种手法。杜林在拼凑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臆造了不少的理论观点，其中有许多是既没有肯定内容又不能运用的空话。例如，杜林否认现实的矛盾，提出力的对抗及其模式，就是这种典型的空话。恩格斯指出：“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只有在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表明这种对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③由此可见，恩格斯对杜林玩弄空话的种种手法的揭露，也是对杜林主义的空洞、陈旧的内容的有力批判。

杜林在其著作中给平淡无味的空话加上神谕式的大话作为佐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1、8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4页。

料，从而形成杜林主义的又一特色。对此，恩格斯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杜林说大话的手法之一，是随意地把一些平凡的事实甚至陈词滥调提升为“规律”。在《哲学教程》第六编中抛出了所谓“差异规律”，并且吹嘘“差异规律同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评价和提高生活价值的标准！”^①这个差异规律究竟包含什么内容？这个规律是怎样炮制出来的？恩格斯作了具体的剖析和解答。恩格斯指出，多年来在任何生理学手册中都说到，对同一神经的持续的刺激或者同一刺激的延续，会使任何神经和任何神经系统疲劳，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使神经的刺激有间断和变换。杜林就是给这种简单的事实，戴上“差异规律”的桂冠。恩格斯批判说：“简直不可想象，杜林先生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他的彻底独创的结论。……杜林先生刚把这些老生常谈译为现实哲学的语言，刚给这种陈词滥调套上‘一切感觉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情况的差异为基础的’这一神秘的形式，这种陈词滥调就已经转变为‘我们的差异规律’了。”^②在这里，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炮制“规律”的一般过程和常用手法。从这里可以看到杜林所谓“规律”，只不过是大话的别名而已。恩格斯揭露，杜林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中，也用同样的手法，吹嘘“冲动和情欲的满足有赖于经济障碍的克服，这是自然界的外部结构和人的内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规律”^③。接着，又炮制出五条“国民经济的自然规律”。恩格斯指出：“这一极为陈旧的平凡事实竟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说明，倒要归功于杜林先生。如果经济学上和哲学上的‘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仅仅在于给随便遇到的平凡事实加上一个响亮的名称，把它吹嘘为自然规律，甚至吹嘘为基本规律，那末科学的‘更加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8—129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8、202页。

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以做到了。”^①杜林说大话的手法之二，是任意地把他的宣扬的观点、理论封为“独创”。杜林在哲学中，宣称提出了“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在经济学中，鼓吹“建立一种新的、不仅满足时代而且成为时代标准的体系”；在社会主义学说中，吹嘘发现了“未来必须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结构。恩格斯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剖析，揭露杜林号称“独创”的货色纯粹是欺人之谈。“定数律”，是杜林自诩为哲学领域中的“独创”之一。他警告人们“不能把定数律看成一个微不足道的真理”，因为“定数律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了大家所熟知的一系列现实事物的起源，而且还让我们知道了其它现实事物的系列；定数律的固有特征取消了人们在想象自然时的那种原始局限性。”^②恩格斯指出，杜林的“可以计算的无限序列的观念，换句话说，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律，是一个定义中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它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③因为，不论是哲学上的无限性，还是数学中的无限序列，虽然有质的不同，但都是不可以计算完的。数学的无限序列，从0向左到 $-\infty$ 和从0向右到 ∞ ，也都是不可计算完的。所以，杜林的可以计算的无限序列的观念，也就是他的定数律，就象“圆形的方”或“木制的铁”那样是荒唐的矛盾。“定数律”不仅不能让人们熟知一切现实事物的起源和系列，而只会使人们重新陷入那种“原始局限性”。因此，只有从反面的意思去理解，才能说杜林的定数律是一个“独创”。“暴力所有制”，是杜林自诩为经济学领域中的“独创”之一。他鼓吹“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应当被看做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它们在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框，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框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1页。

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93—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页。

才能显示其作用”，并且吹嘘他的这种理解和表述是“如此独特”^①。恩格斯对此批判说：“一个人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样自以为是，才能把这个毫不独特的观点看得如此‘独特’。显赫的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的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已经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了，……这种观念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并且第一次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动摇；在这里，‘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知。”^②杜林给古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披上经济学外衣，当作“独特”的新货色来兜售，这一方面说明他的社会历史观是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他对真实的历史进程的无知。恩格斯指出：“‘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在这里，原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真实的事物进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话。”^③至于杜林吹嘘为“独创”的社会主义结构，其实只是一种乌托邦。恩格斯指出，杜林“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④杜林说大话的手法之三，是荒唐地吹嘘他的理论可以适用于全宇宙。杜林认为，不能给他发现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以“人间的”称呼。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杜林“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⑤因此，尽管他对数学的了解是如此惊人的贫乏，他却厚颜无耻地宣称：“‘他天体的居民的数学，除我们的公理外决不能以别的公理为依据！’”^⑥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吹嘘他的理论是“终极的真理”，而实质上是掩饰他的无知和谬误。在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6、173、174、178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8、39、61页。

论述生物学的问题时，杜林提出了四个完全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其中有的是极其荒谬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杜林标榜他的观点“是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声称“这样就有一种在地球以外也适用的意识学的发端”。对此，恩格斯揭露说，杜林“在地球上的生物学领域中遭遇有点不妙，那末，他是知道怎样自慰的，他遁入自己的星空。”^①恩格斯对杜林说大话的种种手法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他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进一步批判。

杜林应用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制造各种空话和大话，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杜林主义的内容增添了种种错误和谬论。因为从杜林所说的空话和大话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普通知识中搬来的老生常谈，一类是杜林自己主观随意的“创造”。前一类老生常谈虽然反映了一定条件下的客观实际，但经杜林贴上杜撰的标签或夸大为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转化成谬误。正如前述，杜林坚持“用原始元素中的组合思想代替变态概念”^②。这就完全无视生物机体的运动和化学元素的运动之间的质的区别，用低级的运动形式取代高级的运动形式，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恩格斯在具体分析了生物机体通过细胞分裂而逐步发展的过程后说：“把这样的过程叫做组合，而把称这一过程为发育的意见叫做‘纯粹的想象’，这种话无疑地只有对这种过程一无所知的人——很难设想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说得出来；在这里恰好只是而且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发育，根本不是组合！”^③至于后一类杜林自己“创造”的空话和大话，由于受到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制约，自然更避免不了错误。恩格斯在哲学部分批判过的、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物质自身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0—91页。

② 杜林：《哲学教程》，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4页。

同状态”、“定数律”、“道德原则的永恒适用性”等观点，都是充满谬误的货色。恩格斯指出：“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却到处可以碰到这些东西，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做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①在批判杜林在经济学中臆造“基本规律”和“自然规律”时，恩格斯又从方法上和内容上揭露了其错误。恩格斯指出，杜林“忠于他在哲学上已经陈述过的方法。从最无聊的陈词滥调中抽出两三个有时甚至措词不当的不言而喻的语句，就构成了经济学上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基本原则、自然规律。……给这种空谈的平淡无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只是神谕式的大话，有些地方是不正确的理解或关于各种各样琐碎事情的自以为了不起的臆想。”^②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空话、大话时，始终紧紧抓住他应用的方法和所阐述的内容，这就从现象的揭露深入到本质的批判，完整地剖析出杜林主义在总体上和在局部上荒谬性。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杜林主义的批判，是全面的、具体的、深刻的和有利的。通过对杜林主义出现的社会根源、杜林主义的反科学的和反动的目的、杜林主义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与方法以及以空话、大话和谬论为特色的杜林主义的内容的系统的剖析，具体地揭露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出了在主观上受到极端贫乏的认识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狂妄自大限制的杜林，深刻地阐明了在上述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杜林主义的内容和特色，并且始终着重对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从而给杜林主义以摧毁性的打击。这就是贯穿在恩格斯对杜林主义批判中的主线，也是恩格斯批判杜林主义给后人提供的基本经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1、241—242页。

第三节 《反杜林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构想

《反杜林论》不仅全面地彻底地批判了杜林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端正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人运动的政治方向；而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正面阐发，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8年版“序言”中指出，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使我在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①在《反杜林论》1885年版“序言”中，恩格斯又重申：

“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变成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相当广泛的领域。”^②恩格斯的话，一方面表明，杜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主要是内容和实质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体系之间的对立，但是由于内容和体系不能截然分开，因而批判杜林主义的内容必然要涉及杜林主义的体系，正面论述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必然要阐发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还表明，《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及其内在联系的阐发，“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及其内在联系的阐发，其次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内在联系的阐发。在这一节，我们先论述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然后论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阐明。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11页。

一、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要求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的阐明，并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的愿望，而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些问题“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换句话说，这是社会历史发展到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客观要求，这个要求可以从实践方面和科学方面去把握。

（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完善化要求

从实践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都是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做主要基础和主要动力。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阐明，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发展的要求。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孕育过程中，马克思就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正是由于认识了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按照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客观要求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1845年春至1846年夏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又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进一步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并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公开问世。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公开问世时，还只是在工人队伍和工人运动中发生影响的各种思想理论中的一种，对工人运动、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革命未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有待于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取得发展。因此，摆在它面前的是双重的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迎接欧洲兴起的多次的社会革命，在发挥理论的能动作用中接受革命实践的考验，总结各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为迎接和指导新的社会革命作准备；另一方面，同工人队伍、工人运动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进行坚决的反复的斗争，不断清除它们的错误的影响，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指导地位。由于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工人的不懈的努力与顽强的斗争，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的进程达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为迎接和指导新的社会革命作准备方面，取得了根本性的成果。马克思总结1848年——1850年的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①。通过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无产阶级“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②；并且科学地预见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将经过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③。马克思总结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成果的《资本论》，主要以生产关系说明它的结构和发展，同时揭示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活动和作用，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1、4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2页。

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同样，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自公开问世以后，经过近30年来实践的检验和科学的论证以及新的丰富和发展，已经成为被证明了的真理。

在同工人队伍和工人运动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作斗争，清除它们的错误的影响，争取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指导地位方面，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公开问世的过程中，就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以及封建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它们的假社会主义的面目。马克思主义理论战胜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在第一国际中取得了指导地位。1871年巴黎公社的诞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是国际的精神产儿”^②，“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③。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到70年中、后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④，“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⑤。

综上所述，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已被证明为科学的真理，并且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取得了指导地位。因而，历史进一步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系统地完善和阐明自身的理论以及它的内部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在理论的完整上显示自身的科学性和进一步有效地发挥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指导作用。

（二）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进一步丰富的要求

从科学方面来看，《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

④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2页。

建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阐明，则是相关的科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哲学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总结与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在研究人类科学知识、特别是总结19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完善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①在《反杜林论》1885年版的“序言”中，恩格斯又强调指出：“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②近代自然科学虽然在15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但长期处于孤立的静态的研究和积累材料的阶段。到19世纪，自然科学处于巨大的变革过程，从经验科学向理论科学转化。特别是标志近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新发现，主要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新发现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才逐渐完成的。由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孕育、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都着重于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和社会科学知识成果的总结。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总结近代自然科学巨大变革的新成果，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基础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就成为十分迫切和突出的任务。为此，恩格斯在70年代开始，就集中力量系统地展开对近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如对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哲学概括，都在《反杜林论》中加以应用和阐发。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探讨了从天体演化到生命的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和成果，这表明他力图全面概括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系统地揭示自然界的辩证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1、15页。

性质和运动。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本卷第三章论述。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提出的完善化系统化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段，怎样理解、界定这种新哲学的内涵，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理解、界定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把正在孕育的新世界观新哲学称之为“新思潮”，说明“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接着，马克思在1843年11月至1844年1月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它理解为一种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哲学”，恩格斯在1843年10月至11月写作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把它理解为一种“健全的哲学”^②。这些理解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孕育中的新哲学世界观，还缺乏具体的和明确的认识。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它称为“共产主义”，解释为“实践的人道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③。从这里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的突出影响。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和有分析地肯定唯物主义哲学，把新哲学理解为“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作为新哲学世界观的思想来源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作了科学的完整的批判与评价，从而使他对新哲学世界观取得了明确的认识，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并解释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59、5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页。

形态》中的阐述，是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观点的论证、展开、深化。和这里探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三个值得重视的思想：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再把“共产主义”主要看做是关于未来社会的既成思想或理论，而认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说明，共产党人的理论的“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②这些论述揭示了，作为现实的运动及其理论表现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并和从“理性”或“爱”等精神的东西出发的各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也改变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把共产主义和哲学世界观区分开来的情况。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新唯物主义”作了更高的概括，界定为“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③这里的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而是由他们在《德法年鉴》以来的实践和研究进程中创立的新哲学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问世后，恩格斯在1859年写作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学批判》中明确地说，党“有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①。可见，把他们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界定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并把这种哲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理论基础，以便同旧唯物主义以及旧哲学区别开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见解和态度。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了分析，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揭示了它的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论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本观点^②。后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除了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外，并指出马克思“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和建立了新的辩证方法，说明“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③。马克思在1865年写作的《论蒲鲁东》中指出，存在着与思辨辩证法不同的“科学辩证法”^④。接着，在《资本论》第一版跋中，马克思说明在将近30年以前“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建立了“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的辩证法，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阐述了它的“唯物主义基础”^⑤。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新的论述中，又提出了“科学辩证法”或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涵义。

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作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理论基础并已在工人运动中取得指导地位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必须回答、阐明包含在自身内部的上述各个部分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才能使自身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更有效地发挥自身作为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33、42—43、48—51、77—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5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3页。

观、理论基础的指导作用。

二、《反杜林论》体现出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从新唯物主义产生后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使新唯物主义进一步完善化系统化。恩格斯正是适应历史发展的这个要求，在《反杜林论》中建构了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使新唯物主义进一步完善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有巨大意义的贡献。

（一）阐明新唯物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上文说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新哲学，并把它称为“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它包括的内涵，则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辩证法”和实践唯物主义等。经过30年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怎样认识他们创立的新哲学的质的规定性，这是建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

（1）从与旧哲学的不同，阐明新唯物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他们创立的新哲学，明确地规定和称为“现代唯物主义”^①。恩格斯对新哲学的这一规定和称谓，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现代唯物主义”的规定和称谓，是为了把新哲学和旧唯物主义明显地区别开来。恩格斯说：“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②因为这里经过批判地吸收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成果，经过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否定，所以导致了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根本不同的“现代唯物主义”。另一方面，“现代唯物主义”的规定和称谓，是为了突出新哲学同当时的自然科学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历史科学的新成果的内在联系。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科学地概括了“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其中包括“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①。这表明新哲学没有脱离人类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而是人类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最新发展的产物。恩格斯强调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②。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对新哲学所作的“现代唯物主义”的规定和称谓,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的规定和称谓,是一脉相承和完全一致的。当然,恩格斯在这里作为对新哲学的30年发展的历史总结,增添了阐述新哲学和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关系,明确了新哲学是“本质上辩证的”,从而使对新哲学的认识更为深入、完整。这是对新唯物主义的认识的进步,应该加以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不仅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并且与一切旧哲学有质的区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同样把现代唯物主义看作“世界观”。他认为,作为哲学史上的“否定的否定”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③。但是,恩格斯在这里不是重复马克思的论述,依然从哲学与改变世界的关系,而是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揭示作为世界观的现代唯物主义的质的区别。

旧哲学是在各门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尚未分化、独立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把许多具体科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在自身之内。在古代,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从15世纪开始,欧洲由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物质生产的新发展带动了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使许多具体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页。

科学分化、独立出来，并且得到了日益迅速的发展。但是，到了18世纪—19世纪，许多哲学家并没有从近代自然科学分化、发展的现实中获得新的认识，仍然坚持在哲学中用想象去虚构世界的总体联系，并且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而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这样，不仅妨碍了哲学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指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这样，就“不再需要任何其他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①

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正是认识、适应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要求。它作为否定的否定，不仅否定了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也否定了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现代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不再象旧哲学那样给各门具体科学提供关于事物及其知识的总联系的构想，而是给它们提供关于科学地认识世界的一般的观点和方法。所以，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②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现代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在“解释世界”（特别是认识自然界）的问题同旧哲学的质的区别。这同马克思强调新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在“改变世界”的问题上同旧哲学的质的区别，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因为他们认为新世界观不论作为改变世界或认识世界的工具，同样提供的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方法或辩证思维的方法。

以上马克思、恩格斯前后所作的互为补充的论述，较为完整地揭示、阐明了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质的规定性。它是批判地概括两千年来历史本身和哲学、自然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151页。

科学的全部思想内容，特别是概括近代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的产物，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都提出和提供了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辩证方法，即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的统一，这决定了它在本质上辩证的，也就是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

(2) 从研究对象的确定，阐明新唯物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恩格斯除了从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去阐明新唯物主义质的规定性之外，还从新哲学的研究对象，去阐明新唯物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新唯物主义究竟包含哪些理论成分，这些理论成分的关系怎样，它们如何组成唯物主义世界观，这是新唯物主义产生后就提出了的问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始终坚持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即从科学地揭示、确定新唯物主义的对象，去阐明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关于新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恩格斯过去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论述，但在阐述新唯物主义的研究内容时，多有涉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哲学对国家问题的研究，要“从对象和自身的关系来考察对象”^①，要揭露对象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新哲学要研究、解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研究历史，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④。这些论述表明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研究自然和人类的历史发展，揭示其根源和必然性，把握其特殊的逻辑。到《反杜林论》，恩格斯、马克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8、3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恩总结了新唯物主义哲学近30年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作了较明确和较完整的规定。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在这里，恩格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的确定，去揭示新哲学世界观的质的规定性。

恩格斯肯定新哲学世界观的对象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把新哲学和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形而上学哲学区别开来。唯心主义哲学以思想、精神为研究对象，自然、社会在它们那里只不过是精神的附属物或产物。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但都是把它们当作孤立的、不变的对象来研究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以自然、社会、思维的运动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了具体的阐述。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②认真地细致地分析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可以把握其中包含的多层涵义。一方面，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人类历史、人的精神活动，都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并且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就是说，恩格斯认为现实世界自身存在着联系、相互作用、运动、变化，这是不依赖于作为考察者的“我们”而客观地存在着的。另一方面，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人的精神的联系、相互作用、运动等，都不会自发地进到或反映在“我们”的头脑中，必须通过作为考察者的“我们”的“深思熟虑”（即考察者的头脑的自觉的辩证的思维的作用）才会“呈现在我们眼前”。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

然，承认前一方面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承认后一方面就是坚持辩证法观点，二者结合才是新唯物主义观点。

然而，恩格斯关于新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的规定还表明，对自然、社会、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研究，是为了发现、掌握它们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新哲学必须完成的研究任务。因此，在恩格斯看来，新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对包括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在内的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及规律，进行辩证思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以前的人类思维的共同作用）而作出的科学表达、表述。所以，恩格斯说：“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穿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地被思维着的人们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①可见，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就是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自觉反映和科学表述。

承认新唯物主义是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理论表达，这就为正确理解其他层次的问题确定了唯物主义的前提。弄清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关键在于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辩证法”的概念，往往包括双重含义。一是指现实存在的辩证法，即包括自然、社会、思维在内的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辩证法”概念的另一种涵义，是指对现实的辩证法的自觉反映和理论表达，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这种以理论形态表述的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科学辩证法”、“唯物主义辩证法”。由此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14页。

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同一层次的范畴，实质上是同一的东西，即同样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及其普遍规律的理论反映和科学表达。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使用两个有所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同一理论呢？这是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由于从不同的视角来界定。他们使用“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的概念，是为了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这时，他们突出的是这种理论在内容和本质上的辩证性。所以，恩格斯强调指出：“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①。他们使用“科学辩证法”、“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概念，是为了区别于唯心主义辩证法。这时，他们突出的是这种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所以，马克思强调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②因此，应当如实地把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和科学辩证法、唯物主义辩证法看作同一的东西，即对于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及其普遍规律的理论反映和科学表达，也就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两个东西，或者认为前一个只是理论，而后一个只是方法；或者认为前一个是总体，后一个是总体中的一部分。如果那样认识的话，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它们所作的规定、论述的本来涵义的。

关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等理论，恩格斯把它们看作是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的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在恩格斯看来，这主要是由它们的对象的相互关系所规定的。恩格斯认为，“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中发生作用，这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周围世界运动、发展所呈现的三大过程和三大形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明人的生产、劳动对周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世界的改造作用时就指出，“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①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指出，物质从自身中“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②。因此，必须相应地建立关于这三大过程、三大形态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关于自然界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唯物主义思维观”的概念，但他多次使用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等类似的说法，并且称之为“逻辑和辩证法”^③。更重要的，是他对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作过许多理论的阐述。因此，可以肯定在恩格斯看来，新唯物主义还具有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并列的唯物主义思维观。但是，恩格斯当时称之为“逻辑和辩证法”。不过，这里的“辩证法”不是指整个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是指思维辩证法，即关于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既然可以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表述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当然也可以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表述关于自然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学说和关于历史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学说。恩格斯在大部分写作于《反杜林论》之前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片断和札记中，就把自然界自身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称作“自然界中的辩证法”，而把关于自然界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学说称为“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或“自然辩证法”^④。这样，就象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新哲学世界观可以对应地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那样，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也可以对应地称之为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唯物主义思维辩证法。这里虽然包含部分的推论，但基本框架是符合恩格斯所论述的思想的。因为恩格斯认为，“思维规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第550、28、99、546、591、635、647页。

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①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②。

这样，恩格斯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揭示了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同一的，同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它作为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是由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思维观即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唯物主义思维辩证法相互联系组成的理论体系。在阐明新唯物主义的质的规定性的同时，恩格斯还对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和结构，展开了具体的论述。

（二）阐明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恩格斯对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定，首先是论述它作为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恩格斯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批判杜林的先验主义的需要，因为杜林在其《哲学教程》的导言和第一篇中抛出了从原则出发的世界模式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论述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因为制定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必须先阐明它怎样解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怎样确定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哲学编的开头，在批判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同时，阐述了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新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是同一般哲学探究、解答的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一般哲学都必须探究、解答的根本问题，在恩格斯看来，是如何理解“意识和自然，思维 and 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关系^③。恩格斯认为，在这个问题的解答上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同时也正是对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8、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7页。

这个问题的相互对立的解答从根本上区分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关于唯心主义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作过许多的分析、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黑格尔唯心主义时说：“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①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解答精神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必须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它们的起源来看，二者究竟谁产生谁；二是从思想、观念的内容来看，究竟是存在、现实的反映还是主观自生的。黑格尔认为精神产生自然界，观念产生世界及其运动，就必然认为观念的内容是观念的自我产生、自我认识、自我复归，这就决定了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同样，恩格斯论述现代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基本原则，正是针对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从上述问题的两个方面去展开的。关于精神的起源、意识的产生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唯物主义时，主要是从它们作为社会产物的角度去论述的。这固然是出于着重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需要，但也和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进化论）的发展状况以及他们对自然科学缺乏深入的研究有关。因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阐述。首先，恩格斯论述了思维和意识是自然界的产物。他说：“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7页。

产物”^①。承认思维、意识产生于起源于自然界，这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后来，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具体的阐述和论证。关于思维和意识的内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唯物主义时已有过较充分的论述，阐明意识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在头脑中的映象。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只是重新肯定思想、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他指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②因此，“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论。他强调指出，“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③。

综上所述，在意识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是自然和社会的共同产物，意识是外部世界和人们实际生活过程的反映，思维不能从自身而只能从存在，汲取关于存在的意识的内容。这是作为世界观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新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就是说，新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科学的理论，用于认识和改变世界，就是科学的方法。不论从新唯物主义的总体或部分来看，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在恩格斯看来，意识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方法论中具有同样的意义。恩格斯认为在哲学研究和实际活动中，上述问题表现为原则与研究工作、原则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说，在研究工作和实际活动中，是把原则看作研究的出发点还是研究的最终结果，是要求外部世界去适应原则还是要求原则必须适应外部世界，同样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唯心主义既然认为自然是精神的产物，外部世界是观念的映象，因而必然主张原则是研究的出发点，人们必须从原则出发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9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38页。

构造世界，使世界适应原则。新唯物主义既然认为意识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观念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必然主张原则是研究的最终结果，应该从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中引出原则，而原则只有适合于外部世界才是正确的。恩格斯明确地揭示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的对立，他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承认原则是研究的最终结果，是从外部世界抽象出来的，只有适合于外部世界才是正确的，这是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以上所述，表明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理论基础，贯彻于它的体系的各个部分和始终。

（三）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阐述

在对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作展开的阐述时，恩格斯把关于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阐述放在首位，这是符合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的。从世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自然运动着的自然界，以后才出现自然发生的人，出现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从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早就指出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需要从它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制约上加以说明。可见，首先阐述自然界在历史上和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理论上的基础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1）确立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性质怎样和怎样确立新唯物主义自然观，这是阐述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必须首先说明的问题。恩格斯认为新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通过批判改造自然哲学和总结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建立的。

自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自然科学相对不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其发展的最高代表。恩格斯对自然哲学的批判，先揭示、肯定了它的积极成果。恩格斯认为自然哲学的积极成果，主要在于其辩证的观念，即把自然界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总体和不断变化的过程。如康德的原始星云说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把自然界描绘为在相互联系中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同时，恩格斯还对自然哲学的不足以至错误，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批判。首先，恩格斯指出，自然哲学在自然科学相对不发展的条件下，却企图描绘出自然界联系和运动的完整的图画，因而往往不得不用想象的虚构的联系去补充甚至代替现实的联系。他指出：“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①其次，恩格斯指出由于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自然哲学的发展观是不彻底的。恩格斯说：“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②再次，恩格斯指出自然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在唯心主义制约下，往往用神的意旨或绝对观念去解释自然界的现象。“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③恩格斯认为必须彻底改造自然哲学，“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④。

要确立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必须贯彻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⑤为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天体演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7、14页。

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7、13、15页。

化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到当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了科学的初步的总结，用以阐述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观点，确立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 阐述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观点

第一，阐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

在如何看待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的问题上，一种常见的形而上学观点设想自然界最初是静止不动的，后来才发生运动、变化。杜林对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的看法，就是这种形而上学观点的典型表现。恩格斯揭露了这种观点的反辩证法和必然滑向唯心主义的错误。他指出：“如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末，它怎么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种状态的东西，不能由它自己去摆脱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因此，使世界运动的第一次推动一定是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的。”^① 恩格斯认为这种错误之所以产生，在于不了解或不承认物质与运动、运动与静止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它们各自孤立起来和割裂开来。因此，恩格斯对它们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和辩证法的阐述。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具体地论述了物质与运动的关系。首先，他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肯定运动是物质的必然属性，凡有物质存在，它必然是运动着的物质。“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其次，恩格斯阐述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的多样性。他说明宇宙中的天体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热、电、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还有有机生命等，都是物质的运动的不同形式。“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中。”^② 恩格斯指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65页。

在承认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时，决不能把只适用于某一部分物质的某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加以夸大，当做绝对的东西用于整个物质世界。那样，必将导致否认物质与运动的必然联系。这样，恩格斯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揭示、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性。

为了进一步论证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性，恩格斯还阐述了运动与静止、平衡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认为运动和静止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一面，静止表示事物的平衡状态，而运动则表示事物的平衡状态的破坏，二者互相排斥。然而，运动和静止又存在着互相联系的方面。恩格斯认为，在物质世界的运动中，运动和静止、不平衡和平衡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的结果”^①。为了易于理解，恩格斯举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例证：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力学意义上的静止，但它同时却参加地球的运动和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分子、原子去经历各自的运动。这个例证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上意义，说明静止、平衡作为有限制的运动的结果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运动、平衡的破坏则是绝对的。由于运动和静止不能截然分开，所以恩格斯提出：“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②。由此可见，自然界在其“最初状态”（如果有最初状态的话），就是运动和静止、变化和不变的对立的统一。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论述，恩格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③。这是新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物质世界的运动的基本观点，是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理论基石。

第二，阐述唯物主义的同时又是辩证的时间观点和空间观点。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页。

设想自然界的最初状态是不变的，必然把时间与物质、时间与空间彼此割裂开来。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否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杜林的自然哲学认为自然界在最初是没有时间的，都把时间和物质、时间和空间割裂开来。因此，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就必须科学地阐明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建立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时间、空间的观点。

恩格斯认为，要确立的科学的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必须从现实的时间、空间出发，而不能从时间、空间的概念出发。因为科学的时间、空间的观念，是对现实的时间、空间及其特性进行研究的结果和概括。而从时间、空间的概念出发，甚至停留于它们的概念的研究，这种思辨的方法往往导致混乱、荒谬。所以，恩格斯说：“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①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出发，要求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只有适应现实的时间和空间才是正确的，这是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的具体贯彻。

恩格斯认为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出发，就可以看到时间和空间不是“空洞的持续性”和“虚无缥缈的空间”，而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所组成和被不同的事实所充满。同时，变化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也不是一回事。“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由于时间而存在。”这就表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着各种变化着的事物，它们是变化着的事物的存在形式。这样，一方面变化着的事物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形式而得到表现，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可以借变化的事物而得到测度。所以，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 and 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荒诞的事情。”^②这是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基本特性，也是新唯物主义关于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6—57页。

时间和空间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一方面揭示了时间、空间与物质存在的有机联系，肯定时间、空间的物质本性；另一方面还论述了时间、空间在发展过程中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肯定时间、空间的辩证性质。恩格斯强调指出，要正确理解时间、空间的无限性，必须坚持辩证法的观点。因为，“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①无限性是一个矛盾，首先表现在无限和有限是对立的统一，“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②。不论是无限的时间还是无限的空间，都是由在数量上不可穷尽的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组成的。其次，无限性是一个矛盾，又表现在它的过程的展开也充满着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在时间或空间的展开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点，既是一个有限的部分，又是无限的时间延续或无限的空间广延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从这个点向前向后，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恩格斯说：“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③。再次，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还表现在它既没有开端和终点，又有开端和终点。无限性没有开端和终点，是就它的永恒的发展过程来看的。无限性有开端和终点，是就它的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点来看的。因为过程中的每一个点，既可以是前一阶段的终点，又可以是后一阶段的开端，是开端和终点的辩证统一。恩格斯指出：“开端和终点正象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依存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是一样。”^④恩格斯关于时间、空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对立统一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所不可理解的。

恩格斯既阐述了时间、空间的物质本性，又阐述了时间、空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4页。

间的辩证发展，并且揭示了它们在运动着的物质的基础上的统一，这就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同时又是辩证的时间和空间观念。

第三，阐述有机生命运动的辩证法。

运动着的物质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和发展，这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内容。而自然界的发展方式，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机界向有机界过渡。出现有机生命，正是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表现。恩格斯为确立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有机生命运动的辩证法进行了可贵的探究。

首先，恩格斯探究了有机生命的出现。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不是表现为单纯的量变，而是表现为由量变引起的质变、飞跃，表现为从一种运动形式到另一种运动形式的决定性转变。他通过分析从天体力学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力学的转变，从物体的力学到分子力学的转变，从分子的物理学到原子的化学的转变，从普通的化学到蛋白质的化学反应的转变，得出结论说：“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①这样，在恩格斯看来，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不仅表示着物质运动的多样性，而且表示着物质运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方式。而在无机界的各种运动形式的比较中，化学反应变化是复杂的和高級的。通过长期的复杂的化学运动，自然界才实现了由无机界到有机生命的过渡。恩格斯指出，“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所能肯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②恩格斯以后的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为这一认识提供了日益增多和愈益有说服力的证据。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有机生命运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自然科学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唯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9、88页。

主义哲学、特别是宗教唯心主义，往往利用这个问题向唯物主义哲学进攻。恩格斯在确立新唯物主义自然观时，着重探究生命的本质问题，既是出于论证现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性质的需要，也是反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需要。恩格斯不是把有机生命当着一种孤立、静止的现象来考察，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活动、运动并从它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去考察。恩格斯认为有机生命的运动，也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考察初级生命现象，可以揭示一切生命现象的共有本质。他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①恩格斯关于生命本质的揭示，突出生命是一种“自我更新”、自我运动，显示了有机生命与无机物体的质的区别。无机物体和有机生命都发生新陈代谢活动，但无机物体的新陈代谢是由外部造成的过程引起的，而有机生命的新陈代谢是自主性活动，“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②。恩格斯关于生命本质的揭示，又突出了生命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显示了有机生命的自我更新的能力。恩格斯指出，一切生物共有的生命现象的表现，“在于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③生命机体的存在，离不开它的环境。但它与环境的关系，是以生命机体为中心的二者的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中，生命机体有选择地摄取对它“适当的”东西，生成新的和排除旧的东西。这种初级的自主性、能动性，是无机物体所不具有的。恩格斯关于生命本质的揭示，还突出了生命机体是内在矛盾的运动，显示生命运动的辩证法是和自然界、物质世界运动的辩证法一致的。恩格斯认为生命机体内部包含着分解和同化、吸取和排泄、分裂和结合等多种矛盾，由于内部矛盾的作用而与外部环境发生一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0、89页。

的矛盾。在内外矛盾的综合作用下，“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①。这就表明，有机生命的存在、运动都是矛盾的存在、矛盾的运动。

再次，恩格斯阐述了有机生命在矛盾斗争中的发展。恩格斯认为自然界的有机生命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并肯定达尔文的进化论给这方面的研究以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恩格斯研究、吸收达尔文进化论的成果，对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作了初步的阐述。恩格斯认为，有机生命的发展是通过矛盾斗争实现的。在有机生命的存在、发展过程中，除了生命个体内部包含的矛盾，还发生物种与环境（包括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矛盾，物种内部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它们和物种之间的矛盾。由于每一个体“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②而这些有利的特质就有了遗传的趋势，并通过累积的遗传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有机界的个体、物种，就是这样在矛盾斗争中，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变化、发展。

第四，阐述人在劳动过程中自我诞生的辩证法。

从有机自然界中产生人，这是物质运动的一次伟大的飞跃。但是，人不单纯是自然界自发的生存斗争的产物，人更主要是自己活动、自己劳动的产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③。可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必须揭示人从自然界诞生的规律性。对此，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作了专门的论述，从而较完整地制定、阐述了现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理论。这样，人的诞生标志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自然界向社会的过渡，恩格斯关于人的社会的理论阐述则标志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向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渡。

（四）关于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

新唯物主义作为全面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不仅研究自然界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而且研究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①因此，可以把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归结为关于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同时，这种科学理论也可以称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由于在新哲学世界观创立时，唯物主义历史观曾经作为重点阐述过。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主要在于补充、丰富。

（1）阐述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和基本理论

恩格斯认为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是现实的历史发展提出的要求，因而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他指出：“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②在这里，恩格斯列举了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1838—1842年英国宪章运动，说明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这一严峻的现实及其发展，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说明。但是，长期存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承担起这一理论任务，发现、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强调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应当归功于马克思”^③。

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发现唯物主义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30页。

史观的研究工作的思维进程。恩格斯认为思维进程的第一步，是从现实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追溯到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认识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中作了重要修正：“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思维进程的第二步，是发现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经济根源，认识到“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思维进程的第三步，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区分出物质、经济的关系和思想、政治的关系，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①。恩格斯关于发现、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维进程的阐述，同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研究工作的历史进程是基本一致的。

恩格斯还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概括的表述。恩格斯的表述，同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作的经典表述相比较，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马克思使用的概念精确，理论的论述准确；而恩格斯出于让一般工人较易理解，在这方面较少注意。其次，马克思着重在唯物主义历史观自身的表述，恩格斯则着重于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去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再次，由于50年代末欧洲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马克思强调一种社会形态在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恩格斯在70年代中还存在革命形势时，强调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日益清醒的认识，表示这个社会制度已出现弊病，说明消除弊病的物质手段已存在，关键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

于通过头脑从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由此可见，这些差别是由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共同造成的。

（2）阐述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

经济和政治（包括因素、活动、力量）是社会历史中两种经常发生作用的社会组成成份。如何认识、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重大分歧之一。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时，科学地阐述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恩格斯认为在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被经济决定的。对此，恩格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首先，从它们的产生来看，自有人类就有人的经济活动，而政治是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才出现的。恩格斯指出：“人类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所以他们象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①。后来，由于生产力逐步提高，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出现了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需要，产生了由个别人担当的社会职位。后来，又出现了私有财产，进而出现了阶级、国家，这才有了人对人的统治。可见，政治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并且主要是由于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次，在社会历史中，经济是目的，政治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手段。恩格斯指出，众多的事实说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②在历史上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中，每个阶级拼死搏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或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4、175页。

再次，从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来看，经济比政治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经济、政治、思想等手段的综合作用。但是斗争的最终结局，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是决定性的力量。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市民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实质上“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土地占有、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强大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①最后，仅仅从暴力与经济的关系来看，暴力必须以经济为前提、基础。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②

恩格斯认为政治虽然最终为经济所决定，但政治仍具有一定的独立的和能动的作用。首先，恩格斯认为政治权力虽然最初产生于经济根源，“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但“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政治权力“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使自身日益独立化，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并且演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和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强大的国家权力^③。其次，恩格斯认为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可以采取两不同的方向，采取何种方向是由政治自身的性质规定的。他指出：“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9、181、195页。

的压力下陷于崩溃。”^①这里，同样显示了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再次，恩格斯认为政治的能动作用，还表现在革命的暴力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他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②。在这里，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要求的结果。

恩格斯关于经济的基础和最终决定作用和政治的能动作用的论述，展开和丰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反杜林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的和重大的贡献。

（3）阐述道德和法的社会历史性

道德和法虽然分属伦理和法律的不同领域，但在恩格斯看来，它们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因而揭示它们的一般性质和发展规律，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任务。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道德和法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和法在阶级社会中具有特殊阶级内容，道德和法的共同性与历史继承性等观点都展开了论证。这些都将在本卷第四章加以阐述。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有重点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的必然性、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以及道德和法的社会历史性的理论，丰富、深化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直到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五）关于现代唯物主义思维观的阐述

恩格斯把支配着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的运动的辩证规律统称为辩证法，并把它区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外部世界的辩证法和思维的辩证法。客观辩证法、外部世界的辩证法是支配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和思维的辩证法是支配人类思维的辩证法，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表现形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9、200页。

式不同，后者是前者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因此，现代唯物主义思维观即唯物主义思维辩证法是关于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主观辩证法、思维的辩证法的理论概括和科学表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有关的论述，是对唯物主义思维辩证法的开拓性贡献。

（1）明确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研究主观辩证法、思维的辩证法、辩证思维方法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这样做，是出于反对形而上学和总结自然科学成就的需要，是为了阐明辩证思维的规律和掌握运用概念的艺术。

形而上学是同辩证思维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恩格斯认为它是15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的独特发展所带来的。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把自然界分成各个部门，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内部按其解剖形态进行考察。恩格斯认为：这种研究“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①。即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从广泛的总的联系中割裂开来和孤立起来去进行考察，这样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把它们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恩格斯指出：“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②到了19世纪，它更成了自然科学、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收集、积累材料进到整理材料和把材料系统化，从以分析为主进到以综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

合为主,从经验自然科学进到理论自然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进化论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①在哲学领域,虽然康德的星云说把这种形而上学冲破了一个缺口,黑格尔以颠倒的形式第一次揭示了整个自然、历史 and 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和费尔巴哈又重新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

所以,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②可见,自然科学和哲学要彻底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就必须领会辩证思维的规律和掌握运用概念的艺术,而这又只有通过研究以主观辩证法为对象的唯物主义思维辩证法,才能达到。因此,研究主观辩证法,是为了揭示、领会辩证思维的规律,掌握运用概念的艺术,自觉地进行辩证思维。

(2) 阐明人的思维的主要矛盾

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看,人的思维是不包含任何矛盾的,思维的产物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杜林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恩格斯认为,要批判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必须弄清思维的性质和特点,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人的思维。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③。因而,一方面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出界限,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人可能完全地认识世界,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另一方面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6、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8页。

人类思维又只能表现和实现于一系列的个人的思维之中，这些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地认识世界，他们的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比不需要改善的因素或正确的因素要多得多，就是说个人的思维是非至上的。这表明人的思维、认识，包含着复杂的矛盾。恩格斯指出：“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①这就是人的思维所包含的主要矛盾。

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所具有的主要矛盾，又是人的认识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说，通过这个矛盾的不断出现不断解决，推动着人类认识向前发展。在恩格斯看来，这个矛盾的解决包括相互联系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人的每天的、每次的认识中逐步得到解决。恩格斯说，这个矛盾是“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②另一方面，是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得到完全解决。恩格斯说：“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界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③这两方面的解决，虽然在具体内容和达到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前者为后者准备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总结。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促进了人的思维内部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以及人的思维与外部世界的矛盾的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肯定这个矛盾“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④。

(3) 阐明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统一

由于人的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对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5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95、94—95页。

统一，因此人的思维的产物，即思维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结果，必然既包含真理性认识又包含谬误性认识。恩格斯指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①。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真理和谬误都是人类认识的必然产物。

在真理和谬误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那种把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揭示、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恩格斯肯定真理与谬误是彼此对立的，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二者不容混淆。不能把真理说成是谬误，更不能把谬误当作是真理。但是，它们的对立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即在是否正确反映具体对象这个认识论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恩格斯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②。其次，恩格斯论述了真理与谬误的转化。由于真理与谬误的对立是相对的，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只要稍稍离开它们反映、说明的具体对象，“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③恩格斯以波义耳定律为例，说明它作为真理性认识，受到它所反映的气体的体积和所受的压力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成反比关系这一特定领域的限制。只要以上各种条件稍有变化，如气体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可见，对真理与谬误的关系，必须从它们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恩格斯反对给一些普通常识予以永恒真理的称呼，特别反对把在一定历史条件所取得的真理性认识绝对化，把它们夸大为永恒真理。这样做，不仅不能推进人类认识，反而束缚了人类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4—9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9页。

识的发展。

由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认识包含着真理与谬误的对立统一，因而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充满着真理与谬误的互相转化。恩格斯通过分析四类不同的科学领域的具体情况，说明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不断揭露原有的真理包含的错误和不断发现更新的真理。恩格斯指出，细胞“这种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前生物学上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而且还不得不把这些真理整堆整堆地永远抛弃掉。”^①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的发展，都要求人们克服形而上学的僵化观念，掌握、应用思维运动的辩证法。

(4) 阐述必然和自由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认为，自由和必然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中必然发生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又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恩格斯对这个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阐述。

首先，恩格斯科学地全面地揭示、阐述了自由和必然的涵义。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②但是，黑格尔只是从精神领域来理解自由和必然，把自由仅仅了解为“对必然性的认识”。恩格斯强调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必然是指客观存在的规律，包括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和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规律，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摆脱的。而自由则包括认识规律而作出判断的自由和应用规律而进行活动的自由两个方面。恩格斯认为，对规律的认识，表现为意志自由。他说：“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认识来作出决定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7、125页。

的那种能力。”^①对规律的应用，表现为能支配外部自然界和人自身，即表现为行动自由。所以，恩格斯从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去完整地阐明自由的涵义：“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②

其次，恩格斯认为自由同人类的生产实践紧密联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指出，在人类迈向自由的过程中，发现摩擦生火和发明、使用蒸汽机，都是决定性的步骤。他说：

“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开。”^③正因为这样，所以恩格斯强调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④

再次，恩格斯认为真正的人的自由，是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既然自由是根据对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自然和人自身，因此最高的自由就是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协调，这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恩格斯说：“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⑤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编，恩格斯阐发了与此同样的思想。他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⑥

以上的论述表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第一次把人的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126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6、308页。

思维及其运动作为历史过程来考察，从思维与外部世界在生产实践中的相互作用着眼，揭示、阐述了人类在不断解决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真理与谬误的矛盾，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规律性，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

（六）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的阐述

恩格斯在分别考察了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阐述了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之后，就转向对辩证法的规律的阐述，并以此结束“哲学”编。因为在恩格斯看来，新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因此在分别阐述了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后，必须进行综合、概括，揭示、阐述自然、社会、思维的运动的普遍规律，以此作为新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最终组成部分。

（1）阐述矛盾辩证法

恩格斯对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的论述，可以说都是以揭示、阐述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中的矛盾为中心去展开的。在探究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时，他又先论述了矛盾辩证法。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才把矛盾辩证法表述为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在论述矛盾辩证法时，恩格斯首先探讨了什么是矛盾的问题。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恩格斯解释了什么是矛盾，认为矛盾就是事物自身包含对立。他指出：“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具有对立，那末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②这一论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673页。

表明，恩格斯是把事物的矛盾和事物的运动联系起来考察，从事物的运动去说明矛盾的。所以，他又得出结论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①。对矛盾的这个说明，是合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的。

其次，恩格斯阐明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恩格斯在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中关于矛盾问题的阐述，已经揭示、证明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这里，恩格斯再作了概括性的论述。恩格斯从简单的机械运动开始，来揭示、证明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指出：“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②接着，恩格斯分析了更高级的运动形式，进一步揭示、证明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例如，有机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所以，恩格斯说：“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③然后，恩格斯还分析了人类思维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同样证明矛盾是客观地普遍地存在的。因此，恩格斯指出：矛盾不仅“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④

再次，恩格斯阐述了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论述矛盾的客观性、普遍性时，已经肯定了矛盾“是一种实际的力量”。然后，他通过分析矛盾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的关系，进一步揭示、阐明了矛盾作为一种实际力量是发挥什么作用的。在《反杜林论》准备材料中，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⑤。这就是说，一切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133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3、673页。

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是客观的辩证的否定，因为通过辩证的否定，最终实现了发展；而从内容方面看，则是对立的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因为内部矛盾才是否定得以实现的根据。恩格斯认为，否定、发展按本性说是包含着矛盾的过程和对立面的转化，辩证的否定就其使对立面的转化实现来说是过程的关键和核心。可见，在恩格斯看来，矛盾和辩证否定是互相联系的，它们都对事物发展起推动作用，但矛盾是辩证否定的内容根据，是更深层的推动力量。

恩格斯认为，矛盾辩证法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哲学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①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形而上学思维和辩证思维之间的对立，也是在矛盾问题上的对立。形而上学思维看不到或不承认矛盾，就无法理解事物自己的运动、变化、生命。例如，杜林不承认矛盾，就找不到从静到动的桥梁，就把思维及其产物绝对化，等等。辩证思维承认和运用矛盾辩证法，才能给上述问题以科学的解答。所以，在恩格斯看来，承认、坚持矛盾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要的内容和特征。

（2）阐述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恩格斯指出，量变和质变的规律曾由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阐述过。但是，黑格尔揭示的主要是，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恩格斯总结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新经验，阐明“量转化质，质转化为量”^②，从而做到完整地揭示、表述这一规律。

对量变和质变规律的内容，恩格斯作了简要的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指出，这个规律包括“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③这样两方面的情况。在这里，恩格斯批判地吸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139页。

收了黑格尔关于“度量关系的关节点”的思想。他肯定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①即在量变的关节点上，事物从原有的质飞跃为另一种质。同样，事物的质的变化也使事物的量发生改变。就是说，由质变产生的具有不同质的事物，也必然具有不同的量。正如恩格斯在书中所分析的碳、氢、氧化合物那样，由于上述元素的数量变化，产生了不同质的甲酸（ CH_2O_2 ）、乙酸（ $\text{C}_2\text{H}_4\text{O}_2$ ）、丙酸（ $\text{C}_3\text{H}_6\text{O}_2$ ）等，而这些不同质的酸也具有不同的量，如它们的沸点、熔点的量都各不相同^②。

恩格斯还用大量的经济材料，论证了这个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这里，他充分地论证马克思研究经济科学的成果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恩格斯指出，“是马克思第一个促进人们注意到”^③这个规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作用。马克思不仅阐明了“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变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变化着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而且还“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④。在自然科学方面，恩格斯具体分析了这个规律在碳化物同系列的不同物体的变化中的作用和表现，并且指出“在化学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量转化为质’”^⑤。恩格斯以上的论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认识量转化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3）阐述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恩格斯指出：否定的否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 and 思维的发展规律”^⑥。对此，恩格斯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在自然界方面，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8、140、141、139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0—141、154页。

“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同时，“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①在植物界，如大麦的种子在适宜的土壤、温度、水分等条件下发生特有的变化，变为麦苗，这样原有的麦粒被否定了；麦苗生长、开花、结实、成熟，又产生大麦粒，这样植株渐渐死去，它又被否定了。在动物界，如蝴蝶通过对卵的否定而产生出来，它通过生长发育达到性成熟，交尾、产卵后又被否定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地完成并不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前，不只是一次而且是多次结子、产卵或生育后代”^②，但其过程同样发生着否定的否定。在社会历史方面，恩格斯简介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否定的否定的论述：随着劳动、生产的逐步社会化，以剥削、占有剩余价值为基础的资本家所有制，否定了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然后，资本家私有制又必然被适应生产、劳动高度社会化要求的公有制所否定。恩格斯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③。在人类思维方面，恩格斯论述了数学和哲学中的否定的否定的规律的作用与表现。在代数中，对 a 的否定得出 $-a$ ，对 $-a$ 再否定（即以 $-a$ 乘以 $-a$ ）得 a^2 ，进到了二次幂的阶段。在微积分中，把 X 和 Y 加以微分，得出 $\frac{dx}{dy}$ ，把微分式加以积分，重新得出实数 x 和 y 。在哲学发展史上，古代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然后唯心主义又被现代唯物主义否定。所以，恩格斯总结说：“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表述出来而已。”^④

恩格斯对黑格尔关于否定的否定的思想的改造，不仅表现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9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6、155页。

揭示、证明这个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且表现在对这个规律的内容作出了科学的阐述。首先，恩格斯认为否定的否定的规律的作用，在于表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是事物和过程的性质要求和决定的辩证否定，而不是外部强加的随意的否定。他指出：“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①因此，否定的否定的规律的表现形式，不是象黑格尔所说的千遍一律的三段式，而是还有两次或多次否定的方式。其次，恩格斯认为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是克服和保存的统一。他指出，辩证的否定是一种“扬弃”，“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②因此，通过辩证的否定，发展不是重复原有的东西或是旧事物复归，而是事物得到提高、完善。再次，恩格斯认为事物的辩证否定和事物的矛盾运动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这就决定了辩证否定的必然性。他指出事物的发展过程，“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③这就是说，从实质来看，辩证否定的过程就是对立的划分、斗争和解决的过程。一方面，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和产物；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辩证的否定，对立面才能实现转化，事物的矛盾才能解决。

恩格斯在论述辩证法的主要规律时，反对把辩证法看作单纯的证明工具，坚持辩证法作为世界观的本质。他指出：“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辩证法不仅是比形式逻辑高超得多的“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而且“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155、151页。

萌芽”^①。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如实地看作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才符合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第一次集中地、全面地阐述了辩证法及其主要规律（即使对个别规律的表述还不够精确），这是继唯物主义辩证法产生后的又一巨大贡献，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确立了纲领。

三、对恩格斯建构的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

以上，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定作了阐述。下面，就如何认识、评价恩格斯建构的这个体系，作进一步的概括的说明。

（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建构了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关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确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何种体系，理论界的见解并不十分明确，也不完全一致。苏联和中国的哲学界普遍认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系统化或体系化，但并未明确指出该书阐述、确立的是什么样的体系。从有关著作论述的内容来看，通常都认为阐述的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或者认为是由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组成的体系。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反杜林论》并没有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我们认为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从《反杜林论》的实际情况出发。

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把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现代唯物主义的体系，必须弄清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哲学思想，具有内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7页。

的有序的结构。

恩格斯在本书一版序言中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①对恩格斯的这句话，必须完整地把握和准确地理解。如果只抓住前半句，就可能得出恩格斯没有想在《反杜林论》建构体系的结论。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体现在相应的概念、范畴之中的观点、观念，通过相互间的有机联系而组成的有序结构。按照这样的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新唯物主义理论当然具有内在的联系，即具有内在的有序的结构。我们在上文的具体论述，已经作了说明。至于恩格斯在序言中所说的话，主要表明马克思主义和杜林主义的对立是内容上实质上的对立，而不是体系上的对立，同时也表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不是要重新创造另一个体系，而是在总结、发挥、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已有哲学思想及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去制定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显然，这样理解，才能把恩格斯这句话的前后部分统一起来。

第二，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恩格斯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对新哲学世界观的表述，二者实质上是同一的。

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恩格斯使用过的概念，新唯物主义和科学辩证法是马克思使用过的概念，它们作为名词是不同的，但作为概念是一致的。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都是表述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它们都是主观的理论形态的东西，虽然它们的内容是客观的，都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反映和理论表述。不能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主观形态的东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页。

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看成是客观形态的东西，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反映。也不能把现代唯物主义只看成是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看成关于辩证法的理论，认为它们的结合才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世界观。它们的差别在于，现代唯物主义突出的新哲学世界观的反映方式是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突出的是新哲学世界观的反映内容是辩证法。

第三，恩格斯认为现代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是现代唯物主义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恩格斯看来，现代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是现代唯物主义的不同组成部分，又是现代唯物主义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思维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不同组成部分，又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根据上文的论述，这两种说法实质上是相同的。但是，长期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反复宣扬现代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强加于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这种说法或者是曲解，或者是误解。应该承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已经从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需要两方面基本上说清楚了这一问题。从世界的历史发展来看，人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自然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的前提，历史辩证法以自然辩证法作基础。不承认、不阐明自然辩证法，对历史辩证法的反映、阐述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科学的。从理论的需要来看，一是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阐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不同于旧的自然哲学的理论；二是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阐明现实的人如何从自然界产生的理论。可见，现代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是对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新的开拓、补充、完善，决不是外加、强加。

综上所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现代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的框架是：作为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现代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思维观（唯物主义思维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观。第一部分是导论，第二、三、四部分是分论，第五部分是总论。

（二）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制定，同批判杜林哲学有关，但主要是恩格斯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的上述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否同批判杜林哲学有关，是否受到杜林哲学的影响，这是国内外有关的学者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例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其《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说：“恩格斯特别是在《反杜林论》中，还不得不——自相矛盾地——采用他的论敌的一些立场”^①。然而，麦克莱伦对此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论证。为此，必须明确以下的认识。

第一，对杜林哲学的批判，是恩格斯阐述现代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因。

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阐述，起因于对杜林哲学的批判，这是历史的事实。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由于他所批判的杜林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他不得不从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去展开批判。当然，在哲学方面也是如此。正如本章第一节剖析杜林的“现实哲学”所指出的，他的哲学就包括：哲学导论和世界模式论，自然哲学、意识哲学、人的哲学等部分。恩格斯为了批判杜林哲学，不得不把《反杜林论》“哲学”编分为大致相应的部分。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恩

^①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格斯“采用”了杜林的立场，或以为恩格斯阐述的现代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安排受到杜林哲学的影响。从恩格斯有关阐述的内容来看，恩格斯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同杜林哲学根本对立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处处“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①。例如，杜林虽然也企图说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但由于他的形而上学的立场、观点的制约，始终未能做到。只是恩格斯运用辩证的思维，才得以如实地揭示、阐明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辩证运动。从恩格斯阐述的理论体系的框架形式来看，也决不是重复或仿照杜林哲学。例如，《反杜林论》有关“自然哲学”的四章，就分析、批判了杜林的《哲学教程》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问题，即批判了包括他的自然哲学和意识哲学中的错误。又如，《哲学教程》是从自然哲学到意识哲学再到历史哲学，而《反杜林论》则是从自然观到历史观再到思维观。再如，《反杜林论》专辟“辩证法”两章，阐述辩证法的规律，这是杜林的《哲学教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的。可见，批判杜林哲学只是恩格斯阐述现代唯物主义内涵体系的动因，任何夸大、曲解都是错误的。

第二，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定，是自觉地认识和适应总结自然观、历史观、思维方式的变革的需要。

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定，主要是他自觉地认识、适应总结自然观、历史观、思维方式变革的成果和完善新哲学世界的客观需要。一方面，自然观、历史观、思维方式的变革，发展到当时，突出了必须总结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领域的变革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包括经验和教训），为进行总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关于这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和“序言”中都作了集中的反复的论述。至于在上述几个方面中，着重阐述自然观、自然辩证法方面，并且大量使用自然科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页。

的材料。这是由于确立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思维观的任务已由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前完成，确立现代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任务则有待于在当时实现。而自然界的运动、自然科学的成就，能更有力地证明辩证法的客观存在。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①

第三，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制定，是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阐述，不是来自论敌，而是他的创造性研究活动的成果。恩格斯的创造性活动，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去把握。一方面，是对自然科学新成就的研究、总结和发挥。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他从1869年以后，开始对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首先，在当时形而上学思维还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恩格斯应用辩证思维去进行研究、总结，这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次，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必须通过制定、阐明这种自然观的基本理论，这是由恩格斯通过创造性活动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实现的。再次，在对某些自然科学原理的阐述上，也显示恩格斯的创造性。如对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全面揭示和完整表述，对生命的特征的系统地揭示和阐述等。另一方面，是对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制定的创造性。对这个体系的框架的设想、构成，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体系。如，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系安排是：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他的逻辑学的体系安排是：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个规律是分散论述。恩格斯的体系安排，有分有合，有导论有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论，全部贯串对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阐述。

国内外的不少学者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否认人的主体性和它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因而是和马克思确立的新唯物主义体系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说：恩格斯的体系“是一个冷酷的、连续的和无情的体系。人很少能影响历史 and 自然界的发展进程。人与其说是历史的主体，不如说基本上是无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客体。”^①对恩格斯阐述的现代唯物主义体系的这些评价，是缺乏有力的根据的和错误的。这种看法的错误，从认识根源来看，在于不了解或不承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体系的特殊性。历史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单一的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多样的开放的发展的。它随着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条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具体形态。它们之间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一致性。因此，既不能用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立的理论体系，去否定《反杜林论》中建构的理论体系，也不能用后者去否定前者。而要善于去发现它们之间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发现它们之间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为了回答上述的攻击，下面简要说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建构的现代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在创立时期建构的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致性。

首先，这种一致性表现在，恩格斯不仅不否认并且强调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现代唯物主义理解的人的主体性，不是在幻想中的独立，不是脱离现实的意志自由，而是集中地表现为人在实际活动中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支配。恩格斯在论述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时，没有任何关于人是自然必然性的消极客体的论述或暗示，明确地肯定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

^① 诺曼·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

然界”^①。

其次，这种一致性表现在，恩格斯不仅不否认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思想，并且通过有关的阐述深化了这一思想。恩格斯在论述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必然和自由、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改造等问题时，都贯彻了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思想。同时，深入地阐明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是以认识客观必然性为前提的。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越多越深刻，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能力越强、改造作用越广。并且明确这种相互作用是一种历史的过程，最终人们可以“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②。

再次，这种一致性还表现，恩格斯进一步阐明历史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以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必须在社会化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人才能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获得体力和智力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才“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③。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还明确地把马克思和他创立的新哲学世界观，规定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④。所有这些，都是对上述的错误看法的有力反驳。

第四节 《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的阐明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不仅确立了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还从更大的视角、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演变和整体联系。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12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4页。

部分的基本理论，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历史、各个部分的核心内容以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互相促进，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时代。

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部 “百科全书”的主要贡献

恩格斯把《反杜林论》看作“百科全书式”的著作^①，这对这部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的巨著，无疑是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这是第一部集中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又是阐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发展的第一部著作，这就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部“百科全书”的主要贡献。

（一）在确立现代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下，阐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

关于《反杜林论》对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的阐明，在上文已有论述。在这里，再作一些简要的提示。《反杜林论》对现代唯物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论述，首先出于批判杜林哲学的需要，同时也出于确立现代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正是出于批判杜林哲学、特别是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观点的需要，恩格斯有时不得不重复某些旧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例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观点，物质的自己运动的观点，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的观点等。但是，由于阐述、确立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需要，恩格斯往往对这些观点给予改造、发展，或增添新的内容，或赋予新的表述等。例如，在物质与运动的关系的问题上，恩格斯提出了“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39页。

命题。这不仅有了新的表述形式，而且在吸收旧唯物主义肯定运动是物质的属性的思想的基础上，从内容上有了深化和丰富，使之成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当然，《反杜林论》还有许多哲学观点，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为依据，或者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果，而作出的新概括，从而丰富、发展了现代唯物主义理论。例如，关于“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的观点，“运动就是矛盾”的观点，时间、空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相统一的观点，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相统一的观点，生命的基本特征的观点，有机界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观点，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相统一的观点，真理和谬误互相转化的观点，等等。在研究《反杜林论》中的各个哲学观点时，应当注意上述的区别、联系。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的贡献。

（二）总结马克思的研究成果，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创立的“划时代的功绩”，“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①恩格斯充分肯定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创造性贡献，他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阐述，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为依据而展开的。

第一，阐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支配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可以分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的条件和形式以认识支配生产、交换、分配的规律的科学。恩格斯指出：“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②由于人们进行生产、交换、分配时所处的条件，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2、163页。

各个国家各不相同，并且每个国家的各个世代又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的条件和形式，并把它与在它之前或和它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加以比较，以发现支配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的规律的科学。恩格斯指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但是，“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因此，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确立，“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①

第二，论述生产、交换、分配的辩证运动的一般规律。

恩格斯指出，对生产、交换、分配的规律进行研究，必须“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②恩格斯正是以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论述了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职能，但是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③。生产和交换作为社会历史的前提，规定着产品的分配方式和方法。“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④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一方面，旧的分配方式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另一方面，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则有利于前者的巩固、发展。恩格斯认为，社会的弊病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产物和表现。因此，“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4、161、1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1页。

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①

第三，阐述社会生产在历史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

首先，恩格斯指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是以生产的进步和繁荣为基础的。从古代的土地公有的原始公社到奴隶制社会，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是由生产造成的，即是私有财产和分工的产物。早在古代的原始公社中，已经存在某些私有物品。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私有财产的积聚日益增多，从而有可能出现奴隶和奴隶制度，出现体力劳动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②古代奴隶制的出现就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这是社会历史的进步。恩格斯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③

其次，恩格斯指出在政治权力和经济运动的对立中，经济总是发挥最终的决定作用。对此，恩格斯分析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较落后的野蛮的征服者对经济发展先进地区的征服。这种征服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破坏了经济的发展，但在长时期后，绝大多数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仍然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从而为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被征服者所同化。只有极个别的情形是，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驱走被征服者，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衰落下去。这种政治权力的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7、198、196页。

落后以致倒退。另一种情况是，在非征服的条件下，“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①。

再次，恩格斯指出阶级的消灭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都必须以生产发展为前提。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因为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付出很多的劳动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参预社会公共事务，必然要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这个阶级永远不会让劳动群众摆脱沉重的劳动负担。因此，“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②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消灭阶级和实现一切人都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制度。

第四，论述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恩格斯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这一发现首先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真正的科学，因而对这个理论作了深入的阐述。

恩格斯认为要了解剩余价值怎样产生和它的性质，必须先了解商品的价值。李嘉图首先提出了商品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的。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成果出发，精确地揭示“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③而工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它的价值是由生产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在劳动力的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8、208页。

用即工人生产商品的过程中，他耗费在所生产的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他创造的商品的价值，大大高于制造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大大高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这样，资本家就无偿地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阐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和性质，“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结构，揭示了整个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①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它的展开、发展、激化，规定、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矛盾，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恩格斯以上的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的运动的规律，而且深刻地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秘密和它的运动的特殊规律，从而具体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三）总结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历史、实际、理论等不同方面，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真正的科学的根本特征，帮助现代无产阶级认清完成解放世界这一历史使命的性质和行动条件，从而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一，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必然产物。

恩格斯指出，随着欧洲从封建主义时代转换到资本主义时代，就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种批判在理论上表现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3页。

文为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且天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坚决地进行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他们的主要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科学的评述。傅立叶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在自身不断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的，它有上升的时期也有下降的时期。欧文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共同的财产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圣西门提出一切人都应当劳动，并且认为对人的统治应当改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以及必须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等思想。恩格斯认为，这些思想、理论不论如何的杰出以致天才，但根本上具有空想的性质，因为“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①。这就是说，他们的理论不是从物质现实中发现出来，而主要是从头脑中发明出来的。他们不是着眼于改造现存社会制度，而是着眼于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他们只看到无产阶级是“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②。因而只是依靠社会的上层和从上面去实行他们的计划、理论。恩格斯指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③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批判地总结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④，从而使它由空想变为科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0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3、22页。

第二，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就是不从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出发，从头脑中发明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发现、概括出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对此，恩格斯在《反林社论》中作了集中的、明确的和扼要的阐述。

首先，恩格斯精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主要表现。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社会生产上的首要的历史作用，就是把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变为社会化生产。一方面，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把个人的分散的劳动加以集中和统一，使生产活动也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化的劳动相结合，造成强大的社会化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①但是，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并且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它们仍被迫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②的矛盾。“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③这表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4、295—2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5页。

来，并且规定、影响社会的其他各种矛盾。在这里，恩格斯着重地揭露、考察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的两个主要的表现。一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①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化、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在上述基本矛盾的作用下，独立的分散的小生产日益被社会化生产所排挤，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资本家手中，而个体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和农民）则日益丧失生产资料而成为无产者。恩格斯指出：“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②二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③这就是说，由于上述基本矛盾的作用，每个资本家都努力加强自己所有的工厂的生产的组织性以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在社会中，每个资本家及其工厂都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支配它们及其活动的只有价值规律，在它们之间进行的激烈的竞争使整个社会生产表现为无政府状态。而在上述的矛盾、对立的综合作用下，使资本主义爆发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④

其次，恩格斯精辟地论述了要善于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中发现新社会的因素和实现新社会的手段。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的出现，不仅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适应社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5、296、29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1页。

会化生产的发展，并且表明代替旧社会的新社会的因素和实现新社会的手段也已多少存在于社会现实中，关键在于应用辩证的思维去发现出来。对此，恩格斯也作了具体的分析、论述。在恩格斯看来，社会化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革命因素，也是新社会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①这就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对待，从而在资本主义关系内出现了某些新的因素。例如，生产机构和交换机构向股份公司的转变，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如铁路、邮政、电报等）向国家财产的转变，等等。恩格斯指出：这些转变虽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但却“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可见，“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②

再次，恩格斯精辟地阐明新社会产生的物质前提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作准备的。恩格斯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③同时，恩格斯还指出：“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④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资产阶级学者曲解的那样是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物质条件（社会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2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3、306、307页。

力、社会化生产等)按客观规律发展一定导致的结果。

以上的论述说明,“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①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在可靠的现实基础上。

第三,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关于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的预见。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也有所论述。但是,他没有给未来社会确定任何名称,主要是根据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趋势去预测未来社会的某些主要特征。

首先,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的占有方式是符合现代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本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第一个行动,是“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就让位于“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②

其次,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中阶级、国家都将很快消失。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以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雇佣工人为标志,无产阶级是以丧失生产资料而出卖劳动力为标志,而现代国家则是维持这种阶级对立和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工具。因此,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以社会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305页。

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①因为，“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②

再次，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将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在恩格斯看来，“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③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直接的生产和直接的分配。这样，就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和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最后，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将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和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社会弊病。按照恩格斯的论述，社会在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之后，还必须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弊病，作出重大的努力。在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方面，应该使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并且实行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要先消灭旧的分工，让劳动者能定期地调换工种，使劳动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要缩短实际劳动的时间，保证劳动者有时间参预社会共同事务的管理；要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从儿童开始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的预见，是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为依据的，许多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所不同，但其中包含的许多思想仍然是有启迪的。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时，还多方面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它们有机地构成的整体。对此，我们将在下文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5、306、334页。

分别地加以论述。

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 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初是作为一个整体孕育的，其中包含着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因素、成份。后来，由于研究的对象和担负的任务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形成过程中逐步地分化为三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作为同一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发生互相作用互相促进。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①在这里，恩格斯从根本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

（一）掌握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认识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确定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

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孕育的初期，最先是把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改造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进而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借助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宾颠倒”的方法，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逻辑神秘主义，初步地认识、掌握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这表明在他和黑格尔不同，强调“从对象和自身的关系来考察对象”，不仅要揭露对象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把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13页。

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 马克思应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初步地认识了现代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和现代无产阶级的立场相结合，推动、帮助马克思开展经济学的研究和进一步研究、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认识了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历史的辩证运动、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人的自我诞生的辩证法、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及其变化必然导致的共产主义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孕育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雏型，进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先形成、确立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从而为进一步形成、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

（二）应用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历史发展，确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产生后不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迅即提出了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任务，要求在纲领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思想，划清它和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派别的原则界限。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作品——《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首先考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历史，揭示了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各种表现和发展阶段。接着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8、3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467页。

的一般表现。”^①这正是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具体应用具体贯彻。然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②并且对这些要求，展开了理论的分析、阐述。由此说明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导致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灭，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上述基本原理的论述，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且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其他社会主义的理论、派别的界限。后来，恩格斯在论述《共产党宣言》时，指出构成它的核心的基本原理是：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④这就再一次证明，《共产党宣言》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新唯物主义、主要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应用具体贯彻。这也表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肯定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而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是指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理论去阐明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问题，确立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和条件的科学理论。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480、4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

(三) 为无产阶级解放而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阐明、确立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

恩格斯所说的由于发现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在这里，剩余价值理论不象唯物主义历史观那样发挥指导作用，而是发挥论证的作用，即进一步论述、证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规定剩余价值理论发挥这种特殊作用的，首先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在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虽然，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也为发现剩余价值作了一些理论准备。但真正发现剩余价值，阐明剩余价值理论，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欧洲革命高潮过去后，马克思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他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需要，去揭示、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客观规律，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所说的，他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集中体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马克思首先公开发表剩余价值论，是在1865年6月间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作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里，也有有力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是发挥进一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作用。

其次，从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来看，它发挥的也是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作用。当然，这里的前提是，马克思对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页。

学的深入研究及其成果（包括剩余价值理论），是以新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的。对此，恩格斯在1859年写作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明过，“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① 马克思正是充分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才得以发现剩余价值和阐明剩余价值理论。第一步，发现剩余价值，必须运用辩证的分析和综合。一方面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来，才能认清劳动力是具有增殖价值能力的商品，认清价值是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从利润、地租、利息等具体形态中抽象出剩余价值，才能认清剩余价值是资产阶级以不同形式分享的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第二步，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运用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最初，从揭示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开始；进而分析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分析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揭示资本的运动是价值增殖的运动；然后，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与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区别与联系，揭示剩余价值必须以流通过程为基础但只能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第三步，阐明剩余价值生产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为此，要研究、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研究、论述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生产，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同时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其发展，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导致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日益深化和激化，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为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的核心，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的揭示、阐明，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

总之，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的揭示，有力地说明它们是作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历史地产生、形成的。

三、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各个部分 的内容相互制约而构成的有机整体

在《反社林论》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社会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的规律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性质和条件的科学，肯定它们是各具自身规定性和独立性的学科。同时，恩格斯又从它们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在理论内容上的相互制约，揭示它们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联系地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在这里，再对恩格斯关于它们在内容上的相互制约的论述，作简要的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提供科学的和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同时也从它们吸取理论内容和得到科学验证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而孕育、产生的，它必须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目的服务，这是它与其他哲学不同的根本所在。所以，它在形成过程中，是首先和主要通过对社会运动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

研究，去揭示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同时形成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提供的革命的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正是后者的理论得以阐明、确立的根本保证。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的有：在新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否定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作理性、正义、普遍人性、永恒真理等的产物和体现的错误观点，把它们看作是是人类历史运动的一定阶段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展的必然产物，从而把关于它们的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以新唯物主义为指导，否定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不变的概念，而把它看作处于经常的变动中，看作是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的过程；在新唯物主义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既如实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和性质。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具体理论观点，同样必须以新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得到科学的阐明。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剩余价值理论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等观点的阐述，都表明这是应用、贯彻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成果。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它的理论观点又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吸取内容和得到验证。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论述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以及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时，就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述中吸取了丰富的内容。如，关于货币或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论述，关于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造成与许多单个人的力量的总和本质不同的新的力量的论述，关于从劳动者个人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到新的个人所有制是否定的否定的辩证过程的论述等。又如，恩格斯对平等观的阐

述，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消灭阶级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对新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应用，又是对这些观点和方法的科学检验。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论述，是对新唯物主义的有力的验证。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末，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①

（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的阐明，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制约，又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制约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低的层次，因为它不是研究世界运动的普遍规律，而是研究人类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运动的规律；但是，它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所处的层次为高，因为后者是研究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解放的规律。因此，居于中间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制约，另一方面又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制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对许多理论观点的论述，对此给予了揭示和阐明。

应用新唯物主义来指导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根本改变了这一学科的目的和性质。正如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揭露的，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②，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存在作论证的。在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页。

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①以新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却如实地揭示、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服务。此外，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都在新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得到科学的阐明。例如，有的经济学家把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关系割裂开来或颠倒过来，认为分配和生产无关，或者认为分配决定生产。对这个问题，杜林也持这种观点。恩格斯坚持新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基础的基本观点，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述。他指出：“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而且，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实地推断这个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②又如，关于资本的概念，不少的经济学者把资本与生产资料混同起来，庸俗经济学家宣扬“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杜林也大致持这种观点。恩格斯在批判这类错误观念时，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去分析作为剩余劳动的产品的生产资料和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联系与区别，从而阐明了资本的科学概念。一切的生产资料都是剩余劳动的产品，都是积累的劳动，这是它们的联系和共同性。而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特殊性在于：“只有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劳动者……来作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劳动者的时候，……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无疑对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指导意义。承认分配是被生产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不会象蒲鲁东、杜林那样主张只是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而企图保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应该首先从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着手。同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7、227页。

对于具有不同特殊性的生产资料，科学社会主义应采取有所不同的态度。

(三) 科学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运用和贯彻，又是对它们作出的新的检验

关于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相互制约的阐述，上文已有不少论及。在这里，再作某些简要的补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不同部分，多次强调现代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贯彻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以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物质事实为依据。在“概论”的开头，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行考察的结果，强调“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①。在“政治经济学”编，恩格斯又强调现代社会主义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揭露和阐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及其解决的必然要求。他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②。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再次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强调改变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③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划清界限，使现代社会主义提出、阐明的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因此，现代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思想，既表现为理论上的胜利，更表现为实践中的胜利。毫无疑问，这些胜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的有力确证。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1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3、292页。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第一次明确地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同时又第一次明确地深入地揭示、论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简短的结论

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但是，在反杜林主义斗争中产生的《反杜林论》，不仅没有失去它的历史光辉，而且日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理论意义。《反杜林论》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理论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的科学论述，揭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部源泉和动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反杜林论》确立了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论述、阐明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完善化的进程中树立前所未有的里程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新的途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发展史中，列宁在《反杜林论》奠定的理论基础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反杜林论》的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后，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同时，又为中国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对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提供了重要教材和锐利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史上，《反杜林论》在日益广泛的国土上培育出一代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事实证明，《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的理论源泉。

第三章 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创立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

自然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的重要标志。

在《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对 19 世纪中叶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成就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总结和概括，对当时流行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里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和思潮作了深刻的批判，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论证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促进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和完善化，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是极其重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他们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的同时，经常密切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关心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

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

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起，就一直关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至60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论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讯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经常讨论一些自然科学问题，交换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意见。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说他正在进行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广泛地研究了自然科学知识。在迄今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笔记本》中，记载有一些大化学家和农学家有关农业化学方面以及有关农业史、地质学、力学、工艺学等方面的著作摘录。同时，马克思对于生物科学方面如：生命的起源和本质、生理学、人类学和生物化学等问题表示兴趣。他非常熟悉微耳和（细胞学说）、弥勒和赫尔姆霍兹（生理学）、肖莱马、霍夫曼（化学）、丹尼尔斯（人类学）、格兰特（地质学）、波佩（数学史）、杜布瓦·雷蒙等自然科学家的著作。马克思还研究了俄国化学家恩格尔哈特的著作。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摘录自然科学家著作的要点，而是做出了自己的结论。这表明，马克思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例如，马克思对著名化学家李比希的著作，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批评了他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和阶级局限性。李比希认为，土地报酬递减律是大自然确定不移的规律。而马克思认为，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报酬递减的原因只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既侵吞着劳动者的精力，又侵吞着土地的天然富源。马克思对施莱登和施旺有关生理学著作摘录了要点并且指出了细胞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3—326页。

马克思还对动植物细胞分裂的生理过程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虽然同化和异化是不同的过程，但是，这种同化与异化是互为条件，互相依赖的。马克思强调了这些过程的统一性。

恩格斯为了批判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而开始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他于1858年7月14日写信给马克思说：“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从哲学观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知道，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毫无疑问，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末，论据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旺发现的……一切东西都是细胞。”^①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根据自然科学中的最新发现做出了某些哲学概括。他说：“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②他还说：“人们在研究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危险的。”^③由此可见，恩格斯准备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同自然科学新成就加以比较以便作出唯物辩证法的解释。

达尔文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这一科学巨著在1859年出版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认真研究，而且给予高度评价。1859年12月12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325页。

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歷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①马克思还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了解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②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说，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整整几个月没有谈论别的任何事情，只是谈论达尔文和他的发现的革命力量。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严肃地批评了达尔文著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马克思指出：“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③恩格斯是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达尔文的错误，是“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④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从40年代起他就非常关心数学。1865年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在工作之余——当然不能老是写作——我就搞微分学 $\frac{dx}{dy}$ 。我没有耐心再去读别的东西。”^⑤他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认真钻研了微积分和代数学，留下了近一千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1—2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4页。

的《数学手稿》。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

马克思在1864年通读了英国物理学家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认为他在“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①因为这本书很好地论证了能量转化问题。恩格斯也指出：格罗夫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②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运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展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③恩格斯早在40年代中期就认识到，英国社会革命是科学和实践的结果，从此，他密切关注自然科学的进展。但是，在40年代末的革命狂飙时期，从50年代开始长达20年的“埃及幽居”的经商生活，占用了他大部分时间，因此，不可能对自然科学进行系统研究，只能是另星的，片断的和时断时续地进行研究。即使这样，他还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阅读和研究大量的自然科学专著。从5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当他写完《〈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2月）以后，就开始退出了商界，集中主要精力和时间对自然科学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他在1885年写的《反杜林论》二版序言中提到，他在1870年移居伦敦以后的八年当中，“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对自然科学和数学上面。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刻苦钻研的精神，非常广泛地但又是极其深入地研究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地质学、天体演化学等各个自然科学领域。《自然辩证法》一书就是这种精湛研究的结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至19世纪70—80年代，由于当时自然科学本身的巨大发展，有必要对自然科学新成就进行哲学上的总结和概括，系统论证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19世纪下半叶的特点是自然科学正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这以前，自然科学发展主要处于收集材料阶段，基本上是一种经验科学。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材料，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总结，不仅揭示各个学科的内部联系，而且揭示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所以，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

第二，在这以前，形而上学世界观长期地统治着自然科学，它把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看做是彼此孤立的、静止的和一成不变的。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获得了蓬勃发展。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三个伟大发现给所有自然科学领域以革命影响。在天文学、数学、电学和磁学的研究方面都获得了卓越的成就。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赫胥黎、海克尔和巴斯德的生理学以及古生物学、胚胎学等领域内也发现了许多新材料。

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新成就，日益清楚地揭示出来了自然界的辩证性质，证明自然界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是永不休止地运动，发展和变化着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猛烈地冲击着形而上学世界观。所以，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但是，当时的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家，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却被牢牢地束缚于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的传统观念之中。他们因为不懂得辩证法，不仅不能正确地理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

出现的大量成果，而且成为了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俘虏。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不需要任何哲学概括。因而，在自然科学家中间，便产生和传播了实证论。许多卓越的自然科学家都受到了实证论的影响。实证论作为一种时髦的反动哲学思潮，特别在德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这在杜林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不少亲自完成了一些重大科学发现的自然科学家也不能对他们自己所发现的东西，在理论上做出正确的说明。例如，德国动物学家施旺虽然他创立了细胞学说，已经科学地发现了动物机体的细胞结构，但是他却仍然信奉“生物学的不可知论”。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兹发现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不但不能理解这一科学定律所揭示出来的自然界中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辩证联系，反而试图把一切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把一切能量形式都归结为“力”。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了物种进化论，虽然在事实上用他创立的进化论致命地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但是他本人却没有勇气与宗教神学决裂。这种情形使得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面临自然科学的大量发现而迷惑不解，面临自然科学大量新材料而束手无策。于是，就在自然科学发展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矛盾和非常混乱的局面。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首要目的，就是根据充分的自然科学的事实来说明：在自然界中，辩证法规律是客观地、普遍地存在的，由此出发把科学的自然观系统地表述出来，从而完成方法论的根本变革，帮助自然科学家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经验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创作一部直接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衔接的著作。这部著作不仅揭示了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同时还要揭示出自然界辩证发展过程怎样有规律地超出自然界的范围而过渡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去的，说明辩证法规律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人类社会也同样地起

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完整的世界观。当时，正值第一国际停止活动以后，欧洲各国进入建立独立工人政党、准备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武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适应这一客观要求而写作的。

促使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猖狂进攻，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873年开始，恩格斯集中主要精力研究自然科学，并打算写一部《自然辩证法》。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①接着在信中恩格斯详细地叙述这些思想内容，实际上提出了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轮廓。1873年正是巴黎公社革命两年以后，恩格斯这时开始写作《自然辩证法》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各国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对工人阶级采取镇压措施，而且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思想斗争更加尖锐化了。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极力歪曲当时自然科学领域中涌现出来的新成果，妄图推翻或“驳倒”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在生物学领域中，德国生物学家毕希纳于1872年出版了《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生存竞争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公开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人类社会也象动物界和植物界一样，发生了为生存而斗争。所以，人剥削人的现象是一个由于人类的本性本身产生的自然过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在物理学领域中，产生了热力学唯心主义。一些自然科学家把仅仅在封闭的有限的系统中建立起来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2页。

到无限的宇宙中去，“证明”整个宇宙有朝一日将要达到热平衡状态，到那时热运动将会停止，出现所谓的“宇宙的热寂”，其他一切运动也将停止，于是“宇宙的末日”就会来临了。他们以此“宇宙热寂论”来证明“上帝存在”，同时宣扬悲观主义，麻痹和消解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

在生理学领域中，出现了“生理学唯心主义”。这个学派是由创立关于“认识的界限”的“理论”的著名学者弥勒和赫尔姆霍兹领导的，他们拾取了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用以“解释”生理学的成就。当时生理学发现了人的感觉不仅依赖于外界的刺激物，而且依赖于人的感官结构及其功能，不同的外界刺激能够引起类似的感觉。于是，他们就企图否认外部世界作为感觉的源泉的客观实在性。发现了人的感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就此企图证明人类没有能力认识世界，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可知性。

在数学领域中，有所谓“数学唯心主义”。他们片面夸大数学的抽象性，否定数学的现实原型，把数学公理和由此推出的理论体系，说成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先验的东西，把整个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说成是人类精神的纯粹“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是人类“理性的游戏”。

此外，当时在欧美各国流行着一种“降神术”、“招魂术”。许多自然科学家，有的甚至是自己科学领域中第一流人物，都成了这种荒唐的神秘主义和迷信的牺牲品。

这样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粉碎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创作过程、 体系结构和历史地位

1. 《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创作过程

恩格斯为了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从1858年7月至1873年5月，这15年为恩格斯创立自然辩证法的准备阶段。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重要的信，在自然辩证法创作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这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第一个历史文献。经过15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恩格斯逐渐产生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写出一部自然辩证法的专门著作。

《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前后经历了十多年时间，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873年春到1876年5月，恩格斯从开始写作《自然辩证法》到写作《反杜林论》为止。

1873年初，恩格斯打算写一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的论战性著作。保存在《自然辩证法》手稿第一束中的第一个札记《毕希纳》就是恩格斯准备写这一著作的提纲。要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而且要批判毕希纳的庸俗唯物主义和他想把自然科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并把社会主义加以改良的企图。后来，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恩格斯认为必须提出更为广泛的任务。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1873年就已经决定写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著作。恩格斯于5月30日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信中讲述了他准备写作《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他指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

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①这封信中，恩格斯还简单地阐明了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研究有机体的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以及它们所研究的各种运动形态间的辩证关系。在这封信的最后恩格斯指出，要对这些论述“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②这表明，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思想已经形成，问题就在于要开始对这些思想进行加工了。

马克思在5月31日给恩格斯复信中，说恩格斯的信使他“非常高兴”。德国化学家肖莱马读了恩格斯的信后也在信上写了意见表示完全同意恩格斯的看法。肖莱马在恩格斯信中谈到对物体运动的不同形式的探讨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这段话的页边写道：“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在恩格斯信中谈到机械运动的那段话的页边上写道：“完全正确！”在恩格斯信中谈到化学运动的那段话页边上，肖莱马写道，“这是最根本的！”^③

这个时期是恩格斯开始全面地探索和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重要时期。他集中精力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材料，写出了全书一半以上的札记和片断以及两篇重要论文。这两篇论文是：《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导言》写于1875—1876年，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能写于1875年；第二部分写于1876年。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导言》是最完整、最重要的一篇，它是全书的总纲，集中地体现了全书的基本思想。第一部分着重以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为根据，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必然性。第二部分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描绘了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进一步说明了唯物辩证法是唯一适合于自然科学发展需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5—86页。

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最初是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后改为《对工人的奴役》）的导言，以后恩格斯把它放在《自然辩证法》一书里，于1896年单独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了人类起源的问题，深刻地论述了劳动对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在经过从1873年到1876年这三年努力写了上述论文和大量札记、片断以后，《自然辩证法》的清晰的轮廓和最终全貌已经初步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恩格斯1876年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指出，“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①

从1876年底至1878年初，由于要集中力量反击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恩格斯不得不暂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在这两年中，他完成了《反杜林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写作《反杜林论》过程中，恩格斯利用了后来为《自然辩证法》准备的材料，并把原来准备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的思想在这里加以发挥了。在这两年中，恩格斯也并未因写作《反杜林论》而放弃继续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打算。他在1877年7月25日致弗·维德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为《前进报》写完分析批判杜林的文章之后，立即就要集中全副精力去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著作，这部著作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我之所以至今未能完成这部著作，除了各种外部条件，为各社会主义机关刊物撰稿也是原因之一。已经过了56岁了，应该最终下决心节省自己的时间，以便从准备工作中最终得出某种成果。”^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0、261页。

第二个时期：从1878年7月到1883年3月，即从完成《反杜林论》到马克思逝世为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问世以后，立即恢复了中断了的《自然辩证法》的撰写工作。在这五年中，恩格斯又比较集中地写作《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又重新拟定了《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具体计划。这个具体计划包括两个部分：“总计划草案”和“局部计划草案”。这两个计划草案是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框架作进一步勾画的结果。

“总计划草案”包括十一项内容，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和第二项是属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方面的；第二部分包括第三至第五项是属于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及其在各门科学中的表现，以及对各门科学中辩证内容所作的分析；第三部分包括第六至第十一项属于批判当时流行的一些机械论、不可知论及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总计划草案”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整个面貌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了。

在这个时期，恩格斯写的论文一共有八篇之多。《反杜林论》旧序。《辩证法》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都是1878年写成的。《辩证法》是1879年底写成的。此外，还有五篇论文是在1880—1882年间写成的。这五篇论文是：《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特》、《热》和《电》。这五篇论文是与“局部计划草案”相应的。他紧张地整理已经收集到的材料，使它们相互连贯并系统地阐述紧接“导言”之后的八篇论文和相当数量的札记和片断。同时，恩格斯还继续为《自然辩证法》结尾的各章收集材料。1882年11月23日，正当恩格斯写作“电”这一部分时，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必须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但是，恩格斯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因为马克思于1883年3月与世长辞了。

第三个时期：从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到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马克思逝世以后，更加重要的任务使恩格斯不能再继续完成

自己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这时，恩格斯由于全力倾注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遗稿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工作，耗费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因此不可能系统地写作《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说：“我负有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重要的。”即使这样，他并未停止过写作《自然辩证法》。1885年在准备《反杜林论》第二版时，恩格斯为这一版写了一个详细的序言，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论述和综合了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在这期间，恩格斯为《反杜林论》写了两个篇幅较大的附注：一个涉及的是数学中的哲学问题；另一个涉及的是“机械的”自然观。此外，1886年，恩格斯在写作《费尔巴哈论》时撰写了论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一个大片断。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1863年恩格斯结识了著名化学家肖莱马以后，就成为亲密的朋友和研究自然科学方面和撰写《自然辩证法》的最好顾问。

2. 《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体系结构

恩格斯确立自然辩证法体系的思想是经过了萌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体系的构想最早是在前面提到的、他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述的。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明确地表述了四个重要的辩证法思想：第一，关于物体与运动不可分的思想；第二，关于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物体的思想；第三，关于物体不同运动形式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的思想；第四，关于不同运动形式的辩证转化引起各门科学辩证过渡的思想。这是恩格斯建立自然辩证法体系的初步设想，是他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纲要。经过5年的深思熟虑之后，1878年恩格斯拟订的〔总计划草案〕则是对这封信的构想的进一步发展，并且使它更加系统化了。

〔总计划草案〕是在恩格斯写完部分论文和札记之后草拟的。

一方面是为了编排和整理这些草稿；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写作制定的计划。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变化，但是它仍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恩格斯的写作意图。因此，它是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体系结构的主要依据。如果我们将“总计划草案”中所列各项与各篇论文和札记加以对照，便可以看出，“总计划草案”的前五项都有同它相应的论文和札记，彼此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后面几项则有些出入。这是由于恩格斯在撰写《自然辩证法》过程中曾经因为承担了更重大的任务而两次中断了写作；第八、九、十项没有来得及写，第六、七、十一项也只写了一部分札记。虽然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没有最后完成，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论文、札记和片断，但是，这些材料贯穿着总的基本思想，是被恩格斯的科学计划统一起来的有机整体。因此，“总计划草案”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总纲。

〔总计划草案〕共有十一项，相当清晰地展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体系的全貌。第一项“历史的导言”中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是“导言”的总的指导思想。第二项按照《〈反杜林论〉旧序。辩证法》的内容，主要论述理论思维回复到辩证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三项“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明确指出辩证法有三个主要规律。第四项“各种科学的联系”，揭示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的分类与联系，并在批判圣西门和黑格尔的基础上，阐明了科学分类的客观基础。第五项“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简要叙述”，深入到各门基础中揭示蕴藏其中的丰富的辩证思想。第六项“认识的界限”，通过批判康德、休谟及赫尔姆霍茨、杜布瓦-雷蒙·耐格里等人的“认识有限”说，阐明自然界的可知性和人类认识自然的无限能力。第七项批判海克尔机械论观点。第八项批判海克尔、耐格里在1877年9月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原生体的

灵魂”问题所作的发言。第九项“科学和讲授”，对1877年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的演说和海克尔《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的小册子发表评论。第十项“细胞国家”，着重批判微耳和《细胞病理学》中关于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的观点。第十一项“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强调劳动在人的分化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局部计划草案”大约写于1880年，是恩格斯撰写《运动的基本形态》一文的预备计划。计划中的各项与论文的各段在内容上几乎也是完全对应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包括的札记、片断大部分是与论文内容相一致的，它们多是为撰写论文准备的素材，而且大部分在论文中还用过。

《自然辩证法》这部手稿包括10篇论文，169条札记和片断、两个计划草案，共181篇文章。《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给我们研究它的体系结构带来了一定困难。恩格斯生前曾将这些材料分成四束。第一束冠以“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标题，共127篇，包括一些较短的札记和片断；第二束冠以“自然研究和辩证法”的标题，共6篇，包括一些篇幅较大的论文和札记；第三束冠以“自然辩证法”的标题，包括已经完成的6篇论文；第四束冠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的标题，包括42篇札记和片断。第二、三两束恩格斯编有详细目录，内容可以确定，其它两束只有总标题而没有目录。这两束是否被后人更动过，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

从恩格斯对四束的分类和标题可以看出，这是他晚年对自然辩证法体系的构想的进一步发展，为后人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体系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原始材料。但是，恩格斯留下的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它的体系结构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规模已经相当宏大，然而，根据恩格斯的原意应当如何确定自然辩证法体系，

仍然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

3. 《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历史地位

恩格斯逝世以前,《自然辩证法》手稿没有发表。恩格斯逝世以后不久,也只发表了其中的两篇论文:1896年发表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98年发表了《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遗稿都落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人伯恩斯坦手中。伯恩斯坦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物理学家列奥·阿隆斯德(Arons)研究恩格斯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遗稿是否可以出版。列奥·阿隆斯德是一个十足的经验主义者,非常轻视理论思维。他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内容太陈旧,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是小学生的作品,因而认为都不宜公开出版。因此,伯恩斯坦不让公开发表。于是,《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其他理论著作一起被伯恩斯坦一伙扣压了三十年之久。伯恩斯坦不让发表恩格斯的手稿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问题》(1898年)中妄图证明辩证法对科学的“危害”,并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从辩证法的“危害”中解放出来。他用康德的唯心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代替唯物辩证法。当然,这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是大相径庭的。

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派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到柏林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发现了《自然辩证法》手稿。1924年春,俄共(布)中央又派梁赞诺夫到柏林找伯恩斯坦商议出版恩格斯这部手稿的问题。终于在1925年第一次以德文和俄译文对照形式将这部著作在莫斯科公开出版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恩格斯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

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十分重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

法》，在我国，《自然辩证法》的中译本前后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版本。1932年8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杜畏之根据1925年德俄对照本译出的第一个版本。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郑易里根据1935年的俄译本和1930年的日译本转译而成的第二本版本。1955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曹葆华、谢宁根据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的193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德文版和1953年的俄译本译出的第三个版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德文版第20卷译出的第四个版本。1984年又出版了重校新编的中译本。这个版本根据德文原文重新校译，并查阅恩格斯的手稿作了重新编排。

《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它总结和概括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和全面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之后所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以更为完备的形态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进，《自然辩证法》中有些自然科学材料和个别结论显得过时了。但是，恩格斯所作出的哲学结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一些光辉预见，如原子不是最小的粒子，后来都为科学发展的材料所证实。因此，《自然辩证法》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揭示自然界辩证法是恩格斯的独特贡献。

驳斥对《自然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

自从欧洲革命风暴以后，当时马克思以全部身心地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对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新问题研究的责任，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

恩格斯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

就，并从哲学上进行了探索，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以《自然辩证法》一书为标志，由恩格斯系统阐述的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及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总结和概括，确实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也是留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份伟大遗产。

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和方法却遭到了种种歪曲和攻击。

卢卡奇在其《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最先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责难。他认为，辩证法是产生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是围绕着对历史的总体的认识而旋转，在客观自然界不存在这种相互作用，因而也谈不上辩证法的存在。他批评恩格斯抛弃了辩证法的实质，“即在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没有这个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在卢卡奇看来，“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种方法在这里只限于历史和社会领域。来自恩格斯的关于辩证法定义的误解主要地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恩格斯仿效黑格尔的错误引导，把这种方法也扩展到自然界。但是，辩证法的决定性的因素：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变化……等等，并不是来自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①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和方法的责难在西方资产阶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间引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雅克·利德萨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使人苦恼的问题之一就是自然辩证法问题。”^②实用主义者胡克指出：“必须排除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这种企图。这和一个自然主义的起点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从未说过自然辩证法，虽然他很清楚在物理和化学的基本组织中量的逐渐变化会导致质的变化。”^③他说，相信自然辩证法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剑桥1968年版，第3、24页。

② 雅克·利德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新泽西1981年版，第160页。

③ 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第75页。

的存在，就是从普罗提诺到黑格尔的每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的中心学说，企图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诬蔑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放在物质里，就是回到老黑格尔泛神论那里去了。存在主义者萨特对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也持否定态度。他说，自然辩证法也许可能存在，不过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最微小的初步证据。科拉科夫斯基试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实证主义混为一谈。他指出：“从恩格斯对方法和内容的统一的研究中，从他在达尔文的模式中把人类历史同自然历史联系起来的观念中，可以断定恩格斯是接近于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者。”^① 莱文也说，“实际上，恩格斯赶走了哲学，他用实证科学代替了哲学。”^② 马克思是一个人类中心论者，他强调实践概念，这和恩格斯的宇宙中心论相去甚远。

认为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自然辩证法思想或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为了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写作《资本论》，没有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但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和自然过程中的辩证性的论述是很多的。例如，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论述了自然界中磁的南极与北极的对立统一的思想。他说：“两极是相通的，北极和南极是相互吸引”，“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北极和南极都同样是极，它们的本质是同一的，北和南是同一种本质的两种对立的规定。”^③ 1844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物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说：“象月亮和彗星这样的物体是对立物的自然形式，

①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牛津1981年版，第1卷，第377页。

② 莱文：《一个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第15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5页。

按照《逻辑学》，这种对立物一方面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地球是作为对立物的否定统一等等的逻辑理由的自然形式。”^① 1844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运动是物质所固有的特性，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②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球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生存、生活。”^③ 1853年马克思表示非常赞同黑格尔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自然界的基本奥妙之一的说法。^④

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思想。这表明自然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不能仅仅限于在马克思著作中能够找到多少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术语。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分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思想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⑤ 相反，唯心主义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⑥ 例如，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单纯在空间运动的自然界同人类历史毫无关系，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躯壳，是概念运动的一个外在环节。唯心主义历史观从反面证明了，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掌握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统一，对于建立完整的唯物主义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对自然观的考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必要前提。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4页。

主张单纯脱离人的历史发展去研究自然界的发生史。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过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后者把周围的感性世界只是看作某种开天劈地以来就已存在的结果，而不是看作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看作历史的产物。所以说，对人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同样又成为对自然界研究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只有到了近代，即在自然科学有了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逐步解开自然之谜，而在人类的童年，人们是用神话来解释世界的。

唯物主义地把握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统一，就需要分别阐述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4年起，是致力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工作。恩格斯从70年代起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在历史上开创了对自然观作出科学解释的一个先例，这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重大意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占有指导地位，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攻击，其目的是要割裂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统一。恩格斯批评十八世纪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把历史观和自然观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时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改变，而不单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①上述批评家们的言论，恰恰表明他们是属于被恩格斯批评的那种只知道思维而不知道自然界的哲学家。他们恰恰忘记了，对自然界的考察，是人的思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即使对自然界的最抽象的研究，都是人的思维科学的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研究，开辟了唯物主义一个崭新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再也不象旧哲学那样，是致力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

把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分割成几个互不联系的领域。相反，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阐明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统一性。从这种立场出发来研究辩证法，就不能只把它限于用来说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辩证法重新导入黑格尔概念运动的轨道。恩格斯指出，“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①运用唯物主义反映论来把握辩证法的实质，不仅阐明了自然界的辩证运动性质，而且从根本上说明了人的辩证思维的来源。当然，从形式上看，客观辩证法表现出一系列差异，由于这些差异成了否定自然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借口。施密特指出：“只有当自然被置于人和社会的组织中它才能成为辩证法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彼此只能作为外在的两极和对立面出现。”^②但是，施密特恰好忘记了，不仅恩格斯，而且马克思始终都是把客观辩证法当作主观辩证法的基础。他在谈到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主要区别时，明确地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把观念当作独立的主体，当作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恰好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恩格斯彻底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一思想，认为“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批评家们认为，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路线，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3页。

② 施密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第10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恩格斯精辟地把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在辩证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唯物辩证法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了辩证法这个根本特性，就可以了解到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关系。恩格斯指出，全部近代科学的成果都证明了自然界的发展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性质，从而为形成科学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①但是，那些尚未从十八世纪形而上学自然观中解脱出来的自然科学家们不能正确地把握自然界的辩证性质，由轻视哲学而发展成做了最坏哲学的奴隶。这就是恩格斯所看到的，已有长足发展的自然科学水平、自然科学的内在辩证本性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之间的不相适应，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正确途径是用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来研究自然界的辩证运动。为此，恩格斯号召自然科学家要了解黑格尔的著作，要了解并掌握自然辩证法。不过，求助于黑格尔，并不意味着回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象后来的那些批评家们所妄加批评的那样。他倒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必须“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②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学得以深入发展的理论基础，从哲学高度上科学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这些论述，直到今天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122页。

西方有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完全否定。雅可比说：“对普遍科学法则的研究吞没了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的主观能动性的存在。”^①科学的法则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具有这种对立的性质呢？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由活动并不是一个任意的问题，人是受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制约的。对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为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掌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便有效地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指出：“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②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确地揭示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置于对客观规律的正确理解之上。脱离现实基础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对人的创造价值的肯定，而是根本否定了人通过客观规律来实现自己的一切可能。这充分证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非但没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科学地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人的崇拜不过是重复了黑格尔那些过时的东西而已。

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批评家们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和方法的真正目的就是：割裂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统一；抛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否定辩证法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企图在辩证法领域中重新恢复唯心主义统治。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根据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

① 雅可比：《失败的辩证法》第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考察，论证了唯物辩证法自然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同时，又运用这种自然观在概括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描绘了自然界的真实图景，阐明了自然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和范畴。

一、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 自然观的历史必然性

1. 古代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的自然观及其局限性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哲学提供了科学基础，而哲学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哲学和自然科学从古以来就是携手并进的。在古代，很难把哲学和自然科学分开。“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①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只有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门科学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和古代这种自然科学水平相适应的，出现了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自然观。公元前六世纪在古希腊伊奥尼亚地区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包括：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和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埃非斯学派。在古希腊也同时存在着与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相对立的自然观。这就是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代表的和以埃及学派为代表的原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古代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的思想，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求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把自然界看作是不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统一整体，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但是，由于受到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是直观观察的结果，没有严格的科学基础，具有朴素的原始的性质。由于这种局限性，它以后就必须让位于另一种见解，即从培根和洛克开始的形而上学。但是，“如果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页。

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①

2.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完成

在欧洲的所谓中世纪（即封建社会）时期，落后的封闭的自然经济阻滞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宗教以压倒的优势统治着社会生活。教会垄断着包括科学和哲学等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婢女；它不得超越出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②同样，哲学也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只有论证封建等级制度和上帝创造一切的哲学，才能得到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的承认，这就是所谓繁琐的经院哲学。当时的经院哲学家们论证的问题诸如：“一个针尖上能够站立多少天使？”“在将来死人复活时亚当的肋骨在谁的身体里复活？”等等十分荒唐的问题。当时，英国先进思想家罗吉尔·培根（约公元1214—1294）举起实验科学的旗帜，用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反对繁琐的经院哲学的时候，反动教会把他投入监狱长达十四年之久。总的说来，在漫长的黑暗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里，自然科学是没有多大发展的。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于15世纪后半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恩格斯指出，这个时期近代自然科学才达到了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因为这个时期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市民、即后来的资产阶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下，在政治上打垮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君主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欧洲中世纪末期，经济蓬勃发展，生产急剧增加，刺激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的空前未有的进步。新兴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发展，实力增强，迫切需要和积极鼓励各种新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要求摧毁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以及整个封建思想体系，建立资产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要求摧毁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建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5—3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资产阶级自己的新文化。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胜利，必须把矛头对准天主教会的反动统治。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欧洲的所谓文艺复兴运动。所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单纯是在文艺方面恢复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而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反对中世纪专制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反动统治的一次革命运动。

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势力的增长，思想上影响的加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也迅速发展起来。“现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① 自然科学家为了坚持科学真理，反对宗教神学，而遭到教会的残酷破坏，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新教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新教的创立者之一卡尔文，虽然在宗教改革中起过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当自然科学家塞尔维特坚持科学真理，发表非正统意见，发现血液循环时，卡尔文就把他活活地烧死了。这表明，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需要自然科学来发展生产技术，并用以反对宗教势力，但是它容许宗教残余势力的存在，保持有利于自己阶级统治的传统观念，因此，有保守妥协的一面。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于1543年正式出版，这是近代自然科学独立的标志。它是科学反对神学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他的著作无情地打击了传统观念。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指出：哥白尼对于西方的思想解放“所做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② 他使科学摆脱了教会的束缚、摆脱了亚里斯多德学术思想的束缚。从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到哥白尼(公元1473—1543)这长达一千八百多年中，地球中心说作为传统的学术思想，对人们有巨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601页。

影响。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是天文学的一次革命。它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帮助人们在宇宙观上引起了决定性的变革。“一旦认识到地球不是世界中心而只是较小的行星之一，以人类为中心的妄想也就站不住脚了。”^①从哥白尼开始，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也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此，自然科学的发展便开始大踏步前进。

《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与一直被封建教会奉为信条的地球中心说直接对立，根本上动摇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唯心主义宇宙观。因此教会把它列为禁书，把太阳中心说列为“邪说”，并将宣传、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的意大利唯物主义哲学家乔·布鲁诺监禁八年后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后来，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法国天文学家刻卜勒（公元1571—1630）发展了哥白尼的思想，发现了太阳系行星运动的基本定律，引起了力学上的一系列发现。牛顿总结了这一系列成就，从而为经典物理学奠定了基础。

从哥白尼到牛顿—林耐，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伟大成就以牛顿和林耐为代表。牛顿在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1704年发表了《光学》，建立了整个理论物理学的纲领，建立了包括力学三大定律在内的理论体系。他的科学成就主要有：（1）成功地解释了行星、卫星、彗星的运动；（2）成功地解释了潮汐和地球的运动；（3）发现了天体运动的原因——万有引力；（4）他的运动学说应用于光学产生了光的微粒说；（5）他的运动方程是热的分子运动论的唯一基础；（6）电学和磁学的发展也是沿着他的道路前进直至近代；（7）由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所发起的电动力学是光学的革命，也完全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在数学领域，笛卡尔引进变数，建立了解析几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601页。

何；牛顿和莱布尼兹，制定了微积分。在物理学领域，除光学外，对热、电、声、磁只有初步研究，地质学还未从矿物学中分化出来，因而还不存在古生物学。化学刚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燃素说占据统治地位。在生物学中只有动物学和植物学由于林耐作了分类工作。卡·林耐(1707—1778)是伟大的动植物分类学家。1735年发表了《自然系统》。他用双名法命名当时所知的一切生物——植物和动物。他采用、扩充并且进一步完善了比较高级的阶段分类法。这些方法的大部分要点至今仍是现代分类学的组成部分。林耐是他的时代生物学的经典代表，又是下一阶段生物学发展的先声。他的分类系统是当时人为分类系统的最高成就。林耐的《自然系统》是生物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初步建立的植物和动物的分类学使动物学和植物学达到了一种近似的完成。当时自然科学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手头现有的材料。这就决定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早期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第一，把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作为研究自然界的基本方法；第二，它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孤立地去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第三，由于牛顿力学达到的伟大成就，使人们相信力学规律支配自然界的一切自然现象。“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①自从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代替了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自然观。林耐的物种不变论和牛顿力学的机械论的推广是这个时期自然观的最主要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61页。

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①根据形而上学观点，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永恒不变的，互不联系的，它们只有在空间中彼此并列地存在着，而无时间上发展变化的历史。

应当肯定，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早期，强调经验的方法，分门别类地去研究自然现象，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研究使自然科学在细节上弄清楚了许多事实。但是，正是在这种研究方法中孕育了形而上学。因此，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形而上学的产生“是有重大的历史理由的。”^②当然，形而上学之所以在18世纪占据了统治地位，来自哲学传统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形而上学在根本上是符合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本性的。

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例如，当牛顿不能解释天体运动的起源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全智全能”的上帝。所以，恩格斯说，“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而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③

3. 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瓦解和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的产生

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工业大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工业经过了大规模技术改造，社会生产空前发展，从而推动了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中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动摇了陈腐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为唯物辩证法自然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在《导言》中从五个方面论述了18—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

首先，在天文学领域内，把形而上学自然观打破第一个缺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3—364页。

②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5页。

的，是德国哲学家伊·康德（1724—1804）。1755年康德出版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他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他认为，太阳系是从星云（弥漫物质）通过自身的运动规律，即由于吸引而不断凝聚，由于排斥而发生旋转运动，从最初的混沌状态中，逐步发展成为有秩序的天体系统。康德的“星云假说”，既反对了反动的“宇宙神创论”，又否定了牛顿的关于“神的第一推动”的错误结论，它从物质自身的对立统一中分析天体的发生和发展的，说明自然界有自己发展的历史。这是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的。恩格斯指出，康德把“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①很明显，这种既从物质自身的客观规律出发，又把天体看成是一个形成过程的观点，为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在人类认识史上是第一个科学的天体起源的学说，推动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天体演化学的基础。恩格斯指出，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不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那末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②恩格斯还指出，如果独立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下去，那么，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康德的假说，当时没有受到自然科学界的重视，直到1845年洪堡发现了康德的这本书，并且把主要思想刊登在他的《宇宙》卷I中，发掘出了这埋没了90年的思想。1796年，法国自然科学家比·西·拉普拉斯（1749—1827）应用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成果为康德的“星云假说”作了进一步补充和论证，才被人们逐渐重视起来。康德和拉普拉斯这个星云假说直至今今天，仍在不断修正、补充和发展。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6—367页。

打开形而上学自然观第二个缺口的是地质学、古生物学上英国地质学家赖尔提出的缓慢进化说，第一次把发展、变化的思想引进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从理论上驳斥了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1769—1832）的形而上学“突变论”。当时由于采矿业的发展，地质学家们不断地发现了在地壳的不同地层中埋葬着不同的、已经灭绝了的过去的动植物的化石，为地质学积累了不少资料。这个事实被迫使地质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地壳和地球上的生物在以往遥远的历史年代里确实经历过多少次突变。但是，居维叶在1826年出版的《地壳突变》一书中却断言，各个地层中化石的不相同，是由于地球上多次发生重大的水灾这类的灾变，淹没了陆地，毁灭了生命所造成的。每次灾变以后，上帝重新造物时，因为忘记了他以前造物众生的形象而变了样，因此每次造物，模样都不一样。居维叶的后继者杜宾尼甚至认为，上帝曾经过二十七次造物行动来论证灾变论。恩格斯指出，这种“灾变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① 赖尔在1830—1833年间发表了三卷本《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地球缓慢渐进变化的理论。他认为，地球地层的形成和变化不是经过突然的灾变，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并且引起这种变化的力量，不必到自然界以外去寻找。因为地球表层的一切变化是缓慢的、逐渐的，它是在外界环境各种自然力量的影响下，在水、风、温度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下进行变化。这种理论承认了地壳和生物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赖尔的理论尽管还存在着缺陷。但是，它继康德之后终于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领域又一次打破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恩格斯给它评价很高：“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7页。

在化学领域里，维勒人工合成尿素成功和霍夫曼、凯库勒提出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给形而上学自然观打开了第三个缺口。继拉瓦锡提出氧化燃烧理论推翻了形而上学的燃素说以后，到十九世纪初，道尔顿提出了化学原子论，不仅奠定了化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揭示了化学过程中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他指出，化学元素的基本单位是具有一定重量的原子，不同元素的原子有不同的重量、不同的性质，并在构成化合物时保持确定的比例。他通过试验对一些元素原子量作了初步测量。这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认识原子。恩格斯指出：“在化学中，特别是由于道尔顿发现了原子量，现已达到的各种结果都有了秩序和相对的可靠性，已经能够有系统地、差不多是有计划地向还没有被征服的领域进攻，就象计划周密地围攻一个堡垒一样。”^①在新的原子论的基础上，化学、特别是有机化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1828年，德国化学家维勒煮沸无机化合物氰酸铵时，得到了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有机化合物的尿素，这就开拓了第一次用人工方法从无机物中合成了有机物尿素。这是用科学试验证明了有机物和无机物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同时也证明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过渡，并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生命力”。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把无机界和有机界截然分开的形而上学观点，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把有机物神秘化的唯心主义。

在物理学方面，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给形而上学自然观打开了第四个缺口。1830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和电解定律，揭示了电和磁之间、电和化学现象之间的联系。1840年迈尔、1843年焦耳确定了热能和机械能相互转化的定量关系，1843年焦耳和1844年楞茨发现了焦耳—楞茨定律，确定了电和热的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53页。

互转化关系。这样由于物理学的发展就把过去是互不相关的各种能量形式——电、磁、化学、热和机械能之间的联系都揭示出来了。在1842年至1847年间，先后由迈尔、格罗沃、赫尔姆霍兹等人把它们总结出来了，就成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英国的格罗沃证明：“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①这一发现彻底摧毁了形而上学把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加以孤立分割的观点。

最后，在生物学方面，提出了细胞学说，并确立了达尔文进化论，给形而上学自然观打开了第五个缺口。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马提阿斯·施莱登（1804—1881）发表了《关于论植物起源的资料》，提出了植物构造学说。他认为，植物构造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低等植物由一个细胞构成，而高等植物是由许多细胞构成。这样，就在植物构造的多样性中，揭示了物质构造的统一性。1839年德国动物学家泰奥多尔·施旺（1810—1882）把细胞学说扩大到动物界。他发表了《动植物结构和生长相似性的显微研究》，提出了动物细胞构成的理论。他认为，细胞构造是一切动物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而且论证了动物和植物的组织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就论证了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统一性。施莱登和施旺的发现说明，一切生物有机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都是由细胞的繁殖与分化发展起来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生物有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证明自然界中一切生物有机体都遵循着它们共同的规律，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1759年卡·弗·沃尔提出了种源说，以后这种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经过奥肯、拉马克、贝尔，整整过了一百年，才由查·罗·达尔文（1809—1882）科学地完成了。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8页。

立了生物进化论。它不仅揭示了自然界中现存的千差万别的生物之间的历史联系——它们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且也追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代提供了可能，揭开从“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秘密。进化论思想证明，动植物和人类本身都是自然界千百万年之久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这样就致命地打击了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和上帝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谬论。

总之，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中的许多新发现，接二连三地打破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一个个缺口，打击了各种各样的反辩证法，反唯物主义的神秘观点，“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①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这十九世纪三个伟大发现，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一切事物和过程的辩证性质。所以，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②又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③从而给形而上学自然观以致命打击，“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④唯物辩证法自然观的产生标志着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彻底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454页。

产，这是人类自然观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恩格斯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历史必然性。

二、揭示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详尽地考察了自然界中包括从原始星云到人类社会和一切物质形态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的转化过程以及物质的永远循环过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自然界普遍联系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表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①

恩格斯首先运用当时公认为正确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论述了恒星和星系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康德认为，宇宙是由无数混沌的原始物质形成的，原始的原子由于彼此吸引和碰撞，从而发热和旋转时，形成高温的旋转着的云雾状的原始星云。这些星云在其内部质点的相互吸引的作用下，向中心高度集中，逐渐形成球体，这就是最初的恒星。这些恒星继续旋转和收缩，直到从它的赤道上抛出物质，形成一些围绕恒星旋转的环状体，圆环中的质点在凝集过程中分解，而形成围绕恒星旋转的星系。太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拉普拉斯进一步发展了康德星云假说，他指出，无论液体或气体的球旋转体，都不可能保持圆球的形状，其表层物质必然从两极向赤道方向移动，而形成一个扁球，随着冷却和继续收缩，旋转速度加大，边缘物质产生更大离心力，直到从赤道上抛出，而形成行星。以后，继续在原始的行星上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行类似过程，又从行星的赤道上抛出一部分物质，形成行星的卫星。恩格斯认为，在银河系中不仅可以观察到衰亡的恒星（即“熄灭了的太阳”），而且还可以观察到正处在形成中的恒星（即“还没有形成的太阳”）^①。恩格斯还认为，星系也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他指出，随着银河系（即“我们的宇宙岛”）和河外星系（即“独立的宇宙岛”）中各种天体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它们各自也处在不同的“相对发展阶段”中。现代天文学发展的材料证实了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

现代恒星起源和演化理论指出，恒星一生要经过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主要演化阶段。在早期阶段，气体云在引力收缩下形成恒星，当时已经观测到一种似星云又非星云，似恒星又非恒星的中间状态的天体，如球状体和赫比格—哈罗天体；在中期阶段，星体内部已经开始核反映。也叫主序星阶段，即青壮年阶段；在晚期阶段，恒星演化处于衰亡过程中。恒星内部核反应结束后，把一部分物质抛射到太空中去，成为天际气体，另一部分核心就坍缩为如中子星和白矮星，星洞等各种稠密的衰亡天体。

现代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理论占支配地位的有：英国天文学家霍意耳的星云说，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的星云说，中国天文学家戴文赛的星云说，苏联天文学家萨弗隆诺夫的星云说等现代星云说。这些学说既保留了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中的一些优点（如整个太阳系是由同一个星云形成的，按照拉普拉斯方式形成星云盘等），又克服了其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如角动量分配问题），把人类对太阳系起源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恩格斯还指出，太阳系中的各种天体形成之后，还要继续演化下去。太阳、行星和卫星刚形成以后，因为热运动占优势，化学元素的化合是不可能的。由于温度下降，天体越小，冷却的越快，卫星、小行星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1页。

流星首先冷却，行星和太阳冷却得最慢。

恩格斯根据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解释了地球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随着地球和行星上温度进一步下降，各种相互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越来越多。当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以前在化学上没有分别的元素互相区别开来了，并且相互化合成各种化合物。这些化合物随着温度的下降，由气态变成液体和固体。并且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不断地变化着。后来，地球上开始形成了地壳、地幔和地核；在地球表面形成了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由于这些圈层的分化和相互作用，又出现了气象的、地质的运动形式，推动着地球演变的历史。

恩格斯论述了地球上生命起源的问题。指出：“如果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高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末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的原生质便形成了。”^①他还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它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②恩格斯在作出这样论断时还不知道蛋白体的化学结构式和合成蛋白体化学，然而，他却预见到了生命起源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第一，生命的本质是蛋白体存在的方式，蛋白体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功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刺激反应、繁殖等。第二，生命的起源是通过化学途径实现的。恩格斯预言“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制造蛋白体成功了，那末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进行新陈代谢。”^③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

当地球上出现了生命之后，就开始了生命运动的历史。生命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起初没有细胞结构的蛋白体经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2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6页。

无数次分化，才在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细胞。“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形成的基础也产生了。”^① 细胞的出现标志着生物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由于细胞的不断分化，单细胞生物逐渐发展为多细胞生物。最初的生物，一部分逐渐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部分逐渐分化为动物。最初的动物，又分化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这样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发展过程，最后在脊椎动物的哺乳纲中分化出了人类，才实现了自然界中第二次大飞跃，自然界从此开始了人类的发展史。

恩格斯还考察了自然界中一切有限的事物，从有生有灭到有灭有生。他指出，事物有生就有灭，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例如，太阳由于不断地辐射出物质能量，它的温度越来越低，将来总会有一天不再发光发热，而逐渐冷却和死灭。太阳冷却以后，在地球或其他行星上也会失去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条件，甚至最后完全消灭了有机生命的痕迹。就是人类本身，最后也是要灭亡的。但是，即使太阳、地球和人类都死灭了，也并不是什么“宇宙末日”的到来。宇宙间的一切运动，也不会变成单一的机械运动——只剩下死寂了的太阳、地球和其他星球的残骸在无限的空间里旋转，整个自然界必然以其丰富的多样性，继续无限地发展下去。

整个自然界究竟怎样继续发展下去呢？恩格斯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自然科学提供的经验材料是非常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哲学的理论思维。恩格斯说：“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存在。”^② 运动的不灭性作为哲学上的命题，早在17世纪就被笛卡尔提出来了。到了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确立，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6页。

运动不灭原理提供了科学根据。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是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运动也是不能创造不能消灭的；物质的运动不仅在数量上不能增加或减少，而且在质上，即物质具有从一种运动形态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态的能力也是永远不能消灭的。恩格斯指出，在无限的宇宙中，各个星球和这些星球上各种物体的具体运动形式都是必然要死灭的，但是这种死灭并不是化为乌有，而是转化为另外的物体运动形式。当某种物体的某种运动形式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转化成另外的物体的另外的运动形式的时候，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这种物体的运动形式又会从另外物体的另外运动形式中重新产生出来。所以，虽然物质的具体存在形式是暂时的有限的，有生有灭的，但是，整个客观物质世界是永远不会消灭，物质的运动也是永远不会中断的。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所依据的客观规律也是永恒存在的，不会消灭的。“宇宙热寂论”认为，一切现存的运动形式都将转化为热，而一切星云体的热又将终止下来。这种“理论”把宇宙看作一个有限的封闭体系，它否定了热运动转化为其他运动形式的可能性，否定了散射出去的热重新集结起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否定了运动不灭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神创论。

恩格斯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材料，批判了“宇宙热寂论”，进一步描绘了太阳系死灭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形。他指出，既然在太阳系形成以前，我们宇宙岛的物质曾经把某种运动形式转化为热，以致从这当中可能发展出千万个太阳和太阳系，那么在我们的太阳系毁灭之后，我们宇宙岛的物质也会同样形成新的太阳系和炽热原料；既然我们的太阳系能够把热散射到太空中去，转变为一种运动形式，那么它也就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既然在我们的地球上，在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产生出了无数的有机物直到能够思维的人类，那么当它“在某个时候一定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以后，“而在另外的某个

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①”至于死灭的太阳系怎样转化呢？恩格斯认为，这“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②因此根本用不着求助于“造物主”。恩格斯把整个自然界描绘成了物质运动的无限发展过程，把唯物辩证法自然观贯彻到底了。接着，恩格斯还指出，这些未来发展的具体途径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

恩格斯的科学预言，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材料所证实。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太阳从形成到今天已经经历了约五、六十亿年的历史。它一直进行着热核反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氢原子核聚变为氦原子核，太阳不断地消耗大量的氢，产生大量的氦，发生大量的能量。目前，太阳内部氢的消耗估计还不到一半，因此，太阳正处在“中年期”，距离太阳和地球的末日还非常遥远。但是，由于氢不断地减少，氦灰烬不断增加，氦核不断地聚变为碳核，并向更重的元素聚变，太阳总有一天会进入“老年期”。同时，由于在高温和热核反应条件下，不断进行光辐射和抛射物质，太阳自转速度逐渐减慢，因此，在整个自然界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总要达到死灭阶段。现代天文学事实告诉我们，1967年以来的20多年中已经发现了70多个脉冲星这类新天体，这是一种高速自转的中子星，它是由质量大于太阳的恒星演化到晚期，能源释放完了发生猛烈爆炸而形成的。在爆炸过程中，由于恒星内部产生极大压力，把原子外层的电子核压到原子核里面去而形成中子，表面温度达到1000万度，辐射能为太阳的100万倍。这说明，在太阳系死灭以后决不会是“宇宙末日”到来，类似我们的太阳、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还会在新的形式下重新产生。现代天文学还告诉我们，近几十年来，先后发现了20多种分子形态的星际物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9、377页。

质，其中10多种是有机分子。例如，1969年坠落在澳大利亚的陨石上发现了十几种氨基酸。这些星际有机分子的存在，特别是氨基酸存在的可能，说明生命现象是宇宙中的普遍现象，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一定条件下它就必然会产生出来。虽然目前自然科学发展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未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必将不断证实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

总之，恩格斯通过阐述自然界本身的发展历史，说明了唯物辩证法自然观是对自然界辩证发展过程的正确的反映。

三、自然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结合自然科学的实际材料，从理论上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主要规律和范畴进行了概括和阐述。恩格斯不准备详细地考察辩证法规律（包括范畴）之间的内部联系，而着重阐明辩证法规律和自然规律之间的一致性，辩证法规律也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作为一种方法论对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

1.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结合自然科学材料，深刻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是一种反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去看世界，分析问题。在它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完全孤立存在的。它看不到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也不承认客观事物之间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转化的联系。例如，在自然界中，有机界和无机界、动物和植物、光、电、热、磁等自然现象，被认为是相互之间是根本没有关系的事物。整个自然界都是由这样许多没有内在联系的事物堆积而成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形而上学相反，它强调事

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主张从事物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在辩证法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相互联系的总体，其中每一个事物都是统一的相互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环节，彼此孤立的、与周围其他事物互不相干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①又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②辩证法不象形而上学那样在绝对的对立中思维，而是在区别中看到联系，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因此，不仅承认“非此即彼”，即承认事物之间的区别，而且也承认“亦此亦彼”，即承认事物之间的联系。当时生物进化论已经提供了大量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亦此亦彼”的过渡型态的文昌鱼，它既无脊椎，亦无骨骼，但具有脊索。又如，在鱼类和两栖类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亦此亦彼”的过渡型态的南美肺鱼。它既有鳃，又有肺；既能在水中呼吸，又能在陆地上呼吸。在爬虫类和鸟类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亦此亦彼”的过渡型态的细颚龙和始祖鸟（化石），它们兼有两者的特征。这种过渡型态的动物表明，不同类型的动物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固定不变的界限，不同物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③和形而上学把事物看作静止不变的观点相反，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取得的许多成就表明，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最大的星球，都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制约的。这就是说，它们之间是相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3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4—555页。

互作用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事物的运动。所以，只有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才能把握事物的运动。因此，恩格斯说，“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①这就是说，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特征。

恩格斯指出，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在黑格尔那里，以其唯心主义方式表述过辩证法的三个主要规律。他在《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阐述了量变质变规律；在《逻辑学》的第二部分，即本质论中，阐述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黑格尔构成整个哲学体系的基本规律。黑格尔把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纯粹思维规律。他的错误在于，把这些规律当作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不是从它们自身中抽引出来的。黑格尔企图把客观世界牵强附会地纳入他虚构的思想体系。恩格斯指出，就是黑格尔虚构的思想体系本身，也只能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而把它绝对化、永恒化，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那就极其荒谬了。如果剥掉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外壳，把它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是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白的了。”^②而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规律具有客观性质。恩格斯指出：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③他深刻地阐述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④因此，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1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401、553页。

一致的。恩格斯非常强调要划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界限，绝不能象黑格尔那样，从绝对观念中引出思维规律，并把它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中去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这样，恩格斯就在划清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心辩证法基础上，阐明了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2. 辩证法的主要规律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第一个自觉地阐述辩证法的哲学家，在他的《逻辑学》的范畴体系中虽然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的内容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作过阐述，但是他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三个规律。他的《逻辑学》范畴体系是以唯心主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基础，以“正、反、合”三段式为骨架和结构来排列和展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改造、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和神秘性，但是当时是围绕着创立唯物史观这个中心问题进行的，并没有写专门的唯物辩证法著作。在50至60年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应用于同一科学，在写作《资本论》前后，曾经设想写一篇专门论述辩证法的专著，但未能实现。因此，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即辩证法），只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即《资本论》的辩证法。因而他就不可能专门阐明辩证法规律和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7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驳斥了杜林对辩证法的攻击和污蔑，同时，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的内容。但是，当时并没有明确地把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归结为三个。1879年恩格斯在撰写《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这篇论文时，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主要规律。他指出，辩证法可以“归结为

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①由于当时恩格斯侧重于阐明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此，对这三个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作出详细的阐述。他说：“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是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②不过我们从《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对立统一规律尤为重视，他强调地指出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论”，是“最重要的部分”。^③同时，他在分析和考察辩证法的范畴问题时，也始终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运用自然科学材料论述了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首先，恩格斯对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自然界中一切物质的差别都是由量的变化而引起的。他说，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只有由于物质或运动（所谓能量）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恩格斯指出，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定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正是由于这种差别，才有各门科学的区分。科学的不同领域，实际上就是取决于物质分割的不同界限，物质在每一界限范围之内，以一定的运动形态表现出来。而在每一科学领域中又存在着各自的量变和质变。在力学中，是不发生各种物质运动形态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但是，“只要这里发生质的变化，它总是受相应的量的变化的制约的”^④。在物理学中，质变显现为分子状态的变化和各种物理运动形态之间的转化。宏观物体温度的增加或减少，而有各种不同的聚集状态。电向光、热的转化，必须有一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402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404页。

定的最低限度的电流。“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的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就转化为质。”^①在生物学中或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也都证实了这个规律。但是在当时还不能精确地对这些领域作出定量的研究，所以恩格斯没有举出这方面的例子。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更具体、更深刻地说明了恩格斯曾经谈到的那些自然过程。在《关于“机械”的自然观》的札记中，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质和量的相互作用。不仅量转化为质，质也转化为量。在化学领域中，这个规律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在化学领域中，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就更显而易见了。例如，化学中的同系物，由于原子数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各种同分异构体的存在，说明原子的种类和数目都相同的分子，还可以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因而有不同的质，并且每一化合物的同分异构体的多少，又是在原子数目的制约之下。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更生动地说明了量向质的转化；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特性，随着原子量的增加而呈周期性的变化。恩格斯认为，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质变的科学。

关于对立面相互渗透的规律。在《辩证法》札记和其他论文中进行了许多方面的论述。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运动，是因两极对立而产生的。吸引和排斥，是自然界中最简单、最普遍的两极对立。这个对立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自然界的发展就是一个两极化的过程。恩格斯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说它们是把“ $A = A$ ”的公式、即形而上学的同一律，作为世界观的基本原则，来否认矛盾、否认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其实，“在无机界中，抽象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4页。

用经常改变它，在修改它的同一性。”^①“在有机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②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的时候，恩格斯深刻地论述了辩证法的具体同一性，指出“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③“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④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的差异，都有自己对立的两极，都有其内部的矛盾。这就阐明了对立面的又同一又斗争是一切事物内在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认为，对立面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和相互过渡的。他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⑤这深刻地揭示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是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恩格斯以大量事实一再说明，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就在于是否承认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相互斗争和相互转化是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源泉和动力。

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恩格斯指出，它也“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⑥在《反杜林论》中运用自然科学的许多材料论证了否定的否定规律是客观地普遍地存在于整个自然界的。在无机界中，恩格斯分析了地质演化的过程；在有机界中，恩格斯分析了植物和动物的生长繁殖过程。由此得出结论，否定的否定规律是自然界中实际起作用的基本规律。由于在《反杜林论》中已经作了详细而系统的论述，所以，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没有过多的赘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包括《反杜林论》）中，运用自然科学材料确证了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将黑格尔

①②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6、567、55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纯思辩的形式，改造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3. 辩证法的范畴

辩证法的范畴是辩证法规律的表现形式。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阐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时，列举了自然科学的大量材料，运用对立统一观点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恩格斯认为，同一性和差别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三对值得着重注意的重要对立范畴。他指出：“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当它们被分开来考虑时，都互相转化。”^① 这些重要范畴都是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着，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想要知道转化的根据、理由，就必须考虑事物的内部，即对立面的统一。恩格斯说，这必须求援于“根据”。黑格尔认为，根据就是同与异的统一^②。

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对这个问题从来就有两种对立的了解。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是抽象的同一性，它不承认事物内部存在着与自己对立的东西，即不承认事物内部的差异性。辩证法的同一性是具体的同一性，即包含着差异性的同一性。恩格斯指出，辩证法认为：“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③ 黑格尔竭力批判抽象的同一性，主张具体的同一性。他认为，辩证的同一，同时也包含着差异于自身。黑格尔指出，如果思想仅仅只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这种思想乃是一种最无益最无聊的工作。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他用大量的自然科学事实论证了辩证法的具体同一性。他指出，在无机界把表面上机械的变化（冲蚀、严寒），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的机械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胶合物）以及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8页。

② 参看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8页。

规模的变动——地面的凸起、地震等等，无一不是证明同一性包含着差异，而差异的变化寓于同一之中。在有机界则更为明显，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区别。生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是一样，生理学愈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愈加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愈加重要。任何事物，从自然界、人类社会到思维的发展过程，无不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辩证法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范畴，对于认识事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既然同一性中包含着差异性，那么在认识事物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同一性上，而应深入其内部考察差异性，才能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发现事物的本质。但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坚持抽象同一性，它主张， $a=a$ ，反过来， a 不能同时等于 a 又不等于 a ，一切事物都是僵死不变的、不能转化的。例如，有机体，星体和太阳系都是如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被无数自然科学的事实一点一点地驳倒了，它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时仍然继续存在着，被旧事物的拥护者用它来作为抵抗新事物的武器。但是，辩证法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范畴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具有科学性，决不会形而上学的反对而失去真理性。

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是两个更加尖锐的相互矛盾的范畴。它们是对立的统一，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必然性以事物内部矛盾、本质原因为根据；偶然性则是由事物非本质的或外部的原因引起的。因此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客观事物本来所固有的，这就是它们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又是相互联系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并且这两者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形而上学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没有任何联系的，绝对对立的两个范畴，甚至认为它们并不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联系，而是纯主观的

范畴。黑格尔在哲学史上曾第一次论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批判了形而上学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的错误。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运用达尔文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材料，阐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还批判了在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上的两种形而上学观点。

一种观点，是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彼此并列的、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它认为自然界有些对象和过程是纯粹的必然性，而另一些现象则是纯粹的偶然性。而整个问题就在于不要把这两类互相混淆起来。当时，在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中广泛地流行着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他们不仅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绝对对立起来，而且竭力贬低偶然性的作用。“于是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①既然科学的任务，是要找出原因，解释规律性，而这些偶然性却没有原因，没有规律性，因此，就被排斥在科学之外了。这样，凡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就都归之超自然的原因。偶然性成了上帝的别称。所以，凡是必然的联系丧失效用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必然导致神学。

另一种观点，只承认必然性，根本否认偶然性。它认为，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种观点是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传到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主张，自然界的一切都在绝对的必然性支配之下的，偶然性是不存在的。这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是前一种观点的变形。因为不去揭露偶然性的必然性的联系，而把一切都简单地称作必然性，那就仍然不能发现自然界的规律性。这样必然性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还是不能从神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1页。

自然观中解脱出来。”^①抹煞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区别，企图从根本上否认偶然性来根绝偶然性，实质上就是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

关于原因和结果，这对辩证法范畴，是自然界和社会中各种现象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反映。恩格斯指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②他认为，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形态之间的转化，是因果观念的基础。自然科学和生产实践证明：一种运动形态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态，这前一个运动就是原因，而后一个运动就是结果。恩格斯指出，社会实践是因果性认识的基础。“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次更替，就产生因果观念。”^③恩格斯举出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深刻地论证了实践是因果关系客观性的证明。当然也有这样的時候，给了原因，但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因果性被推翻了吗？没有。只要我们经过适当的研究就可以发现，阻碍预期结果的每一个可能的事实都是有其各种原因。

（例如，勾动枪壳之后为什么没有把子弹头打出去？）恩格斯认为：“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④

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作用说明了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恩格斯认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可以变换地位；相互作用是用当代科学观点考察物质运动时第一个遇到的东西。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恩格斯从物质运动形态相互转化过程中进行了充分论证。（例如，电可以转化为磁，磁也可以转化为电，在这里，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1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和磁是相互作用的)原因作用于结果,结果也作用于原因。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因果关系的本质,说明了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有力地驳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机械决定论者撇开相互作用的各种具体形式,企图在单一的因果关系上推出“终极原因”。最后,这个达不到的“终极原因”就被归结为上帝。黑格尔认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这一命题的合理性,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看,“为了了解个别的现象,我们必须把个别的现象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表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① 自然科学家格罗沃已经认识到了各种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他却认为,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作用将“导致荒谬境地。”恩格斯说,这是由于他对付不了相互作用这个范畴。相互作用是比因果性更高的范畴,它更深刻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认识到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的条件,人们就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自觉地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更好地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

第三节 物质运动的理论和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相互联系的辩证法

物质运动理论和科学分类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恩格斯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物质运动理论的建立为深入地阐发自然界的辩证法铺平了道路,也为正确说明各门科学之间的辩证联系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物质运动的基本原理

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深入钻研自然科学理论,探讨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

科学哲学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物质运动的新思想。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不无欣喜地谈到他的这个新发现，他写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①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物质与运动不可分割的原理。这个原理成为恩格斯深入研究运动问题的出发点。后来，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的这个基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阐发。

恩格斯认为，离开运动去考察物质是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对于近代科学中盛行的机械论观点来说，物质的客观性，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物质的运动却被看作是某种外来“力”的作用的结果。力作为运动的原因将运动从外部给予了物体，而物质本身是惰性的、被动的。因此，在机械观中物质与运动本质上是相互分离的，并且正是由于将物质与运动割裂开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关于神秘的“第一推动力”的假设。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离开运动去看物质的错误倾向。他坚持从物质与运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观点出发考察自然界，依据科学的事实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它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此确立了辩证的发展观。

根据物质与运动统一的思想，恩格斯也坚决反对割裂物质与运动关系的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完全脱离物质来考察运动的唯心主义倾向。例如黑格尔认为运动变化的主体是“绝对精神”，而物质世界是僵化的、不发展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自然科学中后来演变为所谓的“唯能论”。“唯能论”将物质与能量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7页。

割开来，因而也就将物质与运动割裂开来，甚至进而将脱离了物质的纯粹的能量看作唯一存在和独立的实体，导致了认为存在着“没有物质的运动”的错误结论。针对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强调指出，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特定的运动总是与特定的物质形式或物质种类相对应。在批判物质与运动关系上的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同时，恩格斯对运动概念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将运动定义为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根据恩格斯的定义，既然运动是物质的一种属性，那么两者就必然是不可分离的，因为属性不能离开它的物质主体。19世纪科学已经证明，物质世界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中。从巨大的天体到微小的粒子，从无机物到有机生命，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中。正是由于物质自身的运动变化，才构成了千变万化、生机勃勃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宇宙间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是物质的运动，每种运动形式都有其物质承担者。恩格斯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指出，机械运动的物质承担者是物体，物理运动的物质承担者是分子，化学运动的物质承担者是原子，而生命运动的物质承担者则是蛋白体。关于每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承担者的思想，是恩格斯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使物质与运动不可分割原理获得了更具体的表述形式，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进而研究各门科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从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割性出发，恩格斯指出：“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末运动也就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①显然，承认物质的永恒性，承认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割性，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运动的永恒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哲学的运动不灭原理在19世纪获得了有力的自然科学证据，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但是运动不灭性作为普遍的哲学结论，并不等同于具体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原理。恩格斯指出，从历史上看，运动不灭原理先于能量守恒定律二百年就已由笛卡尔以较为明确的形式提出来了。然而，只是由于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才使运动不灭原理确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能量守恒定律指出：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能量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而只能在总数值不变的原则下，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由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不同能量形式和相互转化中，存在着等价的比列关系。能量是物质运动的变量，所以能量的不灭性就成为运动不灭性的直接依据。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客观自然界中，当运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时，既没有凭空创造出运动，也没有无缘无故地消灭掉某种运动。例如，物体的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运动（摩擦、碰撞），转化为电（摩擦生电），进而转化为磁，即转化为电磁场的运动；热和电都可以转化为化学运动（高温下水分子的分解和电解现象）；化学运动也可以反过来转化为热运动和电运动（电池）；最后，热运动和电运动又可以转化为机械运动（蒸汽机、电动机）。而所有这些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并不意味着运动的消失。在这些运动形式转化的前后，运动量（能量）的总和不变。一个物体获得了一定量的某种运动，必定是另一个物体失去了一定量的某种运动。反过来，一个物体失去了一定量的某种运动，则必定是另一个物体获得了相当量的另一种运动。在这里，运动不灭性首先就表现在运动量的这种不灭性和守恒性上。

然而，恩格斯指出：“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①什么是运动不灭原理的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0页。

的方向？为什么强调对运动不灭性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作了具体的阐发。恩格斯指出，在各种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其转化前后运动在量上的守恒性，而且要承认这些不同质的运动形式是不能消灭也不能创生的。即是说，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的能力是不会被消灭的。所谓运动在质上的不灭性就是指，物质多样的运动形式及其转化的能力是物质本身固有的，是不会丧失的。恩格斯认为，不承认物质运动在质上的不灭性就不可能贯彻彻底的发展观，就不可能对运动的永恒性作出完整的说明。

运动在质上的不灭性和在量上的守恒性以物质运动的多样性为前提，恩格斯曾指出：“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①这里恩格斯强调把运动看成是宇宙中一切变化和过程的总和，因而运动在质上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在这点上，唯物辩证法的运动观同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运动观是根本对立的。机械论否认运动的多样性，将各种运动之间质的差别归结为量的不同。在机械论者看来，“运动总是不言而喻地被认为是和机械运动，和位置移动相等的。”^②在恩格斯的时代，整个科学界仍受机械论的影响，机械运动被看作唯一的运动形式，机械“力”的概念被随意搬用，各门科学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互不相干的“力”。如热力、电力、磁力、化学亲和力、生命力等等。总之，对于每一种特殊的运动，人们就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力”来加以解释。力的概念的滥用，掩盖了各种运动之间质的差别，阻碍了对不同运动的特殊性作具体的研究，给自然科学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因此阐明物质运动的多样性，说明不同运动之间的区别是极为必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的。恩格斯对机械论所导致的这种思想上的混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由于各种运动之间质的差别，因此力的概念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在力学的范围内，力的概念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如果说“热是使物体膨胀的力”，那就错了，因为这并未说明热的本质——大量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同样，在化学反应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化学亲和力”在起作用。而将所谓“生命力”看作某种独立于有机体之外的东西，则导致了超自然的神秘主义观点。为了更充分地表达运动的多样性以及物质与运动相互关系的思想，恩格斯在有关运动问题的讨论中使用了“运动形式”的概念，并运用这个概念深入研究了各种运动现象之间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结。

依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果，恩格斯将自然界丰富多采的运动过程概括为四种基本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每一种运动形式都有着特殊的本质，这个特殊本质为运动内部特殊的矛盾所规定。例如机械运动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运动中的阴电与阳电、凝聚与扩散、吸收与辐射；化学运动中的化合和分解；生命运动中的同化与异化，遗传和变异等等。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指出，运动形式不同，一般来说，其对应的物质承担者也不相同。与机械运动形式对应着的是天上和地上的物体；与物理运动形式对应着的是分子；化学运动对应着原子；生命运动则对应着生命的物质承担者——蛋白体。每一种运动形式都具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特殊矛盾，因此各种运动形式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①

当然，各种运动形式不仅相互区别，表现出多样性，而且也

① 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每种运动形式不一定只有一种物质承担者。例如物理运动不仅是分子运动，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的运动也是物理运动。但是不同质的运动有不同的物质承担者的思想仍然是正确的。因此恩格斯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相互联系、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表现出统一性。恩格斯特别重视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过渡的问题，因为在运动形式的相互过渡中更充分地显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本性。恩格斯指出：“不管一切渐近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的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的力学转变到分子的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的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的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更是如此。”^①显然，在恩格斯看来，运动形式的转化从一种运动形式到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渡，是各种不同质的运动形式之间相互联系的根本形式。在转化过程中既包含着运动内在矛盾的转变，也伴随着一种物质形态向另一种物质形态的过渡。恩格斯认为，关于运动转化的认识是19世纪自然科学所达到的对自然界的最深刻的认识。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分析，揭示了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辩证统一性。

对于空间中并存的各种不同质的运动形式通过转化而相互过渡，相互联结，恩格斯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作了具体的说明：“物体的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都可以转化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又可以反过来产生热和电，而由电作媒介再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②在自然界中，物质运动由于内部的矛盾作用，总是在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着。当着一种运动形式通过各个环节转变为种种不同的运动形式时，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统一性就清楚地显现了出来。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以其所起的作用，证明自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9页。

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形式，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的。

然而，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不仅存在空间上相互邻近的历史，而且还存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也就是说，在空间中并存的各种运动形式是时间上相继发展的结果。因此，恩格斯指出，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联系和统一又是普遍发展中的联系和统一，而这种发展是通过转化实现的。“真实的转化是在历史中——太阳系的、地球的历史中。”^①根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恩格斯指出，地球上存在着的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是太阳系长期演化的结果。在早期炽热的星云团中，热运动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他运动形式还没有分化出来。随着温度下降，天体不断冷却，才开始了运动形式分化的过程。特别是太阳系形成后，在一定的演化阶段上，地球上的化学运动开始成为主要运动形式之一。随后，由于化学变化，从无机物中产生了有机物，进而出现了生命运动形式。生命物质又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矛盾运动，最后产生了人类。于是物质运动的演化便超出了自然界而进入到社会的领域，出现了社会运动形式。自然界丰富多采的物质运动由这一发展过程联系了起来。各种运动形式在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依次转化，形成了物质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统一性就体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根据恩格斯的意见，物质的运动形式是一个从机械运动形式开始，依次发展到生命运动形式为止的完整系列（只考虑自然界）因此基本运动形式的排列不是任意的，这个排列反映了运动形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顺序。通过对自然界运动形式辩证发展的历史考察，恩格斯进一步研究了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高级运动形式由低级运动形式转化而来，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它也将低级运动形式包含在自身之中。因此任何较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2页。

级、较复杂的运动形式都包含着较低级、较简单的运动形式。恩格斯指出，一切运动都是和某种位置移动相联系的，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较大或较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在化学反应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温度的变化和电的变化，而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基本运动形式之间的这种包含关系也反映了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内在联系和统一。另一方面，高级运动形式并非低级运动形式的简单堆积，不能把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因为高级运动形式有着不同于低级运动形式的特殊的质。恩格斯强调指出，位置移动决不能把有关运动的性质包括无遗。因此将生命运动这种高级运动形式简单归结为机械运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关于物质运动形式之间辩证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还原论”的历史作用，以及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正确运用还原方法提供了指导思想。

在深入研究各种运动形式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恩格斯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只有研究或充分了解了初级的、简单的运动形式之后，才能够对于更高级的、更复杂的运动形式有所了解。具体地说，只有先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等运动形式，对它们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反过来，也只有通过对高级运动形式的深入研究，才能更充分、更彻底地认识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化学只有通过那些在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①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重大方法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一方面，由于自觉地吸取和运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成果和方法，使得生物学从一门描述性科学进入到定量科学的行列。本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应用现代物理学和化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8页。

的原理、方法，通过对生物体的主要物质基础——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运动规律的研究，在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以至今天人类正可以利用化学的方法合成简单的生命物质。另一方面，现代生物学的突破，对生命现象研究的深入，也推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例如，对生物体内酶催化作用的研究已使人们对化学反应的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有人预言，对酶催化作用问题的最终解决，必将对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现代科学研究中所体现的这种辩证性质生动地说明，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二、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对物质运动理论的系统阐述为揭示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联系，建立科学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认为，科学分类是科学认识本身提出的要求。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知识不断积累、丰富，各门科学相继独立和分化出来，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如何把各种知识系统化，建立科学体系的问题。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这种要求。适应这种要求，科学史上产生过各种不同的分类体系。18世纪以来，科学有了进一步的分化和发展，于是“出现了要把旧的牛顿——林耐学派整个自然科学作百科全书式的概括的要求，有两个最有天才的人物投身于这一工作，这就是圣西门（未完成）和黑格尔。”^①恩格斯对圣西门和黑格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圣西门提出按照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分类的思想。他认为，各门科学的分类是以其研究对象的分类为基础的。圣西门将人类认识的各种现象分为四大类：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和生理现象。与此相应的是研究这些现象的天文学、物理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

化学和生理学。而这些学科的排列则是由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决定的。因此圣西门也提出了科学分类应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进行的思想。不过圣西门所说的简单和复杂，还只是现象的联系，并不是对象自身的本质关系。这种由简单到复杂的排列并不完全反映对象本身的发展，主要是反映主观认识的顺序。

在肯定圣西门分类中的客观性原则的同时，恩格斯还对实证主义者孔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恩格斯认为孔德抄袭了圣西门的分类方法，但却抛弃了圣西门分类中的客观性原则，从而对圣西门的分类系统作出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孔德认为，人的理性是有倾向性的，在认识事物时总是从抽象的东西到具体的东西。在他那里分类的原则不是从客观对象出发的，而是从人的理性出发的。因而各门科学的排列并非力图反映科学对象本身固有的内部联系，而仅仅看作是安排教材和教学的需要，认为要学习复杂的科学，必须学习简单的科学。例如，要学习化学，必须先学完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而学习社会学则必须学完所有其他科学。孔德将较简单和较复杂科学之间的关系绝对化，从而导出了荒谬的结论。对此恩格斯指出，在孔德那里，“一个基本正确的思想被数学地夸大成胡说八道”。^①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分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将发展的思想带进了科学分类中。圣西门和孔德的分类虽然提出了从简单到复杂排列科学的思想，但各门科学只是依据外部特征机械地加以排列。黑格尔在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将各门科学看作是依赖于绝对精神发展而相继产生的过程。实际上，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就是一个科学分类的系统。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绝对精神最初是在超时空的逻辑领域运行。以后“外化”为自然界。在自然界阶段上，它又经历了机械性阶段、物理性阶段和有机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

阶段，最后又回到绝对精神自身。在绝对精神依次发展的顺序中，各门科学相继产生出来。黑格尔将自然科学区分为三大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论；认为机械论研究质量即物体的运动，化学论研究分子运动和原子运动，而有机论研究的是生命有机体的运动。它们的排列顺序反映了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顺序，从一种科学到另一种科学的转化反映了绝对精神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黑格尔用发展的观点、转化的观点来说明各门科学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解释是建立在其唯心主义哲学之上的，因此这种一门科学到另一门科学的转化不可避免地仍带有着人为的性质。

圣西门和黑格尔的分类思想在近代科学分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在对他们的分析批判中，肯定了圣西门分类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原则，吸取了黑格尔分类中的辩证发展的合理思想，并在对圣西门和黑格尔分类思想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将科学分类的客观原则和发展原则有机统一起来，为建立科学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基础。

从客观原则和发展原则出发，并依据对物质运动理论的研究，恩格斯提出了物质运动形式的区别和固有次序作为区分和排列各门科学的依据的分类思想。恩格斯指出，整个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中“运动着的物质，物体”^①，其中各门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则是物质的“不同的运动形式”^②。科学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所以各门科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应决定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根据这个思想，恩格斯对当时自然科学从整体上进行了划分。恩格斯关于科学的基本分类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机械运动——力学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7页。

物理运动——物理学（分子的力学）

化学运动——化学（原子的物理学）

生命运动——生物学（蛋白质的化学）

从上表可以看出，同基本运动形式的划分相对应，自然科学被区分为四大基本部门，即研究机械运动形式的力学，研究物理运动形式的物理学，研究化学运动形式的化学和研究生命运动形式的生物学。这四个基本科学部门是按照其对象的相互关系和固有次序排列起来的。在这里，从一门科学到另一门科学的过渡，反映了从一种运动形式到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渡。因此，运动形式之间的辩证联系使各门科学之间的本质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

首先，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是统一的，各种运动形式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因此，自然科学也是统一的，各门科学有着相互转化的有机联系。恩格斯多次指出：“当我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并进而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借此表示科学中的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和连续性，也表示出它们的差异和非连续性。”^①

其次，由于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种运动形式是从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化而来的，因此“这些形式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②所以，各门科学的排列表明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即从研究最低级、最简单的运动形式的力学，不断上升，最后过渡到研究最复杂的生命运动形式的生命科学。而科学的逻辑进程正好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从近代自然科学的历史进程来看，由16世纪伽利略奠基的力学开始，到17世纪牛顿创立的古典物理学，再到18世纪拉瓦锡的化学，直到19世纪达尔文的生物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5页。

进化论，显示了人类认识物质运动形式的历史过程。所以恩格斯对各门自然科学的排列也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即各门科学的分类和排列顺序与人类的认识史或科学的发展史相一致。

再次，各种运动形式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渗透，因此，各门科学之间也必然是相互渗透的。根据这个思想，恩格斯预言，在各门科学的结合部或衔接点上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科学部门。例如，恩格斯实际上预言了物理化学的出现，他说：“这样，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自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①恩格斯还预言了化学与生物学之间的边缘领域的产生。这些预言已相继为科学的发展所证实。在当代，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彼此渗透越来越明显，边缘科学大量涌现出来，原有科学的邻接领域日益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对于现代科学的这一突出特点，我们仍然可以依据恩格斯的分类思想给予合理的说明。

总之，恩格斯以物质运动形式的理论为根据，将客观性原则和发展原则结合起来，充分揭示了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联系，奠定了正确的科学分类理论的基础。恩格斯关于科学分类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的特点及其分类体系无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数学在科学分类中的地位 及其辩证性质。马克思 《数学手稿》的意义

数学在恩格斯科学分类系统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恩格斯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5—636页。

思想，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形式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科学分类的基础。而任何物质运动都有自己量的规定性。量的关系是各种物质运动的一般关系。只有把握了物质运动质的规定性，又把握了它的量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物质运动的规律。数学以物质运动量的关系为对象，因此它既与研究具体运动形式的各门科学密切相关，同时又不从属于某一门科学。恩格斯定义数学为关于“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说明了数学的抽象性以及它与其他科学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了它在科学分类中的特殊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和重视数学。在恩格斯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贡献中，涉及到许多数学问题，并包含有专门论述数学问题的札记。马克思曾利用工作之余，从事独立的数学研究，留下了近千页的数学笔记。恩格斯曾说，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而且甚至在数学领域也有独到的发现。^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和研究数学，首先是由于实际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他们充分认识到数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马克思在1858年1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制定政治经济学原理时，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术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②马克思在其研究工作中，不仅大量运用了初等数学的知识，而且也包含了对高等数学方法的运用。1868年1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工资问题，他说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对于研究这一问题很有帮助的公式。^③后来，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5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2页。

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①马克思重视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运用数学，他对数学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曾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②为此，他建议恩格斯研究数学，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有空时我研究微积分。顺便说说，我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如果你愿意研究，我准备寄给你一本。我认为这对你的军事研究几乎是必不可缺的”。^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数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确立科学的世界观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数学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数学不仅仅限于探讨数学问题本身，而且着重于对数学进行哲学概括，着重于挖掘数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并将其作为丰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数学哲学的研究工作概括起来，包含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其一是阐明数学的本质，即数学的客观性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其二是揭示数学内在的辩证性质。关于前一方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作了较充分的阐述。

抽象性是数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唯心主义者往往据此而将数学与客观世界割裂开来，歪曲数学的本质，将数学说成是纯粹先验的，纯思维的产物，并通过对数学本质的这种歪曲解释为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作论证。恩格斯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④而现实的数学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7页。

②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7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页。

例如“数”和“形”是数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全部数学都是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繁衍、发展的。但是，“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得来的。”^①人类原始文化史的大量事实材料证明，数的概念并非人类天生具有的，人类学会计数是从拿手指头开始，通过长期的实践过程，人们才逐渐获得了脱离具体物质对象的数的概念。各种形的概念也是一样，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将外部世界中的各种形状的具体事物加以比较，从中提取出一般的形的概念。恩格斯通过对数和形的历史考察，说明了数学的现实来源。当然抽象的数和形的概念形成后，也使数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但是客观世界仍然是数学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它为“一切想象的数量都提供了原型。”^②不仅简单的数量关系，而且象无限性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也可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说明。恩格斯指出：“物质是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的，容易分清的组，使每一组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间在质量方面都具有确定的、有限的比值，但对于邻近的组的各个组成部分则具有数学意义下的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比值，可见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③因而自然界中物质的层次性以及物质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为抽取和理解数学中的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概念提供了现实的原型。总之，数学的概念来源于现实世界，并且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中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

关于数学的客观性，还涉及数学公理的客观性问题，公理方法是建立数学理论的重要方法，在公理化的理论体系中，必然存在少数不加定义的和不加证明的基本命题，即公理。那么，公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8页。

在数学上的不可证明性是否表明了它们的先验性呢？恩格斯指出，数学中的公理并非先验的真理，数学公理具有客观性，它们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因此尽管公理的真理性的确不能在数学理论自身中加以证明，但却可以在理论之外，由人类实践活动辩证地证明。公理的自明性正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实践过程中继承下来的，关于这一点，列宁后来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的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①总之，公理之所以成为数学上不加证明的东西而被用作数学推理的出发点，正是因为它已经是人类千百万次实践所证明了的东西。公理的自明性，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的结果。唯心主义者通过否定公理的客观性，进而否定整个数学理论本身的客观性是不正确的。

数学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现实世界是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因而数学作为现实世界的一个方面的反映也就必然要反映出这种过程的辩证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肯定了数学的客观性，而且着力于揭示数学内在的辩证法。在《自然辩证法》的“数学札记”中，恩格斯分析了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大量实例，说明辩证法的规律在数学中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在初等数学中，恩格斯分析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和运算过程，指出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②恩格斯认为，近代数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变数引进数学，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变量的研究，导致了微积分的产生。微积分突破了初等数学的框架，把数学的研究对象从常量发展到变量，从有限发展到无限，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1页。

使数学“不仅仅表明状态，并且也表明过程：运动。”^①运动进入了数学，因而辩证法进入了数学。在高等数学中（主要是微积分），初等数学的一些永恒真理被突破了，一些在初等数学看来完全不可理解的命题在高等数学中得以确立。于是数学走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单纯的抽象的量之间的关系，无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觉地成为辩证的数学家。

随着数学进入辩证法的领域，数学思维也应采取辩证思维的形式，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也由于受到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微积分的辩证本质被隐藏在神秘的外衣之下。甚至一直到19世纪，尽管微积分在实际应用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但它的理论基础仍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认识到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深刻变化，为了揭示微积分学的辩证本质，同时也为了给微积分理论的正确性提供哲学依据，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中对微积分学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微积分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哲学概括，并做出了独到的发现。马克思提出微分是“扬弃了的差”的重要思想，认为 Δx 或 dx 这个量已经不是初等数学意义上的那种要么是零，要么非零的量了，而是一种充满矛盾的量，是零与非零的对立统一，它服从特殊的运算规律。因此，不能用初等数学的观点看待高等数学中的运算。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清除微积分基础中思想上的混乱，帮助数学家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正确理解高等数学的本质和特点，推动数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为我们树立了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总结数学历史的发展，探索数学理论问题和批判数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范例，这对于我们研究数学史以及当代数学哲学问题，无疑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6页。

第四节 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 过渡的辩证法

恩格斯在“总计划草案”最后一条中提出了“因劳动而产生的人的分化。”^①这表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最后部分准备分析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从而由分析自然界的辩证法转到分析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在“导言”中，他也阐述了人类起源问题，提出了：人类依靠劳动从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以后，还必须依靠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的重要思想。1876年6—7月，恩格斯撰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起源问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论断，实现了人类起源问题上的新突破。同时，论证了从自然界过渡到人类社会的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劳动看作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飞跃的关节点。这样，就使得对自然辩证法研究和历史辩证法研究有了一个结合点，把《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密切联系起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理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

一、劳动创造了人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一直是哲学界和科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古老问题，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人们不能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8页。

自然力量的支配，更无法理解人是从哪里来的，因此，不论在东方，抑或在西方，世界各国都曾广泛流传着许多不同形式的神话和迷信，神创造人类的说法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历代的科学家和先进思想家们对人类起源问题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过许多天才的猜测和学说。例如，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提出水、原子和火是万物（包括人在内）的始因和本原的学说。恩格斯指出，这些自发的唯物主义者，把自然现象看作是无限多样的统一，是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東西中寻找统一。因此，他们的学说是朴素的，不可能战胜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在欧洲的中世纪，上帝创造世界（包括人类）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国几千年来，人类起源问题一直是个“不解之谜”。从远古时代的女娲的炼石补天，搏土造人的神话和传说，一直到儒家的“天命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随着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起源问题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早在18世纪，法国自然科学家布丰已经提出把人放到自然界里去研究的主张。他说，人应该把自己放到其他动物一块，他的整个物质方面都象其他动物。瑞典自然科学家林耐（1707—1778）的《自然系统》一书奠定了动植物分类学的基础，他把人与猿同归入了灵长类，甚至发现“野兽中丑恶的猿和我们多么相象”，并且还指出了人与猿的系列关系。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774—1829）认为，一切现代生物都是由古代的生物进化而来的，生物都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的。他在其著作《动物的哲学》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论述了人由动物起源的问题。他已经指出人类起源于亲缘关系最近的哺乳动物（猿类），并且描述了大概的过程。他说，由于森林稀少，古猿不得已而放弃居住树上的生活而在地下两足行走，改居地面生活，直立姿势在人身上打上了烙印，引起四肢和脑的发展等。

英国科学家赫胥黎（1825—1895）在其1863年出版的著作《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证明人类是起源于动物，而且应当把人类看作是接近于猿猴目，特别是人状猿猴目的哺乳类动物。1874年，德国自然科学家海克尔（1834—1919）在他的《人类起源》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猿源论”。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两书中，总结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科学成果，揭开了生物进化的秘密，证明了人类是由旧大陆的某种古猿变来的，人类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祖先。这对唯物主义地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是一个很大进步，这是达尔文对人类认识史的一个重要贡献。赫胥黎在反对教会的诘难，为人猿同祖论作辩护时说，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与真理背道而驰才是真正的羞耻。从此，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是对“上帝造人”的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沉重打击。

但是，由于达尔文或达尔文学派在社会观上仍然受着历史唯心主义影响，仍旧把人看作是生物学的人，所以只能解决人类是从何而来的问题，未能解决人是怎样由猿转变而来的问题。因而达尔文或达尔文学派没能根本解决人类起源问题。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才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的看法时，就肯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他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

劳动的结果。”^①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继续发挥这个思想。他们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 这就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吸取和总结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其他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科学成果，创立了完整而科学的人类起源理论，他明确地提出了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科学论断，系统地阐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找到了打开人类进化秘密的钥匙。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曾经天才地提出过人类通过劳动自我创造，使客体成为自己所生成的人，试图解决统一的世界是怎样由自然界向社会过渡的。但是，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思想，形成了劳动观点，并且把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恩格斯总结自然科学成就，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科学论断，从哲学上解决了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问题。这是人类起源问题史上的大革命。

人起源于动物，人是从动物界中逐渐分化出来的。恩格斯指出：“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

意识——这就是人。”^①依据生物学分类，人在动物界中的地位是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猿猴亚目、人科、人属、人种。

现代自然科学在许多领域发现的大量事实材料，提供了关于人类起源于动物的确凿证据。

首先，在胚胎学领域内，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胚胎发育与动物进化历史之间有着非常吻合的现象。恩格斯指出：“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已，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②胚胎学证明，在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中出现脊椎动物和高等猿类的特征。俄国胚胎学家贝尔通过比较不同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发现高等动物早期的胚胎阶段与低等动物胚胎阶段的相似性。他指出，胚胎中首先出现普遍的门的特征，以后顺次出现纲、目、属、种的特征，最后才出现个体的特征。贝尔所阐明的这一规律对于人类的胚胎发育的最初期（卵裂、囊、胚、原肠胚），同其他脊椎动物的胚胎也极其相似。四至六周时，人体胚胎头部两侧显出似鱼类的鳃弓和鳃沟，躯干后端有尾，第五至六个月时，胎儿全身盖上了细毛（胎毛）。第七个月时，胎儿脑有了皱纹和类人猿相似。

孩童的智力发展和我们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也很相似。初生的婴儿对外来刺激的反应能力很差，如吃奶、遇到强的光线自然地闭上眼睛等等，还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象动物所具有的无条件反射一样。孩童三个月以后，开始分化出较强的视觉刺激组成部分，能分辨出熟人和生人的面孔，逐渐对外来刺激产生了条件反射，如看到奶瓶就想吃奶等，而动物界发展到哺乳动物中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8页。

狗就有这种能力了。当孩子八个月到一岁时就发出一些不太清晰的声音（如啾啾呀呀地叫妈妈），这相当猿进化到人的原始阶段。小孩在一至二岁时对外界复杂刺激都能发生反应，并且学会了爬、站立、抓食物等活动。

其次，在比较解剖学领域内，我们可以看出人具备着哺乳动物的一般特征。达尔文当时就根据解剖学领域内积累的事实材料，证明人类同高等哺乳动物在一般构造和体质上有相似的地方。他曾指出：“人类是按照其他哺乳动物同样的一般型式或模型构成的。人类骨骼中的一切骨可以同猴的、蝙蝠的或海豹的对应骨相比。人类的肌肉、神经、血管以及内脏亦复如此。……一切器官中最为重要的人脑也遵循同一法则。”^① 达尔文根据当时解剖学获得的事实材料证明了人类和高等哺乳动物在一般构造和体质上的相似。现代比较解剖学证明，几乎人类的主要器官同脊椎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的相应器官，是同源的。比如人手的骨骼同陆生脊椎动物的前肢具有相同的结构图案，人类同类人猿在外形和内部结构上有更多相似之处。此外，在人类身上残存着的许多痕迹器官和偶然出现的返祖现象，也说明了人类起源于动物。

第三，在比较生理学方面，根据血清实验证实人与高等猿类有较近亲缘关系。利用“抗原—抗体”反应的强弱所作的实验表明，人血与猿血最接近，与猴远些，与其他哺乳动物相隔更远。另外，运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比较各种类型生物的细胞色素C的氨基酸也表明，猕猴和人的细胞色素C只有一个氨基酸的差别，而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则和人的细胞色素C完全相同。

第四，在古生物学方面，已经发现的许多从猿到人的化石材料更直接地反映了人类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的历史过程。我国是

①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1923年北京猿人的发现，特别是他的文化遗物：石器和火的同时发现，把当时称为“猿人”的直立人明确地归属到“人类”的行列，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肯定猿人是人，是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这在人类起源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1924年夏天，在非洲南部阿扎尼亚的一个采石场发掘到一具已经灭绝的猿类的六岁幼儿的头骨，这种猿是从猿到人的“缺环”，是一种人型的猿，被命名为南猿非洲种，简称非洲南猿，它外部形态已经显示出某些典型的人类特征。此后，在东部非洲坦桑尼亚奥都会峡谷和肯尼亚等地相继发现大批化石材料，包括头骨、牙齿、下颌骨和身体骨骼。从构造上看，头骨枕骨的犬孔的位置比现代猿要靠前得多，骨盆短而宽，髌骨的位置较近前方，由此可以判断它们已经能够直立行走。这一类型的化石，包括一组形态变异范围很大，生存年代持续相当长的类群。其中的特化类型，成为进化上灭绝的旁支；其中的进步类型，可能已经分化为最早的人类。1972年至1977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发现了“南方古猿阿法种”，世界人类学家公认这种古猿在人的进化系统上，它的年代大约距今四百万年前，是迄今发现的这类古猿化石中最早的类型，其形态特征与现代大猿之一——非洲黑猩猩有些相似。

二、劳动使猿转变为人的具体过程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从分化产生的。劳动使猿转变为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恩格斯指出：“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

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①从《自然辩证法》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提出了从猿到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即：直立行走能力形成，手的发展和脑髓的发展。

首先，直立行走能力的形成。恩格斯指出，由于地壳运动和气候的变化，使森林地区减少，古代类人猿被迫脱离原始森林的树上生活转移到平地上寻找食物。由于新的生活方式影响，古代类人猿原来已有一定程度分化的四肢越来越适应于执行不同的功能。前肢离开地面，后肢则开始摆脱前肢的帮助，以适应于在平地上行走。这样，古代类人猿就逐渐地由于开始下地时的半直立姿势过渡到直立行走。由于出现了手和脚的分工以及直立行走这一过程，因此，恩格斯说：“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②

直立行走能力的形成。把前肢从支持的功能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了手和脚的分工，使手向着和脚不同的职能方面专门化。在地上生活的古代类人猿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用手适应很多新的动作，如使用木棒和石块来获取食物，或利用这些自然物体来抵御猛兽等。在适应和征服环境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古猿的基因型（遗传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利于生存的变化被自然选择保存和逐渐积累下来。经过许多世代，“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取新的技巧”。^③从使用天然“工具”这种动物式的本能劳动形式，逐步过渡到制造工具的人类劳动形式。在劳动中，手适应于愈来愈多和愈来愈复杂的动作，引起了手的解剖结构的重要改造，如腕部的加强，掌骨的相对加宽，第二节指骨缩短加宽和拇指的特化。随着手部骨骼的转变，手的神经——肌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0页。

器官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结果形成人类特有的达到高度完善的劳动器官——人手。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①

其次，手的发展。恩格斯指出，由于手和脚分工，对机体其余部分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受生物学规律（即生长相关律或相关变异律）支配的影响，由于直立行走和手的解放，必然导致有机体其余部位的相应发展，如咽喉和声带的相应发展促使了发音器官的改造，创造了能够利用各种清晰的音节说话的可能性。同时还引起了骨骼、颅骨结构、视觉器官、脑髓运动中心等的一定变化。另一方面，“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其余机体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②恩格斯指出，由于手的解放，才有可能从事真正的劳动，即人类祖先开始结合在一起进行集体劳动，这是猿类的群居生活过渡到人类的社会性生产，从而结合成生产关系的巨大飞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统治，因而“扩大了人的眼界”，并且“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③——发音器官确定不移地发达起来了，于是语言在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了。

达尔文曾经企图从纯粹生物学角度来解释语言的产生。例如，他认为，鸟类的声音在若干方面与语言极为相似。因为同种鸟中所有成员都发出同样本能的鸣叫来表达它们的情绪，所有能够鸣叫的鸟类都是本能地发挥这种能力。同种但栖息在不同地区的鸟类鸣唱的自然差异，可比作“各地方言”之不同，不同种但亲缘关系相近者的鸣唱，则可比作人类不同种类的语言。他推理说，人类早期祖先最初用他们的声音发出音乐般的声调即歌唱，用来表达各种感情，如爱慕、嫉妒、胜利时的喜悦，向异性求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2页。

偶、与情敌挑战等。所以，用有音节的声音去模仿音乐般的呼喊，以表示各种复杂情绪的语言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很明显，达尔文过于强调了人类语言和动物声音的相同方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后来，有些语言学家走得比达尔文更远。他们把动物的声音和人类的分节语等同起来，认为猿猴有与人类分节语相同的分节语，有共同的语言规范等。这样就走到了极端的拟人论。上述看法都是没有看到人的语言是社会现象这一本质特点，而离开了人们的社会劳动活动，是无法正确解释语言的产生的。

第三，脑髓的发展。劳动和语言推动着猿脑逐渐地转变为人脑。人脑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的。在原生生物那里，仅有对外来刺激的感应性。这种感应性仅能分辨刺激的强度，而不能分辨刺激的性质。随着动物物种在环境影响下的不断进化，作为动物有机体的一部分的神经组织也有相应的发展。当动物发展到猿时，神经系统有了较高的发展。但是，猿只能对现实具体事物作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反映，只有具体的、初级的和直观的思维能力。直到猿脑经过质的飞跃发展到人脑时，才能进行抽象思维的活动。从猿脑到人脑的飞跃是由什么引起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劳动和语言。劳动使人脑接受着大量的刺激物（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因而使脑发达起来，并发生质变。由于劳动，人手的结构和机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手的发展对于脑的发展起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完成复杂的动作自然地就引起了大脑两半球皮层的迅速发展，因为大脑两半球皮层分析和综合来自运动器官的信号，其中包括首先来自手的信号。因此，手作为劳动器官，在实践过程中完善起来，这一点对于脑的整个反映活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反映能力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促使思维的物质器官——大脑的发展。

脑髓发达的同时，人的上肢和颌骨逐渐形成，各种感官和各

种心理过程的发展，产生了意识和抽象思维能力。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其发展，推动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脑髓、感官、意识以及抽象思维能力又反过来成为劳动和语言进一步发展的新的推动力。由于语言的产生，人类就借助于语词的抽象与概括来反映现实世界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为人的脑髓。”^①

在新的推动力的作用下，人与猿相分离之间的差距就愈来愈大，而且在新的量变基础上准备着新的飞跃。于是，在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人和人所特有的人类反映现实的形式——意识。

最后，恩格斯强调地指出：“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②作为人的主要特征的手、语言和意识都是在社会劳动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劳动过程中，人既改变了外部的自然界，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本身的自然。劳动使人得出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③人类社会也和人类一起产生了。开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也创造了人类社会。

恩格斯对劳动如何使猿转变为人的漫长过程所作的科学分析，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如果说，在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劳动在人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还是比较笼统、比较抽象的话。那么，现在，恩格斯已经逻辑地复制出它的具体历史过程，使之成为不可动摇的科学真理。恩格斯的分析彻底粉碎了“上帝造人”和“人脑创造万物”等的各种宗教唯心主义谬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3—514、374页。

近百年来，我国和世界各地陆续地发现了大量的原始人类的化石和他们所使用的石器，雄辩地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理论的正确性。根据对北京猿人化石材料的研究，发现北京猿人的肱骨（上肢骨之一）的构造跟现代人没有什么差别，而胫骨（下肢骨之一）的构造跟现代人的有较大差异，跟类人猿的却很相似，这表示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劳动，上肢首先发生变化，手首先向人的方向发展，而下肢的发展落后于上肢。同时，根据北京猿人化石股骨和胫骨的构造，证明他们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根据肱骨和腕骨的构造，证明他们的手能够自由劳动。在北京周口店的历次发掘中，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不同类型）和灰烬层。这些确凿地证明生活在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有一定的思维能力，能够制造多种使用目的不同的石器工具，并且能够用火，从事采集和狩猎，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另外根据头骨左方额叶脑回下部（语言活动中心之处）一条清楚的横纹，表明在形态上已有相当分化，据此可以推断他们已经能够用发声的语言表达思想。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初次发现蓝田猿人化石和原始的打制石器。蓝田猿人的体质特征比北京猿人稍原始，生存年代也较早，大约距今60万年前。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元谋人”牙齿化石，此后又在这个地区挖掘出了旧石器和人工用火的遗迹。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对比分析，测定元谋猿人大约距今170万年左右，这是我国至今已发现的最原始人类。根据人类学家的估计，从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类开始出现时起，距今大约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

三、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人是从动物中分化出来的，因此，人和动物有联系的一面，但是人和动物有差别的一面，人和动物有根本区别。

首先，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社会性。恩格斯说：“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而“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①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社会劳动。“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②也就是说，社会是与人类同时形成的。因此，人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离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人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其次，恩格斯指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人类具有改造自然界的自觉能动性。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于自然界，而人类通过劳动从而和自然界发生了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同动物适应环境的活动是根本不同的。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劳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它不同于动物的任何本能。马克思曾经拿人和蜜蜂作比较，说明最拙劣的建筑师之高明于最巧妙的蜜蜂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工作之前已经有了建筑的蓝图。人的其他劳动都莫不如此。原始人在制造劳动工具、即使是最简单的石刀、石斧之前，也必然在头脑中初步形成了制造和使用这种工具的计划，能够意识到他们活动的目的。人有这种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能力也就是人特有的自觉能动性。恩格斯把人类和其他动物进行了全面对比之后，得出结论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作出的改变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③人类正是通过生产劳动去支配和改造自然界，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于是人类就能够在物种方面，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3—5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8页。

人。

恩格斯还指出，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了劳动技能和人类本身的发展，扩大了生产劳动的领域，增强了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逐渐地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靠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比较有保证的生活资料；也学会了缝制衣服和建造住房，使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以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等各种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发展起来了艺术、科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恩格斯指出：“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①

恩格斯指出，那种只看见人和动物的联系，而忽视人和动物区别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只是从量的方面去理解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注意了它们之间的共同性，片面地强调了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但是它看不到人和动物之间的质的差别，看不到从猿到人转化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变，而是一个根本的质的飞跃。这种观点也是把高级运动形态归结为低级运动形态，用量的差异说明质的差异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表现。具有这种观点的人，不了解劳动在人和动物之间划下了不可跨越的鸿沟，不了解劳动的巨大的积极的创造性作用。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人之所以超出于动物，人不单纯地适应自然界，而能够支配自然界，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中能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根本脱离自然界，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恰恰相反。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6—517页。

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①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自己创造的。人离开动物越远就越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自然的盲目的力量对人的历史影响就越小。因为人们在劳动中日益学会了更加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自然规律。特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大发展以来，人们就越来越能够认识到正确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学会认识自然界、学会认识违背自然规律所带来的后果。但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是要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尽管人们在向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也还是难免出现一些自己料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②因此，人类为了在改造自然界中获得成功，就必须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绝不是把违背自然规律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恩格斯为此特别强调了人同自然界的一致性，批判了把人和自然界、精神和物质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提出：“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代社会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③

最后，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类认识了自然规律，只是具有了征服自然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付诸实现、变成现实的物质力量，还得由人类认识和运用社会规律的情况来决定。所以，人类要真正能够做自然界的主人，其先决条件是做社会的主人。这就是说，人类要完全摆脱动物的境界、对自己的生产行动不仅能够预见到较远的自然后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519-520页。

而且还能够认识到它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从而统治并调节这种影响。要实行这种调节，单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方面的保证。“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①因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够最终地超出动物，才能够不仅从物种关系方面，而且从社会关系方面，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

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和创造人类社会的伟大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强调了生产劳动在人类起源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强调了从事生产劳动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第五节 辩证逻辑和认识论问题

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时，非常重视辩证逻辑和认识论问题。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思想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

一、关于辩证逻辑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次提出了“辩证逻辑”这个概念，恩格斯关于辩证逻辑内容的论述，为辩证逻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指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都是研究客观世界的思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1页。

形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形式逻辑满足于思维形式的简单排列，而辩证逻辑却要考察思维形式的运动，即概念（判断、推理）的运动。辩证逻辑不但承认思维形式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注重思维形式的流动性、灵活性和相对性。因此，辩证逻辑所研究的思维规律是辩证法规律在思维领域的具体表现，是研究自然界的唯一正确的思维方法。恩格斯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①他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原理，以及它们在逻辑思维中的应用加以区分开来了，这是恩格斯的一种创造性的见解。辩证逻辑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思维规律及其形式的科学。

恩格斯指出，所谓辩证的思维就是主观辩证法，而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的辩证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自觉反映。在这个基础上，恩格斯论述了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

关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的思想是我们研究辩证逻辑的前提和出发点。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②坚持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的统一，并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反映，这是辩证逻辑的前提和出发点。恩格斯批评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因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只是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但是他们忽视了思维形式的能动性。因此，恩格斯指出，“只有现代唯心主义的而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③黑格尔从思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研究了思维形式，提出了精神的能动性，认为主动的创造性思维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是，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观点讲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认为思维规律是第一性的，存在规律是第二性的，把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弄颠倒了。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理论能够正确地（能动地）反映自然界，从而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思想。这是辩证逻辑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关于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这是辩证逻辑的又一个基本原则。所谓历史的东西，从广义上说，就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历史发展；所谓逻辑的东西，则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黑格尔认为，逻辑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历史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思想，强调历史的东西是第一性的，逻辑的东西是第二性的，自然界演化的历史和认识发展的历史决定着人脑中运用概念思维的过程。他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当然，逻辑的东西并不是对历史的东西的简单的重演，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它剔除了历史发展中许多偶然的因素，只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的再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用思维发展史和有机体的发展史形象地论述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思想。他指出：“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又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①

关于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也是辩证逻辑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所谓“具体”,可以区分为感性的具体和思维的具体。感性的具体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具体事物。思维的具体是指认识的结果。人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亦即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恩格斯运用运动规律和运动例证的关系为例说明了这两类具体在性质上的差异:“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②这就是说,从运动的个别感性具体形式上升到抽象,从而把握了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而这个规律,是经过抽象达到思维具体的结果,它比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丰富、多样统一)得多。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从感性具体开始,经过科学的抽象,概括出内在的必然的东西,形成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过,这只是认识到事物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为了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全面的认识,还必须把事物各方面的本质和规定联系起来,上升到思维的具体,以便达到全面地把握统一事物的整体,形成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深刻的认识。这种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揭示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从逻辑学角度为自然科学必须复归到辩证法提供了根据。

二、关于认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在阐述认识论问题时,十分强调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他说:“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不过是对自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545、545页。

自然界本来面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①他认为，在理论自然科学中要从事实中去发现一些联系，而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

恩格斯在认识论问题上，着重论述了认识论辩证法，批判了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在19世纪70年代，自然科学领域里流行着一种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至少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思潮。诸如：生理学家雷蒙、生物学家赫胥黎、植物学家耐格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兹等著名自然科学家都宣扬不可知论观点，因而在认识论问题上引起了严重混乱。特别地，当时德国植物学家卡·威·耐格里（1817—1891）是从经验主义走向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他于1877年9月20日在慕尼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自然科学的认识的界限》的报告，公然宣扬不可知论和机械论。他认为，我们只能认识事物量的差别，不能认识事物质的差别；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不能认识无限的东西；只能认识个别的东西，不能认识一般的東西。他认为，只能认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能认识无法用量来计量的东西。他否认自然界事物一切质的差异，把它归结为量的差异。他在质和量之间、有限和无限之间、个别和一般之间、相对和绝对之间，划了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因此，他否认物质、一般、质、时间、空间、无限的可认识性。恩格斯针对这种情况，深刻地批判了不可知论观点，着重阐明了认识论的辩证法。

首先，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合理思想，论证了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康德曾经把认识规定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性直观；第二阶段是悟性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理性阶段。康德认为，在第一阶段用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时间、空间把混乱的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出一定的秩序，然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

认识进入悟性阶段。在这个阶段，用先验的逻辑范畴——原因、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等把认识材料加以排比、分类，形成一般的概念，普遍性概念，使其成为系统化知识。认识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纯粹理性阶段。康德虽然脱离思维的客观内容，只谈形式，具有先验论色彩，但是他把认识区分为悟性和理性有合理的辩证法因素。黑格尔吸取了康德的辩证法因素，把认识分为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他认为，悟性是思维的低级阶段，在悟性认识阶段，各种思维形式是彼此孤立的、固定不变的，抽象的、无矛盾的，因此是片面的；理性是思维的高级阶段，在理性认识阶段，各种思维形式是相互联系的、运动变化的、具体的、对立统一的，因此是全面的。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思想，指出：

“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意思的。”^①恩格斯总结人类思维史之后指出只有人才具有高级的理性思维。他认为，“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抽象、实验、分析、综合等“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②它们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相反，“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③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为现代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所证实。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耐格里陷入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他不懂得辩证法。耐格里把质和量，有限和无限，个别和一般加以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针对耐格里的错误，恩格斯论述了质和量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客观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每一种事物的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差别，如：颜色的深浅，质料的软硬，生命的长短，无不有量的差别，它们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虽然具有质的区别，但是可以认识的。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具有无限多的质的事物，抽象的质是不存在的。各种事物由于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它们之间既有相同的质，也有不同的质。这种质的差别通过视、听、触、味的感觉去感知事物，都可以认识的。恩格斯着重指出，人除了有各种感觉器官之外，还有抽象思维活动，这使得人们能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性。所以，对人类来说，最后的绝对的认识界限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针对耐格里的错误，论述了认识中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人们只能通过有限来把握无限。他说：“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①恩格斯在肯定人能够认识无限的同时，指明，人类对无限自然界的认识只能逐渐接近，而不能穷尽：“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近的进步过程中实现。”^②因此，恩格斯说：“无限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③

恩格斯还阐述了认识中的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强调了认识的绝对性。他说：“对我们来说，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够了。”^④恩格斯指出，绝对和相对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相对的知识具有绝对的意义，绝对的内容具有相对的范围。如果片面地夸大科学理论的相对性，忽视绝对性，将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如果片面地夸大科学理论的绝对性，忽视相对性，那么科学理论存在就没有意义了。恩格斯提出“自然规律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思想，使自然科学家既避免陷于不可知论，又避免了形而上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555、560页。

学绝对化。

恩格斯在批判不可知论时进一步阐明了认识的能动性思想。他在读到人类对必然性和因果性的认识时强调了实践活动在这种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人类的活动能够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末这就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必然的因果联系。”^①他在谈到自然科学史时，特别强调了生产实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决定作用，尖锐地批判了忽视人的能动性的机械论观点。他说：“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②

再次，恩格斯还论述了个别、特殊和一般的思维发展辩证法。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认为概念运动是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的上升过程。所以，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是绝对观念运动的相互联系的三个环节。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猜测到了思维发展的辩证法。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指出概念的运动即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由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的上升运动。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着个别、特殊和一般，它们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个别中包含着一般，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由于客观事物的多样性，事物发展的无限性，个别、特殊和一般的结合方式的复杂性，所以，人的认识所经历的由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的上升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或两种形式中实现，而是在许多形式中实现的。所以，认识从个别、特殊到一般的上升过程是通过多种形式实现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2、573—574页。

三、逻辑方法和科学假说的意义

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时，非常重视科学方法论问题。特别注意和深刻阐述了逻辑方法和假说的科学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揭示了它们的辩证本性。

概念这个思维形式既是思维的起点，又是一个认识阶段的终结，因此它在思维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概念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概念在内容上是客观的，而其表现形式则是主观的。恩格斯认为，就连最远离客观世界的数学概念，不是人类思维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它可以从自然界中找到现实的原型。恩格斯在批评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观点时，论述了概念的客观性，他指出，“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①恩格斯指出，概念的本性是辩证的，它不是僵死的、固定的，而是在对立中运动、矛盾中发展。他说，“正如电、磁等自身两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②在《〔数学〕札记》中，恩格斯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几个数学概念的辩证性质。例如：“零”作为数学中运算的起点，不只是纯粹量上的否定，同时也是肯定，是肯定与否定，有与无的对立统一；“一”和“多”是对立统一的，“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和“多”是互相转化的。概念是灵活性和确定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它反映客观对象性质的相对稳定性，具有一定的确定性，才能确切地反映现实；另一方面，它又反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5页。

客观对象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体现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各门自然科学都制定了自己一系列的基本概念，通过它们来反映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例如，生物学的同化，异化，遗传，变异，化学的元素和原子，物理学的声、光、电、力、质量和速度等。许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包括制定新概念和充实旧概念而表现出来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不能把握概念的辩证本性，就很难正确认识自然界。所以，对概念这一思维形式的研究，对于自然科学发展和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判断是在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思维形式。恩格斯对判断的辩证本性的研究，集中地反映在判断的分类问题上。在《关于判断的分类》的札记中，他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关于判断分类原则进行了比较，批评了旧的形式逻辑分类的缺陷，提出并阐述了关于辩证逻辑判断分类的原则。他指出：“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①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直到康德为止，关于判断问题的研究，始终局限于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联系地排列起来。”^②这种分类只是把它们平列起来，没有考虑判断之间的相互联系，没有体现判断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因此，没有揭示出判断的辩证本性。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用辩证法来研究判断的第一个人，他批评了旧形式逻辑在判断分类上的缺陷，把不同的判断看作一个跟随一个的必然的演化序列，是思维所规定的全体，不同判断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把判断的发展只看作“绝对观念”自身发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546、546页。

展的结果。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在判断分类上的辩证法思想，并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根据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进程，将判断划分为个性判断，特殊性判断和普遍性判断。恩格斯用人类对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认识过程作为实例说明其判断分类的正确性：

个别性判断——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

特殊性判断——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1842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

普遍性判断——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

（1845年迈尔）

恩格斯说：“因此，表现在黑格尔那里的是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而在我们这里就成了对运动性质的立足于经验基础的理论认识的发展。由此可见，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①就这样，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深刻地阐述了判断的辩证本性，对于自然科学发展和提高理论思维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

推理是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推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推理形式本身以及各种推理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辩证法》札记中，批判了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对待归纳和演绎的形而上学态度，从阐明演绎和归纳的辩证关系着手、深刻论述了推理的辩证法。

德国著名生物学家海克尔等人为代表，将归纳和演绎绝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海克尔认为，归纳和演绎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推理形式，在他看来，在认识过程中，两种推理或者交替使用，或者只用其一，进化论仅仅使用了归纳，而猿类论只利用了演绎。恩格斯运用自然科学大量事实批判了海克尔把“推理分为归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7页。

纳和演绎两极”的错误观点。^①他指出：“当每天都有新的事实发现，推翻全部旧有的归纳分类法时，海克尔恰恰在这个时候狂热的拥护归纳法，这又恰好表明了我们的这些自然科学家的思考力的特色。”^②由于归纳推理具有局限性。所以只根据这一种思维形式是不可能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恩格斯指出：“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③因为进化论取得的进步，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归到“演绎法”。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目等基本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因此，归纳和演绎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绝对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

另一类自然科学家把归纳法看作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推理形式，因而片面夸大归纳的作用，甚至把演绎也看作归纳，根本否认演绎的作用，成为“归纳万能论者”。恩格斯批判了归纳万能论者的形而上学错误，深刻地阐述了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首先，他指出，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而且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好像分析和综合一样，是相互联系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应用的地方。其次，恩格斯指出，“归纳万能论者”是违反人们的认识辩证运动的。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这是整个认识过程中互相联系的两个阶段，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归纳和演绎就是反映了这两个认识过程的辩证关系。如果把归纳和演绎割裂开来，就违反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恩格斯以萨迪·卡诺研究蒸气机为例说明归纳法不是建立科学理论的唯一推理形式。指出，在萨迪·卡诺研究蒸气机的过程中，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9、570页。

科学的分析和抽象是重要的手段，它比简单的归纳更能够深刻地揭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归纳和演绎必须同分析和综合等思维形式结合起来，方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

在《自然辩证法》札记中，恩格斯特别强调假说在科学认识中的巨大意义。他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①在当时最发展的自然科学部门——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人们就象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互相干扰并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也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②越来越新的联系和关系被发现了，因此而日益增长了“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③。

假说是在实践活动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分析、类比、推理等逻辑方法的理论思维的基本形式。它是人类探索和认识自然界客观规律不可缺少的思维环节，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重要阶段。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科学积累了一定的事实材料之后，经过思维加工，运用逻辑方法进行分析、整理，作出推测性的带假定意义的理论解释，就形成某种“假说”。假说，是具有假定性质的对事物本质的理论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客观真理的因素。任何科学假说的提出，都是推动科学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6、96—97页。

进的新起点。但是，假说的科学性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证明和检验。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经过实验证明为科学理论。另一种可能是被推翻了、或被部分地被推翻了，或者经过修正和补充更加完善了。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是重要的因素。实践活动为判别假说内容的真伪，提供了客观标准。恩格斯还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根源，他说：“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代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①

恩格斯关于假说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的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首先，在于它本身固有的方法论的指导性，指导自然科学家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陷入归纳主义的狭隘性。其次，它在哲学上也有重大意义。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主义假说理论得到了传播，实证主义不把假说看作是对真理的预测，而是对真理的代替，这实际上是把假说成分排除在知识结构之外，从而否定了假说变为确实可靠的知识的可能性。恩格斯关于假说的理论是反对实证主义的有力武器。

第六节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距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在这一个世纪中，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各个自然科学领域，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百多年来经过各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践检验，《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某些事实材料和个别结论虽然过时了，需要重新加以修正，但是，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本观点和方法，不仅过去是正确的，而且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并且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自然辩证法》一书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自然辩证法》一书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着重批判了经验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当他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提出了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①这样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科学论断。

恩格斯首先分析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现状，发现自然科学已经达到的水平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本性与当时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极不相适应。自然科学在18世纪末以前是处于收集经验材料阶段，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材料，主要任务已经从收集、积累材料，转为分析、整理材料。要求把这些经验材料进行总结和概括，使之系统化。但是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和概括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就必须依靠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深刻地全面地认识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但是，自然科学中传统观念仍然束缚和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时，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由于受到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的影响，不但不能对自然科学新成就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概括，而且不知不觉地导致唯心主义，成为诸如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等错误哲学思潮的信奉者。

恩格斯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正在反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

着“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用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去解决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就必然会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有辩证法，“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②同时，只有辩证法，也才能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

恩格斯接着考察了19世纪科学史上的几次重大成就和哲学史之间的关系之后发现，许多近代自然科学新的理论几乎都能够在过去的哲学中找到它的原理，从而阐明了哲学史上的辩证观点对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例如，从古希腊的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思想中可以找到近代道尔顿原子论的思想渊源；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里可以看到近代热之唯动说的雏形。恩格斯还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家不重视思维发展史，不熟悉哲学史，出现了这样被动的局面：不少“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③并且还成为非常时髦的东西流行。这种情况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学习辩证法，熟悉历史上的辩证观点，对于自然科学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还展望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景，认为自然科学家如果不通过有效途径从形而上学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将日益不能适应自然科学本身的迅速发展，在理论上必然要产生危机，最后陷入不可知论泥坑。恩格斯还分析了从形而上学复归到辩证的思维的途径，指出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自发地达到，这条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另一条是通过学习辩证哲学自觉地达到，只有这条道路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他说：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

“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①他认为，在希腊哲学中朴素、直观的辩证思维，包含着后来自然科学的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它对自然界整体和对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认识，比形而上学观点高明得多，而黑格尔的哲学，由于它拥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所以只要自然科学家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就能够从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中“翻译”出合理的辩证法。因此，他建议自然科学家学习希腊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指出，如果自然科学家愿意研究和学习希腊哲学和黑格尔哲学这两种形态的辩证哲学，那么，从形而上学思维复归到辩证思维的过程就会大大缩短。

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家既要进行科学研究，就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他们中许多人虽然想竭力摆脱哲学，但是又不得不从各种未经批判过的旧观念中吸取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②因此，问题不在于自然科学家是否愿意接受哲学的支配，而只是在于：接受那种哲学的支配。他们是让那种最坏的哲学支配呢？还是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辩证思维的指导呢？恩格斯强调指出，当自然科学家在进行理论思维时，实现从形而上学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复归。他批判了一些自然科学家轻视哲学的错误倾向，并且强调指出，轻视哲学，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2.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总结和概括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特别是从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阐明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思维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3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3页。

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且着重指出辩证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恩格斯的论述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阐述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关系。他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①由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天文学和力学最早发展起来，由于它们需要借助于数学，所以数学也随之得到了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②恩格斯着重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是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经典力学得到了充分发展，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化学也得到了发展。19世纪由于资产阶级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自然科学才冲破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迅速地发展起来。

恩格斯论述了自然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同生产的紧密联系，找到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领域的革命，使物理学有了新的突破，x射线、天然放射性、镭、电子的发现、 α 射线、 β 射线和 γ 射线的发现，使物理学从对宏观低速运动的研究进入微观高速运动的领域。这时期，普朗克提出了量子论，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本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综合性的学科，如数理逻辑、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由于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使生产技术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原子能发电、人造卫星等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当前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使社会生产发生了新的变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页。

革。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在最近十年里，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的数量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现在的时代是“知识爆炸”时代。每年全世界发表的科学论文就有四百多万篇。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规模巨大而且内容新颖，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交织在一起，学科门类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目前学科的分支已有1500多个，这些学科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叉，而又是彼此独立的群体。当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充分证明了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生产紧密联系的观点的正确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明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思维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指明了辩证思维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也阐明了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意义。他揭示了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和自然观演变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古代，没有精确的、完整的、有系统的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所形成的自然知识是和朴素的辩证法合在一起的。在近代，经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家束缚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中，因而严重地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唯物的同时又是辩证的思维方式才能促使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着重阐明了自然科学家学习辩证思维方式的重要性。他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①深刻地揭露了一些自然科学家由于忽视辩证法、从经验主义滑向唯灵论，从而走向了歧途。恩格斯指出：“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②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家虽然可以从研究自然科学中不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357页。

觉地复归到辩证思维，但只有自觉学习辩证法，从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中学习辩证的思维方式，才能更快、更有效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不仅阐明了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而且阐明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和范畴是认识自然界的方法论。恩格斯阐明了辩证的逻辑思维方法的基本原则：思维 and 存在一致的原则、抽象和具体统一的原则、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恩格斯还阐明了逻辑方法的辩证性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辩证判断的分类、假说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等等。揭示这些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辩证法规定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①，并“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②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第一次对自然界作了总体的系统论述，指出：“物理学和化学——都属于同一系统”，^③“现在愈来愈成为必要的自然科学的系统化，除了在现象本身的联系中是找不出来的”^④，把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相互转化的统一系统。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断科学的方法。这些以系统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即系统性原则、联系和发展的原则、最优化原则、有序性原则和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方法，即功能模拟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系统方法、模型化方法、最优化方法等等都是建立在辩证思维的基础上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4、599页。

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①，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一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形式支配。”^②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思维和自然科学家相互关系的论述对一百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巨大。现代自然科学是在恩格斯上述辩证思想指导下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在统治自然科学家们头脑的实际上已经不是17、18世纪那样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思维方式。当今一些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非常重视学习和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另外一些自然科学家虽然没有学习过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但是，实际上在整个时代思维方式指导下，也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思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

3.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不但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而且运用自然辩证法解决当时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在自然科学中运用辩证法的榜样。

第一，关于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的争论。17世纪以来，笛卡尔派和莱布尼兹派就机械运动的量度问题展开了争论。笛卡尔派认为，质量与速度的乘积（ mv ）是运动的量度，否定有其他的量度；莱布尼兹派认为，质量与速度的平方的乘积（ mv^2 ）是运动的量度。直到19世纪末这场争论没有结束。有些科学家继续坚持笛卡尔派或莱布尼兹派的观点，或者把两种量度的意义混淆起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详细地考察了科学史上这个难题，并且得出结论，“ mv 是以机械运动来量度的机械运动， $\frac{1}{2}mv^2$ 是以机械运动转化为一定量的其它形式的运动的能力来量度的机械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552页。

运动。”^①恩格斯把动量、动能、功这些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同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学说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了科学史上这个难题。

恩格斯的结论说明，当发生机械运动转移时，应当用 mv 来量度。当机械运动内部或机械运动与其它运动形式之间发生能量转化时，则应当用 $\frac{1}{2}mv^2$ 来量度。深刻地揭示了动量和动能这两个在性质上不同的物理概念的本质含义，即，动量 mv 和 $\frac{1}{2}mv^2$ 的区别在于 mv 的变化只能反映力在一段时间的持续作用，并不能充分反映机械运动的内部或机械运动与其它运动形式之间的能量转化过程。从 $FS = \frac{1}{2}mv_2^2 - \frac{1}{2}mv_1^2$ 公式中，可以看出功和动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功是从量的方面去看的运动形式的变化。这样就从数量方面把功和各种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恩格斯从“转化”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真正抓住了动量、动能和功这些物理学基本概念的本质。这是那些长期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力学范围内的科学家完全不能比拟的。

第二，关于阐明“地球——月亮”系统中，在潮汐摩擦条件下机械运动向其他运动形式转化问题。

1876年力学家汤姆生和台特合著的《自然哲学论》一书中，重新研究康德提出的潮汐假说。他们不仅看到了月球对地球的影响，也研究了地球对月球的影响；他们不仅揭示了月球引力对地球整体（包括地球的固体和全部的液体）起作用，阻碍着地球的自转。他们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潮汐假说。但是，他们认为地球自转变慢所消耗掉的动能全部转化为月球的位能，而没有看到其中一部分向其他运动形式的能量转化过程，因此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地月系统中所具有的动力学的能量（位能和动能）的总和不变。显然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是机械论。尤其是，汤姆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37页。

和台特在建立潮汐摩擦理论的时候，竟把自己的根据建立在地球完全是固体，因而不可能有潮汐摩擦发生的虚构的前提上，必然导致逻辑上的混乱。

恩格斯在1880年—1881年写了《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一文批判了汤姆生和台特的错误。恩格斯运用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理论全面分析了地球—月球系统中潮汐这个难题。恩格斯认为，摩擦和碰撞是动能借以转化为热能的两种基本形式，因此每当发生摩擦时，动能必然会消失并转化为一定形态的热能，而不是转化为动力学意义上的位能，这个转化过程的特点是“不可逆的”。同样，在潮汐摩擦的情况下，地球自转逐渐变慢所消耗掉的动能，必然是一部分转化为月球的位能，使月球离开地球更远，而另一部分则转化为热辐射到宇宙太空中去，因此，地球—月球系统的机械能是不守恒的。这样，恩格斯运用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原理正确地解决了19世纪末期关于地球自转不均匀性问题的难题。

另外，恩格斯还运用辩证法原理，对数学、热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和人类的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所表现出来的许多深刻思想，当今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恩格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自然科学发展趋势所做的分析和预测，已经为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所证实。

1. 在天文学中，恩格斯根据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和当时天文学中的材料，提出了衰亡了的太阳或恒星可以“死”而复活，能量的集中、物质运动的大循环等重要科学预言。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虽然已经过时了，但是恩格斯做出的结论正在被现代天文学证明着。现代天体演化学材料表明，在宇宙内，我

们的太阳系，还有无数恒星和类似银河系的巨大的恒星系统都是从温度很低的弥漫星云发展而来的。由于星云的引力收缩顺次形成红外星、红星、红巨星（主序星阶段——如我们的太阳系）和趋于灭亡的白矮星（老年星）、中子星（已死的天体）。恩格斯指出银河系中存在着熄灭了的太阳，并且指出死灭的太阳系将以另一种形式在宇宙中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开始宇宙中天体有生有灭，有灭有生的无限循环的另一个阶段。现代天文学已经观测到熄灭了的太阳系的存在，并用光谱分析测定了恒星的年龄是多种多样的，有小到几万、几千万光年的，也有大到一百亿光年以上的。这有力地证明了有无限个宇宙同时存在，而无限的宇宙中各个天体也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的。现代天文学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表明，我们今天能观测到的宇宙的大小为 100 亿光年，它是“希克斯场”（四种作用力的统一场）逐步膨胀、爆炸而形成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宇宙也是有生有灭的。

2. 在物理学中，恩格斯预示了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在《自然辩证法》中他认为，相互作用也是运动：“……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又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了。”^① 恩格斯曾预言，相互作用在未来科学中也应同时起着事物的一种独特的真正的终极原因的作用。^② 现代物理学正是从运动和相互作用在物理认识史中的相互关系出发，才注意研究物理运动的四种相互作用，除了宏观低速运动的万有引力作用以外，还存在着电磁作用，高能物理学中粒子运动的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

由于运用以运动概念为基础的量子场论，可以“理解正在受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9、574页。

到观察的所谓基本粒子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它们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①。最近20年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已把研究和实验的中心转移到研究和描述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并把相互作用范畴作为解释亚核界的基准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物理学家提出把四种作用力统一起来，这就是统一场论。现在发现一种叫“希克斯场”的新作用力场把四种作用力统一起来。“希克斯场”的大小为 10^{-34} 厘米，被称之为“渺观”。这样恩格斯提出的相互作用范畴已经成为现代物理学的重要范畴，作为现代物理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范畴。

在物理学中，恩格斯于1882年提出了电子存在的预言。他说：“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象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求。”^②这表明，恩格斯不但肯定了电子的存在，而且指出电子是当时电学研究的中心，沿着这个中心研究下去，就会给电学理论带来突破，并给它奠定巩固的基础。1897年汤姆逊发现了电子，完全证实了恩格斯关于电子存在的预言，同时也证实了恩格斯关于电学理论发展的推测，即电学正是由于围绕电子的中心研究，从而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

3. 在化学中，恩格斯提出了原子可分割性的预言。19世纪初道尔顿建立了原子论，化学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原子和化学元素，已经达到这样的限度：它用自己的方法不可能从原子中继续分割出更小的实物粒子。因此，包括道尔顿在内的许多科学家认为，原子是用任何方法都不能分割的最后的物质粒子，这是一种机械论观点。与此相反，恩格斯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原子具有复杂成分。”^③现代自然科学中电子及各种基本粒子的发现，完全证实

① 施维格：《相对论性的量子论》，《物理学成就》第86卷第4期，第5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54、614页。

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恩格斯认为，物质既是可分的，又是不可分的；既是连续的，又是不连续的。他预见到物质粒子都是以不同的次序无限小的数学的模拟量存在。恩格斯的预言说明了物质的层次性。现代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的理论证实了恩格斯关于原子复杂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观点。现代原子论表明了基本粒子具有微粒和波动双重性质，这就证明了物质粒子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恩格斯还详细地阐述了非生物界吸引和排斥统一的物质观；指出了没有静止质量的这种物质存在的可能性；对“力”和“能”的概念作了科学的阐述。现代物理学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已证实了恩格斯这些科学预言的正确性。

4. 在生物学中，恩格斯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①恩格斯关于生命的定义揭示了生命的本质，是对生命进行的哲学总结。现代生物化学发展提供的新材料证实了恩格斯所揭示的生命本质的正确性。现代生物学认为，以蛋白质和核酸为基本成分的蛋白体是决定生命活动的最主要表现的物质。恩格斯认为，蛋白体的自我更新是在它所固有的特殊矛盾——同化和异化的对立运动中进行的，现代生物化学的成果告诉我们，有机体内的蛋白质，核酸是处在不断自我更新的动态平衡之中，蛋白质和核酸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恩格斯指出，应当揭示蛋白质的化学成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已经弄清楚了蛋白质和核酸的化学成分，它们都是高度特异性的大分子化合物，这就是说，生命物质也是物质的运动形式。

恩格斯曾经科学地预言，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制造蛋白体成功了，那么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和实行新陈代谢。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40页。

的预言为揭示生命的起源指出了正确方向。最近30多年来,人工合成生命物质的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展。比如1965年我国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1967年国外有人合成了5500多个核苷酸的噬菌体 $\phi\times 174$ 的DNA;1968年合成了3000多个核苷酸的噬菌体Q₂的RNA;1970年美国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RNA的基因;1973年合成了大肠杆菌酪氨酸转移RNA的基因;1979年我国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由41个核苷酸组成的核糖核酸半分子,1981年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具有与天然分子相同化学结构和完整生物活性的酵母丙氨酸转移RNA。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正日益接近于解决人工制造蛋白体的问题。恩格斯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实现。

5.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根据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原理,提出了在各门学科的衔接点上必然会产生新的边缘科学的预言。19世纪末期在考察电火花对化学过程的影响时,物理学家宣称这是化学上的事情,而化学家却宣称这是物理学上的事情。恩格斯对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不重视电化学问题的研究,明确地提出了边缘科学的发展问题。他指出:“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个地方可以期望取得最大的成果。”^①1885—1887年阿罗尼乌斯建立了电离理论,这个理论的重要概念——离子正好反映了电——化学的联系:阳离子带正电,阴离子带负电。阿罗尼乌斯的电离理论证实了恩格斯预言的正确性。又如,恩格斯还提出了在化学和生物学之间会产生一门新的边缘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可望人工合成生命的预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在化学和生物学以及物理学的衔接点上不仅产生了生物化学、生物有机化学、生物物理学以及分子生物学,而且在这些学科的指导下,成功地实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越来越接近解决人工合成生命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5—636页。

一难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高度分化，学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又高度综合，出现了整体化的趋势。20世纪4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了一些不是专门研究某个特定的运动形式，而是研究一切运动形式中共同的属性的横断科学或横向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这些横断科学或横向科学的出现，是同各种不同学科之间知识的移植和概念、方法的交流分不开的。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某一特定整体性问题为对象的、涉及许多学科的所谓整体性科学，如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科学学和管理科学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这里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①这种“相互补偿”就是指的各种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结合、相互渗透问题。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已经逐渐把社会科学纳入了自己的轨道，并对社会科学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出现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现在任何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社会科学的帮助。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正在同时渗入技术科学之中，使技术科学成为这两大科学门类的联结点。因此，当前世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但为自然科学家而且也为社会科学家所重视。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非常重视和关心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其是恩格斯对此进行了长时期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的体系，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部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系统地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成就，深刻地批判了自然科学中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科学地论证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因此，《自然辩证法》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某些自然科学具体材料和一些个别结论，需要根据自然科学新材料加以必要的修正。但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仍然是正确的，它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天，自然科学家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仍然是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哲学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晚年的景况不同，但他们不知疲倦地“为世界而工作”的精神是相同的。两位巨人，直到他们心脏停止跳动以前，仍在注视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钻研实践和科学提供的新经验、新材料，探索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道路，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交替时期，对于各种形式的原始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本质和趋势，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手稿，数十年来鲜为人知，更谈不上研究，直到本世纪70年代，由于这些“笔记”^①的公布于世，西方学者、各色各样的“马克思学”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领域里，又开拓了令人注目的新天地。这样，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引起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成熟的）马克思”的争论，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一些西方学者不满足于用青年马克思去反对老年马克思。他们错误地认为，在马克思的最后十年，特别是逝世前的最后三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新的转轨。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中，虽然年事已高，却以顽强

^① 关于马克思晚年（1879—1882）的笔记命名意见不一。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出版《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西方一些学者多沿用《民族学笔记》或《人类学笔记》，苏联学者一般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也有称《民族学笔记》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称《古代社会史笔记》，本书编者采用全集中文版的名称。

拚搏的精神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他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诞生后四十多年的战斗经验，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外敌人，继续在各个领域里，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生活和战斗的12年，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12年，由于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活动是在两个世纪，即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交替的前夕，所以他觉察了新世纪来临的许多征兆，并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新现象，从理论上进行了探索、研究，并且做出了新的概括和初步总结。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其宝贵的贡献。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制造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特别对恩格斯晚年的理论贡献捏造许多谎言：诬蔑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了，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僵化了等等。其实，从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正如梅林指出的恩格斯历史活动的重心正在他的老年，“他逝世的时候与其说是幸福而内容丰富的生命的终结，毋宁说是顶峰。”^①

第一节 马克思晚年的笔记

马克思晚年虽然生活条件艰苦，健康状况也逐渐恶化，仍然保持着对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酷爱科学，密切注视着新的科学成果，他博览新书，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这些笔记中凝结着马克思的理论思维的结晶，闪耀着他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成就的思想火花。深入研究这项笔记中的丰富内容，理解这些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它的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中吸取思想力量，是一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任务。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版，第293页。

一、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和趋向

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兴趣十分广泛，他最关注的是继续撰写《资本论》。他在继续撰写《资本论》过程中，结合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资本主义各国新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深化他曾经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准备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研究工作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把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俄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上。马克思在研究和撰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注意的重点是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把它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的对象。他晚年却搜集了大量的俄国的和美国的资料。1881年马克思曾开列了一份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书单中就有一百二十种以上，而这个书单还不包括他曾经使用过的资料。马克思特别重视研究有关俄国改革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料汇编、专题论著式研究性著作，并作了大量笔记。马克思写的《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了他所研究的关于俄国的资料和文献。

马克思收集了有关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资料，研究了美国大工业的发展。他阅读的资料中有美国出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关于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纺织工业和童工等方面的情况。马克思摘记中还记下了大股份公司的形成过程，以及万德比尔特、古耳德、洛克菲勒这些金融大王和工业巨头的发家史。

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他非常警觉地观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新变动。在1879年和1880年之间，马克思批评了德国教授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揭露了讲坛社会主义者约翰·卡贝·洛贝尔图斯的理论的虚伪性。马克思指出，瓦格纳对政治经济现象的态度是唯心主义的，他否认经济规律，颠倒了客观规律与范畴的关系，把经济规律看作是法律范畴的演变的反映，这是采用了洛贝尔图斯的概念和方法。马克思强

调从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的辩证分析方法，是和瓦格纳采用的“把概念并在一起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指出：“洛贝尔图斯把‘逻辑的’概念和‘历史的’概念对立起来，就完全暴露出他的肤浅”。^①马克思还批判了瓦格纳宣扬庸俗的进化论，否定革命的作用，企图永远保存资本主义制度，鼓吹改革税收制度和工人福利保险等改良主义措施。瓦格纳吹捧俾斯麦警察官僚国家，妄图继续保持容克地主占有制。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瓦格纳们“一只脚仍然站在旧的垃圾上”，他们一伙是“从地主的农奴变成了国家的，俗称政府的农奴。”^②

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密切关注自然科学发展的每一新成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总是积极的做出评价。例如1882年，在慕尼黑电气技术展览会上，展出了法国工程师马赛尔·德普勒在米斯巴赫和慕尼黑之间架设的远距离输电线路，身患重病的马克思即请龙格把一本关于德普勒在电能远距离送电方面的试验报告寄给他，同时在1882年11月2日写信告诉恩格斯注意这一很有前途的发明，并请对这一科学技术的成就的意义作出评价。

马克思在数学领域里也有独到的发现，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③在马克思的晚年，完成了《数学手稿》中一些重要的数学论文，19世纪80年代初写的《论导函数概念》、《论微积分》的手稿中标明“给将军”、“给弗雷德”就是证明。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中，曾有一个他自己做的简要书目索引。从索引中我们了解到马克思为了研究数学、仔细地研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4—4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了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泰勒、马克劳林、达兰贝尔和拉格朗日等人的著作。

《数学手稿》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一生重视科学研究、知识渊博，而且它是研究高等数学辩证法问题的不朽著作。马克思研究数学区别于其他数学家的独具特色的贡献，就在于他把辩证法应用于微积分学，引用微积分学证明辩证法存在于现实之中，用辩证法揭示微分概念及其运算的辩证内容；力求揭示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同初等数学的辩证关系，并创造性地阐述了这些概念。

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研究了微积分的发展史，他不仅研究探讨了微积分学从牛顿、莱布尼茨到拉格朗日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辩证地历史地研究了每一发展阶段特征及其内在规律。对各阶段不同代表人物的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作出了科学的评价，既肯定了他们在微分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又指出了他们的不足，批评了其中某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表现。马克思强调指出，只有科学思维发展到高级阶段，即真正的辩证阶段，才能揭示现象的实质。这无疑是从17世纪以来经历了两百多年微积分学发展史第一次运用唯物辩证法所作出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晚年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研究数学的情景，恩格斯回忆道：“1870年以后，又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物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①还在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就阅读过《数学手稿》的一些论文。恩格斯在1881年的信中曾向马克思祝贺。他说：“我终于鼓起勇气，没用参考书便研究了你的数学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8页。

稿，我高兴地看到，我用不着其他书籍。为此我向你祝贺。事情是这样清楚，真是奇怪，为什么数学家们要那样顽固地坚持把它搞得神秘莫测，不过这是那些先生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造成的。”^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曾经想出版《数学手稿》，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以浓厚的兴趣研究世界史，是马克思晚年科学研究的第四个主要特点。马克思晚年打算总结世界历史的发展，深入研究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而加深和不断完善对整个历史过程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1881年到1882年，马克思写了四本关于世界史的札记，其中内容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7世纪，作了批判性的评述。这些手稿约有一百零五个印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的手稿，并加上了《编年大事记》的标题。这份手稿在评价事件和人物时，表达了马克思对各种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编年大事记》常常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剖析各种政治事件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既研究和探索历史过程的总趋势，也注意研究各个国家历史过程的特殊性，运用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辩证法去把握事件的规律性。《编年大事记》详细地记载了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事实，反映了马克思对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深切的同情。他看出从14世纪开始的欧洲各国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在法国和英国……大封建主和骑士阶层之间内战不已，市民起义反对大封建主和骑士，遭受压迫的下层人民无比愤怒。”^②马克思非常重视农民起义，研究了意大利多耳契诺领导的农民起义，法国的扎克雷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和杰克·凯德起义，捷克的胡斯运动，以及德国的1524—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农民运动的局限性，但马克思强调农民起义虽然屡遭失败，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在手稿中马克思积极评价了人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6卷，第41页。

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他高度赞扬了百年战争期间鼓舞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法国农村姑娘贞德。

马克思非常关心殖民地人民的命运和他们的解放运动。他认真地研究了卡尔顿关于爱尔兰农民贫困状况的根源。1880——1881年，他对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爱尔兰的土地关系开始重新研究。他对英国殖民地印度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十分关切，指出，印度人民遭受的殖民地掠夺极其严重，英国人以租税等各种形式，并且不付任何代价的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超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造成居民极端贫困，饥荒连年发生，

“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①马克思非常愤怒地指责殖民者对财富榨取，“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②

重视对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是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第五个明显特点。

原始社会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早在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初期，就形成了关于原始社会的基本理论，原始社会是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制度。它与低下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适应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形成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形态。他们说：“第一种所有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务农生活的。”^③由于当时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局限性，因此这里的“部落所有制”概念还是比较广泛的，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某些特征的假设性质。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加的注中指出的，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

几乎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社，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日耳曼部落的历史发展所由起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所以马克思研究和完善他的社会发展的理论是一个过程，而“部落所有制”只是原始社会的最早提法。

5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东方问题，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农村公社问题，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问题，马克思对比了欧洲社会和亚洲社会的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原始所有制的提法有了进一步变化。他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把原始所有制形式分为三种形式，即“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原有关系的再生产。对劳动条件，对同部落的人等等的关系是客观的存在。所以，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这些所有制形式还不是最原始的形式，它们“已经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人们的意识里都是一个产生出来的东西”。^①后来马克思认为，它们“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②它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缺乏联系，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③到了1859年，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阶段，已经有了结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亚细亚的”时代，是和“原始公社”时代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到了70年代，马克思由于研究各个民族的土地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对公社所有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不仅深入研究亚洲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历史，而且还深入研究欧洲、非洲和美洲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历史。马克思这时更加相信“原始公社”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德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格·毛勒对欧洲马尔克制度做了考察，证明欧洲各国的古代社会也曾经存在过公有制，这种土地公有制的遗迹在当时西欧、北欧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欧洲各国土地私有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毛勒写了许多关于马尔克制度的历史著作。1876年，马克思详细地摘录了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德国马尔克制度史》以及其他著作。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毛勒的著作评价很高。他说：“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由民、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②马克思还对在德国发现马尔克村社制度非常高兴。他说：“恰好在我的故乡，即在洪斯吕克，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当律师的父亲还和我谈到过这件事哩！”^③

马克思生前的最后几年，从1879——1882年间阅读并详细摘录的五本笔记，它们是：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52页。

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这五个笔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表示了这些笔记并不是马克思信手摘抄的材料，而是经过精心挑选、改造和补充，用以丰富唯物史观，确证、充实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论断，还表明了马克思许多宝贵的思想和一些问题的构想及其研究的趋势。结合马克思从50年代以来所关心的东方问题，以及他晚年通信，特别是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回信的三个草稿内容。看出马克思晚年至为关心东方农村公社的演变及其前途，特别是俄国公社的命运。马克思认为，这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他指出，如果有了适宜的内部环境、公社不再受专制国家的压迫和半农奴制的剥削，当然这在俄国必须经过人民革命，这样，保存下来的公社形式，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起点。

从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即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在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一般过程，如何在非欧地区，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尚属非资本主义地区和不发达的农民占多数的地区及社会中的特殊表现，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农民问题，工农联盟问题，是欧洲1848，1871年两次革命经验所提出的问题。晚期笔记大量涉及农民、殖民地东方农民和他们在未来的革命改造中的历史作用。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晚年，在探索一种不同于宗主国无产阶级的殖民地农民革命的一种新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在研究工作中呈现的新趋势。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除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由恩格斯利用撰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引起了世人的注目。其它笔记，直到本世纪70年代很少为人们所研究。

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遗产，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同特点愈来愈明显，探索不同的革命道路，揭示其发展规

律，愈来愈引起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关切和思考。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晚期笔记，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新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

二、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展现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它的内容颇为广泛而又连贯，从中可以提出各种研究的课题。可以说它是马克思晚年拟写一部巨大的哲学历史著作的科学资料的准备和计划。它蕴含着丰富的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的探索和剖析。这里仅提出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公社制度的历史命运

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土地公社占有制，其解体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有重大的科学价值。1879年出版后作者赠给马克思，并题词《赠给卡尔·马克思——以示友好和敬意》。马克思从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对这本书作了摘要、摘录、评论，有的地方并标出了重点。马克思摘录的篇幅超过了该书的一半。这说明马克思对此书的重视，而且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晚年对农村公社问题的观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柯瓦列夫斯基对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秘鲁、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美、亚、非三大洲的材料，研究和对比了作为原始社会痕迹的公社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它们的命运，及其发展的趋势。这些材料使马克思能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来研究原始公社现象，它不仅是欧洲某些地区的现象，而是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亚、非、拉美广大世界存在。从时间上说，它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一漫长的演变及其发展过程得到了研究。

马克思在研究柯瓦列夫斯基所广泛搜集的资料时，对各种类型的公社进行了比较研究，丰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内涵。马克思经过研究，明确提出把各种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指

出，正像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即一系列“原生的”、“再次生的”类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古代类型的公社都在各洲消亡了，当时留在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农村公社，往往是原始公社的最后阶段，它们较之古代类型的公社有些什么特征呢？

第一，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社员的血缘关系上的；农村公社冲破了这种狭隘的联系，并在扩大的范围内保持公社同公社的接触。

第二，远在农村公社出现以前，公有的房屋曾是各种形式的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在农村公社内，房屋及园地，已经是私有财产。

第三，虽然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村公社各社员之间进行重分，每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进行分配。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农村公社与原始的类型公社不同，它既有公有制的因素，又有私有制因素。马克思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二重性”概念的提出，说明了在社会发展的高一阶段中，既包括低级阶段的因素，又生长新的因素，因而揭示了公社内部矛盾，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它反映了公社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必然演变。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公有制及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私有制的出现，如房屋、小块耕地及其产品归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马克思同时又指出，“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因为私有制因素的增长，起着破坏公社原有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害冲

突，造成私人占有森林、牧场、荒地并把它变为私有财产。由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二重性”特点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公社的命运。马克思强调指出，由于农村公社的内在的“二重性”使它有两种发展的趋势，一种趋势是私有制因素加强，私有制原则在公社中战胜公有制原则，导致公社制度的解体；另一种趋势是保存集体所有制因素，并且战胜私有制原则，使公社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机体，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长久地保存下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①

马克思的“笔记”中，详细摘录的公社在各大洲的演变情况及其瓦解的材料，是马克思对公社作理论分析的大量实际的材料依据。从“笔记”中我们看到，私有制因素的发展固然是公社内部财产支配上不平等的起因，导致公社逐渐瓦解。但“笔记”中特别注意揭露欧洲列强对亚洲、拉美和非洲土著居民、对公社制度所施行的殖民主义奴役和掠夺，就是说，受奴役的各族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是资本主义强制干预的结果。例如在美洲西班牙领地上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剥削；英国人为了给他们的工业设置销售市场而对印度农村中农业和手工业的传统结合进行有目的破坏；法国为了在阿尔及利亚安置移民而对阿拉伯人部落的土地实行强制转让。殖民主义者只给宗主国的统治阶级和本地的商业带来利益。马克思尖锐指出英国人、法国人在殖民地利用法律和国税进行掠夺活动。他说：“英国政府利用（已由法律批准的）‘抵押’和‘出让’，极力在**印度西北各省和旁遮普**瓦解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彻底剥夺他们，使公社土地变成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并且指出在“阿尔及利亚存在高利贷的类似活动，在那里，国税重但是他们手中的进攻武器。”^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24页。

柯瓦列夫斯基的材料表明：高利贷者、富农以及本地的投机商、暴发户，这些人与殖民主义者合作，成为从内部破坏公社机体的蛀虫。这些人形成殖民主义者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破坏公社内部力量抵抗活动，人为地加速公社的破坏、促使农民群众陷入困境。农民的贫困、饥荒、殖民者的推波助澜，加速私有土地制的发展，为公社土地所有制过渡到本地高利贷者中间商人以及欧洲来的冒险家、投机商和土地占有者开了方便之门。这样，公社团体的瓦解过程，并不以确立小农所有制为限，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土地所有制。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所以马克思针对这种现象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① 马克思引用霍布斯这一警句，确切地描述了殖民地、落后国家人民在公社瓦解之后悲惨结局。这种命运的结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导致破产的殖民地人民失掉“反抗的最后力量”，而内部纠纷却成了土著人民政治生活的唯一表现。虽然马克思的“笔记”记录的是公社的历史资料，但是一百年来外国殖民主义者，破坏土著人民农村公社组织的野蛮行为，迫使他们反抗、斗争、失败和再斗争的血泪史、不是再现于亚、非、拉某些落后国家，不发达国家的现实吗？！历史从正反面证明了马克思当年反映在“笔记”中光辉思想的实践意义。

这些古老的社会制度的痕迹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以及当今的世界上仍然保留着，实质上是落后地区的土著人民的命运问题，它们能否在人类解放的事业中找到新的出路呢？马克思在讨论俄国公社问题时，从理论上提出寄希望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寄希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环境条件。

（二）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原始公社形态的可能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04页

景

马克思完成了柯瓦列夫斯基著作阅读、摘要之后不久，于1881年2月18日在伦敦收到俄国著名的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从日内瓦给他的信（2月16日写的），信中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并且问马克思关于《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否适合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为俄国与西欧各国有所不同，在俄国还保存有农村公社，并且是当时俄国农村居民最大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信中谈到俄国革命者中间关于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情况，她请求马克思，“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①

马克思为了给查苏利奇复信，在1881年2月底至3月初三个星期里曾经起了四个草稿。把这四封信稿综合起来研究，我们从中领悟到信中凝结了马克思在最后十年间花了大量劳动读书、研究原始公社问题的成果和思想结晶。所以必须把这四封信稿和马克思以数万页的读书笔记结合起来研究。同时，它也是马克思晚年研究俄国问题，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不发达国家在获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给以支持的条件下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的这几封信稿所包含的思想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在复信中，首先强调《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理论，是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得出的原理。这一理论指明了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所讨论的问题，“在俄国农民中，则是把它们公有制变为私有制。”^②所以，马克思说：“在‘资本论’中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7、268页。

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①而是必须从俄国的实际条件出发。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理论变成“万能钥匙”，似乎人们可以用它回答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发展命运，而不问其历史条件和环境如何。为了正确回答俄国公社的命运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②对于英国统治者在印度摧残农村公社的结局，资产阶级学者往往对此加以歪曲，马克思告诫说：“我们在阅读资产阶级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善意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③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末，大概除了亨利·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④马克思在这里反复强调的关键之点是，殖民地农村公社的命运并不是俄国“历史的必然性”一定赋予俄国农村公社的遭遇。这就要分析具体环境了。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几封信稿中，根据他自己掌握的材料对俄国农村公社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条件作了研究。马克思当时预言，“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⑤马克思把俄国公社和西欧作了对比研究，他指出，并不是所有原始公社都是按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而它们的发展阶段和结局，也同样没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431、433、44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有固定的历史模式。古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在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时已不复存在了，而蜕变出西欧的封建制度。而在俄国，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俄国按照资本主义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而公社将会迅速瓦解，可是马克思又指出：“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① 马克思指出的俄国的条件是非常特殊的，在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先例，一旦发生了革命，那么，土地公有制社会赋予它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并存，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所以马克思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② 并且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③ 当然，从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包括三封草稿，还看不出他所说的俄国革命是什么类型的革命，可是到了1882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应俄国的彼·拉甫罗夫的要求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写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们分析了从1848—1849年欧洲革命以来俄国形势的变化，指出，俄国已从欧洲反动堡垒变成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因此，“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④

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稿，其根本精神在于说明和论证不能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441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326页。

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社会发展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然后又把这一理论变成“万能的钥匙”，一切民族、不论其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而且马克思从理论上论证了西欧以外的公社历史演变的道路的可能性。它们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向。马克思的根本精神是说明，这种发展道路与西欧道路的不同，是历史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绝没有超条件的“历史必然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走了自己的路。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运动已是欧洲的先进队伍的结论，被证实了。列宁在俄国革命胜利后，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俄国革命的某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俄国革命显得有利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东西。”^①列宁还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大战把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民族卷进了世界历史，“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非资本主义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②

马克思的手稿、笔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并未失去其理论的实践的意义。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公社的演变趋向，原则上适宜于亚、非、拉一些落后民族仍然存在的传统的土地公社演变的趋向。其基本精神是指明了各民族按不同方式发展自己的道路。

（三）关于氏族部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从中吸取极其珍贵的资料。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于1877年在伦敦出版。柯瓦列夫斯基把这本书送给了马克思。从1880年10月到1881年2月，马克思仔细阅读并详细摘录了《古代社会》一书。后来恩格斯曾写信给考茨

①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721页。

基，指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观点”有“特殊的重要”。因为摩尔根通过史前史的资料，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①

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著作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在《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摘录了书中有科学价值的篇章，剔除了书中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提法和判断。明显的一点是马克思改造了原书的体系、结构。例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结构，是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包括政府、国家的形式）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而马克思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的结构则迥然不同，它是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家庭形式的演变再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这样，不仅使摩尔根的体系更富有连贯性、逻辑性，而且纠正了摩尔根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还用科学材料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国家的产生是在私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结果。

马克思非常重视摩尔根对氏族部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分析资料。摩尔根根据他在印第安人中所搜集的材料，揭示了氏族制度的社会功能和本质，确认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本细胞，并且认为一切文明民族的最初氏族部落是母权制。他确证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地是从母系氏族演变到父系氏族，从母权制演变到父权制。总之，摩尔根证明，原始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氏族。摩尔根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氏族制度的说明，不能从思想关系中，诸如法律关系或宗教关系中去寻找，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尤其在私有制形成的过程中，氏族逐步向国家转化的思想引起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在摘要中指出：“最古老的组织是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氏族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氏族社会中，管理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4页。

关和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某个民族或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这些关系是**纯粹人身性质**的。此后，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在这里，管理机关和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地域，例如对**乡、区和国**的关系来体现的。”^①

民族组织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都有发现；它一直保持到资本主义文明开始直到现时代。

摩尔根根据大量实际资料，确认家庭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并确定了婚姻和家庭演变的顺序和形式，从而简略地描绘出了一幅婚姻和家庭的发展史图画。

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发现评价很高。指出：“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不同于“欧洲的学者”，因为“欧洲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②与此同时，马克思在摘录中对摩尔根一些论点作了补充、纠正，甚至从其他古代作家中引证许多材料加以补充和进一步证明、论证。马克思纠正了摩尔根的几个论点：摩尔根认为火的发明是较次要的，而马克思指出：“与此相反一切与取火有关的东西都是主要的发明！”^③摩尔根还认为人类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可以说达到了**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④马克思断然给了否定。其他如摩尔根认为公社的筑篱圈地本身就是私有制存在的标志等。马克思认为是错误的。马克思对摩尔根提出的观点，提供的材料，根据唯物史观作了新的概括和总结。摩尔根认为家庭是能动的，亲属制度是被动的，那么，只有家庭的变化才能引起亲属制度的变化。马克思对此现象作了更深刻的理论概括，指出这点和上层建筑其他现象一样，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说：“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⑤关于专偶制家庭的起源和性质，形式以及和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都作了深刻的剖析，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05、510、379、3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54页。

并且阐明了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原因和意义，补充了其他民族中父权制大家庭的例证。马克思还援引了一些史料以补充、论证摩尔根的论点，例如在评述到19世纪才被发现的土著民族中还保留集体所有制残余的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南方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的公社作为证明。马克思还就罗马社会中私有制的产生、氏族的瓦解以及此后和国家的形成作了许多补充论述，并且批判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格罗特等人对历史的歪曲。

马克思曾经打算运用他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写一部阐述摩尔根研究成果的著作，很可惜，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就与世长辞了。后来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的意愿，写出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用唯物史观系统论述了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走向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

（四）批判资产阶级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偏见和超阶级的国家观

马克思对梅恩和伯拉克著作的摘记一般是批评性的评论。

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出版于1875年。马克思对该书的笔记写于1881年4—6月，是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以后写的。他在批评梅恩的观点时，反映了他研究摩尔根著作以后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梅恩根本不理解氏族的地位和作用。梅恩错误地认为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不是氏族，而是家长制的联合家庭，他特别“把在印度存在的那种联合家庭错误地当作了最早的形式。”^①相反，马克思指出，印度的联合家庭形式“它带有很次要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它在农村公社之外，尤其在城市里处于统治地位！”^②梅恩在这里和其他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一样，颂扬当时印度的父权制大家庭，是一种反科学的普遍现象。马克思对梅恩用现代观点看古代社会制度极其愤怒，指责他是反科学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81—582页。

历史主义“道貌岸然的英国骗子”^①。马克思并指出梅恩举出现代资产阶级制度以对抗公社习俗是“厚颜无耻地揣测”^②。类似的例子很多。

马克思还揭露了梅恩从法律上为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主义罪行辩护。他揭露爱尔兰的宗教和司法机构，即布雷亨（指爱尔兰职业世袭法学家阶级）们法学家和基督教会，以及印度的婆罗门僧侣所起的作用，他们支持自由公社成员奴役群众，并建立特权的统治。而布雷亨法表明了非显贵的自由民能够成为首领的道路，同时，他所达到的这种地位也就是‘对一群依附者的管辖’^③。马克思评论道：“这些家伙后来就成了特殊阶级的成员。”^④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批评了殖民统治的法律实质。指出：

“实质上爱尔兰法律更接近蛮族法律，而不是接近英国的法律。”^⑤在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那套法律的虚伪性及其抽象繁琐用以欺骗被奴役者。“请注意，这是僧侣法学家布雷亨划分的（指划分等级——引者），这一法律同所有古代僧侣著作（例如《摩奴》一样，充满了为首领、高等阶层等效劳，最后这一切又为教会效劳的虚构，此外，他们象各种法学家一样，可以随时提供虚构的分类。）”^⑥马克思在评论中反对梅恩抽象地超阶级的国家观。马克思对国家观点的描述非常深刻、精采。指出：“梅恩忽略了深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⑦马克思还尖锐地指出：国家是代表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所谓它的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国家最终都是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93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8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3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8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46页。

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也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前提。这是马克思继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之后对国家学说的集中论述。

马克思批评了梅恩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梅恩认为历史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精神。马克思指出：“但是这全部历史在梅恩那里都溶化到所谓‘道德因素’中去了”^①。而马克思则强调历史的决定因素首先是经济。

另外，在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的摘要中，马克思对拉伯克的观点多是持批判性的评论。他认为：“拉伯克同麦克伦南一样对基础，即存在于部落之内的氏族一点也不了解，尽管他也援引了某些事实”^②。这是马克思对拉伯克和当时的人类学家麦克伦南的总的评论。

马克思对拉伯克书中的摘要和评论，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以及宗教的形式。马克思批评了拉伯克的反历史主义态度和在早期家庭和婚姻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例如，他不仅对宗教任意分类，“按照拉伯克先生的看法神是头脑的编造。”他根本不懂宗教的真正起源。又如拉伯克援引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用资产阶级的框框把“群婚”和“淫婚”等同起来。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的解释，马克思批评拉伯克相信麦克伦南的胡言乱语，而为了把一些现象解释得合理而“搞实用主义！”^③

（五）反对把西欧发展的模式搬到东方社会

英国学者约·布·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曾经引起了马克思的重视。

菲尔曾在印度和锡兰任过法官，对当地的生活比较熟悉。他对19世纪的印度，特别是孟加拉作了资料翔实的调查，报导。菲尔的著作描述了孟加拉和锡兰农民的农业、村社和家庭的机制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62、6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63页。

况，也反映了他们同地主、高利贷者、政府捐税以及司法机关的关系。

马克思重视的是有关东方社会特别是东方公社问题。马克思作了详细的笔记，马克思在评论中批评菲尔把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封建概念运用到他的描述中，他把亚洲发展的概念套进欧洲历史的框架之中。对此，马克思指出，“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①马克思这一思想绝非偶然，显然在研究亚洲公社这一问题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应当区分欧洲农村公社和亚洲的农村公社，从而区分它们所属的社会形态，因为这两个地区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环境特点。马克思在研究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就曾反对他乱用“封建的”、“封建化”的概念。

马克思对菲尔和柯瓦列夫斯基的批评，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表明研究某一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应当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历史分析的态度。反对把社会发展的某种概念僵化、模式化，任意套进现实。马克思几十年中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坚持唯物史观，断然否定把“历史的必然性”变成历史哲学的套语，那么，在研究东方社会时也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态度。

这就是马克思潜心研究古代社会留给我们的方法论的教诲。

三、马克思晚年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由以上对“笔记”内容的简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晚期笔记是一个宝藏，尚需深入挖掘和开拓。晚期笔记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界碑。它表明马克思研究问题的重点转移。在70年代以前，马克思重点是研究资本主义起源、发展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时马克思注意的中心，或者说他研究问题的重点是关于英法德等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意识

^① 马克思：《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第16页。

形态，形成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完整理论。这一理论在实际方面的运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是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到了7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的进程有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大工业已有大规模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逐渐发展壮大。欧洲工人阶级既有二月革命的经验，又有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和掌握政权达两个月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过去作为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的俄国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美国都有了显著的变化。美国工农业的发展“以至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垄断地位。”^①至于俄国已从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变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预言：“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③随着革命的形势和中心向东方转移，以及亚洲、非洲、美洲社会尚保留着古代社会的遗迹的材料的公布，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牵动了他们的视线，把他们从重点研究西方（主要指西欧）社会的结构转向对东方社会的研究。1877年马克思写给俄国彼得堡《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信虽然是针对俄国知识分子中争论《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性是否适用于俄国的问题。而问题的实质却是以西欧为背景并根据它的实践材料创立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是否适合于全世界（包括东方的俄国）问题，就是说，提出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的历史规律与某些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特殊情况相结合，而揭示其特殊的发展的规律。这引起了马克思更加注意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前面已经讲到，在80年代初，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就俄国农村公社问题，请教马克思，涉及到俄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即在俄国当时条件下能否越过“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2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更加重视东方社会特殊因素的研究。与此同一时期，马克思研究了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和菲尔的民族学，人类学等一批著作，并做了详细的笔记、评论。

从马克思的晚期笔记的丰富评语中闪现的思想，可以看出，马克思试图研究未来东方社会主义革命改造过程中可能的途径，从笔记中接触到马克思晚年探索不同于西方社会或非欧社会的趋势的问题。

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就这些问题写出他续《资本论》之后又一本探索东方社会秘密的巨著而与世长辞了，他留下这份遗产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人，借以探索广大第三世界的历史和现状的一把钥匙。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转折的地位，它提出的新的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第二节 恩格斯探索资本主义辩证发展的新趋势， 制订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方针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整理、出版马克思毕生为之奋斗的《资本论》第二、三、四卷；独自担负起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订适应新情况下的战略策略；迎接马克思逝世后来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高峰。

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征兆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各种新版本。1883年，即马克思逝世的当年，就出版了第一卷第三版。恩格斯把马克思在法文版中的一些修订处收入正文中，并把马克思在

自己的《资本论》中所做的修订也改入正文中。1886年，恩格斯主持出版了《资本论》英文版。在这本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谓‘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①。到了1890年，恩格斯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四版。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活动，不仅保证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思想的传播，而且反击了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第一卷的攻击和歪曲。

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新版本和传播其思想只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工作中的很小部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工作，才是恩格斯的重点。他遵照马克思的遗愿，把自己晚年的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四卷上。

恩格斯采取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手稿。正如他在1883年5月给贝克尔的信中说的：“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②恩格斯在整理这些遗留的手稿中，克服种种困难，付出艰苦的劳动，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日以继夜地工作。恩格斯一再强调，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达马克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指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全按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8页。

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①恩格斯认为，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整理出原文，并公诸于世是他的崇高的职责。由于恩格斯的辛勤劳动、精心整理，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先后于188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9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出版之后，恩格斯开始准备整理《资本论》的历史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宣布：“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只要有可能，我就着手去编”^②但是疾病使恩格斯的夙愿未能实现。

恩格斯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出版工作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完成了马克思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使得马克思花费了四十年的心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趋向灭亡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完整的科学形态公诸于世，完成了由马克思开始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革命变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欢呼《资本论》的完满竣工，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不可摧毁的坚实基础，指明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二、三卷的过程中，采取了创造性的态度，他一方面强调要忠于马克思的手稿，另一方面他仔细地研究了《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的现象和过程。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趋向垄断的征兆，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探索，而且将其成果以不同的形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容。他对第三卷所作的各种增补和注释共有六十多处，其中多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中新现象的理论上的概括和辩证分析。《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里一段插话，表明了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成果。他指出：自从马克思写了关于股份公司的评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2页。

以来，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①并且指出，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它表现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这里，恩格斯看到了马克思没有看到的卡特尔、托拉斯这些所谓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等新现象，已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生产的新形式。恩格斯还以英国为例，指出，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部门，“竞争已为垄断所代替”。

恩格斯论述了资本主义许多征兆预示着由于卡特尔、托拉斯的形式，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加剧，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更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②恩格斯明确指出，由于世界市场上竞争大大加剧，生产能力日益提高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市场之间之矛盾也随之而加深，这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腐朽性的一面。根据这种变化的事实，恩格斯指出了两种征兆，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可见，垄断代替了竞争，迫使垄断企业用调节生产的办法来管理大企业。但是，生产资料的垄断并不能改变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也克服不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恩格斯从这些征兆的出现得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554页。

了革命的结论。他指出，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产阶级。实践证明，垄断资产阶级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调节”，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才能实行对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领导和调节。

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中，恩格斯关于交易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占地位的变化的评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结论。因为自从马克思在1865年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以来，情况已经发展变化了，交易所的作用日益增强。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就是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交换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为了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及其意义，恩格斯拟定了七点详细研究纲要，准备写出著作加以论述。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计划，就与世长辞了。在论“交易所”的七点纲要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论断。首先重点论述了交易所作用的变化过程，他认为，1865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当时它还是资本家们互相夺取他们积累的资本的地方，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普遍产生不道德影响的新证据。可是，从1866年危机以来，交易所作为有价证券市场的作用增加，剩余价值的积累以不断增加的速度进行，“以致在所有工业国，至少在英国，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已经不能在扩大他的营业方面全部用掉，英国的棉纺织业在1845年就已如此，此外，还有铁路投机，但是随着这种积累的增长，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这种人对营业上经常出现的紧张已感到厌烦，只想悠闲自在，或者只揽一点象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①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正在形成的金融寡头现象，指出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的某些特征已经显露出来。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9页。

次，恩格斯论述了股份公司这种企业形式，在工、商、银行以及农业中的推广，“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遭到这种命运。”^① 各行各业垄断组织的出现，增加了食利者和投机机构。最后，恩格斯指出了资本输出和瓜分殖民地问题。因为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它的结果就是开拓殖民地、瓜分世界，追逐高额利润。恩格斯揭露了一个事实，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

恩格斯在论“交易所”的七点纲要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向垄断转化的辩证法，这是他晚年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的概括，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成果，而且开拓了对帝国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基地。七点纲要是一个纲领性的研究大纲，如果结合恩格斯晚年的其他论著和信件，可以看出他晚年揭示资本主义转化的辩证法思想的来龙去脉。

在19世纪80年代末，恩格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问题，指出，保护关税是逐渐由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转变为阻碍它发展的因素，其结果使一些受保护的工业部门生产转变成垄断的征兆，其表现就是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了“瑞恩”和“托拉斯”，它们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垄断权。因此，恩格斯说：“宾夕法尼亚的石油生产变成垄断组织‘美孚石油公司’是完全合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过程。”^② 到19世纪90年代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辩证转化又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重要意义的新的理论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恩格斯强调，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27页。

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这里恩格斯以他独有的辩证观念和方法分析新的事实，指出，从单个的私人生产到股份公司的出现，同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变换了剥削的形式，而并没有改变其实质。在同一性质经济形式范围内出现的垄断组织，股份公司，则预示垄断阶段出现的征兆而已。至于说“无计划性也没有了”的论断，这是指支配和垄断工业部门的股份公司、调整它们的产业结构，等等。恩格斯晚年的许多论著：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文版和德文版第二版序言，以及《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美国的总统选举》等文中，都对垄断经济形成、发展的特点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卡特尔、托拉斯的出现，必将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外矛盾的尖锐对抗，在当时，资本主义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销售市场的攫取已接近完成，象“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①而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特别是当时晚起的年青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德国、尤其美国是发展速度较快，竭力想把英国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从而成了英国在市场上的敌手。恩格斯当时预言，一切条件都在变化，新世纪已经来临，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必将加剧，“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即20世纪初，发生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证实了恩格斯的辩证分析和预言。由于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不是帝国主义时代，他只能从实际出发就某些征兆作出初步的分析、概括，指出其发展趋势，还不可能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过程的完备理论。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种种变化，从而说明了他是如何善于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2页。

国主义时代的任务。”^①

二、坚持辩证法，制订无产阶级活动的新方针

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国际工人运动有了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欧美许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涌现出一批有威望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的愿望日益加强，建立新的国家组织的条件正在迅速形成。恩格斯对于新的国际组织，即第二国际，从酝酿、筹备到产生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实际上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顾问，他继续保持了马克思在世时就实行的用通信的方式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他的建议或指导性的意见，总是从各国本身的历史特点出发，帮助各国党在思想上的建设和组织上的巩固，帮助解决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克服各种错误倾向。恩格斯始终坚持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各国具体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反对把她变成适合一切场合的不变的公式。他在致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曾经分析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所犯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他们严重忽视了当地工人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和特点，不研究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水平，不适当地把理论强加于工人，结果脱离了群众。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②

在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动中，恩格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正当马克思主义者筹建第二国际时，以马隆和布鲁斯为首的法国可能派纠集了英国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4页。

的“社会民主联盟”、美国的“劳动骑士团”等组织，利用各国工人阶级要求增强团结的愿望，抢先筹建了新的国际组织，企图以此来控制国际工人运动。在这关键时刻，恩格斯为了粉碎可能派窃取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企图，就毫不迟疑地放下了其他工作，积极地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盖得、拉法格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可能派和工联主义进行了斗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反对可能派的斗争是过去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他强调，“问题主要在于：过去国际中的分裂和以前在海牙的斗争，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也是我大力进行工作的原因，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的让步”^①。在恩格斯指导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盖得、拉法格，以及克拉拉·蔡特金等著名的国际共运的活动家改变了态度，积极行动起来，与“可能派”划清了界限。

根据恩格斯倡议，各国工人党于1889年2月在海牙举行会议，会上作出决定：在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召开了马克思主义者主持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

第二国际成立后，在它活动的前期，特别是在恩格斯健在的五年中，在他的指导下，继承了第一国际的好传统，发扬了在重大问题上各国党协商一致的精神。恩格斯制订了正确的活动方针，对于各国党既要加强联系又要尊重各自的独立性，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要坚持和民族利益相结合。恩格斯认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②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恩格斯认为，任何一个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4页。

在国际中的地位，取决于它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按照恩格斯的指导方针，第二国际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深入开展工人运动，推动国际共运的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由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国际的声援，19世纪90年德国议会否决了俾斯麦的非常法，德国党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种新形势下，统治阶级改变了斗争手法，他们企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资产阶级的合法秩序范围内，达到取消工人运动的目的。这时工人阶级政党要采取何种斗争策略，如何坚持革命路线，促进革命的发展，就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引起了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思想上的摇摆和混乱，滋生了机会主义思潮和倾向。恩格斯鉴于机会主义思潮增长的危险，为了使第二国际，特别是德法两党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不顾年迈多病和繁重的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工作，挺身而出投入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当时德国党围绕制订新的纲领，展开了反对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的斗争。

恩格斯为了帮助德国党制订一个好的纲领，清除机会主义、调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于1891年一月决定发表马克思十五年前写的并一直没有公布的《哥达纲领批判》，还为它写了序言。恩格斯强调，如果他迟延发表这个“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①恩格斯同时发表了马克思当时给威·白拉克的信，表明，制订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就等于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个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恩格斯当时的主要精神，是重申马克思在揭露党内矛盾、缺点、错误的严厉性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页。

尖锐性。第一次表明马克思本人对拉萨尔机会主义所持的明确、坚定和不调和的原则精神，而这些正是德国党的领导所缺乏的原则精神。由于恩格斯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使马克思的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公诸于世，使它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共同财富。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带有“爆炸性”，在党员群众中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一片欢腾”，但也遇到了某些领导层的不满和机会主义的反抗。当时德国党的议会党团代表格里伯格公然声明：“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鉴于此，恩格斯在1891年3月趁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之际再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并且写了一篇《导言》。在《导言》中，总结了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巴黎公社后二十年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针对当时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潮，对《法兰西内战》的思想做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

第一，关于领导权问题是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恩格斯鉴于公社起义的过程中，参加起义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掌握领导权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并巩固胜利，必须由一个理论上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领导。他指出：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因为他们并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正确的宇宙观，不过是凭着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革命者。而公社委员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则是信奉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毫无用处。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忽略了现在看来应当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而在当时没有做。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第二，坚定、果断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是革命后解决各种问题的重要环节。公社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采取坚定的社会主义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措施。如果公

社掌握了银行，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恩格斯指出，最令人难解的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侵犯的敬畏心理。当然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措施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

第三，恩格斯重申马克思的看法，指出公社的某些正确措施，“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就是说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公社经验已经说明：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布朗基主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指针。

第四，恩格斯在补充中指出：“工人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①必须建设崭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为此，他强调要克服历史上旧的类型国家“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教训，肯定公社在政权机构管理方面两项正确的办法：第一、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论什么职务都由普选产生，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第二、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能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恩格斯这里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它要尽量消除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逐步过渡到把它完全抛弃。

在《导言》的最后部分，他猛烈抨击当时兴起的机会主义思潮，“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②《导言》有强烈的针对性，它总结的法国历次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鲜经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所提出的警告，并没有为德国党领导者们所接受，他们制订的准备提交爱尔福特党代会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9页。

论的纲领草案仍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错误观点。于是恩格斯在1891年6月间对纲领草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即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恩格斯虽然肯定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优于《哥达纲领》。它基本上清除了拉萨尔派和庸俗社会主义的残渣。但是对纲领的政治要求部分，恩格斯做了严厉的批判，指出，纲领草案在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它不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要求，他们力图使党相信“资本主义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他们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象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①这样的观点，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这种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的斗争引入歧途。恩格斯把这称之为机会主义，他们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结果只是葬送掉革命。恩格斯是个辩证论者，他在强调暴力革命的同时，并不排斥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关键是依客观的具体条件而定。他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当然，在实行警察专制制度的国家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在这种条件下，再幻想走和平发展的途径就是替旧制度遮羞。

恩格斯还评论了关于国家的政治形式和结构形式问题。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②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关于国家结构形式，恩格斯针对当时的德国说，“无产阶级只能采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

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形式。”^①只有多民族的国家，联邦制才是一种可取的形式。恩格斯这一重要著作中的思想，列宁十分重视，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十年以后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他最后的一篇理论文章，它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新的探索。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转变自己的斗争方针，确定夺取政权的道路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论点，是一篇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著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运用唯物史观和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的理论方面有着光辉的成就。他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概述世界各国工人政党改造旧世界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②，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

恩格斯严肃地对1848—1849年制定的斗争路线和策略进行了总结，并进行自我批评。他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恩格斯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当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593页。

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自1848—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来，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即工业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正是这样，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社会发展的前台。这说明革命的客观前提和斗争的主观力量、阶级基础都发生了变化。恩格斯的结论是：“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①第二、恩格斯指出，革命运动的进程和条件起了变化，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也应有所改变。他指出，历史做的还要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②

恩格斯在总结了欧洲无产阶级从1848年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结合90年代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提出了在总的战略，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这一目标下，对策略形式要做相应的灵活的变化。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采取合法的斗争还是非法的斗争形式，是以和平的手段还是暴力的手段，随时注意到条件的变化，要有辩证的态度。因为根据以往的教训，认识到革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以一次决定性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地向前推进，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夺取一个阵地又一个阵地，不能试图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恩格斯强调要在群众中进行长期艰巨的工作，要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由于德国党当时曾巧妙地利用了合法斗争和议会民主，特别是利用了1864年实行的普选权，一步一步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肯定了德国党的重大贡献在于：“他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595页。

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表明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①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因此而扩展了合法活动的可能性，并通过这一活动，把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众和其他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在合法活动中，对于提高工人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有重要意义。“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②

恩格斯在充分估计和利用合法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他又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坚持革命权。“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③；第二，要建立一支“决定性的‘突击队’”，为“决定性的搏斗”那一天做好准备。他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④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指出，在决战时刻未来之前，绝不要接受统治阶级的挑战，把无产阶级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而要聚集力量，准备决定性搏斗。他同时也发出警告，如果统治阶级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不得不“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施加压力，诉诸暴力，临到危急关头时，无产阶级就要运用“革命权”，“调动突击队”把自己的活动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很明显，《导言》中恩格斯的核心思想，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决战到来时，进行决定性的搏斗，以争取胜利，夺取政权。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607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8、609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恩格斯《导言》的思想曾多次受到歪曲，直到现在许多评价和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

恩格斯在1895年2月写成《导言》后，本拟作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篇导言交出版社出版。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以德国帝国国会正在讨论《防止改变法》草案为由，要求恩格斯放低革命的基调，修改手稿。恩格斯为了顾全大局，同意改变一些提法或删除某些辞句，从而使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恩格斯是不满意的，他在同年3月28日给劳拉的信中指出，“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在我看来是过份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会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改变法草案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未经恩格斯的同意，竟在报纸的社论《目前革命应该怎样进行》一文中摘要发表了《导言》。恩格斯得知后非常气愤，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抗议。并于4月1日写信给《新时代》主编考茨基，指出，“《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们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①《新时代》杂志1895年27期和28期刊登了恩格斯删节后的全文。直到1930年，《导言》未经修改、删节的全文，才第一次在苏联出版。

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歪曲恩格斯的思想。他一方面宣扬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暴力对于社会主义变革的作用，是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宣称：恩格斯深信暴力革命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并且说：“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的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页。

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①还说恩格斯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殊途同归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后来受到列宁的抨击。在当代，西方一些学者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政治遗嘱”，认为恩格斯放弃了用革命变革来夺取政权的思想，把议会道路说成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粗暴歪曲，是制造马克思恩格斯观点对立的另一种形式。

值得强调的是，应当完整地、全面地把握《导言》中恩格斯的思想精神实质。恩格斯在这里所阐述的把和平斗争方法与暴力斗争方法相结合的思想，既反对了左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顾客观条件的盲动的乱用暴力手段的错误倾向；同时又反对了在敌人使用暴力时顽固坚持议会的和平斗争的右倾思潮。

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创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大贡献。

农民问题之所以重要，恩格斯认为，“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鲁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②因此，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过程中，深入研究了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并且广泛地考察了东欧、南欧、法国和俄国的农民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恩格斯发现，农民作为政治的因素，然而至今对政治还是漠不关心。他指出，农民的冷漠态度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结果。农民这种冷漠态度往往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支柱，甚至在法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农民表现为一支反动力量。然而，正如恩格斯强调的，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改变的。许多情况改变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业危机，割断了农业小生

① 伯恩施坦：《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列代表的声明》（1898年9月29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5页。

产的命脉，使它不可逆转的衰落和灭亡。同时，恩格斯指出，在西方已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恩格斯认为，只有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①

农民这个政治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农民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却不能使自己成为阶级斗争中的独立因素，因此，农民跟哪一个阶级走，哪一个阶级就能在斗争中取胜。1848年法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都因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而失败。路易·波拿巴和梯也尔都是由于骗取了农民的支持而获得了胜利。所以恩格斯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这就是说，只有把农民争取到自己阶级的一边，才算把握了农民问题的中心点，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农民是划分不同阶层的。在德国农村中有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和大农。根据农村的社会结构，恩格斯阐述了如何争取他们。恩格斯指出，农业工人是农村的无产者，社会主义政党首先应当依靠和团结他们。他强调，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②。恩格斯认为，只要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撒在这些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么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

关于小农，恩格斯指出，它是指小块土地所有者或租佃者，是农民中数量较大的阶层。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打击下，小农不可避免要走向衰落、灭亡，它的前途是未来的农村无产者。因此，这个阶层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必须争取和可以争取的同盟军。恩格斯指出，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上面。搞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6页。

楚了对小农应有的态度，社会主义政党便有了确定对农村其他阶层的态度的立足点。

至于对中农和大农的态度，恩格斯指出，或者还有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我坚决反对把它们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它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它们一起奋斗。”但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①

当然，大土地占有者和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是革命的对象，是共同的敌人。

恩格斯还论述了在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权力以后怎样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以后，“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产阶级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能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恩格斯指出，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明了的好处。”^②到那时候，农民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③

恩格斯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和科学预言，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合作社所有制形式作为中间环节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恩格斯的这一伟大著作，批评了第二国际，特别是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关于合作化是改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

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途径和步骤。

第三节 恩格斯论人类早期社会 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恩格斯的关于人类早期社会的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科学地论证和阐明了人类起源的学说。在《起源》一书中他又科学地论证和阐明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①。这二者紧密衔接，勾画出了一个人类早期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完整图画，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展示了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向未来科学共产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前景。

一、原始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 和发展的趋势

在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晚期非常重视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他生前曾打算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提供的成果，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完成了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马克思逝世后，在德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讲坛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分子配合资产阶级发动了向唯物史观的进攻。他们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鼓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等错误观点。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以他们固有的偏见，妄图在家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这样三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范畴方面制造混乱，宣扬一些非历史主义观点，宣扬私有制、阶级、国家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简称《起源》，以下同。

永恒不变，否认家庭的历史演变，替男权作辩护，认为母系社会、母权制的遗迹是什么神话传说和陋习，等等。因此，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学说，科学地阐明原始社会的动力、结构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需要。

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历史早有研究，并对欧洲几个民族作过系统的考察。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就着手研究了爱尔兰的历史，查阅过大量文献资料和古爱尔兰文原著，并且开始写《爱尔兰史》，本来计划写四章，因故只写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70年代，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对人类的起源和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形成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80年代初，他根据自己的成果，写了《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及《马尔克》等重要论文。对德国遗留的村社制度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他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恩格斯揭示原始社会的规律，写作《起源》一书奠定基础。

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原始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理论，揭示了它前进运动的决定性的动力因素。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①

恩格斯在这里概括的“两种生产”的理论，第一次科学地指明了在人类改造自然、脱离自然的混沌状态而形成人类社会后，形成了新的物质基础和原动力。揭开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谜底，完整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直接生活的生产”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直接生活的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物品，“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这是人类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是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就必须有满足需要的工具，因此，生产工具的生产也属于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基本的实践活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生产活动，也就没有社会。因此，“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即增殖，概括为人类活动的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③

恩格斯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后，并且深刻地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起作用不是抽象的，它是和时间、空间及其他历史条件相互制约着。他特别强调“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④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一定历史时代”、“一定地区”等限定条件说明，在原始社会里，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细胞在起作用，人口繁衍直接影响着生产力，没有这个因素，也就不能维持原始的家庭，也构不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因素、血族关系，家庭越来越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其作用了。恩格斯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24、3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人口因素的增加或缩减，它总是和生产力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交织在一起而起作用的。所以，对人口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的增加或减少，它所起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都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只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原则，至于在一定社会的历史时代，这一普遍原则，以什么样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所起作用的大小，这就看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其他条件了。因此，脱离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和条件，把人口因素的繁衍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脱离开，抽象地把两种社会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制约作用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

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对“两种生产”的理论，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并且受到了歪曲和不应有的批评。有来自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和歪曲，如俄国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说两种生产理论是恩格斯“更正”了唯物史观决定论的公式^②；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卡列也夫也说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表明了恩格斯“他的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③等。当时这种谬论就受到了列宁的批评和反驳^④。后来普列汉诺夫也捍卫了这一原理。

对两种生产理论，也有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不正确的批评，有人认为两种生产的理论，“完全破坏了唯物史观一元论的性质”，他们把人类自身的生产从社会生产中排除出去^⑤。也有人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不准确”、“有错误”，甚至说它是“二元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② 《俄国财富》，1894年元月号。

③ 《欧洲通报》，1894年4月号。

④ 《列宁全集》（第3版）第1卷，第117页。

⑤ 参见河上肇：《唯物史观研究》。

以上意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片面强调社会发展中的物质因素、经济内容，而忽视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其实，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规律的高度来看，人类的生产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生产过程就不能延续。恩格斯指出：“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① 恩格斯的观点十分明确，在社会历史中，经济关系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关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发展的限制，而“亲属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杀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② 并且还指出：“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人种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恩格斯强调“象这样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含糊过去”。^③ 这就阐明了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中，亲属关系在社会制度中起决定作用，否则，难以解释一切蒙昧民族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恩格斯的观点，并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恩格斯根据两种生产的理论，详细剖析了原始社会的结构，指出血缘关系是整个人类早期社会的基础，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恩格斯特别强调，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从北美印第安人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只有弄清了氏族制度，才能真正了解原始社会。根据摩尔根的资料，恩格斯在《起源》中研究了氏族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指出，氏族是从普那路亚群婚中产生出来的，最初的氏族是母系氏族，后来才过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9、24页。

到父系氏族。它既是一个出自共同祖先的血缘亲属集团，又是组织原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经济单位，同时，也是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管理机关。在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的不断扩大，私有制、交换和人们的财富积累也随之日益发展起来，这就形成了财产差别，从而产生了阶级的对立。所有这些新的社会因素，在非常缓慢的过程中逐渐摆脱旧的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旧社会内部成长的新因素，两者互不相容，必然导致彻底的变革为止。这时“以血缘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①。

恩格斯运用两种生产的理论，说明人类社会是规律性的更替，深化了摩尔根描绘的那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而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三段式”发展图景，并增添了唯物主义论证。他指出，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人类居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形成了分节语，以果食、根茎为食物。这个时期恩格斯称之为“过渡状态”，是人类社会真正开始阶段。到了中级阶段，人们开始使用火，采食鱼类（虾类、贝壳及其他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这二者相互联系，由于有了新的食物，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增强了征服自然条件，具备了开拓新的区域的可能性。到了高级阶段，从弓箭发明开始，弓、弦、箭，已经是复杂的工具，通过劳动提高了人类的智力。

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从学会制陶开始，这时已经出现了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始的农业和畜牧业。恩格斯强调指出，野蛮时代，自然条件的差异，具有了重要意义。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从灌溉、栽培食用植物和建筑上使用砖和石头开始。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从原始社会发展的顺序和不同阶段看，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野蛮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向对抗社会的过渡阶段，因为连接野蛮高级阶段的是文明时代的到来，这是原始社会从产生到灭亡的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家庭的起源和演变

恩格斯运用两种生产的理论，把家庭与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都是创举。

历史科学的发展表明，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当时在这一方面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认为家庭似乎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历史的发展。一般所知道的，除个体婚制之外，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以及印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没有任何内在的历史联系。其他所知道的一些现象，如有些古代民族中，尚存在以母系而不是以父系来计算，以及一些宗教传统，都被看作“奇风异俗”，奇谈怪论。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即1861年，瑞士学者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才算开始家庭史的研究。恩格斯认真地研究了《母权论》，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该书非常认真的从古代经典文献中搜集资料，证明了人类最初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由此而发展到一夫一妻制，由母权制发展到父权制，提出了有价值的证明。恩格斯认为，“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

命。”^①但恩格斯同时也批评了巴霍芬的宗教神秘主义，指出，他认为从母权制发展到父权制，其根源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观点的变化引起的，特别是代表新观念的新精神战胜旧观念的旧精神的结果。他不懂得正是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引起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这是十足的唯心史观，宗教神秘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说：“显然，这种认为宗教具有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作用的观点，归根结蒂会成为纯粹的神秘主义。”^②

接着是英国法学家约·弗·麦克伦南，他被称谓巴霍芬的直接继承人，于1865年出版了《原始群婚》一书。尽管英国人称麦克伦南是原始家庭研究的权威，实际上他的许多观点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恩格斯指出，他的观点是虚构出来的、充满错误。他在书中认为，在古代和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一种“抢劫婚姻”。他认为这种习俗的遗迹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某些集团与部落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只得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只能在本集团以外找丈夫，麦克伦南把这叫做外婚集团；而另外一些民族，它的习俗只许男子在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称它为内婚集团。他并且虚构了外婚“部落”与内婚“部落”的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蒙昧时代的部落之间战争连绵不断，于是发生了“抢劫婚姻”等等。恩格斯尖锐地指出：“他那纯粹出于误解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理论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③

19世纪70年代开始，摩尔根的新的发现和其他极有价值的材料的公布，麦克伦南所编造的婚姻家庭理论就彻底被推翻了。

恩格斯提到了摩尔根的两部著作：1871年出版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和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摩尔根在这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页。

两部著作中都公布了新的发现和他的结论，恩格斯对它们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在第一本书中，摩尔根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它相应的家庭形式，于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和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摩尔根的成就使得麦克伦南精神设计的理论烟消云散了。摩尔根在他的第二本书，即《古代社会》中，对他第一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科学论证，在人类学领域里引起了革命性的变革，恩格斯指出，《古代社会》中，“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①当然，摩尔根的家庭理论，也有他自己局限性，他没有对各种家庭形式及其演变的客观经济根源加以揭示和论证，尤其没有揭示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及其作用的规律性。这些深入的探索是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完成的。

恩格斯的关于婚姻家庭发展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家庭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家庭也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②从两种生产理论看，家庭既是社会原生经济生活的“细胞”，又是种族再生产的基本单位。

恩格斯证明家庭在历史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按照恩格斯的划分，前两种家庭是和群婚制相联系，属于同一历史范畴。因此，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群婚制、对偶制和一夫一妻制。这些婚姻形式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页。

制约的。恩格斯认为，它们大体上与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血缘家庭、普那鲁亚家庭）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一夫一妻制则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里所说的文明时代的婚姻制度，是指阶级社会的婚姻制度，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制度。至于资本主义之后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什么样的婚姻制度，恩格斯也作了历史展望和预言。他指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①

三、论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后，曾多次探讨过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反杜林论》中曾有专门的论述。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发现的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易洛魁人氏族材料，并运用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大量的史料，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解体的过程，分析了私有制、阶级的形成的规律性。

氏族是原始社会的组织单位。原始社会就是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恩格斯曾对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美妙的制度”有一段动人的描写：它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地方官和法官，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8页。

济和氏族都知道对于老人、病人和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

在没有形成阶级以前，人类社会就是如此。但是，“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但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①因此氏族制度一定要瓦解的。那么无产阶级社会是怎样产生出阶级和私有制呢？恩格斯通过对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分析，阐明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具体过程，得出氏族社会必然导致阶级，私有制产生的科学结论。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当时游牧部落从其他的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这一分离出现了两方面的新因素：一是使交换从偶然性因素变成经常性的了。在部落与部落的交换中，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二是商品交换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工具的改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品除了维持劳动力本身的需要外，出现了剩余，这又是一个新因素，使得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使剥削成为可能，于是把战争中的俘虏变成奴隶。所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②这就是恩格斯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科学总结。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这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它的特点是：由于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奴隶不再是零星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页。

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的发展，随之而扩大了贸易的范围；出现了金属货币按重量交换的新形式；社会上除了自由民和奴隶之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划分。这些新的因素的出现，加剧了财产的差别，从而炸毁了仍然保存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共同耕作制。这时，“同一民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民族成员之间的对抗”^①。于是，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这样，人类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在前次分工的基础上，必然地产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恩格斯指出，“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②这个阶级的特点是：它根本不参与生产，却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

第三次分工，使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即奴隶社会。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铸币，它是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它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谁握有它，谁就统治了世界。”^③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的抵押和产生，新的剥削形式也在增多，阶级分化日趋尖锐，奴隶劳动成了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于是，“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④

四、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趋势

国家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抨击普鲁士国家、揭露它的实质，而走上革命的道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述了市民社会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162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165页。

决定国家的思想，恩格斯早在英国调查研究中就曾揭露了资产者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揭穿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这说明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国家观。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逐步发展和丰富了国家学说，而《起源》一书则是系统地论证了“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进一步阐述了国家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恩格斯根据古代雅典国家，罗马国家以及德意志人和克尔特人的氏族制度和国家的演变，总结出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的三种主要国家形式。他指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闭关自守的贵族与没有权利的平民的矛盾，导致了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在德意志，德意志人同罗马人经过长达三百年之久的斗争，作为征服者的胜利结果而产生了国家，它是作为征服外国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

恩格斯在这里细致地分析的三个主要国家形成的类型，呈现了极其复杂的特殊性。雅典的梭伦等三大改革是新兴的奴隶主阶级对氏族贵族的一次政治革命，促成雅典国家的形成，而在罗马则是平民的反叛而形成自己的特点，至于德意志人并没有停留在刚刚萌芽的奴隶制和罗马奴隶制的废墟上，而是建立了封建制的国家。但是，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个别中包含一般，特殊中包含普遍，恩格斯从这些不同的国家类型中抽象出了一般规律。指出，国家是社会分裂为社会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不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

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这里，恩格斯揭示了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功能：“缓和冲突”、“特殊秩序”、这是一切国家共同的职能，这是全社会的需要，是社会内在发展的产物。由于它是随着社会分裂而产生的，是一种阶级社会的组织形式，所以它的社会功能，又不同于原始社会制度内氏族自我治理机关。其根本不同点有三个标准。

第一，国家的特点是按地区来组织居民，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这是由生产的客观条件：如土地和住宅分布所决定的，便于居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行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打破了氏族、部落的限制。这一点，是一切国家所共有的特性。

第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②它是适应阶级分化的需要。构成这种权力的成分不仅有武装的人，如军队，宪兵和警察，而且还有它的物质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氏族社会所没有的，而是国家的阶级职能的权力体现。

第三，向居民收取捐税和公债。它是官吏掌握公共权力和税收权的结果，体现了国家作为社会机关的一种特殊形式。

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国家的阶级本质，阐明了国家的阶级功能。指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③镇压、剥削和压迫这是国家的阶级的功能的具体体现。这种社会的阶级的功能，绝不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而是私有制、阶级形成过程的孪生子。它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

功能正是适应了私有制、阶级的需要。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历史上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里，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虽已经不再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它是民主的、平等的。可是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资产阶级一方面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有产阶级直接用普选制来进行统治，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东西。只有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那时，才能用新的国家来代替。

国家伴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历史的辩证法将证明，随着私有制、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这就是国家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必然趋势。

第四节 恩格斯总结马克思主义 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写于1886年。它是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的请求，撰写的一篇书评，评论丹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施达克论费尔巴哈的一本书。1888年，恩格斯进一步作了修改，写了序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并且第一次公布了马克思的“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论的提纲》，作为该单行本的附录。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的出版和马克思的《提纲》的公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上有极其重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意义，它表明了从《提纲》到《费尔巴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长达四十多年的战斗、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恩格斯总结了新世界观产生、发展的规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反驳了资产阶级的伪造和歪曲，同时也对当时出现的资产阶级哲学复古倒退思潮，给予了严厉的抨击。

一、批判“复活”德国古典哲学消极因素的反动思潮

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经过四十多年之后，它的影响已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①正因如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抹杀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诬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与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凑合。恩格斯认为，这就有必要全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其实，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很久以来的宿愿。1859年，马克思就曾指出这一点。他指出他们两人1845年在布鲁塞尔决定钻研他们的新理论、新见解，与德国哲学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并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即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形式来实现的。它的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他们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新见解，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是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上踏步不前，批评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清算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马克思宣称：他们已达到了主要目的。但是，遗憾的是当时出版商慑于反动当局的压力而没有出版。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他们的一系列历史性的著作中，虽然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

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的关系，曾作过某些说明，但都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他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他们也从来没有回顾过。所以，恩格斯感到他欠着一笔信誉债。如前所述，随着19世纪80年代阶级斗争、哲学斗争的形势发展，使恩格斯感到有必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恩格斯特别强调：“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至于费尔巴哈，“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①因此，同样有必要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与他的哲学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反击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关系进行种种歪曲的反动思潮。

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另一表现，就是竭力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中消极反动的东西，开历史的倒车，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恩格斯指出：“德国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好象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讨厌起来了。”^②当时流行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就是这股反动思潮的代表。

在德国，当时盛行新康德主义。这个哲学派别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到了70—80年代已经流行于德国大学讲坛，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这是因为它适应了德国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执行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任务：第一，抵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渗入当代各种不同的科学部门，特别是渗入到自然科学部门；抵制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的迅速传播和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活动；第二，新康德主义以哲学庇护宗教，维护统治阶级的利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

益；第三，公开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宣扬社会发展论就是单纯的进化论。

新康德主义的早期代表人是奥托·李普曼(1840——1912)，他的代表作是《康德和模仿者》；另一个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郎格，他的代表作是《唯物主义史》。新康德主义的演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后来，按其代表人物的体系不同分为两个主要学派：即马堡学派，其代表人物为海尔曼·柯亨(1842—1918)；另一派为弗莱堡学派（即西南德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新康德主义各派的共同特点就是“从右边”来批判康德哲学，抛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们宣称“自在之物”是“未解之谜”、“极限概念”应予清洗，他们极力宣扬康德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企图把康德的伦理学运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上。1865年李普曼在他的《康德和模仿者》一书中，把康德以后的全部哲学都当作“模仿的东西”而加以抛弃，提出了“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号召重新回到康德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郎格在他1866年写的《唯物主义史》一书中，认为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大胆的但欠考虑地把科学成果扩展到过去被神学与迷信所占据的领域中的活动，并且认为唯物主义不宜作为世界观，说它过于“矫揉造作”。郎格还在一本小册子《工人问题及其在现在和将来的意义》中，宣扬马尔萨斯的反动思想。恩格斯曾在一封致郎格的信中，批评他和马尔萨斯持相同的观点。并且指出，郎格企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解释成为一种永恒的自然规律。^①恩格斯还写信给马克思，指出郎格的小册子“写得非常混乱。是马尔萨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混合物”。^②新康德主义疯狂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革命论，文德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8—4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8页。

尔班就把社会和自然界截然分开，不承认社会发展有规律性，而只能对个别事件作主观的评价。柯亨则认为科学社会理论应当以康德“无上命令”为基础，以伦理社会主义代替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恩格斯觉察到新康德主义的危害，对它进行了及时地揭露和批评，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之初，新康德主义成为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通过伯恩斯坦、阿德勒的修正主义，新康德主义在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里发生过影响。到20世纪20—30年代，新康德主义西南德学派的价值学和马堡学派的逻辑唯心主义，在德国发展成为非理性主义，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作了准备，并成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里，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仍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着影响。

当时在英国流行着新黑格尔主义。其代表人物托马斯·格林（1836—1882）、弗兰西斯·布莱德雷（1846—1924）等人。他们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用无原则的调和矛盾的思想，来重新解释唯心主义辩证法，发展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方面，把黑格尔宇宙观解释为基督教的“理论形式”；宣扬绝对唯物主义，认为宇宙只是永恒的活动和能力，自我意识是宇宙的要素，人们不过是宇宙意识的派生物；他们抛弃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宣扬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实在的东西只有被感觉到时才能是实在的。”^①这正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的翻版。总之，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企图在重新解释黑格尔哲学的幌子下，建立一套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新黑格尔主义除了在瑞典、挪威、丹麦等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中广泛流行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

① 《真理与实在论文集》英文版，第190页。

都广为传播。只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它所采取的形式各不相同而已。

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均为资产阶级走向反动和意识形态衰落的表现。它们在当时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传播的思想障碍。所以恩格斯一方面非常重视对这些思潮的批判；另一方面重视科学地评价德国古典哲学，以肃清它们的种种歪曲，揭露它们在“回到康德”和“复兴黑格尔主义”的口号下，复辟古典哲学落后的、反动的东西。

二、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式。它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和马克思所创造的新哲学，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这一“中间环节”而又同它脱离，超过费尔巴哈，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面向工人阶级，从而形成了崭新的哲学学派。要科学地理解新哲学形成的过程就需要剖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完成于黑格尔。它代表一个时代。它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式，自然就打上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烙印，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既想革命又怕革命的两面性。德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和它对立的不仅是妨碍它发展的封建贵族、普鲁土地主阶级，而且它背后已经兴起了一个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也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既对妨碍其发展的封建制度强烈不满，有一定的变革现实的革命要求，又害怕已经有了政治要求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如果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相比，19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软弱。马克思对德国资产阶级

的特点曾经有过描述。他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①所以它“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②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矛盾性格,决定了作为它的意识形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矛盾因素,革命性和保守性相互制约。

恩格斯运用历史比较法,阐明了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德国的哲学革命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对历史履行的责任。恩格斯用了一个著名的原理:“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导”,阐明了哲学作为世界观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是哲学发展的一般性,而哲学所服务的对象的特点又决定了它的发展的特殊性。

正像18世纪法国战斗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为法国资产阶级作舆论准备的。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革命的前导。恩格斯指出,两个哲学革命是多么地不同啊!

法国战斗唯物主义者,在斗争中英勇顽强,为革命为理性而献身。他们同官方哲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因而遭到了封建专制政府和教会的残酷的迫害。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他的著作被焚烧,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中,数度被迫流亡国外;无神论哲学家拉美特利,他为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论而写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的自然历史》,为此而遭到迫害流亡荷兰,后来又发表了他的名著《人是机器》;《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战斗唯物主义哲学家狄罗斯·霍尔巴赫曾因揭露封建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26、127页。

统治和抨击宗教黑暗势力，而遭受迫害。但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德国从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虽然也像法国一样，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锋，但却没有法国唯物主义那样旗帜鲜明的战斗性。他们都是官方哲学家、教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哲学教科书。黑格尔不仅出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和校长，而且他的哲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恩格斯指出，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隐藏着革命的内容，而这一点，无论当时的自由派或普鲁士王国政府都没有看到。而有一个人，即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代表，诗人海涅，在他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敏锐地察觉到德国古典哲学中隐藏着积极的革命的内容，为德国的民主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诗人形象地指出，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当然德国的雷鸣也象德国人一样，并不太迅速，而且来势有点缓慢。诗人坚信雷鸣一定到来，他称黑格尔是“德国自莱布尼茨以来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哲学家。”①

这些都说明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有着共同特点，他们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发展，却没有参加这种发展中的实践斗争。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以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建立先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完成了哲学的“最终体系”。人们从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象黑格尔哲学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他们有积极的一面，表现在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对辩证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

①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版，第143页。

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内容，被它的保守体系所窒息。黑格尔虽然知识渊博，思想深奥，可是由于他过分埋头于抽象问题，而未摆脱时代的偏见，为旧的制度辩护。所以，黑格尔哲学体系，由于自身的矛盾，又不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它的体系终于要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新的世界观，新的哲学必将会应运而生。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逐渐掌握了政权。德国资产阶级不仅丧失了它仅有的革命性，而且抛弃了理论，丧失了理论上的兴趣，而热衷于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这样，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古典哲学的传统也就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浅薄无聊的折衷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市侩哲学。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有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新兴的工人阶级肩负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任务，开辟了哲学革命的新时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代表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改造，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揭开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世界观。恩格斯从黑格尔的一个晦涩难懂的命题中，发现其革命的核心思想，从而给我们作出了改造黑格尔哲学、批判继承其合理因素的光辉范例。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①这一命题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序言里首先提出的，后来在《小逻辑》导言里重申这一命题，并对许多人对这一命题的“诧异和反对”作了解释和发挥。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一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愤怒。而“感激”和“愤怒”都出于同一出发点，认为黑格尔的命题是从哲学上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存在作辩护，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这种认识都不符合黑格尔的真义。黑格尔在《小逻辑》第六节里指出这些人的错误，是混淆了“现实”和“偶然的存在”两个范畴。他说：“……从逻辑的观点看来，就存在的总体而论，一部分是现象，仅有一部分是实在。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与夫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虽常有人随便叫做实在。但是，即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实在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有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①很明显黑格尔在这里虽然没有正面点明，实质上他把现实和必然性联系起来了，黑格尔特别强调他所用的“现实”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不仅把现实与偶然的事物区别开，并且把“现实”与“存在”范畴也区别开。所以恩格斯透过它那神秘的表述，指出，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黑格尔以“某种税制”为例，说明普鲁士政府实行的政策，绝非无条件的是现实的，就是说不现实的，不合理的。所以，恩格斯说，“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②这就是说，现存的并不都是“现实的”，因为“现实的应同时是必然的，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有些东西是现存的，但它是偶然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在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③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发

① 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版，第5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

展变化着，在变化发展过程中，它将丧失必然性。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代替它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君主制是如此的不现实，以致为1789年大革命把它消灭掉。所以，恩格斯指出：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事物，将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事物。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恩格斯以明晰的语言指出：“这样以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①又说：“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②

恩格斯就是这样层层地剥去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的外壳，发现了它的合理的内核，并且用鲜明易懂的语言表述了关于辩证法发展的思想。

恩格斯进一步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永远结束了那种认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恩格斯的这个科学的论断，是对德国近代哲学革命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顶峰的肯定。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而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打破了形而上学观点，揭示了辩证法的革命的内容。

恩格斯指出：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①

辩证法在认识领域里，不承认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是一成不变的死记硬背的教条。辩证法认为，人们认识 and 发现真理是一个过程，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无限发展的过程。真理也是发展的，它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科学的认识在无限发展过程中，永远不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的终点，否则便是认识的终结。

恩格斯特别强调：“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如此，就是在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也是这样，它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无限过程，每一个社会历史阶段都要让位于更高的阶段。实践活动也是这样，它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实践行动的结果，没有最终状态，不会有永恒完美的社会，也没有绝对完美的国家。每一个历史阶段，就其发展来说是必然的；就其存在的条件来说，又是暂时的，它要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恩格斯在这里强调辩证法的普遍性，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认识思维活动的一切领域。同时也揭示了运动、发展、变化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恩格斯指出，“诚然，它也有保守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③

以上对辩证法的简明而深刻的描述，表明了恩格斯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神秘的外壳而揭示了它的合理内核。如果我们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2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结合《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就会完整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的实质。

这里应当强调恩格斯的另一个论断：“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①黑格尔为什么不能明确地作出革命方法的结论呢？原因很简单，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需要。

第一，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于是黑格尔宣布“绝对观念”是他哲学的最高体现。而“绝对观念”使自己“外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历史中，再回到自身。按照这样的发展进程最后在哲学阶段达到了自我认识，所以绝对精神是他哲学的最后完成和最高体现。这样，“绝对观念”又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终点。恩格斯指出：“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②于是黑格尔哲学成了有终点的形而上学的僵死体系，“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闷死。”^③

第二，黑格尔哲学体系是为普鲁士王朝作理论论证的，是为了适应保守的政治实践的要求。“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④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应在等级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并且还用思辨哲学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是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因此，恩格斯强调黑格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

哲学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德国的政治状况决定了黑格尔拖着一个德国庸人的辫子，没有摆脱德国庸人的影响。这说明哲学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黑格尔体系与方法的矛盾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恩格斯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以时代的尺度来衡量前人，不苛求前人。他对黑格尔哲学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指出：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迷宫里，蕴藏着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①

由于黑格尔哲学存在着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所以往往由于体系的需要，不得不求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把丰富多采的发展变化的辩证法思想，统统纳入他的死板的三段式的体系结构中。恩格斯对此做了具体分析，黑格尔哲学的结构，仅仅是他的哲学大厦的骨架和脚手架。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充分的价值。”^②

恩格斯作为19世纪哲学思潮的代表之一，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哲学的终结和创造新哲学的道路作了总结。他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③这表明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第一个系统的论述了辩证法基本内容和特征，克服了古代辩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页。

证法的摸索的直观形式；继承和发展了康德以来的辩证法思想，把辩证法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对于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像恩格斯指出的，“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沿着这条康庄大道、结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批判精神，吸取了古典哲学包括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这些珍宝，从而创造了崭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论述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

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德国曾发生了巨大影响，延续了几十年，并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衰落，相反，在19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①恩格斯对此现象进行了总结，指出黑格尔主义这一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由于黑格尔主义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②。围绕当时德国具有实践意义的政治和宗教，黑格尔学派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代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益，他们为维护封建君主制度和宗教的精神统治，死死抓住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宣扬黑格尔关于宗教和哲学同一的观点，认为“绝对精神”就是上帝，作为个体的人灵魂不死。他们抛弃了辩证法，甚至认为正、反、合三段式的辩证法运动是论证上帝的“三位一体”的学说。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是代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利益，他们企图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宗教，反对把黑格尔学说解释为正统的宗教学说。

青年黑格尔派在德国历史上曾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动摇不定，观点上摆脱不了黑格尔思辨的影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

响，仍然在唯心主义圈子里打转转，特别是随着阶级斗争的风暴来临，一些人堕落为资产阶级自由派，鄙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走向无政府主义。“更重要的是：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①他们跟黑格尔主义决裂，要求结束思辨哲学几十年的独占统治。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费尔巴哈。

恩格斯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的“解放作用”。费尔巴哈的功绩是他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结束了黑格尔主义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宣告了唯物主义的胜利。费尔巴哈的新观点受到了德国思想界的热烈欢迎。恩格斯说：“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②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了费尔巴哈的弱点：第一，他的著作中的过分夸张的美文学笔调；第二，对于爱的过度崇拜。这些缺点的消极作用集中地表现在当时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中，他们把费尔巴哈的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它们不仅以华丽的词藻代替科学的认识，而且主张以“爱”来实现人类解放，否认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

费尔巴哈虽然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却没有救出它的辩证法的革命内容，因而，他的世界观没有超越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的范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随着1848年革命风暴的来临，正象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哲学撇在一旁一样，费尔巴哈的哲学也被时代的狂飙抛在后边了。

“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③在费尔巴哈停止不前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高举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旗帜，以改造一切旧哲学为己任，迎着时代的潮流，继续前进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2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是恩格斯对人类认识史，特别是对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发展史，作了科学的总结和精炼的概括。他第一个明确表述了这一科学原理，并下了经典性的定义。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为了深入理解恩格斯这一科学原理，首先考察它的历史发展及其在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地位、作用 and 意义。

人类对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上各派哲学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解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呈现了丰富多采的历史画面。远在蒙昧时代，人们就思考“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当时，人群刚刚脱离自然，生产力极端低下，科学知识不足；不了解身体的构造，不能解释做梦的奥秘，于是把自然人格化。他们把思维和感觉的活动，不是看作人体的活动，而是看做离开身体以外的灵魂活动。这是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最原始的思考。

哲学产生以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人们主观的观念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哲学探索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代，围绕这一基本问题，争论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在古希腊，一批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确认世界统一于物质，认为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有一个共同的“始基”，认为“始基”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不是由精神构成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②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德谟克利特认为是原子。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则认为世界共同基础是非物质的。毕达哥拉斯认为决定世界本原的是抽象的数；苏格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页。

底认为世界是伟大的万能的神创造的；而柏拉图则认为永恒不变的世界基础是理念。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感性的物质的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因此，从古希腊哲学中不同派别关于世界本原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它们一开始就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的。

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统治了欧洲，神学支配一切，哲学成了神学婢女。虽然如此，一切争论问题仍离不开哲学基本问题。在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和唯实论长期围绕着一般和个别进行争论，唯名论者主张只有个别的事物才是独立的存在，没有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一般事物，一般只是个别事物的符号；唯实论者则主张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只有一般是实在的。实在论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而唯名论则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这场持续数世纪的争论，虽然各自都披着宗教外衣，论证不超出宗教的范围，但它们涉及问题的实质，仍是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因此，这场争论，促进了经院哲学的瓦解，在哲学发展史上起了推动中世纪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生产力和自然科学迅速地发展起来，落后的封建社会关系和它的精神支柱神学严重地妨碍着资本主义和科学的发展，于是产生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和神学的斗争。哲学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年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教会权威发起了挑战，于是，世界本原，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①这样，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伴随着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出来，从而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近代哲学史上的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不管怎样改变其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式，它们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进行的。西欧近代哲学史的两条路线的明显对立，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他们主张把人和自然作为现实的存在，他们要求人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人，从封建主义的“天堂”搬到资本主义的人间世界。从16世纪到17世纪末这一时期，英国的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高举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旗帜，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创立和发展了机械唯物主义；法国的笛卡尔则宣扬“天赋观念”成为唯心论的唯理论的代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展开了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争论。进入18世纪，斗争以更加明确的阵线展开，本来是近代唯物主义故乡的英国，这时适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日趋反动的需要，产生了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而本来落后的法国，却出现了一批启蒙运动的先驱和以狄德罗、拉美特利和霍尔巴哈的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他们不仅反对经院哲学，批评笛卡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而且激烈反对贝克莱等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并且发展了唯物主义，当然他们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哲学基本问题方面，却从哲学路线上得到了贯彻和科学的论证。

到了19世纪，在德国，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康德的二元论把思维和存在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他的不可知论是针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费希特以更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了康德的哲学，他的“知识学”的第一命题就是“自我设定自身”，世界就是“非我”，他的第二个命题就是自然界是自我的产物，第三个命题是“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因此，费希特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主体产生客体，客体依赖主体，与主体不可分；谢林则是通过他的自然哲学而由主观唯心主义转向客观唯物主义的所谓“同一哲学”，按照谢林的观点，自然界一切的基础，都是非理性的精神力量——“绝对者”。在“绝对者”中、客体与

主体、自然与意识、思维与存在溶合为绝对的同一。而且谢林认为,“同一哲学”是高于互相对立的哲学流派的;至于谈到黑格尔。他的哲学完成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发展,就其基本立场来说,当然是唯心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但可贵的是,德国思辨哲学以颠倒了的形式初步认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康德的割裂说,或谢林的溶合论,或黑格尔所说:“存在与自我意识就是同一个东西,而所谓同一个东西,并不是比较地相同,而是就其本身说根本是一个东西。”^①它们都是围绕思想和存在、主观和客观,思维和自然的对立问题而旋转。至于费尔巴哈,他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中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同一性范畴,提出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物主义命题。他说:“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②这表明费尔巴哈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坚持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划分,而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费尔巴哈也有初步的认识,他指出:“这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摘录了这一观点,并指出参照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这说明列宁是同意费尔巴哈的观念的。^③历史的发展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几千年的哲学发展的历史,在其纷繁的变化中,都离不开思维与存在,主观和客观这一稳定的关系和伴随着它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科学水平低下,各个时期的各派哲学都不能正确地阐明这一问题。到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虽无明确的表述,已成为它们哲学研究和探索的问题,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从不同哲学立场和角度都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7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第115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63页。

触及了这一问题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泛逻辑主义倾向，与此同时就唯物主义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他批评黑格尔颠倒了事物和逻辑的关系。指出，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①并且说：“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务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②这是马克思在论证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国家是第二性的，它是家庭、市民社会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用哲学观点来说，就是黑格尔颠倒事物和逻辑的关系。马克思在笔记中进一步揭露黑格尔逻辑二元论的观点，明确指出：“精神只是脱离物质的抽象”。^③坚持精神不是在物质之外，而是依赖于物质的存在的一元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敌对的”。“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④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布鲁诺、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指出他把“无限的自我意识”看作是一切的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鲍威尔荒唐的认为，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思维中。他们对工人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那么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只要他们在思想上铲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资本^⑤。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251、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23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

马克思恩格斯驳斥了这种谎言，并且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即工人阶级的哲学揭露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危害。指出，工人们与鲍威尔一伙不同，他们知道决不能靠“思维”去摆脱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①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范畴，根本不是什么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必须用实际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并不只是看作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看作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问题。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符合客观实在，从而具有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在《德意志形态》一书中，提出：从意识出发观察思考问题，还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出发，观察思考问题，这是两种对立的历史观、世界观，于是形成了一个科学公式：“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到了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叙述他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的结果时，把这一公式完善化：“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个公式，他指出，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人们只要仔细考察就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④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多次阐明这一原理，运用和发展这一原理。直到19世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8页。

90年代，恩格斯通过总结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地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

以上简要的历史考察，说明人们认识是一个过程，哲学是一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在它的历史发展中，人们的认识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迷误。根据恩格斯指出这一原理，即哲学基本问题，去研究、探索、求真，任何一个哲学学派，只要从总的方向上去评价它，只要把握住哲学基本问题，就会不出现大的失误。

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科学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给人们指明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中，依据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行动才是正确的。因为哲学基本问题反映着被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之间合乎规律性的关系。按照唯物主义原则去行动，存在是第一性的，就能从实际出发去认识和行动，正确地把握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性，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反之，按照唯心主义原则去行动，从意识出发，就会导致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歪曲，出现认识上的盲目性，妨碍规律性的认识，带来实践上的危害。因此，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行动准则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揭示了贯串全部哲学史的两条基本路线斗争的实质，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绕不开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哲学派别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标榜什么宗旨，或自称是什么最新体系的独创者，最新科学的发现者等等，只要用哲学基本问题这把尺度从总体上去检别它，就能识破其面目，而不为其外表所迷惑。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恩格斯第一次把它归结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①任何一个哲学派别都回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不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确立了反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原则及标准，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关于思维 and 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对这问题历来有不同的回答：一种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精神先于物质，物质是精神的产物；另一种则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物质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各种学派。”^①哲学发展史证明：哲学史上的一切思潮或派别，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具体表现，不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即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恩格斯这个论断，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和标准。

按照恩格斯提出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有两种形态：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本原的基础是主体的感觉和意识，如贝克莱的“事物是感觉的复合”之类的本原论。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本原的基础不是主体意识，感觉，而是主体以外的，不依赖人的独立“精神”或“世界理念”，如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它们虽然形态不同，在历史的演变中旗号不一，但其共同点是坚持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

唯物主义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各自的特点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同，但其共同点都是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它们的基本弱点是对物质世界本原的认识，在科学性上不完美、不全面，甚至有庸俗化倾向，影响它们的观点、立场。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历史上也有二元论和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派别，它究竟属于那个阵营，就要考察其基本哲学立场和倾向。

总之，正如恩格斯规定的，“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恩格斯强调，“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①如果离开这一原则和标准就会造成混乱。

施达克就是因为不懂得区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科学标准而造成混乱。他也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本来意思，混淆了理论战线上的是非。施达克认为，费尔巴哈“相信人类进步”、“追求自己的理想”、怀有“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承认“理想的力量”，所以，他认为费尔巴哈是个唯心主义者。恩格斯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逐一驳斥了施达克的错误论点。

第一，施达克把费尔巴哈对“理想目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不符合事实。施达克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看作是同康德的“绝对命令”有联系，康德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那么，于是费尔巴哈也就成了唯心主义者，恩格斯指出，这是荒唐的推理。康德是个唯心主义者，并不是因为康德宣扬过道德的理想和道德的目的，而是因为康德把人类的知识看作先天的、头脑所固有的，否认知识的内容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这才是康德的唯心主义之所在。恩格斯说，这一点施达克是知道的。黑格尔曾经更尖锐地批评过康德的道德思想，指出康德的道德观念是抽象的，永远不能实现的，黑格尔还批判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页。

但是，黑格尔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把对社会理想的信仰叫做唯心主义，这是德国庸人的偏见。

第二，把某人追求“理想的意图”，承认“理想力量”的影响，就说他是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人都是用头脑思想的，推动人去从事的一切活动，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作用于主体，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反映在人的头脑中，这样，就形成人的感觉，思想、动机和意志，形成“思想力量”，激发人的行动，把这些都看成唯心主义，按此推论，人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岂不荒唐吗？

第三，把相信人类的进步，“为真理和正义”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看作唯心主义者。那么，就会把近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一些有献身精神的唯物主义者，如布鲁诺和十八世纪一批战斗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为理想而献出了生命的思想家，当作唯心主义者。这只能说明：“唯物主义”这个光辉的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不是“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吗？

施达克的错误，实际上是对德国资产阶级庸人们的偏见的不可饶恕的让步。因为德国庸人们不断重复他们对唯物主义的诬蔑，认为唯物主义就是会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而他们把唯心主义理解为美德，普遍的人类爱以及其他崇高行为。这一贬一褒，反映了庸人们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性，揭露这一点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也从反面告诉人们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多么重要！忽视这一点，任何动摇都会造成混乱。

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

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①

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是从辩证的意义理解的，即在主观对客观的能动作用而客观又反作用于主观意义理解的。它揭示了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原则和标准。凡认为思维能认识世界、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是可知论；认为思维不能反映客观存在，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可知论。恩格斯根据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绝大多数哲学家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是指唯物主义者和绝大多数唯心主义者而言。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指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和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②当然，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们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出发点和前提是不一样的。

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前提是肯定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思维以外的物质世界，思维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他们承认主观能够认识客观存在，并且和客观存在具有同一性，如果没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没有人们的认识，这样，改造自然的实践就会是盲目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认识看成消极的反映，不理解认识的能动作用，因而，他们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死板的、僵化的，而不是能动的，他们不懂得认识的辩证法。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如培根、洛克和斯宾诺莎，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法，虽然各有某方面的真理性，但就整个认识论而言还不是科学的。而庸俗唯物主义则把思想等同于物质，实际上是否认了认识。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能动的反映论，科学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它在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承认思维的能动作用、承认思维和存在二者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97页。

唯心主义的可知论，由于它们各自在世界本源上的立场不同，分为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世界统一于他的绝对观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黑格尔肯定的回答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推动世界逐渐成为绝对观念的实现。而这个绝对观念是不依赖于世界而先于世界而存在，但是思维能够认识它。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前提中了。而主观唯心主义者柏克莱和马赫等则认为“物是观念的集合”，其结果仍然是唯心主义等同论，思维和存在同一在思想、观念上。

恩格斯指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①这些哲学家就是不可知论者。在近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德国的康德和英国的休谟就是属于这一类哲学家，虽然他们哲学史上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认识论上都是否认世界的可认识性。康德认为，在人们意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他也承认人们的感觉是由外部世界的作用而产生的，但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康德还是一个先验论者，他认为认识除来源于感性经验，还来源于先天的认识能力。康德认为人的知识就是由先天的（先于经验）和后天的（基于经验的）两部分组成。按照康德的认识论，有三种认识能力存在：感性、悟性、理性。康德承认认识对象，即他的“物自体”在意识之外存在，但是否认人能如实地反映“物自体”。他认为人们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本质。康德认为，悟性就是一些先天形式的范畴，如实在、可能性、必然性、因果性等概念。认识就是把感性得来的材料纳入这些范畴，使结论带有普遍性。感性的多样性，可以分别纳入不同的基本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畴，所以他认为，知识是感性与悟性的综合。康德把理性和悟性区别开来，认为理性概念不是经验的某个部分，而是涉及整个经验，它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也不能为经验所推翻，如宇宙论或关于世界的观念、神学等，于是理性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康德称它为“二律背反”。康德认为有四对“二律背反”：世界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世界一切是复合的又都由单一所组成；世界一切是必然的但又有绝对自由；世界存在着造物主但又没有世界的最初原因。康德认为，由于“二律背反”的存在，表示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度的，认识不能超出现象的范围。所以，康德把世界分为可认识的现象世界，和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康德最终是个不可知论者。恩格斯曾经指出，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自在之物”没有给我们的科学知识增添一个字。^①

在西方哲学史上，另一个有影响的不可知论者就是英国的休谟。休谟建立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休谟宣称，一切知识来源于知觉，而知觉以外的客观实在是否存在，是不可知的。知觉是否由物质的实体而来的，也是不可知的。他在《人类理解研究》一书中指出：“思想中的一切材料都是由外面的或内面的感觉来的。人心和意志所能为力的，只是把它们加以混合和配列罢了。”^②这样一来，无论思想、观念、印象等，都是人们心中的知觉，因此，人们只能认识自己的知觉，而知觉以外的存在是不可知的。休谟还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他认为因果联系，不过是人们的习惯的结果而已。人们习惯于把现象之间的更替视为因果联系，某一现象之后经常出现另一现象，人们就把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他认为，这只是“在此之前”，而不是“因此之故”，它们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过是相继出现，多次重复，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②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3页。

而在人们心中形成习惯而已。

休谟在知觉和外部世界之间设置一道鸿沟，一方面他只相信自己的感觉、经验，不承认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另一方面只用习惯的方法说明观念之间的联系，完全否认了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性。列宁曾经指出，“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不用物、精神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① 休谟宣称在人们的感觉之外，在他所感知的存在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他就是这样，一切靠习惯，否认人们认识的科学性。

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否认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批判过不可知论。黑格尔立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他认为康德的错误，就在于割裂了本质和现象的辩证统一，形而上学地把它们绝对的对立起来。黑格尔指出，康德把“自在之物”和现象割裂开来，使“自在之物”脱离了和一切他物的关系，脱离了一切规定性，成为“虚假空洞的抽象”，成为“无”，当然也就谈不上认识了。黑格尔还指出康德脱离人的认识过程去孤立地考察认识能力，把先天的范畴绝对化，从而抛弃了认识的辩证法。他还批评康德的“二律背反”把认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当作了认识的有限和谬误的表现，是不懂得辩证法的表现，认识过程产生矛盾，正是反映了认识的本性，在不断的克服矛盾中辩证运动。所以，黑格尔站在辩证法立场上，对不可知论的批判是深刻的。恩格斯指出：“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能说的，他都说了。”^② 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也批评了康德的不可知论。费尔巴哈认为，康德错误地把思维 and 存在、现象和本质对立起来，因此得出了物自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体不可认识的结论，因此，他就陷入了割裂真理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的立场。实际上，本质和现象之间、原因和结果之间、必然和偶然之间，思辨和经验、实体和属性之间的差别，都是属于感性范围以内的。这就表明真理性和现实性是统一的。康德怀疑感觉的可靠性也是错误的。费尔巴哈批评道：“认为感觉不证明和不包含任何客观的东西，这是多么庸俗！难道饿和渴的感觉是空洞的和无对象的？渴不就是水不足的感觉吗？”^① 费尔巴哈对康德的批判，的确比喻巧妙、生动，语言明白易懂，不像黑格尔那样语言晦涩难懂。但是，费尔巴哈是形而上学的感觉论者，不懂得辩证法，所以，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東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②

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深刻地揭露了不可知论的谬误，科学地解决了世界可知性的问题。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和阐述了实践概念。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以及作为真理标准的意义。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发挥了这一论点。他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③ 恩格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证：“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④ 恩格斯还列举了化学、天文等科学史上和生产实践中一些重大科学发现和实验，用以驳斥不可知论，证明：人们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现在没有被

① 《费尔巴哈哲学选》（上），第5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认识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将会被人们认识的。恩格斯特别强调，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动力，决不是纯粹的思想力量，而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速的进步，归根结底，推动哲学发展的是实践。

恩格斯还根据实践和科学的标准揭露了新康德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是一种倒退。在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德国古典哲学优秀传统得到了发扬，而不可知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已经被推翻了。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和迷路的自然科学家企图恢复康德和休谟的观点。其中一些人是当时知名科学家，如德国的赫尔姆霍茨是有名的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英国的赫胥黎是有名的生物学家。他们做为自然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又拒绝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恩格斯指出，他们“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作法。”^①

四、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

恩格斯曾经捍卫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批评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曲解。但是，作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也严肃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说：“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②

费尔巴哈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他同黑格尔哲学的决裂的同时，就猛烈的抨击了基督教。恩格斯曾经充分肯定了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德国思想界的影响。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

超出了他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和施特劳斯，他们只限于纠缠在基督福音的历史考证；也未停留在18世纪法国一批战斗的无神论者的轨迹上，只是揭露宗教的愚昧无知和欺骗性，而是有所前进，他提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样，天国的神灵，不过是人间世俗的虚幻，把神从天上请到地上，打破了人们神秘感，这是费尔巴哈的功绩。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①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费尔巴哈的批评宗教的认识上的局限性。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产生宗教的现实本身的矛盾，因而不理解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及它在阶级社会的阶级基础，当然也就提不出消灭宗教的历史途径和现实的办法。

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不希望废除宗教，而是使它完善化，这是非常中肯的，因为费尔巴哈正是要建立一个“新宗教”，溶哲学于宗教中。他说：“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观，需要一个对于人类存在的最初因素和根据的新观点，需要——倘若我们要保留“宗教”这个名词的话——一个新的宗教。”^②费尔巴哈主张，必须以对人的爱，当作真正的宗教来代替对神的爱。人对人的爱就是他新宗教的根本内容，而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他新宗教的最高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③费尔巴哈把爱情、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人与人之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第7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

的关系加以神化，把它们看作新的、真实的宗教。至于什么是爱的宗教，他说：“爱的宗教是怎样一种心理，怎样一种宗教呢？是这样的一种，它可以使人在爱中找到自己感情的满足，解开自己生命的谜，达到自己生命的终极目的，从而，在爱中获得那些基督教徒在爱之外的信仰中所寻求的东西。”^①

恩格斯严峻地批评了费尔巴哈对爱的奢谈，指出，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心灵的关系当作宗教，就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混淆了宗教与人们的感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它也将永远伴随着人类而存在下去，而宗教却是不能与人类共存的，随着科学的发达，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从历史上消失以后，宗教也就随之失掉它的基础而趋于消亡。费尔巴哈把二者等同起来，反映了企图把宗教永恒化的资产阶级观点。

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错误，还在于他不是按照本来面目去对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如爱情、友谊和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断定把这些关系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盖上宗教的印记才被认为是完满的。费尔巴哈还玩弄语源学的儿戏。宗教一词，是从拉丁文“religare”一词来的，本意是“联系”，因此，费尔巴哈认为，两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恩格斯指出：“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②

恩格斯还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史观。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恩格斯指出，他的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在历史上伴随着伟大转折的宗教变迁，迄今存在的只有三种世界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历史的事实说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它们缺乏生命力。一旦部落和民族衰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上），第242—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0页。

落，它们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这里当然谈不上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引起人类历史的变迁。至于说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尚能伴随历史的转折，发生一定的影响，这是由于它们在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决定它们适应了一定的阶级和政治的需要。从13世纪到17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最初阶段，就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的，由于当时宗教的黑暗势力非常强大，不得不给革命运动披上宗教的外衣。而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壮大了，可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法国革命就抛弃了宗教的外衣，打着自由、民主和共和的旗帜了。这说明费尔巴哈过分夸大了宗教的历史作用。不是宗教的变迁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相反，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宗教的变迁。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要害是不理解历史上的伟大阶级斗争，而且把这一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模糊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掩盖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这一规律。所以恩格斯总结他和费尔巴哈的分歧，指出：“由此可见，我们已经超过费尔巴哈多么远了。”^①是的，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历史变迁的真正规律，他们和历史一道前进了，而费尔巴哈却被历史抛在后边了。

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费尔巴哈失足的经验。费尔巴哈恢复唯物主义的王位，为什么唯物主义这一强有力的推动力没有使他自己走出历史唯心主义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其一，费尔巴哈陷入了抽象的人性论，他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不敢涉足社会政治领域，不把人当作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不懂得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他那里只有不分阶级的爱，而他生活其中的却是利益的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②其二，德国的恶劣环境，迫使他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236页。

长期脱离火热的斗争，孤独地退入乡间生活，因而他在革命的狂风暴雨中，不能横跨潮流，迎着风浪前进，“落得可怜的结局”。

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为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费尔巴哈，完成哲学的伟大变革。

五、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一）恩格斯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基础，阐明了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唯一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崭新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哲学决裂以后，他们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而是继续前进，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作为世界观，它理解现实（自然界和历史）世界，是按照它本来的面貌来理解，排除一切和事物本来面目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幻想，坚持从事实本质的联系而不是从虚幻的联系把握事物。恩格斯指出：“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没有更多的意义。”^①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它彻底地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即运用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认识科学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克服了费尔巴哈的致命弱点，费尔巴哈哲学的弱点在于，下半截是唯物主义的，上半截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越过费尔巴哈，加深和发展了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从自然界扩展到人类社会的领域，揭示了社会的内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联系和固有的规律，阐明了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的、现代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不同，它本质上是辩证的、历史的，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简单地抛弃黑格尔哲学，而是把它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法当作出发点。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的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我运动的翻版。”^①这种颠倒了辩证法应该把它颠倒过来，使它置于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上。恩格斯阐述了他和马克思一道，改造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把它变成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他说：“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②恩格斯并且指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们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的，以外部必然的形式，在无穷尽的表面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的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恩格斯得出结论，这样一来，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从而唯心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不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③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为他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

唯心辩证法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置于唯物主义基础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上，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就显示出灿烂的光辉。“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①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个伟大思想和方法论，揭示了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的具体辩证发展规律，一种全新的科学，即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和辩证的逻辑学，就应运而生了。这样，唯物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便成为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恩格斯特别强调这一宇宙观方法论的实践意义，必须左实践中具体运用每个研究领域，自从黑格尔以来，关于辩证发展的伟大思想，早已深入人们的意识，为人们所理解。“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② 在实践中，如果人们坚持从这个伟大的思想出发，那末关于“永恒真理”的要求就不会提出来了。因为辩证法主张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人们所获得的知识必然具有局限性，人们的认识也必然为环境所制约。坚持辩证法的方法论，人们就不会再把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等绝对对立起来。辩证法认为，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它们随着条件的变化而相互转化。

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需要具备主客观的条件和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把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物辩证法，创立新的历史观，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革命的、科学的、完整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一定的条件的产物。恩格斯从科学上，历史的发展上和阶级背景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产生的条件和主客观因素，从而系统阐明了这一宇宙观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19世纪，由于细胞理论、能量转化规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上的其他巨大进步，使人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人们不仅能够认识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从宏观上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使新的自然观、辩证的自然观赖以形成。这就标志着旧的自然观即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的破产。

在历史领域里，在欧洲历史上特别是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历史舞台上出现了震动世界的三大阶级的激烈斗争，表明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近代欧洲历史主要动力。一旦发现了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怎样发展变化的，社会中的许多偶然现象就有规律可循了。而历史的发展过程，无论就其微观剖析，或宏观综述，使得过去由于人们头脑中的臆想所造成的混乱而隐蔽的联系，也简单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复杂的遮盖物清除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明朗化了，科学地探索、研究、说明、描绘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可能和必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他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发现和论证了唯物史观，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秘密，赋予人类一把探索伟大历史真实的一把钥匙。

唯物史观的发现，集中体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历史观的真正统一，第一次使哲学变成了真正的科学，完成了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二）论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

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他们的伟大学说初期就发现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随后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在许多著作中发展了唯物史观，丰富了它的基本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为写作《资本论》而写成的大量手稿，极大的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到了19世纪70和80年代，由于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在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对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又作了阐明和发挥，《费尔巴哈论》就是他详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之一。

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哲学、法哲学以及自然哲学都是从头脑中臆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把社会历史看成是个别人物甚至哲学家观念的逐渐实现，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为了清除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影响，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①怎样实现这一任务呢？就必须区分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的不同特点，把握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各自的普遍规律，以及各个领域里规律的特殊表现。

在自然界，除开人的反作用外，客观规律是不自觉地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界中相互发生作用的动力也是盲目的，而一般规律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自然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表现在无数的偶然性中，或通过偶然性揭示内部的规律，其结果都不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总之，一切是盲目的、不自觉地。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一切活动全是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243页。

过有意识、有目的、有某种追求愿望的人而实现的，没有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事情是不会出现的。虽然有这些重要差别，但也有其共同点的，同自然领域一样，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也同样为内在的一般规律所支配。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领域内，尽管人人都有自觉期望和目的，但在社会现象上仍然是好象偶然性在支配着。这是因为在社会领域里，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能够如愿以偿，无数个别的期望和行动彼此冲突，互相矛盾，“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①但是，在表面上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而实际上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的支配。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的成功与否，并不决定于主观的意志和愿望，也不是停留在偶然现象上，而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按照客观的规律办事。

那末，究竟怎样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呢？恩格斯提出了研究和发现客观规律的途径和原则。他指出，在历史本身中去寻找它的发展规律和动力。人们是在通过自己的自觉的期望和目的而创造历史，而按各种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构成历史错综复杂的画面。因此，必须透过引起活动的精神动机背后隐藏着的物质动因是什么？在活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出现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历史上各派哲学家对此是持有不同看法的。旧唯物主义者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而它不去研究隐蔽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而是认为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这就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它虽然不承认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历史，其结果当然是归之于“绝对观念”。历史就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表现，这仍然回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

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把金钥匙才打开了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的谜。恩格斯指出了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应当注意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注意探索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以及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第二、探索历史动力时，还要注意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是持久的，而不是暂短的爆发的火光转瞬即逝，也就是研究在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根本动因；第三、探索群众及其领袖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所有这些“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①

唯物史观揭示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研究了欧洲近代的历史特别是英法的现代史，指出，在以前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其结果的联系是混乱和隐蔽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越来越看得极为明显，法国复辟时期的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和梯也尔等，也都看出了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从19世纪30—40年代起，欧洲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封建贵族的斗争，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恩格斯说：“当时关系已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那末，阶级斗争的最终原因是什么呢？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正如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一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夺取政治权力不过是用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归根结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它们的斗争，是由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结合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会清楚地看到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阶级斗争则是这一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的表现。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①恩格斯在这里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上说明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恩格斯还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规律，论证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法律以及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是第二性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的领域则是决定性的因素，是第一性的东西。恩格斯运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批判了唯心史观在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的传统观点。按照传统的唯心史观看来，国家是决定性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从社会的表面现象看，上述观点似乎有道理。正象一个人，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要通过他的头脑，转变为他的愿望和动机，才能推动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无论体现哪一个阶级意志，都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能以法律的形式取得社会的普遍效力。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观点，都是看到问题的形式方面，如果要深究这些形式上的愿望，无论是国家的或个人的，它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①

按照唯物史观的看法，国家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要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国家总的说来它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需要，因此，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国家都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

既然历史已经证明国家和公法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经济关系决定的，“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②这说明法权总是体现一定阶级意志，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不过这种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不同国度的条件下，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和法一旦产生，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恩格斯说：“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就是国家，因为它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观点建立起来的政权机关，它的职能是保护社会利益、防范内部和外来的侵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③法律作为意识形态，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理论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但是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这样，唯心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249页。

义法学家们往往夸大了经济 and 法律的脱离，错误地认为不是经济决定法律；而是法律决定经济，于是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

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和宗教，它们和政治法权等意识形态不同，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它们是离物质经济基础更高的即更远的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条件往往通过国家以及政治法律等中间环节对哲学和宗教发生作用。因此，这些观念形态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尽管表面现象是这样，但它和经济条件的联系，仍然是存在着的。归根结底，经济基础、物质条件对这些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指出，从15世纪中叶以来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它的内容本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哲学，是中小市民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产物，也是与这一发展过程相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不仅英、法近代哲学的发展证明这一规律，就是黑格尔哲学也恰好说明这一点。它正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性在哲学上的表现。恩格斯进一步通过对宗教的产生、宗教的形式、宗教的变革和发展，论证了宗教对经济条件的依赖关系。同时恩格斯还阐明了另一条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的规律，即哲学、宗教等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赋予时代的特征。人们在头脑中进行思想加工的过程，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阶级利益决定着头脑加工的思想进程，而这一点，往往是没有被意识到的。另外，新的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总要包含传统的某些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里，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①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上述概述，是对唯物史观科学原理的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一步论证，阐明了它的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意义，揭示了唯物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性和完整性。

第五节 恩格斯批判庸俗社会学，保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年已古稀，健康状况不佳，但他仍在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而紧张地工作。当时，在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直接的攻击。它一方面来自德国资产阶级的教授们的挑战；另一方面，来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所谓“青年派”的歪曲。这一状况在当时德国党内，尤其在青年中造成了思想混乱，面对这一挑战，恩格斯不得不奋起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他晚年的通信和文章，反击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并全面论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坚持社会发展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原则，批判把唯物史观庸俗化

唯物史观及其基本理论观点，我们已经指出，早在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他们的哲学世界观时，就作了科学论证，后来在他们一系列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著作中又做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专门的科学概念，却是恩格斯在90年代第一次使用的。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因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

间的斗争”。^①这是对唯物史观的唯物辩证的科学概括。恩格斯以它为武器在他的一系列通信和有关文章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等人和“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进行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歪曲，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驳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

1890年8月，恩格斯从维也纳的《德语》杂志上得知《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是德国资产阶级学者、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巴尔特（1858—1922年）所著，他在书中攻击和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公开宣扬社会唯心主义，这本书受到了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们的吹捧。恩格斯抨击了巴尔特的著作，反驳了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歪曲。

恩格斯为了保卫历史唯物主义，认真研究了巴尔特的书，恩格斯说：“巴尔特的书，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书里不会有那么多庸俗的东西和轻率的结论。”^②恩格斯从中发现这个巴尔特就是德国莱茵河畔称之为哥林多懦夫的那种人，他把一切都看成微不足道的，如果不去掉这种恶习，巴尔特就会象黑格尔所说的，“从无通过无到无”。也就是这个巴尔特竟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来源于笛卡尔主义，公然宣称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例子，就是笛卡尔宣称的动物是机器。所以恩格斯愤慨地说：“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③

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方法也是荒唐可笑的。他首先臆造一种历史发展的虚伪的理论，然后强加给马克思，其实在马克思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得出结论说，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页。

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①恩格斯嘲笑他说，马克思遇到这类批评时，总是感叹这些批评家读不懂他的书，于是“咳，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

巴尔特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手法，就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不是世界观，不是哲学而是社会学，说什么马克思从来没有对思维和存在的本体论哲学以及认识论问题产生过兴趣，诬蔑马克思对哲学没有提供任何新颖的东西。资产阶级学者妄图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的手法，是对辩证的唯物主义在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领域中统一原则的否定，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解释社会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它贬低为“技术经济史观”，巴尔特别有用心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即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同孔德的实证论混为一谈。所以巴尔特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称之为“社会静力学”。他认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仅仅从属生物学上的肉体的需要，把经济活动和劳动生产，社会阶级关系完全对立起来。

巴尔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论证的社会发展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什么“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诬蔑为否定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还诬蔑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思辨结构。

巴尔特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根本不懂辩证法，也不懂得社会科学中的抽象方法和价值，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反映关系的科学概念一窍不通，妄加解释，他断言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范畴，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作用的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4页。

诬蔑为“经济唯物主义”。他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本质等科学规律，归结为工艺过程，技术发展，并荒谬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看作是经济派的观点。

恩格斯曾经批评巴尔特歪曲黑格尔的著作，指出“千万不要象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他只是在黑格尔中寻找“谬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恩格斯斥之为“这纯粹是小生做作。”^①巴尔特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不严肃、极尽歪曲之能事。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巴尔特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恩格斯说：他，巴尔特“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②恩格斯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巴尔特先对此横加歪曲，说明他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巴尔特为了答复恩格斯对他的批评，后来在1897年专门写了一本《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这本书除了对他前一本书的唯心主义观点作些补缀，没有一点新东西，这更证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和辩证法思想一窍不通。他把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经济运动等范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不清楚，他更不理解，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使用不同范畴来表述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他认为这是捉摸不定的“空洞公式”。

巴尔特把恩格斯同马克思对立起来，甚至捏造恩格斯自身观点的矛盾。他杜撰马克思只承认纯粹生产、技术的决定作用，说恩格斯从《反杜林论》开始，特别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0页。

一书中，到处扩张“经济结构”的概念，超出了纯粹生产、技术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的界限。恩格斯指出，巴尔特论战手法象一个律师，常常对他不同意的避而不谈，而对问题无关的东西却加以渲染，蒙蔽读者。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法。所以，他不是一般的无知，而是故意歪曲。恩格斯说：“对于一个读过我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在这两本书中对这些错误都充分予以防止）的人来说，几乎所有这些错误都是不可理解的。”^①恩格斯指出，历史的现象并不象巴尔特所认为的那样是各种孤立现象的总和。各种现象都是统一的社会机体的一部分，它们相互联系、互相作用和互相制约，但归根结底无一例外地以物质生活关系的发展为最终的基础，而决不是把一切现象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关系。对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的理论，巴尔特对恩格斯的理论不仅根本无知，不懂得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发展和新提法，反而攻击恩格斯思想发展有了矛盾，是“改变了信念”，并且以此证明唯物史观的范畴是不科学的，是混淆了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等等。

由于恩格斯对巴尔特不断地进行批评，推动了梅林等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入保卫唯物史观的斗争。梅林写的受到恩格斯赞赏的《莱辛传奇》，该书的附录“论历史唯物主义”中，猛烈抨击了保尔·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篡改和攻击。梅林说：“对于保卫·巴尔特先生塞满了整整二十页的歪曲和误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东西，我们是无法，也不打算一一细加讨论的。”因此，他说，巴尔特的观点“也不值得人这样做；挑出其中若干主要论点，亦即在分析时可以促使人对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更精确理解之点，也就够了。”^②于是梅林从保卫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并依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论证了经济对政治的优先地位，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73页。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版，第42页。

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等原理；阐述了一切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依赖性；正确地论述了宗教、哲学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看了梅林的著作以后很高兴，写信给梅林称赞他对主要的事实论述得很出色。同时指出，巴尔特之流有一个荒谬观念，就是他们无端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发展的历史，所以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巴尔特等人不懂辩证法，机械地把原因与结果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视它们之间的对立、相互作用和转化，故意抹杀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梅林在驳斥巴尔特的同时也揭穿了这些先生们的“荒谬观念”。所以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说：“我很高兴您这样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聘请这个人在莱比锡做历史教授呢！”^①

（二）批判德国“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

“青年派”是19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股反对派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思潮在德国党内的表现。他们是一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青年领袖自居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和新闻记者组成的集团，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林的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保尔·恩斯特；另外还有保尔·康普夫麦尔、汉斯·弥勒以及麦·席佩尔等人，其中也有一些党史研究工作者。恩格斯在他的许多书信和文章中，都坚定地表明了他对“青年派”持否定的态度。

“青年派”政治上奉行机会主义，他们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所执行的政治策略，攻击以倍倍尔等人领导的议会党团，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民主派”。在思想上，他们是半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并企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

在理论上指挥党，他们的世界观是机械论，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宿命论；组织上，大都是一些出身于资产阶级，身上带着资产阶级烙印，在革命运动高涨时参加党的一些人组成的小派别。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描述了德国“青年派”的特点。指出他们是发生在党内的“大学生骚动”^①。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成为党的骨干力量。恩格斯愤慨地指出，他们一方面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带着军官衔甚至将军衔加入党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引证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批评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人的一句话，即“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以此来说明“青年派”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要是活着，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青年派”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恩格斯对“青年派”从根本观点上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但是“青年派”在他们自己掌握的报纸上宣称恩格斯支持他们的立场，恩格斯得知后非常不满，于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的答复”中揭穿了这个伪造。恩格斯指出，“青年派”的声明对他来说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事。并且说：“我至今一无所知。”而且强调“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怀疑的话，那么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些老爷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③

恩格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严肃地批评了“青年派”。

在理论方面，“青年派”在报纸上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8页。

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①“青年派”这些观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它跟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在实践方面，“青年派”不顾斗争的客观具体条件，否认合法斗争的必要性，轻率地要求“拿下障碍物”。恩格斯指出，如果在政治策略上按“青年派”“幻想”去办，“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②所以恩格斯斥责他们实行的政策“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

恩格斯对“青年派”的“幼稚”“天真而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的自我感觉，给予了善意的警告：“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恩格斯指出，“青年派”所受到的“学院式教育”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地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因此“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务的权利。”^③恩格斯强调：“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④

对于恩格斯的批评和告诫，“青年派”置若罔闻。保尔·恩斯特在《人民呼声报》刊登文章抱怨恩格斯把他们反对派叫做“大学生骚动”，并且质问恩格斯：“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不同的观点。”^⑤恩格斯为此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郑重地指出，对德国党来说，“更危险得多的是傲慢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集团”，特别是因为他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不能客观地观察政治和经济情况，不能公正地衡量现实事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9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0页。

⑤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3页。

实的相互关系和斗争者的阶级力量的实际影响。而且他们强迫党接受他们那种极其轻率的策略。还因为他们妄图通过他们控制的党的刊物来指挥党。这就愈加显得危险。所以恩格斯说：“但愿这一点也能帮助保尔·恩斯特先生了，为什么我竭力反对把我同属于这类集团的分子混在一起。”①

至于恩斯特问“在什么地方？”和马克思不一致，恩格斯明确回答，它表现在恩斯特于1890年8月9日登载在《人民论坛》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的文章中，在那里恩斯特直截了当地重复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②恩格斯不得不声明：这个人竟能使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③

恩格斯在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斗争中，保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

恩格斯90年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辩证法的光辉文献。

（一）论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它在自然观上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坚持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7—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8页。

会物质生产第一性、社会意识第二性的原则。恩格斯晚期通信中，驳斥资产阶级学者和党内机会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一再重申“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这是第二性的作用。”^①这个原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也是九十年代书信的核心思想。

针对资产阶级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②并且强调他和马克思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了毫无内容的空话。恩格斯接着辩证地论述了经济状况和政治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社会历史前进运动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起着主要的决定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诸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也包括通过阶级斗争的胜利夺取的政权，以及这个政权所制定的宪法，法律等，还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的交换作用，而在这种交换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③恩格斯的这一论证的核心思想是体现了历史发展中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所谓“归根结底”决定经济因素的论断并不是直线地、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其他因素也起着巨大作用，否则，正如恩格斯强调的“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④这本来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既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却责难恩格斯观点“归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47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根到底”，是“改变了信念”，并且诬蔑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不科学。这说明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不懂得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

坚持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而政治等前提和条件在社会前进运动中也起着一定的反作用。这是恩格斯所阐明和发展的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

恩格斯在批判把经济关系与生产，生产工艺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把经济关系的概念科学化，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 and 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①恩格斯在这里把经济关系概念规定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且对它们包括的内容和内外的层次也作了划分。就其内容说，它“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起来的生产力。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以科学技术和装备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按其社会作用 and 意义来说，在社会发展中它决定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生产力，以科学技术装备为标志的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

“经济关系”还包括其他层次的内容，这就是“地理基础”、“传统的经济残余”以及“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对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来说，地理的自然条件的优劣，旧社会制度残余的多少，以及这个社会的对外贸易往来和它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对社会的发展、繁荣、进步都有促进或延缓的影响，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层内容，是生产方式的演变，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根据恩格斯的分析,人类社会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它的运动,变化的因素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但是总是有规律可循的,社会的运动、变化如同自然的运动、变化一样,是按照它自己的客观规律运行的,这个规律就是经济状况,生产方式制约着历史的发展,“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①

(二) 上层建筑诸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基础的反作用

恩格斯90年代的通信中,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重点阐明了上层建筑各个因素或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对经济基础发生巨大的反作用。一句话,晚期书信中非常重视社会发展中主观因素的作用。为此,恩格斯还论述了他和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这就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阶段,当时主要任务是要从唯心主义最后一个世袭领地把它驱逐出去,确立唯物辩证的辩证的历史观,因此,强调的重点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存在,论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②同时,恩格斯还特别指出,他和马克思在长时期与唯心主义世界观论战时,常常不得不强调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予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这样,就给了唯物史观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对手以可乘之机，肆意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否认社会发展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巴尔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上层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各种因素，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艺术、文化、宗教等观点，及其相适应的机构、设施等物质的外壳和实体，如政权机构、法院、宗教组织等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上层建筑诸因素对经济基础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它们各自的社会功能也不尽相同。政权、法律及其物质结构，则直接与基础发生联系，其他的思想、观念形态则需要中介物，间接的与基础发生联系，而国家、法则是作为其他意识形态与基础联系的间接物。它们对基础的反作用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促进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前进，有的甚至作为旧的残余发生作用的凭借物。在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中，上层建筑中的新的因素，革命意识形态的增长，对历史的作用是促进旧的基础的死亡和新的基础的确立，在历史的新陈代谢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恩格斯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不仅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且上层建筑诸因素在发展中也是交互作用的。政治总是居于主导地位，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成分，它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直接影响各种其他组成因素。同时各种因素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继承性，例如距离经济较远的哲学和宗教的变化，既要反映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化，又有过去哲学基础和教义体系的影响。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尤其和政治、法权及其制度之间，都有交互作用，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反作用。如果否认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忽视它们的社会功能，仅仅归结经济这一因素的唯一作用，那么这种理论的应用于社会，那就比解析一个最简单的方程式更容易了。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

恩格斯在书信中还论述了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后，就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一切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反作用问题。

关于国家，它是为了执行社会的某些共同职能而从社会中分裂出来的权力机构。总的说来，它就象商品贸易、金融贸易一样，“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由生产的发展所决定和制约。但是，国家一经产生，便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力量。恩格斯说：“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①这样，就出现了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的决定作用，经济运动必然会替自己开辟道路；另一方面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对经济的反作用。恩格斯举例指出，这些反作用，本来是第二位的，结果头足倒置了。正如工业市场本来支配着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发生反作用时，却又头足倒置地好象是金融市场在支配工业市场一样，但金融市场发生反作用时，又头足倒置地好象是金融市场支配工业市场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②恩格斯在这里深刻地论述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过去几千年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局限性的阶级根源，这种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483页。

“头足倒置”的假象，是历来统治阶级制造的，再加上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不明朗，遮上一层帷幕，所以人们一直对历史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直到唯物史观的创立，“才终于把它的真象识破”，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规律性，揭开了社会斗争的真象，还它的本来面貌。

国家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在对经济的发展可能出现的三种反作用情况：第一，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面起作用，会促进经济向前发展；第二，国家政权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就会破坏经济发展，这种情况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经过一定时期，国家也会遭到崩溃；第三，国家政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也可以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的一种，不是把经济推向前进，就是把经济拉向后退。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必然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引起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和衰竭，势必导致经济、政治的崩溃。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是科学的论断。

恩格斯还指出，作为暴力机关的国家政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掠夺者有可能把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根据历史记载，在殖民主义者对外扩张掠夺战争中有过这类事例。就是在现时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破坏被侵略国家的经济，毁坏资源的事例也不是个别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事情大部分都起相反的作用。往往由于外部侵略，刺激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促使被压迫者、被征服者政治上的觉醒，增强民族爱国意识，进行全民族的反抗斗争。其结果，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①这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明，政治的权力相对独立性是巨大的，但它又是有局限性的，社会发展最终要服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书信中关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反作用的论述，是对他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国家作用的论点进一步发挥。

法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独立部分，它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的反作用，与国家相类似，它也是适应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早就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产关系。法的本质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反映，它通过法律的形式，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保护、巩固社会中现有的经济秩序，使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固定化、合法化。因此，不同社会形态下就会有不同类型的法。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法的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在必须适应总的经济情况，体现经济的利益，而且必须使法的各个部门，各项法律制度，各种法律规范都必须保持“内部和谐一致”。诸如民法、刑法和经济法不能和宪法相抵触，否则就无统一的法统和法制体系。要做到这一点，法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恩格斯指出，历史上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统治阶级立法的目的是为维护它的利益，但统治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利益，往往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表现为法律语言就不那么鲜明了，甚至附加了许多掩盖物。所以，它形式上好象违反了“法观念”，而实质上则更有利于统治阶级意志的贯彻执行。恩格斯以1792—1796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提出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为例，指出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但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拿破仑法典第一

次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它所提出的“财产不可侵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平等”等原则，是纯粹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法权观念。然而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和阶级要求的增强，迫使拿破仑法典不得不以歪曲的、巧妙的、虚伪的形式，把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无产阶级的被统治的地位，以法律秩序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歪曲，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制定法典的典型。恩格斯由此提出了法发展进程的一般特点，这就是“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①法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克服矛盾，突破体系的确立新的“和谐一致”中发展的。

恩格斯还论述了由于法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产生的倒置现象。“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这是符合实际的现象。由于现是经济利益的体现，所以法必须确保经济的合法地位和维护其利益。在实际生活中，某些经济和政治行为，有了法律依据，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便是合法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因而得不到承认。于是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法决定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法。“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②恩格斯指出，法权思想、法律观点、各种法律制度，一旦生效，它对经济基础就发生反作用，“并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恩格斯以英、法继承权的异同之点及其对财产分配的影响来说明这一个原理。法是经济的反映，但在其发生反作用时，要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

约，其中有传统的、政治的、宗教的，甚至婚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法反作用于基础，仅仅归结它的经济内容的制约是不够的，要考虑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恩格斯还论述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和规律，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把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看作不依赖于经济基础，而只是从思维中产生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①这就一语揭穿了所有的思想家们从来不知道推动他们思想的真正动力是经济因素，而认为他们的思想观点、理论形态来自于“思维过程”，思维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思维中，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们先辈的思维中产生的。所以恩格斯说：“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②在他们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那么似乎一切都是以思维为基础了。恩格斯对“虚假意识”的揭露，既揭示了它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错误地理解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同时也揭露了“虚假意识”的阶级根源，它往往是反映了过时的、衰亡的阶级的愿望。社会上进步的阶级，他们利益要求意识形态和现实的一致，即科学的意识形态。

恩格斯还论述了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的历史。他指出，历史思想家在每门科学中都有一定的材料，无论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和神学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在它们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分别独立地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代代相传经过人们头脑的加工，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1页。

经过了自已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一个加工改造材料的过程，也会受到外部事实即经济条件的影响而给思想材料的发展以影响，但这种影响总是作为思维的成果溶化于思维过程，于是人们便认为是思想、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是始终停留在纯思想的范围之内，是思想消化、吞噬。这样“任何领域的思想观念独立历史这种外表，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①资产阶级思想家、唯心主义者正是利用了意识形态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把它夸大为脱离物质、经济基础的纯粹的思维的产物。恩格斯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意识形态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性，他指出，路德和加尔文对天主教的改革；从康德经过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卢梭以其共和主义间接地否定了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制思想；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发展等，都说明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有其自己历史，决不能只是看作纯粹的思想进程，而是发展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由于意识形态的这种历史规律性，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不平衡性，经济上发达的国家，不一定是意识形态水平高的国家，而往往经济上落后国家能够在意识形态方面居于领先地位。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德国对英法两国也是如此。当然，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总是有规律可循的。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文学的繁荣，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起到最终的支配作用。不过经济的支配作用，是根据各个意识形态本身的特点和条件的范围而有所不同，对政治和法律要直接些，而对哲学、宗教这些较疏远的意识形态部门来说要间接得多。就是在历史上形成某种社会思潮，它要选择什么资料，继承什么，发展什么，抛弃和批判什么等等，归根到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1页。

都是由一定政治的和经济条件决定的。

以上所有论点都是恩格斯对辩证的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三、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 辩证统一，历史发展“合力”论

恩格斯晚年在唯物史观方面的重要贡献，就是深刻论证了社会发展的主观因素多种形式的反作用。恩格斯在这里划清了两种界限，既批判了机械论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方面的直观性，又批判了唯心史观夸大社会发展中主观因素和意识的能动作用。恩格斯强调：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等发展都是以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为基础的。但是这些主观因素，却是以积极地创造性地反作用于规律，发挥多种功能的能动作用。因此，不能认为人们在创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在规律面前总是消极的，相反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表现在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上。

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表现为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恩格斯指出，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它不是按照人们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计划创造的，甚至也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而是由许多人在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计划的相互矛盾冲突中创造的，其中每个人的意向和目的是相互交错着的。社会好象整个被偶然性所支配，看不见社会前进发展的必然规律了。但是，恩格斯认为：“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①这就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不过它是由体现必然性的各种偶然性事件开辟道路的。恩格斯以伟大人物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出现阐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他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时间出现于某个国家，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不是这个人，那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代替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出现的。人物是如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学说和思潮的出现，也绝非偶然性。就唯物史观的形成而论，它也是时代需要成熟的产物。因此，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自然的必然性在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在对必然的认识，促进必然性向自由的转化，避免在偶然性支配下盲目行动。

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结果。没有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即没有人类主体的能动作用，就没有人类历史。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力量的产物。”^①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辩证法，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活动中主观因素人的意志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历史发展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肯定了社会规律是人们活动的规律。恩格斯提出了“合力”的思想。第一，恩格斯首先肯定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历史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任何历史事变，其结果可以看作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以往历史总是象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第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人的意志对历史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社会规律的发展，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即社会规律的发展，既受客观物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也受包括意识在内的主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各个人的意志，包括每一个人的精神的、物质的需要及其经济利益驱使他为了个人的和社会的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然而决不能说这些意志等于零，它们融合而形成一种“合力”，每个人的意志都融合到“总的合力”中去了，因而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恩格斯为了阐明“合力”构成因素的复杂性，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把无数个互相交错因素称之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在力学上，平行四边形表示力的合成，其对角线表示合力的大小和方向。历史发展中，无数个人意志互相冲突，互相抵消，就象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引出无数合力线，而历史的最后结局，就象四边形的最后合力线，这条合力线，其中任何一个线都不一致。比喻只是说明现象的近似，而实际的历史发展要复杂的多。它包括个人、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其中有革命的 and 反动的，有推动历史向前的，也有逆潮流而动的，这些力量在方向上、性质上的不同，造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其结果和任何一个意志和力量都有差异，所以造成历史过程中的曲折，有历史的进步，也有暂时的倒退，就是要看“合力”的结果。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种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历史。”^①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是说明社会历史规律是主体与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

体的统一，最终客观条件起主要作用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入探索历史秘密的重大贡献，有人批评其为“机械论”，特别批评力的平行四边形是机械论。这正说明他们不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和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其实，恩格斯多次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的，也不是赤裸裸的表现必然性，它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我们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它的发展中偶然性就越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恩格斯说：“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①

恩格斯的观点为我们正确研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探索其发展规律，提供了方法论的武器，这绝不是机械论，而是坚持了历史辩证法。

第六节 恩格斯的伦理学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伦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个理论基础，伦理学的各种问题都不能得到科学的解决。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充分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敢战斗、坚韧不拔、团结互助、大公无私、严守纪律、热爱集体等崇高的道德品质，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而又生动的现实内容。经过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得到了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代表著作中，对伦理学思想作了许多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

一、论道德的根源和本质

恩格斯首先指出，人们总是从自己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对道德的根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已作过各种程度不同的论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人类为了生活而进行物质生产，解决衣食住及其他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必然会建立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交往中，会产生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在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为了调整这种关系，就逐渐形成了一些行为准则和观念，这就是道德。因此，道德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①恩格斯这个论述，把社会经济关系决定道德观念的原理比他们以往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表达得更加明确和科学了。它不仅把道德理论从唯心的神秘主义中彻底摆脱出来，建立在经济关系中的坚实基础之上，而且为进一步阐明道德观念的阶级性和历史地发展的规律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还阐明了道德的历史性，认为道德总是随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经济关系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着旧的经济关系日益腐朽，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形成的时候，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也必然随着变得没落和腐败，维护新的经济关系的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也就日益形成。当然,这个新旧道德相互替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也是新旧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的矛盾在道德领域中的反映。所以,恩格斯说,“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所播种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①这样或许有人要说如果善恶可以变化、易位,那就无所谓道德了,每个人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恩格斯指出,问题并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末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然而实际生活的确是极其复杂的。对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完全不同的道德评价。这就是说,道德观念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就有过原始共产主义道德、奴隶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等等。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主义经济处于交替过程中,在道德观念方面,也表现出这种新旧道德交替的复杂情况。恩格斯认为,由于过去的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道德,后来又分成为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许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新的道德萌芽,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观念。在这里,恩格斯明确肯定了道德观念是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关系,因而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观念,根本不存在永恒道德。这是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并运用于分析社会道德问题而得出的精辟结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页。

恩格斯还阐明了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社会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人们之间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以人们之间的阶级利益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利益”是一切社会道德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由于各阶级的地位和所维护的利益不同，因而维护这些利益的道德观念也不同。所以恩格斯说：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未来的利益。”^①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它直接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与此同时，处于被压迫和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道德，它代表着无产者对统治者的反抗和未来的利益。只要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对立，就必然会有敌对阶级在道德方面的对立。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这就是说，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道德的一个基本特征，对道德具有决定意义。因此，恩格斯对道德阶级性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进一步结合起来了，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有阶级的社会中道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恩格斯还第一次明确的肯定了无产阶级道德和历史上剥削阶级道德的联系。在恩格斯看来，道德观念虽然由经济关系所决定，不同的经济关系上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观念，但它们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又有着共同之处。恩格斯在讲到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的关系时说，“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①就是说，上述三种道德由于是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代表着三个相互对立阶级的利益，因而在总体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它们毕竟都是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只是阶段不同而已，因此它们就必然具有可以相互继承的方面。不仅如此，恩格斯认为，推而广之，对那些具有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经济发展阶段的道德观念来说，也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共同的方面。

为了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道德和以往剥削阶级道德的联系，恩格斯还举例分析。他指出，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就是说，在私有制的社会中，必然会形成，维护私有制的共同道德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已经为社会所有，但毕竟还存在少量生产资料和整个生活资料的私有制，因此，“切勿偷盗”这个在私有制社会中形成的道德原则，今天的无产阶级道德仍然需要加以继承。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切勿偷盗”的具体内涵有所变化。恩格斯说，当然，“切勿偷盗”也不是永恒的道德原则。“在偷盗的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②恩格斯的这些精辟分析和论断，第一次深刻地阐明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点，也揭示了无产阶级道德和以往道德特别是和剥削阶级道德的联系，为我们在批判继承方面指明了方向。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深刻地阐明了道德的平等原则。恩格斯认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这就是说，道德要求对于一切人都应当是相同的，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差别；自己在评价别人行为时所提出来的标准和要求，应当与他人对自己和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要求相等同为出发点。恩格斯还认为，这种平等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它的内容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奴隶社会的道德平等和原始社会的道德平等不同，资产阶级的道德平等和封建的道德平等又不一样。这种不同，归根到底都是由各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在道德上提出平等要求，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能平等地进行交换的商品所有者，有解脱行会束缚并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并且要求所有人的劳动仅就它是人的劳动而言，都应当是平等，具有同等效用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平等，由于同农民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方面的一致性，人的平等原则就被宣布为人权。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阶级不平等的现实又使这种平等原则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恩格斯认为，对无产阶级来说，平等的要求有双重的意义。或者它是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反应；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并从中汲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因此“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联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

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①这就是说，我们既不能离开现实的历史条件，去抽象的谈论道德上的平等原则，也不能把历史上的某种道德平等的内容凝固化，绝对化，而应该向前看，努力发展经济，消灭阶级差别，实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真正的人类的道德平等。

二、论原始道德的特征 婚姻家庭道德的演变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对原始道德的特征、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的道德原则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

在分析原始社会道德的主要特征时，恩格斯指出，人类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到达文明时代，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习惯和道德观念。原始社会人类道德观念有着自己的特征。长期的集体劳动生活，人们形成了氏族、部落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基本原则。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不致饿死，不被野兽吃掉，不被别的部落消灭，必须集体活动。因此，原始人就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观念，认为“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界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②当时在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人们养成了热爱劳动、刚强、勇敢等重要的道德品质。否则，就会饿死，就会被野兽吃掉。氏族内部的自由、平等原则是原始社会人类又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不仅氏族内部男女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就是氏族首领和氏族的一般成员也处了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是由于当时人们必须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才能维持生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原始社会的道德毕竟是人类发展最初阶段的道德，因而还存在着某些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

似动物的痕迹，这明显的表现在氏族集团之间残酷的“复仇战争”和“食人之风”。恩格斯说，当时人们靠打猎和采集果实来生活。由于“食物来源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①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类原始道德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道德。

恩格斯还分析了奴隶主阶级道德的特点。他首先肯定了奴隶社会的道德比起原始社会的道德是有进步的。这主要表现在：由于个人劳动维持自己生活略有剩余，战争中抓获的俘虏已不再象原始社会那样，把他们杀掉当食物，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保存下来，改变了食人之风；群婚制已让位于对偶婚制。其次，恩格斯还指出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道德。自私自利、贪财、掠夺是奴隶主阶级道德的主要规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过荒淫无耻的生活，把奴隶看成是私人占有的财物和任意宰割的对象。恩格斯说，奴隶主阶级为了追求“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②这就是说，奴隶主阶级把社会历史推向了前进，但在道德上，却是对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道德的一种破坏。其三，恩格斯还指出，奴隶主阶级另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是鄙视劳动。他们把一切劳动都强加到奴隶身上，把奴隶看成是供他们任意使唤的劳动工具，自己则过着荒诞的生活。恩格斯说，“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③这样，奴隶制社会“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就这方面而言，奴隶主的道德比原始道德是后退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146页。

恩格斯还论述了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的道德原则。他指出，爱情是以男女双方的平等互爱为基础的，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性欲和体态美。人虽然有自然属性，但人毕竟和动物有本质区别，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现代意义上的男女爱情归结为性欲和体态美。恩格斯指出，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志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因此，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性爱还很远很远。恩格斯认为，现代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彼此能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① 爱情是以男女之间的相互倾慕和互爱为基础的。

恩格斯还阐明了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指出爱情是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他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② 在婚姻问题上，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是男女双方要有爱情。这是马克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

思主义伦理学和以往一切旧伦理学在婚姻问题上最基本的区别。

恩格斯还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在历史上发展的情况。他认为,婚姻关系同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大体一致的。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从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群婚制时代,是根本谈不上爱情的,在对偶婚制时代,婚姻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而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只有到了一夫一妻制时代,才为个人性爱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才发展起“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①这是婚姻道德上最伟大的一个进步。

恩格斯还认为,在整个中世纪以前的社会,是根本谈不上个人性爱的。那时候,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当事人则安心服从。古代人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则只有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恩格斯认为,封建的中世纪,爱情也还不是婚姻的基础。创造破晓歌的骑士爱,只是一种通奸行为,从它到应该成为婚姻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么能属于爱情呢?”^②

恩格斯认为,在今日的资产阶级国家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家,父母照旧为年轻的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结果是丈夫大肆实行杂婚,妻子大肆通奸。在新教国家,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页。

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但是，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同居罢了。这两者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木质一样，它们都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

恩格斯还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时期产生的。它是建立在私有制和丈夫的统治基础上的，目的是为了确凿无疑的确定子女和亲生父亲的关系，以便能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父亲的财产。在这种一夫一妻制下的妻子是生育的母亲，管家婆和妇女的总管而已。因此，一夫一妻制不是性爱的结果，而是私有制经济发展的产物。恩格斯还认为，一夫一妻下的夫妻对立，是同阶级对立同时发生的。他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① 阶级压迫和丈夫统治妻子，是私有制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它的产生是必然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中，消灭了私有制经济，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基础，从而也就消灭了男子对妇女统治的基础，性爱才真正成为夫妻关系的基础。所以，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页。

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会有别的动机了。正是在互爱基础上结合的自由婚姻，才能消除丈夫用权势和财产实现对妻子的统治，消除种种悲剧。

恩格斯还预言：一夫一妻制的高级阶段一定会到来。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新的经济基础为真正的男女平等创造了条件，以至爱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将真正得到实现。

恩格斯还回答了由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否会带来一夫一妻制的解体，两性关系的紊乱等问题。他分析说，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不管是婚生的或者是非婚生的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将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这些在以往都是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现在这个顾虑消除了，“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①恩格斯肯定的认为，这是不会的，因为在这里作为现代婚姻道德基础的爱情（性爱）在起着作用。

恩格斯对婚姻家庭方面的道德演变的论述和分析，深刻的揭示了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这些方面的本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三、批判旧伦理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道德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唯心主义伦理学作了深刻地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页。

判。

首先，批判地分析了以往的旧伦理学，指出：旧伦理学都是唯心主义的，在现实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因而是不能实现的。康德在《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他反对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伦理学说，认为道德原则是以先验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人的理性之中的，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必须服从的，这是普遍规律，他称之为“绝对命令”。恩格斯指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一种缺乏实际内容的空洞的抽象，在现实面前是“软弱无力”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论述了自己的伦理学思想。他的哲学和伦理学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由于他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提出了比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更深刻的思想。恩格斯认为，“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

（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都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①恩格斯还以善恶为例，对黑格尔的道德哲学和费尔巴哈的道德哲学作了比较，认为费尔巴哈在这方面的理解也是肤浅的。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

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①

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伦理观作了专门分析和批评，揭示了它为现代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在费尔巴哈看来，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而且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它构成了一切道德的基础。恩格斯指出，这种追求幸福的平等原则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因为追求幸福欲望的实现必须要有一定物质手段，因此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中，“它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②至于说到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那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用各种理由变成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实际上这种平等的权利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更荒唐的是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原则，会得出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投机倒把的证券交易所是最高的道德殿堂的结论。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③是道德的基本原则。人们为了追求幸福而到交易所去，如果一个投机始终得当而赚了钱（得到了幸福！），就证明他执行了费尔巴哈的道德原则，因而他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另一个赔了钱（追求幸福的欲望没有实现），因为他盘算错了，没有完全执行费尔巴哈的道德原则，因而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恩格斯说，这表明费尔巴哈的道德是投机家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234页。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极其空泛，是唯心主义的。任何道德，总是有条件的、具体的、现实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具有非常不同的道德观念。可是费尔巴哈与此相反，认为他的道德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之中。费尔巴哈的道德论之所以是空洞和脱离现实，根本原因在于“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①

四、论道德观念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

恩格斯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斗争的许多书信中，不仅保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也丰富和发展了伦理学。他特别强调了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肯定了道德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

对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以后，就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而存在，它具有自身的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237页。

点和规律。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凡存在着社会规模的独立分工的地方，如国家、法、哲学、道德等等都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从分工的观点看来，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些共同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道德和哲学虽然远离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旦社会产生了职业的道德和哲学家，道德和哲学也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而出现了，表现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指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同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不总是一致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的某一个领域可能处于领先地位，在道德和哲学方面的这种不平衡情况尤为明显。当然应该注意，道德和哲学的这种不平衡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哲学家虽然可以利用先驱者传下来的资料，把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在运用什么样的思想资料 and 如何运用等方面，归根到底它仍然受经济发展的状况支配的。所以，恩格斯认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

恩格斯指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反作用于社会历史，制约着社会历史斗争的形式。他在批评有人把经济歪曲为唯一的决定因素从而否定上层建筑因素的作用的时候指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经济基础和包括道德在内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错综复杂的，在看到经济基础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还应该看到道德等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对经济基础存在和发展的影响，历史的发展是各种社会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七节 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 西方“马克思学”的歪曲

马克思逝世12年后，全世界无产者悲痛的失去了第二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恩格斯象马克思一样，曾经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事业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们在为人类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的伟大功绩，永垂史册！恩格斯和马克思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了半个世纪，他们的事业和学说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伟大厦是两位巨人共同劳动的结晶。可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捏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对立的谎言，歪曲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企图贬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从而达到歪曲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

一、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不仅和马克思一道创建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通过他的不朽著作，《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晚年的哲学通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最完整、最科学的阐述，显示了它们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因此，可以说，没有恩格斯的一系列的哲学著作，就不会有系统的、完善的、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的世界观。但是，历史经验证明，每当有可乘之机，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和哲学家们，总要捏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种种对立的“天方夜谭”，贬低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从而达到歪曲和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目的。早在上一世纪马克思去世

前后，就有人求助于这种手段。马克思逝世不久，恩格斯面对这种情况指出：“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①恩格斯逝世后，又重新掀起分裂马克思恩格斯的浪潮。当时，说什么马克思是希望客观规律自动起作用的抽象的学者，而说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斗争，把重心转移到了革命的主观因素。在另一些场合，又把恩格斯打扮成“渐进主义”、“和平改良主义者”。

到了本世纪20—30年代，由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出现了“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和贬低恩格斯、批判恩格斯晚年的思潮。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生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这种批驳是由科尔什和卢卡奇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书中进行的。从那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实际上所有的思潮，——从萨特到科莱蒂，从阿尔都塞到马尔库塞——一般都反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值一顾，马克思本身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为此目的而在欧洲思想范围内求助于更早的哲学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在理论上退到了马克思以前。”^②

近廿年来，西方马克思学的所谓研究热点，是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不仅围绕着所谓恩格斯背叛马克思主义而议论纷纷，而且出版了大量的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72年，联邦德国出版了一套八卷本的比较百科全书，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它是由英、美、法、德等国许多学者集体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页。

②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版，第78页。

写的。其中第三卷有恩格斯的专章，是慕尼黑大学教授巴列斯特雷姆撰写的，对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针对恩格斯的晚期哲学思想作了歪曲，并就当前西方学者对恩格斯的评价作了论述。1875年，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出版的《对马克思的背叛》一书，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哲学观点看作是“对马克思的背叛”。同年，美国教授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是一部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以及革命策略等一系列理论方面的“分歧”，书中还就恩格斯的“思想模式”、哲学基础作了武断地歪曲。他还写了《辩证法内部的对话》（1984年）把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观点对立起来，还肆意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升级为“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并伪造所谓根据。美国学者古尔德纳的《两种马克思主义》（1980年）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人道主义本质和科学的本质的矛盾冲突，产生了“两种马克思主义”。而英国学者雅可比写的《失败的辩证法》（1981年）就是妄图从马克思的来源上，从黑格尔学说中的矛盾说明“两种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必然性，为制造“恩格斯反对马克思”这一骗局寻找历史、理论根据。最后，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科拉科夫斯基在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这部著作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论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

所有上述先生们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观点以及他们对恩格斯的批评所写的著述，不论他们的意图如何，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在资本主义世界学术论坛上，已经成为热门的话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讨，已经不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事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所及，引起资产阶级学者们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客观真理，真理是不怕批评和探讨

的，但是，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是客观的探讨，只是视角的不同，也无可非议。但是，蓄意歪曲、伪造骗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应当上当，有必要揭穿骗局，保卫马克思主义。

很明显，西方马克思学的先生们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地位和作用抱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巴列斯特雷姆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其最大最成问题的表现，是恩格斯被提高到“经典作家”的地位，对此恩格斯本人应负有部分责任，尤其是他的许多哲学思想被人利用，用以把群众束缚在僵硬的意识形态的信念中。^①巴列斯特雷还认为，在西方学者中关于恩格斯讨论最多的是恩格斯错误地把他自己那些“不同于”并且“低劣于”马克思的思想说成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一致，从而不幸的“重负”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②这些歪曲和诬蔑恩格斯的言论，已经背离了严肃地、郑重地探讨。而是充分说明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蒙住了这些先生们的眼睛，他们看不见马克思主义及其世界观形成和发展方面的事实。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缔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整个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是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世界无产者的导师。至于恩格斯个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独立作用，马克思在世时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③并且指出，“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

①② 卡·巴列斯特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84页。

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①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马克思早在《巴黎笔记》中就做了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它是德国人在经济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恩格斯这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的当时的科学研究，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创建，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多次引用。马克思在《序言》中申明了他和恩格斯合作后发表的各种著作表达的是“我们见解”包括其中“决定意义的论点”。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是受到马克思重视和赞赏的著作之一。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文中，马克思说：“英国从大工业生产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详细情况，请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多么令人惊叹。”^②我们还可以引证恩格斯亲密战友、终身合作者马克思在他们合作的最后年月里对恩格斯评价，看到马克思对恩格斯从青年到老年一些重大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评论，那些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们所说的恩格斯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不幸的重负”是多么荒谬。1880年，马克思给恩格斯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的法文版“导言”中，简明扼要地评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8页。

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的光辉业绩。他指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首先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① 马克思接着列举了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一系列重大活动。恩格斯第一次旅居英国和布鲁塞尔时，担当社会主义运动机关报“新道德世界”等报的撰稿人，和马克思一道建立了德国工人共产主义俱乐部，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变成国际组织。并和马克思一起接受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它出版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一切文字。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1840年，恩格斯参加爱北斐特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完成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进军。1850年，作为马克思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并发表了著名的“德国农民战争”。后来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时，他在党的报刊上连续发表重要论文，出版《论俄国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马克思还特别提到《反杜林论》一书“在德国社会党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指出，从该书的理论部分中摘录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②

可见，西方马克思学的评论家们对恩格斯的评论不仅违背事实而且是居心不测的，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剔除恩格斯的著作，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世界观中排除恩格斯的“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0—263页。

劣”成分，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是不完整的，不系统的，这实质上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抛弃和毁灭。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客观地、严肃地比较研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著作中反映的思想、观点内容的历史意义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的一生，著述丰富多采，他们能讲多种语言，通晓各种科学，以伟人的深睿智慧，探索了社会发展中政治经济的深层，涉足了人类知识的广泛领域。因此，对他们的著作既不能采取僵化态度，也不能以浅尝辄止的浮线态度对待，应当是深入地研究他们的思想、观点上的联系。从史的发展角度来说，他们的著作可分为几类：一类是他们俩合写的著作，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另一类是由马克思独立创作，而由恩格斯发表时作了补充，修订或赞同性的评论，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第二三卷等；再一类是恩格斯独立创作的，对马克思有重大影响，如恩格斯早期的两本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还有一类也是恩格斯独立撰写的，但却得到马克思的启发，协助和支持赞同的著作，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其他也有一些是在马克思授意由恩格斯起草的著作，代表他们的共同主张和路线的等等。对于这些著作中所阐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要不抱偏见，都会看作是他俩共同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所以恩格斯的著作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财富的共同创造者。

二、反对恩格斯哲学思想，旨在 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马克思学的形形色色的流派，在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对立，伪造“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谎言方面有共同点，这就是重点放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的对立。攻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从而达到歪曲、贬低恩格斯哲学思想，进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巴列斯特雷认为：恩格斯详细论证了一种辩证的自然哲学，而马克思则只是联系人来设想自然界，认为自然界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客体，而这个异化客体必须恢复原状。^①而科拉科夫斯基则证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别是，恩格斯主张自然辩证法的潜在先验论，而马克思观点中占主导地位是人类中心说。^②莱文认为，恩格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主张宇宙中的基本动力是物质和运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是从这两种力量中导引出来的，而马克思则主张人化自然。为人的目的利用自然，赋予自然以人的性质。^③还有一个兰德格雷勃比其他人更坦率地说，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本身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人类中心说，根本不同于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具有内在可理性的概念。^④莱文则把这种分歧归结为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恩格斯主义”。

这些评论家们虽然表述的语言不同，但都在哲学世界观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这点上，其立场、观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分裂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建的统一的哲学世界观，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引向唯心主义。

他们用“人类中心说”来概括马克思哲学观，就是把唯心主

① 巴列斯特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②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③ 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

④ 兰德格雷勃：《辩证法问题》。

义、人本主义、思辨人道主义的观点塞进马克思哲学体系中。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观点：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人类存在和人类的劳动的物质前提。那种认为马克思“联系人来设想自然界，认为自然界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客体。”“赋予自然界以人的性质”等观点。就是明目张胆地谎称马克思认为没有人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伪造马克思否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界是不依人们的意志而客观的存在着的。兰德格雷勃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本身根本不存在”。这种伪造的性质，巴列斯特雷姆也不得不承认是按照费希特创造的传统来看待马克思的观点。同时，他们把恩格斯说成是18世纪的机械论者，宣称他主张自然辩证法是潜在先验论。莱文认为：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一个形而上学者，只承认自然界是独立存在，把它当作独立存在的东西来研究。并且说，马克思把辩证法只应用于人类历史领域，恩格斯则把它扩充到自然界，认为宇宙万物离不开辩证法的三条规律。

巴列斯特雷姆和莱文在宇宙观上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神话。这是本世纪下半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手法。他们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某些术语，把马克思哲学思想人本主义化，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论》中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背叛”。这些人企图说明，恩格斯所概括和论证的哲学思想，都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否定了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也就没有统一而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莱文用大量篇幅论证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方面的对立。把他们两人在宇宙观上的对立深入到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莱文说：“恩格斯把自然界的规律说成是辩证的，这是马克思本人从来没做过的。”^①并且说：对马克思来说，辩证

① 莱文：《可恶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

法不是存在于自然界本身，而是存在于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莱文还认为，恩格斯主义完全抹煞了主观成分，只承认自然界存在着辩证法规律，其他一切都是出自这些规律。莱文这些反对自然辩证法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创立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是恩格斯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莱文硬说马克思从来没有研究自然辩证法，这是一种无知的歪曲。只要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就会理解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财富、共同智慧的结果。

早在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寄一本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给他，并且告诉马克思说，他目前正在研究生理学和解剖学，而且发现这两门科学包含有非常重要的辩证哲学观点。并且强调“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恩格斯说，如果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论据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恩格斯很想研究一下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中，对这些新东西，“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①可惜，黑格尔在1831年已经死去，19世纪30—40年代的科学成就，这位天才的辩证法家却一无所知。信中可以看到恩格斯也在研究能量转化规律和细胞理论，他告诉马克思，“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②马克思在第二天就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给了恩格斯。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伦敦出版以后，恩格斯很快就这本书的内容与友人通信交换了意见。恩格斯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③并且指出了该书对研究自然界历史的意义，也指出了它方法上的缺点。他说：“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325、503页。

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
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能不接受
笨拙的英国方法。”① 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信中
提出了关于研究“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的构思和写作设想，这可
以说是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他打算写《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最初的一
个写作大纲。信中说：“…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
学的辩证思想。”② 接着恩格斯在信中阐述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
理，从简单的机械运动直到高级的有机体运动。马克思第二天回
了信表示高兴，并把恩格斯计划告诉了化学家肖莱马。直到1876年
5月28日，就在恩格斯不得不“突然把一切搁下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时”，还写信给马克思说，《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
和“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③ 1882年11月23日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④
这足以说明恩格斯在创立自然辩证法过程中，多次和马克思交流
思想和看法并得到马克思的赞同和支持。我们还可举出马克思本
人论述自然科学辩证法的言论。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给恩格
斯的信说：“你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
——资本家的第三章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
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
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⑤ 另外，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一卷第九章中，论述货币和商品所有者在什么样的最高
和最低限额的基础上，如何通过量变转化为资本家的。他得出结
论说：“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
《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2页。

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① 马克思并且在这个结论的注释中指出了量变质变规律在化学上的应用。他说：“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②

在《反杜林论》中，为了批评杜林，恩格斯在书中阐明了自然辩证法极其重要的原理，而且运用了《自然辩证法》中许多材料和结论。马克思不仅读过了《反杜林论》的原稿，而且该书的第十章是由马克思撰写的。在1878年10月3日，马克思给摩里茨·考夫曼的信中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本书对于正确理解德国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自然辩证法，是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共同制定的。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了在自然辩证法方面他和马克思的一致性。他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法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的一——‘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④

莱文指责“恩格斯主义完全抹去了主观成分”。意思是说恩格斯强调自然界辩证法是决定一切的，从而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了主观辩证法。这是明显的歪曲，按照恩格斯自由与必然：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2—3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2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的观点，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自由活动，并不是一个任意的课题，人是受自然界制约的，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就在于帮助人们掌握和运用自然界规律，以便开拓自然界的财富为人类服务，这是更自觉更有效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指出：“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①他并且强调：“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②这证明了恩格斯不仅没有抹杀人的主观性，而是把它置于对客观辩证法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莱文认为“对马克思说来，辩证法不是存在于自然界本身，而是在于人和自然界的系统中”。说“辩证法不是存在于自然界本身”，这就是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性，是对马克思的严重歪曲，是莱文强加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在人和自然界的系统中，有一个人与自然界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问题。莱文在他的文章中的意思是想说，没有人就没有自然界，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性。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解释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科学，正是说明了客观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性，主体与客体的联系和统一性，绝不能把辩证法只是用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莱文的伏笔是说在人类出现以前，没有自然辩证法寓于其中的自然界。这只能是莱文的立场，而不是马克思的。

在认识论方面，莱文歪曲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点，认为恩格斯“创造了一个绝对两极化的认识世界”。说什么恩格斯主张真理的“摹写论”，还无端指责恩格斯“忽视了人的实践作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518页。

用。”在历史观上，又说：“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完全是经济决定说。”并说：“恩格斯的历史思辨中没有人类实践的概念”，“不懂得思想的批判和创造作用”，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替换了能动的意识等等。^①关于莱文这些歪曲性的论点，我们在本章对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晚期的书信的评介论述中，已经正面地解释了恩格斯的有关论点。恩格斯的著作表明，他在晚期一些重要著作中，正是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认识论，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方面莱文所有责难，完全是他的臆造和无稽之谈。

简短的结论

本章阐述了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和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马克思最后十年，在体弱多病中，孜孜不倦，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事业而刻苦钻研，积累了大量读书笔记，其中关于“原始社会”的笔记尤其重要。马克思晚年关心发展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问题，注意东方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遗产和理论财富，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晚年笔记，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完成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的遗愿，恩格斯创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揭示了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针对19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各种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恩格斯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后40年的斗争经验，论证了马

^① 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

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革命变革。写下了不朽著作《费尔巴哈论》。

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全面的论述，发展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 和学生的哲学思想

经过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欧洲这两场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两次广泛而深刻的验证，证明它是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世界观。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切教导和培养下，一批朝气蓬勃、青年有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成长起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维护、宣传、丰富和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通过他们的广泛努力，不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创新，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更加具体化和民族化。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一批优秀的理论家。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作了广泛的宣传解释，而且对其中的许多具体原理作了说明和发挥。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应用于他们的革命实践，指导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重大的成就。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德国的有约瑟夫·狄慈根、威廉·李卜克内西、卡尔·肖莱马、奥古斯特·倍倍尔、爱德华·伯恩施坦、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安东尼·潘涅库克。

在法国的有保尔·拉法格、茹尔·盖得、若尔日·索列尔。

在俄国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

在英国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莫里斯。

在意大利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在波兰有路德维克·克什维茨基。

在保加利亚有德米特尔·尼古拉耶维奇·布拉戈耶夫。

在这些人中，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社会地位、思想的演变过程都不同，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理论素质也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也不一样。有的是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贯彻到自己的实践中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等人；有的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为捍卫、传播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毕生的努力，如约·狄慈根、保·拉法格、弗·梅林、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等人；有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半途而废，开始时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后来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如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人；有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且取得重大成果，如卡尔·肖莱马、爱德华·艾威林等人。在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情况是很复杂的，对他们的功过是非需要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评价，切不可作简单的结论。那些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为维护、宣传、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无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也有过严重的失误。那些后来堕落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如考茨基那样的人，在当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或那样，或多或少做了一些有益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工作，他们的理论著作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宝库的一部分，他们和他们的学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下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哲

学思想，作出简要的介绍和评论。

第一节 约瑟夫·狄慈根哲学思想

约瑟夫·狄慈根是19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闻名于世的工人哲学家。同时，他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实的战友和学生。他的一生，为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独立地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一、狄慈根的理论活动和思想转变

约瑟夫·狄慈根，1828年12月9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科伦市附近的一个叫作布兰肯堡小村庄。父亲是一位熟练的手工制革匠，在本村经营着一个不大的制革作坊。母亲是农家妇女，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家境困难，16岁的狄慈根，只上了两年中学就被迫辍学，在他父亲的作坊里从事体力劳动。狄慈根虽然失去上学的机会，但没有窒息他渴求知识的欲望。他一边在作坊中学艺，一边坚持刻苦自学，不仅钻研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且还阅读文学作品和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在基本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经过1848年革命的洗礼之后，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下，狄慈根投身于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为争取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狄慈根坚决反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无情地揭露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本质，维护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工人团体的正确利益，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批党员。入党以后，一直到他逝世的几十年间，狄慈根主要从事于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和哲学的研究。狄慈根在担任报刊编辑工作期间，为了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先后

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中主要的著作有：《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论逻辑书简》（1880—1883年）、《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6年）、《哲学的成果》（1887年）。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狄慈根以他独特的方式详尽地阐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在广大工人群众中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888年4月15日，狄慈根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马克思曾亲昵地称呼狄慈根为“我们的哲学家”，认为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有着许多卓越的甚至是令人惊叹的思想。^①恩格斯认为他是天才的，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②

狄慈根从一位普通的制革工人，成长为工人阶级杰出的理论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一个过程的。狄慈根哲学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着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理论探索阶段（这是狄慈根从中学时代起到1848年革命失败止）。这期间，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他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的哲学、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圣西门、傅立叶、卡贝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还一无所知。他的世界观主要是革命民主主义和不自觉的唯心主义。但是，自由、民主和科学的信念在狄慈根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对自由的哲学思考成为狄慈根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

第二阶段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基本形成阶段（从1849年起到1869年止，即从大革命失败后到他的代表作《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的出版）。这是狄慈根通过对抽象自由概念的怀疑和批判开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的，并从研究和解决普遍同特殊的关系过程中，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起初，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狄慈根的思想中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地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给他解决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有着重大的启发。但是，对狄慈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形成有着决定意义的影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狄慈根在反动政府的报纸上通过“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审判的“罪证”中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宣言》这部光辉著作。

¹1859年，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狄慈根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多次的研究，并给以很高的评价。狄慈根说：

“更促进我的求知欲的是《共产党宣言》，……我最大的进步要归功于1859年发表的马克思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①。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下，通过他自己的刻苦学习，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通过了他自己的特殊道路、特别的方式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第一部专著《人脑活动的本质》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特殊方式表述的结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狄慈根成长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艰难道路。

第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者、工人哲学家阶段（从1869年起到1888年止，即狄慈根从事党的报刊理论工作时起到他逝世时止）。这是狄慈根哲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时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指导下，狄慈根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这阶段，他已看到他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如关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思想与存在的关系，要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论述世界的物质性，正确地解决人对世界的认识，彻底批驳不可知论，就应该科学地论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科学地揭示二者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统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下同），第229页。

一。否则，就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狄慈根也开始认识到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狄慈根花费很大的工夫努力学习和体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哲学思想，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80年代开始撰写的《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两部著作，虽然也存在很多问题，语句的重复这老毛病也没完全克服，但从整个思想的叙述水平来说却比《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有着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对思维活动的本质的认识有着重大的突破。狄慈根详细地研究了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提出了以客观辩证法为基础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思想，阐述了思维过程中概念的关系、运动和转化，揭示了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思维是用概念有机联系的体系而不是用抽象的共性把握客观世界存在、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

狄慈根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挖掘。

二、“宇宙万有”学说

狄慈根认为宇宙就是万有，万有也就是宇宙。万有和宇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名称，其实质都是表示客观的世界是一个物质性的世界。狄慈根指出，宇宙中的具体事物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物质。“万有”这就是多种多样各种具体事物的总称或抽象，它与“物质”、“无限”、“绝对”、“宇宙”是同一意义的字眼，表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统一性和根源性。

狄慈根用“宇宙万有”学说，深入地论证了客观世界的物质

性和统一性。他说：“宇宙万有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①，“整个自然界最后是一个唯一的、普遍的统一性”^②。在物质世界之侧、之上或者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世界。狄慈根尖锐地提出问题：究竟是只有一个世界，还是有两个世界？究竟是只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是有一个非物质的或超自然的世界？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狄慈根非常肯定地回答：“世界只有一个，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存在的总集，这个现有的存在无疑有无穷多的种类，但一切种类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自然的自然。”^③后面的“自然”，狄慈根指的就是“万有”、“宇宙”。认为“宇宙万有”是世界上万物的唯一根据。是世界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实体，或是绝对的统一体。认为这个物质的统一体既没有始也没有终、无所谓外也无所谓内、无所谓上也无所谓下。“我们应将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整个世界当作一个唯一实体和事物，当作一元体来考虑”。^④狄慈根认为“万有”、“宇宙”这个永恒的不灭的物质，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事实上或实际上不过就是它的可灭的现象的总和。所谓物质是不灭的，不过是说：不论何时何地都存在物质而已。”^⑤

狄慈根在论证世界的物质性时非常重视斯宾诺莎的“自因论”观点。他说，宇宙中一切具体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是有充分的根据，然而普遍的宇宙、万有的存在却是无根据的，它本身既是根据又是推论，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一切根据都出自无根据，这是一条重要的辩证法知识”^⑥。“万有、宇宙或绝对既是自己的因，也是一切事物的因，它使一切区别，包括因果关系的

①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28页。

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52页。

③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84页。

④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1页。

⑤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2页。

⑥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6页。

区别以及精神和自然界的区别，都‘被扬弃而包括在其中’。”^①狄慈根在自然观上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坚决排除唯心主义的外因论。

狄慈根坚持世界的物质一元性，同时又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反对旧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单一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说：“世界的统一性和复多性同样真实而实在；多即一，一即多”。他用母亲和子女的关系论证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狄慈根说，作为母亲的身份，“它不可能没有子女而存在，正象子女不可能没有母亲而存在一样”，“子女固然是作母亲这件事的结果或产物，它同样是其原因。如果世界一元不孕育着许多个别的子女，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想象。”^②狄慈根最后得出结论说：“世界一元是最高的、最普遍的范畴。……无穷的众多，孕育在他的心底和怀中。”^③狄慈根用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来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不够科学的，但是他的本意是很清楚的：一方面说明物质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本原、本质；另一方面说明具体物质的存在又不是僵死的绝对的同一，而是千差万别，有着质的多样性。狄慈根坚持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对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作了说明和发挥。

狄慈根还指出，有限和无限、普遍和特殊的对立统一是物质世界的本性。他说，万有宇宙“有无数个始和终，反之，它又是无始无终的、真正的无限。”^④“普遍的自然本质依存于无限多的个别特殊体，而这些特殊体又仅存在于、依存于普遍的宇宙整体本质之中。”^⑤狄慈根关于万有世界既是有限又是无限，既是普

①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82页。

②③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62页。

④⑤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5页。

遍又是特殊，既是永恒又是短暂的论还是他对世界的物质性和多样性的辩证论述的继续。列宁对这个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狄慈根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强调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即强调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必须懂得人的每一种认识的相对性，必须懂得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全面联系和相互依存，必须把自然历史唯物主义提高到唯物主义历史观”^①。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克服旧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物质性的单一的、直观的和庸俗的观点，如实地反映物质世界的存在。

狄慈根没有给“物质”下过科学的定义，但从他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对哲学上的物质范畴是有着辩证的理解的。他认为旧唯物主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不了解自然界是一个过程，把物质只看成是具体的、可感觉的形态和简单的存在物，因此把哲学上关于物质的范畴和自然科学上关于物质形态的概念混为一谈。狄慈根认为，旧唯物主义者争论什么是物质，“究竟是只有可触的、有重量的东西才属于物质呢？还是可见的、可嗅的、可听的东西，直至整个自然都是研究的材料，从而一切，乃至人类的精神都可称为物质的呢？”^②这是毫无意义的，其观点是浅陋的、不科学的。狄慈根指出：第一，由于旧唯物主义者不懂得辩证法，“不知道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看成具体事物的抽象图象”^③；第二，由于旧唯物主义者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当他们研究抽象的物质及其一般概念的时候，他们却显得对概念学一无所知。”^④因此，旧唯物主义不可能科学认识哲学上的物质范畴的实质。

狄慈根还对庸俗唯物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它的根本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页。

②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45页。

③④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5、253页。

错误是把思想与物质等同起来，把纯粹的精神现象归结为物理现象，混淆了物质与意识的界限。狄慈根说，庸俗唯物主义者把头脑产生思想比喻为肝脏分泌胆汁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在这个例子中，不论是主辞还是宾辞，不论是肝脏还是胆汁，都是有重量的可触的，这种情形掩盖着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想说的话，即把胆汁作为结果，把肝脏作为居上位的原因区别对待。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在这个场合的确无可非议的东西，在头脑和思维活动的关系中却断然没有参考价值。”^① 这是说，大脑虽是思维的机能，思维必要以人脑为物质基础，才能进行思维活动，但思维本身并非物质性的东西。狄慈根说：“正象对手的研究和对手的解剖不能解决什么叫写字一样，脑的生理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思维是什么的问题。”^② 这个比喻虽不十分恰当，但对于说明问题的实质是明确的。

狄慈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论述了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指出，思维活动虽然离不开大脑的神经活动，但是两者是不能等同的，因为思维的内容并不是由大脑提供的。“一种思想要能表现出来，单靠头脑或思维能力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引起思想的客体或对象。”^③ 人的大脑是思维的主体，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是思维的客体。头脑的主体只有通过感官与物质世界的客体发生联系，反映客观对象时，才能形成现实的思想。强调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是被反映者，人的思维活动是第二性的，是反映者，没有被反映就无所谓反映。他认为那些唯心主义思辨学家靠“沉思”、靠“折磨”头脑来寻求对事物的认识，这只能是一种妄想。其次，狄慈根指出，思维反映存在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他特别反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43页。

②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5、19页。

的消极被动的反映。狄慈根科学地论证了宇宙万有的客观实在性，正确地认识了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基础。

三、以物质为基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为了批判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狄慈根花费很大的工夫从事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他指出：“哲学的重心在于解决人的思维过程；认识论应当成为哲学家的专业”。他认为认识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在于它要解决我们思维工具的性质问题，一切科学的基础在于对思维过程的认识。“哲学的专门任务不是提供世界的真切的思维图象，而是提供人类精神在形成世界图象时所需要的方法和道路。”^① 如果不解决人们认识世界的真正方法论问题，没有科学的思维工具，就不可能获得真理性认识。狄慈根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比喻为一盏点燃一切光明之本的灯，人们只要掌握这个科学的思维方法，就能认识世上一切事物的本质。

狄慈根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他的大部分哲学著作，都是以研究认识论为主要课题，其内容以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

（一）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

“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这是狄慈根的认识论中的一句名言，它画龙点睛地指出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前提和核心思想。狄慈根认为，人的认识不是依据上帝的启示，也不是单靠头脑的沉思，而是依据经验、依据归纳，在整个客观世界中寻求知识和认识的起源。狄慈根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物都是经验。……一切认识起源于世界联系。”^② 人的认识是以生命为前

①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64页。

②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61页。

提，以经验为条件。离开客观物质世界，离开经验材料，就无所谓正确的认识。狄慈根严肃地批评了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认为这种哲学的总习就是否定被反映被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否定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从纯粹的理性出发，在头脑内部通过沉思来寻求一种纯粹的、完全的、绝对的知识。因而，这种思辨的认识就成为“无对象的思想”，“没有内容的思想、没有现实性的思想，只能产生妄想。”^①又指出，柏拉图的那个不要经验的、单靠头脑反省的“回忆说”，这只不过是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的灵魂说。

狄慈根认为，人脑是思维的器官，但是单靠头脑是不可能产生认识的。要产生认识，还必须要有有一个引起思想的客体或对象。他说：“思维与其他任何活动一样，需要一个对象”，“为了思维，我需要可供思维的材料。”“思维能力不是绝对的东西，因为它只有以现象世界、以物质为前提才能存在、才能起作用。”^②他举例说，“视”必须是在眼睛之外有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听”需要在耳朵之外可以听到的声音；“思维”需要有个足以引起思考的对象。不含内容的思维是没有的，没有对象的认识也是没有的。人脑只有通过感官“与万有、与一切材料、一切事物、一切现象发生联系”，反映认识的对象，最后经过思维的加工抽象，才形成现实的思想。

狄慈根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一切思想只能是真实事物的肖像，是真实事物的理论化，并常常把思想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比作绘画、摄影的关系。狄慈根说：“概念和事物的关系就象相片和本人的关系一样”，“我时常把一件事物的概念说成宛如其本身。”^③又说：“我们的思维工具就是一个集光轮，一个使我们看到整体影象的特殊集光轮。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造形艺术家——我在以前的信中把它比作摄影师——本身，也不是照片，

①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4、24—25页。

③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86页。

而是原物，普遍的世界是我们研究的目标。”^①狄慈根嘲笑那些思辨哲学家，专靠头脑“沉思”来寻求认识，正像基督教徒要在肉体之外寻找灵魂的拯救一样。狄慈根指出，与此相反，“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器官不能产生任何形而上学的光明，它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片段，一个描写其他自然片断的片断，当我们对其他的自然片断进行描写的时候，它本身的艺术家的性质就显露出来了。”^②列宁十分称赞狄慈根的论述，认为“这也就是人类认识永恒运动着和变化着的物质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个理论引起了整个教授式御用哲学的仇视和恐慌，诽谤和歪曲。”^③

狄慈根正确地论述了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揭示了意识的起源和本质，提出一个通俗而深刻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思想是脑机能与某种对象结合而生之子。”^④列宁对狄慈根这个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它“包含着和不可知论、马赫主义、唯心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基础。”^⑤

（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同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又有着本质的区别。狄慈根已经看到，只有正确地认识两者的辩证关系，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狄慈根认为，“对我们的感觉来说，世界是多种多样的”，“头脑则从共同点上把世界理解为统一的”。他说：“为了全面地理解事物，我们应该既从实际方面又从理论方面，既靠感觉又靠头

①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8页。

②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9卷，第63页。

④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0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1页。

脑，既从肉体上又从精神上去把握事物。”^①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或混淆起来，都不能正确理解认识的辩证过程。

狄慈根已经看到，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要依赖于感性认识。他说：“理性并非从自身，而是在与现象相接触时才作出概念；……对‘事物的本质’所进行的这一讨论证明了思维能力的本质是我们从感觉现象得出的一个概念。……真理或普遍并不能‘独自地’认识，而只有借一个已知的对象才能认识。”^②狄慈根指出，思维活动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是通过感官获得感性认识来实现的，理性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头脑加工，形成概念、判断、推理，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

狄慈根也看到，感性认识是不完全的、低级的认识，它有待于发展、上升到理性认识。狄慈根指出：“不用说，经验是必需的条件，但只有经验还是无济于事。只有从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论——科学，才能够使我们从偶然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科学使我们能够自觉支配事物和绝对可靠地处理事物”^③。狄慈根看到，如果认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不再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就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就不会有科学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狄慈根提出，感性认识也要依赖于理性认识，认为脱离理性指导的纯粹感性认识是没有的。他说：“思维不能脱离经验，而没有思想，也根本不可能获得经验。”^④“正象没有经验就没有理性一样，没有理性也就没有经验。”^⑤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观点。狄慈根文化修养不高，他能看到感性认识也必须依赖于理性的指导，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狄慈根很少讲到。同时，关于感性认识如何上

①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9、47页。

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5页。

④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62页。

⑤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98页。

升到理性认识，这一过程的内在矛盾及其机制，狄慈根也缺乏论证。说明狄慈根对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内在关系，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了解，这是他的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大的缺陷。

（三）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在真理问题上，狄慈根首先坚决反对黑格尔把真理了解为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他说：“真理必须是客观的，这就是说，它必须是它的一定对象的真理。”^①他认为真理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的，它是以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为基础的。真理之所以是真，在于它“只有与某个一定对象发生关系，只有以外界事物为依据时才能是真实的。”^②狄慈根正确地指出，寻找真理的道路不是靠主观想象、头脑的沉思，“而是我们的思维与现实的、感觉的、物质的生活的结合，这就是通过发展而成熟的哲学理论的精髓。”^③狄慈根认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要把真理的客观性作为真理研究的出发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的最基本的要求。

什么是真理？狄慈根没有下过完全、科学的定义。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真理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指思维对存在、主观对客观的正确的反映。他说：“一切领域中的成熟知识都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④第二种是指客观物质世界本身。他说：“宇宙万有是真理”^⑤，“活的宇宙才是真正的真理”^⑥等等。后一种的表述和含义都是不确切的，并且造成很大的混乱，因为是把真理与客观自然界、客观事物等同起来了。前一种表述和含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阐述。

①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42页。

③④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05、325页。

⑤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25页。

⑥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6页。

在真理问题上，狄慈根最成功的一点是懂得用辩证法来分析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狄慈根指出，人的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我们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真理的认识。因为人的认识受着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毫无遗漏地、绝对地认识客观世界。狄慈根以图画和模特儿的关系，深刻地说明了人认识的相对真理性。他说：“因为人类的认识不是绝对，而仅是为真理作出真实的、实在的、正确的和逼真的图象的艺术家，所以图画当然不能画尽对象中的一切，画家当然赶不上他的模特儿。关于真理和认识，几千年来最流行的逻辑是这样说：真理就是我们的认识与其对象的一致。从来没有什么话比这更蠢的了。图画怎么能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当然，近似是可以的。”^①列宁很欣赏狄慈根关于相对真理的论述，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作了引证。

狄慈根坚持真理的相对性，批评了形而上学绝对真理论。他说：“只有放弃那种追求绝对真理的徒劳无益的探索，我们才会知道去寻找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真理。只有意识到我们认识的相对有效性这一点才是最有力的前进杠杆。”^②这是说，只有坚持真理的相对性，才有可能推动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狄慈根认为，宇宙万有本身是包含着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无限是由无穷个有限组成的，每一个有限的现象本身都具有无限的性质。”^③正是由于宇宙这种两重性，人们在认识它的时候，就产生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矛盾。真理本身“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④。我们认识了有限、相对的事物，就向无限、绝对的宇宙的认识前进了一步。狄慈根说：“相对与绝对之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6页。

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75—76页。

③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38页。

④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18页。

间并非有一条鸿沟，无法逾越，以致可以把一个捧上天而把另一个贬得一钱不值。”^①应该从两者的辩证统一中来理解它们的关系。

狄慈根坚持了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狄慈根说，和一切自然物一样，人的“智力也是一个有限的特殊体，它在具有特殊性的同时，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本身也是普遍的”^②。这是说，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相对的，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绝对的。对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一个人不能认识的，一代人能认识它，一代人不能认识的，整个人类世代的发展能认识它。狄慈根说：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逐步地模写无限的东西，……通过局限去认识无限。”^③“在事物之中不存在不向我们的精神开放的东西。人类的精神对神秘的揭示是无限的，它提出新的说明能力是无穷尽的”^④，不可知论是完全错误的。

（四）对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的论述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在哲学史上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来的，认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即同一门科学。狄慈根基本上同意黑格尔的表述，但对他的唯心主义杂质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狄慈根批评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质，批评他把思维逻辑看作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的基础。狄慈根说，思维中概念的逻辑运动不是世界的内在本质，而是物质世界辩证运动在思维中的反映，“宇宙万有”才是真实的逻辑，它是认识 and 思维的基本前提。狄慈根特别强调逻辑学的客观基础，

①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14页。

②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08页。

③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51页。

④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7页。

强调唯物主义观点在逻辑学中的意义。

狄慈根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旧式的逻辑的缺陷，主张哲学研究的应该是辩证逻辑，这种逻辑是“以世界真理为对象，这种逻辑是宇宙的逻辑，是普遍的逻辑或世界观。”^①它把客观世界及其运动发展的一切事物当作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研究。这样，逻辑学和辩证法是一致的。狄慈根说：“逻辑学应是‘思维的定律及形式的科学’，它也应哲学留下来的遗产——辩证法。……给我们留下了逻辑学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逻辑学的哲学，不仅要说明思维，而且要说明思维由之取得图象的根源。”^②

关于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性，狄慈根也作了详细的说明。狄慈根认为，逻辑学的任务是概括地研究一切思维对象，探讨世界的普遍联系，因此，研究思维体系和规律的逻辑学和研究反映过程的认识论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狄慈根说：“人类的精神只有在与其他方面的物质世界相联系时才存在、才活动——而对于一切现有的存在有机统一的这种认识就构成了我的逻辑核心。”^③又说：“思想、智力的确存在，它的现有的存在作为整体现有的存在的一部分，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是一样的——这就是真正的逻辑学的主要论点。”^④狄慈根强调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是逻辑学的核心，强调思想与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是逻辑学的主要论点。说明逻辑学离开认识论，思维就失去了客观对象，成为无内容的主观思维。当然，人的认识也不能离开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等思维方法，离开逻辑学，认识论的体系也无法建立起来。狄慈根得出明确的结论：“我们的逻辑是认识论。它教导人们不要通过沉思的方法，而要从事物与经验的联系的角度，从整体联系的角度来探索认识。”^⑤同样，“作为

①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49页。

②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4页。

③④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12、113页。

⑤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8页。

哲学的专门对象的认识论，只是、也只能是推广的逻辑学。”^①

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一致的思想，狄慈根也有其深刻的论述。狄慈根认为，不研究辩证法，就不能揭示认识发展的内在规律，人的认识不遵循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规律就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同样，不深入研究认识论，也无法科学地解释、说明作为普遍规律的辩证法，无法正确地认识物质世界发展的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认识论和辩证法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狄慈根说，为了便于理解逻辑学，“我们用一个特殊的称号，用‘认识论’这个专门名称来称呼这个新领域，‘认识论’亦即众所周知的‘辩证法’。”^②辩证法的规律和人的认识的规律是一致的。

狄慈根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思想是明确、深刻的。当然，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他后来认真学习黑格尔著作的结果。对于三者统一的论述中，狄慈根虽然还没有明确指出它的基础是什么，但从他反对黑格尔及其全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把客观辩证法当作三者一致的基础，认为认识论和逻辑学都是辩证法的一种特殊形态。

狄慈根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论述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并对后来的列宁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果考虑狄慈根所处的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对三者同一没有作正面的阐述，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又没有公开发表，狄慈根作为一个工人哲学家，在缺乏文化修养的情况下，能叙述到这个程度确是很不容易的了。

四、普遍联系的辩证法

辩证法思想是狄慈根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曾把自己的哲学叫做“辩证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狄慈根推崇和赞

①②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39、341页。

赏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批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否定，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当他倒掉洗澡水时，他会抱住澡盆中的小孩，不会让水把他带出去。”^①狄慈根告诫儿子在学习哲学时，要认真学习辩证法。

恩格斯曾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②，认为普遍联系是辩证法的本质特征。狄慈根说：“普遍的联系是一切事物和论题都有的。”^③认为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是客观世界的固有本性，也是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主要特点。狄慈根还指出，探讨和研究世界的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首要任务。

（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原则

狄慈根指出，只要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而是辩证地观察事物，那末，事物就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④。他认为，普遍联系是物质世界的本性，事物也是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定性。狄慈根说：“有什么东西在‘自在自为地’起作用呢？光为了发光，太阳为了发热和在其轨道上运行，需要有空间和被照耀、被温暖、被通过的其它东西。要我的桌子有颜色，就必须有光线和眼睛，此外这桌子具有其他一切性质，只是因为它与另一些事物相联系，……这就是说，世界只存在于相互联系之中。一切事物只要失掉这种联系，便不再存在。”^⑤狄慈根认为，事物只因为与其他事物有关，只因为起作用或表现，才成其为自己。如果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它们就无法起作用，当然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世界联系，人类就不存在；没有光线，人就没有眼睛；没有声音，人就没有耳朵；没有物理，人就没有伦理。“事物只有在其联系中和

①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③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73页。

④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7页。

⑤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页。

“凭借联系，才真实地存在着。”^①

狄慈根指出，事物之间的联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复杂的，构成了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因此，在认识一个事物时，不应该孤立地考察，而要尽可能地把握它与周围事物的各方面关系，了解事物的整体联系，否则认识就会产生片面性。狄慈根认为，只有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才能彻底坚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观点，把一切神秘主义从哲学的垃圾中清除出去。

狄慈根坚持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他并没有否定事物的独立性，没有否定事物本身的特殊性。狄慈根在讨论科学对象问题时曾强调指出：“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在一起。但如果因此而不对事物加以区分，那么每一种分科和每一篇论著的内容就会漫无边际。”^②他在讲到科学分类时说得更清楚：“每一个东西是一个独立事物，同时一切事物又都不可分割地彼此联系在一起。”^③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事物存在的科学观点。

狄慈根指出，唯物辩证法在研究、探讨事物的普遍联系时，要力求弄清它们的联系方式和方法，弄清它们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尽可能全面地、深入地考察对象的各种关系，才有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得出正确的结论。狄慈根举例说，脱离开认识对象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孤立地、静止地考察事物，甚至连“下雨好不好”这样简单的事情也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久旱的地方，下雨是好事；在涝灾成灾的地方，下雨就成了坏事。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全面地、深入地考察事物，才能达到对事物的科学认识。

（二）运动发展的原则

狄慈根特别推崇达尔文和黑格尔的关于运动发展的观点，他

①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86页。

②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21页。

③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54页。

说：“前者探求物种的起源，后者探求人类的思维过程。但二者的结果都是发展学说”^①。狄慈根认为，黑格尔的宏大辩证发展学说是伟大的，但它是**以唯心主义为前提**，必然是不彻底的。狄慈根企图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论证运动发展的原则。他说：“世界在我们面前生而复逝，逝而复生。”^②上至宇宙天体，下至生物植物个体，“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③。又说，宇宙中的物质“运动不论在过去、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是永恒的。”^④狄慈根把物质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看作是宇宙的本质，认为物质是存在于变化之中，物质是运动变化着的东西，运动、变化是永恒的、不变的。整个宇宙是呈现着和运动着，无穷地变化着和流动着，永恒不变、静止不动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

狄慈根认为，客观世界物质的运动、变化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也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是永无止境的发展。狄慈根是这样解释发展的，他说：“发展既是革命的，同时也是保守的”^⑤，“发展是先取出小孩，然后倒掉澡盆中的水。”^⑥“一切新事物都具有辩证的尾巴，它同时又是陈旧的事物。只有借助于旧的认识才能得到新的认识。”^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狄慈根对发展是作辩证性的理解，认为发展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扬弃，是把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经过改造而保留在新事物之中，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关于物质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问题，狄慈根也基本上作了正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0页。

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页。

③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1页。

④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59页。

⑤⑥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84页。

⑦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57页。

确的回答。他认为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推动事物的运动发展。这种相互作用绝不是简单的外力推动，而是事物的一种共同运动的作用。他举石头落入水中引起波纹为例：“只有在落下的石头与液体相接触时，只有在两者共同作用时，才会引起波纹。”^①狄慈根这个例子虽然很简单也不怎么深刻，但基本上准确地表达了运动发展的动力在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点。

狄慈根还看到，事物的运动发展和事物的普遍联系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他说：“为了按事物的真正联系进行思考，你不可把任何事物看作独立的事物，而应把一切看作一个实体的流动的性质”^②。同样，没有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也不可能有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狄慈根能把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原则统一起来理解，勾画出客观物质世界辩证运动的图景，不能不说这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因为不仅使事物的普遍联系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有有力地证明物质世界是自因的，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在于它内在的矛盾根据。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一元性最有力的证明。

（三）对立统一原则

对立统一的思想，在狄慈根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往往是通过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批评表现出来的。狄慈根认为，同一律作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一种思维形式是正确的，但是形而上学者把它扩大为一种世界观和普遍方法论却是荒唐的了。因为在同一律看来，矛盾是不可想像的，不现实的。狄慈根指出：“矛盾有两种：一种是无意义的，另一种是极有意义的。”^③前者是指主观臆造的矛盾，后者是指客观现实的矛盾，

①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55页。

②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0页。

③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0页。

这种矛盾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辩证关系，构成事物的本质。他说：

“把事物看作‘自同’是一种绝不可缺少的处理方法，但同时注意到事物不仅是自同而凝结的，而且也在变化流动，是十分有益的。这是一个矛盾，但并非没有意义。”^①这是他对事物既同一又对立的看法。

狄慈根批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认为它的实质在于“夸大差异和区别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事物的自相矛盾的或者说辩证的性质，即：事物不仅是分开的，也是联系在一起的。”^②形而上学者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因此不可能认识事物的辩证本质。狄慈根是用“同一”、“自同”和“变异”、“多样”等范畴来表示事物的对立统一。同一和自同这是表示事物的肯定方面和质的稳定性，变异和多样是表示事物的否定方面和它的差异性。狄慈根指出：“不论是人，是森林，还是花岗岩，其自同性与其对立面，与无穷的变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③把同一和变异看成是事物的两种基本属性，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形成事物的实质和发展的动力。

狄慈根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他说：“全部自然界、全部存在，都生活在矛盾中”^④，“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矛盾，其中包含无数最有意义的命题和反命题；这些命题永不消亡，但可以借助于时间和理性而趋于统一。”^⑤狄慈根说，就是连人的思想、意识也充满着矛盾。“意识本性就是矛盾”，“思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事物，是一个辩证法之谜。”^⑥“必须承认矛盾

①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3页。

②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1页。

③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3页。

④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8页。

⑤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4页。

⑥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05页。

乃是统治思维和存在的普遍的东西。”^①狄慈根坚持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是世界存在的本性、本质，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狄慈根还用大量的事例论证了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说，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都是无限的世界的一个片断，都具有它的无限的性质的一部分，都既是永恒的，又是会灭亡的，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既是大的，又是小的，既是单方面的，又是多方面的，因而都是矛盾的。”^②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生与死、冷与热、曲与直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一切直线实际上都包含着充满矛盾的曲性”^③，“只要你观察生命，你马上就会看到死亡；但是再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到死亡不是死亡：‘废墟中产生新的生命’。”^④关于人类社会的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狄慈根认为也是对立统一的。他说，战争与和平两者的性质是对立的，但是也是相互依存的，永久的和平和无休止的战争都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战争中的和平与和平中的战争是永久的”^⑤。

狄慈根从考察矛盾的普遍性中得出结论：“辩证法的第一项就是告诉我们事物不仅等于其本身，不仅自始至终同一，而且同一事物还具有矛盾的本质”^⑥。狄慈根把矛盾的学说列为唯物辩证法的第一项内容，这说明他是重视矛盾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不能认为狄慈根已明确肯定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但这思想确已初露端倪。

（四）辩证法的范畴

在狄慈根的著作中使用了许多范畴，如现象与本质、整体与部分、一与多、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原因与结果等等。其

①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9页。

②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47页。

③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6页。

④⑤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2—133页、137页。

⑥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4页。

中，狄慈根对原因和结果、现象与本质尤其重视，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和发挥。

狄慈根指出，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原因必须是现实的原因，必须是一个客观地存在着的结果的原因。”^①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是物质世界中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它是世界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狄慈根还指出，对因果规律中的原因应作唯物辩证的理解。他认为原因不是一种神秘力量，也不是一种简单地存在的事物，而应该把原因了解为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狄慈根还批评唯心主义、神学家杜撰出来的所谓终极原因，强加给整个宇宙。他说，一切具体的东西的存在是有根据的有原因的，“但其所据的原本，即普遍的宇宙都是无根据的，它本身既是根据又是推论，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要言之，一切根据都出自无根据，这是一条重要的辩证法知识”^②狄慈根说，宇宙存在的原因是在它自身之中，是宇宙的整体联系，“自然就是一切事物的最终原因”^③。离开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在物质世界之外去寻求终极原因，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创世说。

狄慈根在肯定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基础上，阐述了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狄慈根说，毫无疑问在任何既定的关系中，原因和结果都是确定的，不容混淆的，否则就无法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但从整个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发展的物质世界来看，“一切事物既是因又是果”^④，“每一个原因都产生结果，每一个结果都成为原因”^⑤，原因和结果不是僵死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狄慈根在考察因果联系时，已经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复杂性。

①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55页。

②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8页。

③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9页。

④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70页。

⑤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53页。

他说，一个原因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结果，“同样，事物也不是有一个因，而是有许多的因，有无数的因，这些因聚合而成为总因。”^①因此，在认识现实中因果关系时，首先要从客观事实出发，“不是先天地而是后天地……不是在现象的外面或背后，而是在现象中或借助现象追求原因”^②。从感觉现象入手，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了解原因和结果的内在联系。

对现象和本质范畴的论述，这和狄慈根反对新康德主义者的唯心论和不可知论有着密切关系。康德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的内在联系，认为人们只能认识现象，本质是属于彼岸的，不可认识的。狄慈根揭露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本质并不是神秘的力量，而同现象一样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一个方面，本质与现象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是不可割裂的。狄慈根说：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矛盾不是矛盾，而是一种逻辑作用，一种辩证的形式。”^③两者虽是有区别的，但也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之中。“宇宙的本质是现象，而它的现象又是本质的。”^④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又是本质的一种表现，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

狄慈根指出，如果把本质和现象割裂开来，企图在认识中去把握那个与现象分割的本质，这实质上是找不到的，只能重蹈康德的不可知论的道路。狄慈根说：“懂得这种辩证法就能充分说明企图在假象背后去寻求真理，即在每一个宾辞背后去寻求一个主辞的形而上学的冲动。只因为不懂得辩证的认识作用，这种冲动才会向往在宾辞之外去寻求主辞，在现象之外去寻求真理。”^⑤对新康德主义者的批评是中肯、确切的。

①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70页。

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51页。

③④⑤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84、292页。

狄慈根对唯物辩证法的论述，主要是以上的四个方面，各个方面论述的特点、详尽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毫无疑问，狄慈根同马克思恩格斯相比，他的辩证法思想无论在深度、广度、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都是相差甚远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狄慈根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就会看到，这个完全靠自学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工人，实际上要比当时许多名噪一时的哲学教授高明得多，其思想也深刻得多。

五、狄慈根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狄慈根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哲学家，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的修养，在他的哲学著作中除了一些天才闪光的思想之外，也存在一些模糊、混乱和重大的错误。当然他的错误思想和混乱的表述，在不同历史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应作具体的分析。他的错误理论大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由于用词不当所造成的错误。这种情况，在狄慈根的著作中最为普遍，比如在真理问题上，狄慈根把真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客观化混淆起来，把真理等同于物质世界，并认为真理是世界的本质。他说：“真理是一切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现象与现有的存在的绝对的、普遍的总和”^①，因此，“真理、现实、世界、万有、无限和绝对是同义字眼。”^②又说：“观念和事物共有一个母怀……，这个母怀就是绝对真理。”^③“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智力是一切真理的根源，而外部自然界如同我们的内在理解力一样，都是构成真理和绝对的整体自然的片断。”^④这种论述不但是混乱，而且把思想、精神性东西当成真理的源泉和世

①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7页。

②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18页。

③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33页。

④ 《论逻辑书简》，《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62页。

界的本质，这就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这种观点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反的。所以，当狄慈根写信给马克思提出将真理定义为全能的宇宙时，马克思作了严肃的批评：“这个不幸的人倒退地‘发展了’，并正好‘走到了’《现象学》（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引者注）那里。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无可挽救的。”①

扩大物质概念是狄慈根又一重大错误。他混淆了物质和认识对象的两个不同概念，认为物质世界是认识的对象，那末，认识的活动和思维的活动也是物质的。他说：“我们要区别思维与存在。我们要区别可感觉的对象与它的精神概念。但是，非感性的表象也是感性的、物质的，即现实的。我感觉到我的书桌这一思想，正象感觉到书桌本身一样，都是物质地感觉到的。”②他错误地把思想、精神的东西也看成是物质的东西。狄慈根还很不恰当地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去说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提出要扩大物质的概念，扩大到不仅要包括一切物理现象，包括具体的、可感觉的东西，而且也包括思想、精神现象，包括我们的认识能力和说明能力。他说：“一切真实的存在都是物质”，“思想、思想的来源和思想的性质也同样是真实的物质”，“即使是所谓精神的情况，如政治、宗教、道德等的情况，也都是物质的情况”③。这样就完全混淆了精神与物质的本质区别，如果此观点发展下去，就会滑向庸俗唯物主义。列宁尖锐地批评了狄慈根关于扩大物质概念的提法。他说：“这是糊涂思想。如果这样，狄慈根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就会失去意义。”④

第二，由于狄慈根对认识的复杂性缺乏分析，错误地提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8页。

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6页。

③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47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1页。

“先天意识”。他提出认识起源于经验，这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线。但是，他在论述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时，却又错误地提出先天意识。他说：“如果我说关于无限的、绝对的真理的意识是天生的，是一种、并且是唯一的先天的知识，那么连经验也证实了这种天生的意识。”^①狄慈根所说的先天意识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指由自然界所禀赋的超经验的认识能力。他说：“如果没有先天的能力，即使有一切经验，也无从积累认识，而若没有一切经验，就是最好的能力也必然是一无所获的。”“人类先有一种求知的意识、求知的能力，然后才有所知”^②。第二种是指意识中超经验的内容。他认为对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自然的认识是先天的，是伴随着意识产生的。他说：“不仅求知的一般能力或可能性属于先天的意识，有关整体自然的普遍性的意识也是先天的”^③。尽管狄慈根对先天意识还有很多解释，认为先天意识只是关于无限绝对宇宙的认识，就是先天意识也要通过经验才能变得明确、清晰，需要通过经验才能发展、完善，企图把他的说法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生而知之区别开来。但是，他上列的说法，在理论上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是对立的。

第三，由于表达的不确切，造成思想的混乱，这是狄慈根哲学思想中的第三个错误。比如他认为整个物质世界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根据又是推论，不能把原因与结果形而上学地分割开来，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他在表述因果联系时却说：“因果范畴不是不可思议的事物，而是自然现象先后出现的一种所谓机械排列或机械分类。”^④狄慈根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它不但否定了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而且没有和机械论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狄慈根对于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论述是相当充分的。但他在解释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33页。

②③④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25、359页。

如何解决矛盾的时候，却说什么“自然的矛盾需由我们的头脑来解决。”^①“一切对立在我们的概括能力或思维能力之前都消失了，因为这种能力在一切对立中为中介、在一切差别中寻求同一。”^②这种表述显然也是一种混乱，用主观调和的办法企图去解决客观矛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批判狄慈根用“暧昧、模糊、混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③造成反动哲学家们和马赫主义者所喜欢。

第四，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忽视或认识不足，造成狄慈根哲学思想的局限性。狄慈根对于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几乎从来没有提及过，也很少从质变的角度去考察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很少对事物作质的区别。他说：“事物之间只有渐次的区别，而没有过分的区别，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有一个本质，其余一切所谓本质都应视为一般本质的非本质形式”^④。狄慈根忽视质量互变规律的研究，使他在阐述物质的运动过程时往往是不彻底的，而且还表现出渐进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中，曾多处使用过“实践”这个概念，但是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实践”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范畴，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一个基本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狄慈根只是在感觉经验的意义上认识实践的前提作用，根本不认识实践在认识过程的重大意义。因此，在思维和存在的辩证统一的问题上，在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检验认识的标准等问题上，在感性向理性的飞跃、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过渡等问题上，他都没有也不可能运用实践和实践观的思想去说明。由于他对实践的认识不足，因此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①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6页。

②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7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1页。

④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6页。

论思想显得很薄弱。

以上四个方面，可以说是狄慈根哲学思想中的局限性或主要的缺点错误。造成狄慈根哲学思想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主观条件来说，由于狄慈根的文化知识的修养不足，他不可能深入地理解和科学地解释哲学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当他对辩证唯物主义作进一步深入探索的时候，不是止步惊叹就是作了错误的或模糊的解释。列宁认为他“暧昧、模糊、混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对狄慈根哲学思想中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隐讳，而总是公正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186⁸年10月，当马克思第一次读到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的手稿时就曾指出：这本书“缺少辩证的发挥和重复过多”^①。同年12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又一次指出狄慈根的手稿“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②。恩格斯对狄慈根的错误也进行严肃的批评。他在1868年11月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狄慈根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术语表达的混乱，“缺乏精确性”，“缺乏逻辑修养”，“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并指出狄慈根之所以失误的原因，是由于他“不是天生的哲学家，况且是一个一半靠自学出来的人”，“出现重复，部分是由于术语上的缺点，部分是由于缺乏逻辑修养。”^③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是在全面分析狄慈根哲学思想，在肯定他的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他的缺点，是在爱护和帮助狄慈根的原则下，批评他的错误。但在约·狄慈根逝世后不久，被称为不肖之子的欧根·狄慈根却利用他父亲的哲学思想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杜撰出所谓“狄慈根主义”、“无产阶级的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2—183页。

一元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围绕狄慈根哲学思想的局限性，进行一场尖锐严肃的斗争。当欧根·狄慈根毫无根据地把约·狄慈根的辩证法看作辩证法发展的最高阶段时，普列汉诺夫严肃地指出：其实“约·狄慈根的‘自然一元论的’辩证法‘开宗明义第一章’所‘宣称’的，完全就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很久以前所宣布过的东西：‘观念的东西就是被移置于人脑中并在其中经过改造的物质东西。’”狄慈根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区别究竟在那里呢？没有区别。约·狄慈根究竟给马克思‘补充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①列宁对欧根·狄慈根杜撰的“狄慈根主义”也作了坚决的斗争。列宁说：“‘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想不根据约·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这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是有许多伟大之处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种路线的企图！”^②“从马克思到‘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的道路，是一条通向泥潭的道路”^③。

梅林对狄慈根的哲学思想和所谓“狄慈根主义”作了严格的区分。他指出：“狄慈根主义”与狄慈根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是反对狄慈根的斗争，“我们进行的是反对自称‘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而实际上只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发生混乱的‘狄慈根主义’的斗争。”^④“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这个人要是现在还活着，看到‘狄慈根主义’竟做出这样的表现，是会叫它见鬼去的。这个人就是约瑟夫·狄慈根。”^⑤

尽管狄慈根哲学思想中存在不少缺点错误，但从他的全部著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2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3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5页。

④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同），第159页。

⑤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60页。

作和全部思想来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杰出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

第二节 弗兰茨·梅林哲学思想

梅林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艺术和军事也有很高的造诣，在学术领域，是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一生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在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成为世界各国工人中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

一、梅林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弗兰茨·梅林1846年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旧官吏的家庭，从小有着较好的文化教养。1866年至1870年先后就学于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主要攻读哲学和文学史，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新闻工作。从1860年起，梅林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约·雅科比和格·魏斯之后，开始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所组织的《未来》半月刊和《天平》周刊撰稿和编辑工作，从事他的文学、哲学和社会政治活动，表现出强烈的民主主义的思想。60年代，正是梅林风华正茂的年代。他刻苦好学，强烈追求真理。这时对梅林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康德、雅科比和拉萨尔的思想以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精神。到了70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运动的推动，才开始接受费尔巴哈哲学，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还是格格不入的。

1878年，俾斯麦颁发了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置于非法的地位，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梅林不畏强暴积极地参加反对俾斯麦的反动的反民主的专制制度的斗争，支持德国工人阶级为取缔非常法，争取合法权利的运动，在广大群众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1886年，梅林担任了《人民报》的主编。这家报纸“用适合政治形势的坚定性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开始在报刊上批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支持和保护受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人。俾斯麦反动政府于1890年10月以触犯“反社会党人法”、“侮辱圣上”的罪名，查封了《人民报》，解除了梅林的主编职务。通过这场斗争，使梅林进一步认清了俾斯麦政权的实质，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

1891年，梅林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并担任了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这期间，他不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认真刻苦地攻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真正走上了与德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不久，梅林又担任了《莱比锡人民报》的主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努力。在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革命左派一边，无情地揭露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反马克思主义阴谋，从此，成为世界公认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梅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他和卡·李卜克内西一起创办了反战杂志《国际》月刊，因而在70岁高龄时被捕入狱。1916年，他和德国左派一道，建立了“斯巴达克联盟”，这是德国共产党的核心组织，为筹建德国共产党作了组织上准备。梅林积极支持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他按斯巴达克联盟同志们的愿望，1918年6月，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致布尔什维克的《公开信》。随后，又在《莱比锡人民报》和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人》周刊上，撰写了《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等文章，热烈赞扬和积极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革

命路线。1918年底，在梅林的努力下，建立了德国共产党。1919年1月29日病逝于柏林，梅林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梅林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开阔、多才多艺的学者。他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造诣很深，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史、社会主义民主党史方面有着很深的研究。从90年代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价值的著作：《莱辛传奇》（1893年）、《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年）、《马克思传》（1918年）、《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史》（1910—1911年）等。此外，在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主要的有：《康德和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1900年）、《罗陀斯岛上的舞蹈》（1902年）、《康德和马克思》（1904年）、《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1909年）等。在哲学史的研究方面，他也写了很多文章和专著。1902年，梅林还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四卷集，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在40年代至50年代的主要著作、文章、书信，作了详细的编辑、评论和注释，这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珍品。

恩格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梅林的理论研究给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1892年3月16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曾认为梅林的《莱辛传奇》是“一篇出色的作品”，使他“感到十分满意”，因为“令人鼓舞的是，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导线索来应用。”^①在1893年4月，当《莱辛传奇》出单行本时，恩格斯写信给梅林，称赞他的巨大功绩是：“在普鲁士历史这一摊污泥浊水里清出一条路来，并指出了事物的真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10页。

联系。”并认为梅林这一著作“比一切现有的关于这一段德国历史的论述都好得多。”^①对于《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恩格斯认为主要的事实梅林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②列宁认为“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③认为梅林的《莱辛传奇》和《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普列汉诺夫把梅林评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最（几乎是唯一的）懂哲学的一个”。

二、梅林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和阐发

19世纪末，资产阶级掀起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其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否定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胡说什么它只是少数几个“聪明的煽动家”所杜撰“幻想”；他们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任意的历史结构”、“死板的公式”，否定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一切观念的力量”，把人说成为机械发展的无生命的玩具，否定唯物史的革命能动作用。在这反动的思潮中，德国的社会学家、莱比锡教授保尔·巴尔特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反对唯物史观可以说是达到疯狂的地步，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技术经济历史观”、“社会静力学”等等。资产阶级教授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解释唯物史观。

面对种种的攻击和非难，梅林坚定地站在恩格斯一边，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无耻的诬蔑和诽谤。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不但出色地捍卫和宣传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探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3页。

③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5页。

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

关于唯物史观的产生有没有历史必然性问题，梅林在1893年写了《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反驳资产阶级学者时说：“事实上——并且是当然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①梅林是说，唯物史观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在以前，历史的动因和其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人们对历史的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以来，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如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历史的因果联系也简单化了，这时人们就有可能揭开人类社会的历史之谜了。至于唯物史观创立的主观条件，梅林把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尔巴哈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梅林说：“费尔巴哈是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环节，但他由于德国情况的恶劣而在半途停步了；他对于‘获致真理’仍看作为一种纯粹思想意识的过程。”^②梅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跟费尔巴哈根本不同，他们不但懂得德国哲学，而且也懂得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他们通晓人类发展的历史，继承和发扬了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因此，在人类的课题差不多还未提出，在解决这个课题的物质条件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他们就能解答了这个人类历史之谜。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毕生工作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他们的全部著作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说他们二位只是东鳞西爪地剽窃了一些历史知识来支撑他们所杜撰的历史理论，那完全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鬼话。”^③

①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3、9页。

③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4页。

1897年，梅林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再一次阐述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社会历史观上实现的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梅林在反驳资产阶级学术界污蔑唯物主义历史观根本不是新的，决不是真实的时候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凭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假如他们这样断言，那么他们自己就否定了按照其全部意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能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①梅林还驳斥了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说成是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简单捏合的论调。梅林说：“马克思并不是盲目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孤立的唯物主义。他证明不是思想具体化为事物，而是事物反映在思想之中，于是他就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而当他指出川流不息的辩证过程怎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生作用时，就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②梅林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崭新的世界观，它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它的产生在思想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个“死板的公式”还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驳斥资产阶级的攻击时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事情并不是资产阶级攻击的那样，事实上正好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排斥了每一种想把多变的人类生活视为一律的死板公式。”^③梅林大量引证恩格斯晚年在书信中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一贯坚决反对把唯物史观当成现成公式到处乱套的作法。梅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它只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

①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215—316页。

②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315—316页。

③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0页。

科学方法。”^①因此，运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时，无论是对那一个历史时期和那一个历史问题，都不带任何预先的假定，任何主观偏见，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它进行从基础到最上层的研究，从它的经济结构起一直向上研究到它的精神观念。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人类的历史是极其复杂的，各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大致相同，但绝对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就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别。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是一个现成的公式，而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只要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当作模版来滥用，——这已经有过了，——它就会象一切历史观的模版一样导致到同样的颠倒是非，而且，就是把它正确地作为方法来使用，也会随着使用者的才能和学力的不同，或者随着他们所处理的材料来源的种类和方法的不同，而导致许多见解上的差异。……在历史科学的领域里，根本不可能象数学那样精确的证明，因此，谁要是相信可以通过这种‘互相矛盾’来驳难历史研究的唯物主义方法，那也没有人去妨碍他享受这种愚蠢的乐趣。”^②

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作为自己学说的前提和出发点，认为“人首先得吃、喝、住、穿，然后他才能思想和创作，人必须与别人有社会交往才能获得意识，”^③因此，决定它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唯心主义者却是相反，“他的社会存在由他的意识来决定。恰恰是认为人必需先经过思维才能吃、喝、住，通过哲学才能达到经济的假定，才是显然‘最任意的’预先假定，因此，恰恰是历史唯心主义才是最令人吃惊的‘历史结构’。”^④黑格尔就是这样，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5页。

②③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74—75、21页。

④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1页。

他把结果当作原因，把事物当作观念的映象，在历史观上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观念的力量”，把人类变成为机械发展的无生命的玩物，这纯粹是一种无耻的诽谤。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类并不只生活在自然界里而且也生活在社会里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与世隔绝的人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如果偶然脱离了人类社会，任何人都会很快地衰竭而死去。由此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承认最广义的观念力量的。”^①梅林引证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有关论述，说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根本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的思想观念、动机在社会中有着重大的作用。说马克思主义否认思想观念的作用，这完全是捏造。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思想观念的力量时，是要研究人的观念动机是由什么驱使的，要弄明白观念是从那里汲取力量的。梅林说：“观念不是从无中产生，而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所以，一个观念愈精确反映这个过程，这个观念就愈有力量。人的精神并不超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上，而是在其中；人的精神是从物质生产里成长的，随着物质生产并和物质生产一同成长的。”^②这是说明了物质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活过程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梅林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实际材料，阐述了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能动性。梅林还利用摩尔根所提供的材料，详细说明社会发展也并不是死板的机械运动，事实上，人类的精神一天比一天更其成为自然界死板的机械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5页。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7页。

活动的支配者，并在对于生产过程的精神支配中实现了、并且继续实现着人类的进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的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统治自然的能力也不断地扩大。梅林最后得出结论说：“人类并不是一种死板的机械活动的无意志的玩具，人类的进步发展相反地恰恰在于人类精神对于自然界的死板机械活动的日渐增长的统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也只是这一点——人类精神是依靠物质生产方式、同物质生产方式一起和从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人类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物质生产方式倒反是人类精神的母亲”^①。这是全面地分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既反对了唯心史观，同时又避免了机械论。

梅林在1897年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章时，再一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一切思想的动力从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驱逐出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纯粹的捏造。他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中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国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事实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思想观念也能影响经济事实；决不能因为意识形态不能发生独立的作用，就以为意识形态不发生作用。”^②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梅林是既唯物又辩证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进行指责：一是给唯物主义这个词被加上了一层暗指着不道德的附加意义；一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淆起来。梅林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是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为标准的，哲学派别的划分与道德理想没有丝毫关系的。把唯物主义丑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9页。

②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318页。

化为喜欢大吃大喝、追求物质享受，把唯心主义美化为“相信人类进步”、对“美好世界的信仰”、“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这是神甫们和资产阶级学者的偏见和有意的捏造。梅林说，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淆起来，这是大错特错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把人只看作自然人，不了解人的社会意义，它没有考察人的意识是由什么决定的，“因此，当它进入历史领域时，它就转化为自己最相反的对立物，即转化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①历史唯物主义则与此相反，“认为人不只是动物，而是一种社会动物，他只在社会集团的共同生活中才获致意识，在这些社会集团中他才能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而生活，因此，这些社会集团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他的思想意识，这些基础的进步发展则是人类向上运动的规律。”^②此外，梅林还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认一切道德尺度，忽视气候和种族物质因素等等谬论。在与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梅林不但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它的基本原理作了深入的发挥和说明。

三、梅林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分析批判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19世纪末，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应运而生、广泛流行，对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着重大的危害作用。梅林密切注视着哲学斗争的新动向，深入地研究了各种思潮产生和流行的原因，分析了它的理论实质，对其反动性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对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的批判

阿尔都尔·叔本华（1788—1860）是德国资产阶级反动阶层的代言人，是意志主义的倡导者。恩格斯曾经说过，叔本华的哲

①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8、19页。

学不过是“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而且全都同样是形而上学的。”^①在1848年革命以前，叔本华哲学在德国的哲学界中影响甚微，也没有形成一个哲学学派。叔本华本人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但1848年革命失败后，情况有着重大的变化，善于妥协的、软弱无能的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失败后，被容克地主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专横吓破了胆，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也惊恐万状。他们思想上的那点革命勇气丧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逃避现实、悲观失望、苟且偷生。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种思想状态，叔本华著作正好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于是，被人遗忘了整整三十年的叔本华哲学，突然变成了一种时髦，叔本华本人也变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梅林指出，叔本华所鼓吹的人世悲观主义和意志主义，是适合于资产阶级在50年代中受官僚封建反革命势力打击之后所经受的余痛状态的。因为，这时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政治意志，它宁愿任凭头脑清醒和丧失全部意志后所出现的‘精神宁静’这类诱人的景象所愚弄。^②为什么德国资产阶级抛弃黑格尔哲学转向信仰叔本华哲学呢？梅林指出，这是在于叔本华哲学“使他摆脱了一切悔恨和羞愧的感情，因为它向他指出，他一切自私的和妒嫉的才能构成人类智慧的核心。”^③

关于叔本华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梅林作了深刻的分析。梅林说：“在叔本华那里，意志是一种自在之物，是全部自然界的基质，是我们直接知道并且明确熟知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自我内部能找到的东西，但同时又是不可解释的、位处于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东西”^④。梅林说，叔本华认为“意志是第一性的，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② 参见梅林：《文艺批评论文集》，1934年俄文版，第2卷，第600页。

③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28页。

④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89页。

识是派生物”，意志成为世界的基础、本原，是“世界的内在内容和本质”^①“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这个意志的表现、客观化，世界只是这个意志的一面镜子”^②。这样，“他的意志常常使他成为唯灵论胡说的牺牲品”^③。这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

梅林还指出，叔本华的哲学不但是唯心主义的，而且也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他完全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结构。他认为人类历史中没有上升的发展过程，在人类历史中只看见各个个体的历史，并且人类社会不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是那个样子，永远是原样不动的。梅林说，这正是表明了德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逃避现实的本性，故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得他们烦恼和恐怖。

爱德华·哈特曼（1842—1906）是叔本华哲学的继承人，意志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写有《无意识的哲学》（1869年）一书，跟叔本华一样，把意志作为世界的本原，把表象作为意志的向导。列宁称他为“哲学上的彻底唯心主义者和彻底的反动分子”^④，梅林也对他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揭露。

梅林说：“叔本华哲学中这些令人惋惜的弱点由爱德华·封·哈特曼用他的无意识哲学作了弥补。他把叔本华的愤怒的悲观主义缓和成为‘欢呼的悲观主义’，固然仍把‘世界的贫困’，‘生存的疯狂的谢肉节’留给下层阶级，但绝对不禁止有足够钱财的人享用这个世界的好东西”^⑤。梅林一方面指出，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只不过是更加发展了叔本华的意志主义，“无意

① 《叔本华选集》，1928年英文版（Dewitt Harker编），第190页。

② 《叔本华选集》，第244页。

③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90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页。

⑤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91页。

识”成为一个唯一的、统摄一切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哈特曼比叔本华更反动，因为在为资产阶级效劳方面他比其前师更卖力气。梅林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叔本华还有相当的自豪感而与众不同；……哈特曼则相反，他完全是一个退伍的普鲁士武夫，一切都要用普鲁士伍长的棍子敲敲打打。”^①梅林又说：

“哈特曼向统治阶级表示 he 自己是顺从的帮凶；他甚至用哲学来论证反社会党人法的必要性”^②。这是深刻地揭露了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的实质，揭露他本人根本不是什么学者，而是地道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和凶恶的打手。

梅林还指出，哈特曼也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自然科学的敌人。他不但敌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企图“把当代自然科学包括在唯心主义里”，把科学纳入他的意志主义的轨道。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被梅林称之为大资本的哲学家，他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中最反动阶层的利益，对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有着刻骨的仇恨。梅林说，他的恶毒咒骂自觉的无产阶级，“他的攻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出于和最好的交易所里的事务家、头号的卖身投靠无耻文人一样的、同样的最崇高的思路。”^③在哲学上，他承袭了叔本华的思想，并把叔本华的带有强烈悲观主义倾向的生活意志论变成了“行动哲学”、“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尼采认为，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是没有的，一切都是由权力意志决定的，“除了意志和意志以外，根本没有别的因果联系。”他提出他的哲学目标不是“人类”，而是超人，也就要使个人的要求、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乃至把个人当作一切的主宰。在“超人”哲学的下面，尼采把人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他把资本家看成是善良的、有理性的“上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43页。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91页。

③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44页。

等人”，把专制独裁者、法西斯狂人捧为“超人”，而把创造历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说成是“下等人”，是“畜群”、“贱民”、“败类”等等。梅林说，尼采所论证的“善与恶、理性与愚蠢之间的差别”，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超人’的‘主人道德’是没有善与恶的差别的，是‘站在善恶以外’的资本主义先知，却以古老的童蒙笑话结束了对社会主义的诘难：人类的平等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野蛮的自由’上；不过还有一点小小的附带条件，那就是，善良和理性的人成为资本家，邪恶和愚蠢的人成为无产阶级而已。”^①这是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尼采美化资本主义、咒骂社会主义的反动嘴脸。

（二）对新康德主义、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批判

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80年代风行起来。这个派别打着“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企图复活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的流行，引起梅林极大的注意，他深入地研究和剖析了新康德主义者的著作，严肃地说：“‘回到康德那里去’即是（当然，那是纯然幻想而已）绞杀整个社会主义，是一种——幸亏是想象的——想回到十八世纪的极其不幸的自欺中去的垂死挣扎；而根本地铲除了这种自欺则正是十九世纪的最光荣的功绩之一。”^②在90年代初，梅林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新康德主义的实质，批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修正。

新康德主义者伏尔伦德尔认为社会主义和康德伦理学有着直接的联系，企图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柯亨走得更远，他把康德称颂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创始者”。梅林针对这种种的无耻谎言，进行坚决的驳斥。梅林指出，康德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根本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康德主义“对于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49页。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06页。

德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没有丝毫促进作用，但对于自由主义、尤其是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建立则提供了许多的基石。”^①梅林指出，康德的伦理学不但是阴暗而晦涩的，而且还是一个血管中奔流着神学的全部毒血的市侩。他的关于义务以及他的绝对命令的学说只是摩西的十诫，关于人的天性中的绝对的恶的学说，只是关于原罪的教义而已。康德的伦理学没有什么新东西，它是完全全相应于康德本人所生活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而剪裁出来的，对于资本主义大生产每天数以百计地制造出来的伦理冲突，它都完全不能适用，把它搬来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那是非常可笑而荒唐的。

梅林还揭露了新康德主义者企图用康德的认识论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阴谋。梅林说，康德那个存在现象彼岸的、人类的感觉和理性所不能感知的“自在之物”，实际上是塞在康德的信徒们胃里的一个硬块，尽管新康德主义者把它解释为只是一切认识的总和，是一个假设，是认识的无穷课题，即使是这样，康德的认识论也不能向历史唯物主义说出它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康德的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是毫无联系的两个东西。当柯亨、施陶丁格、伏尔伦德尔等新康德主义者要求社会民主党，不仅暂时地摔开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还应该根本地抛弃它的时候，梅林作了坚决的驳斥。他指出，这是荒唐的要求，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世界观，这个党绝不容许它的科学世界观的晴空为思想意识的迷雾所阴暗。“只要新康德主义者要求这样，我们与他们如施陶丁格和伏尔伦德尔之间就不可能获致任何妥协。”^②

梅林还揭露新康德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嫁接在康德身上，或把康德嫁接在马克思身上，从而混淆两种学说的根本对立。梅林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02页。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15页。

说，新康德主义者这种做法，即使是出自最高尚的动机，也是能导致把德国工人阶级意识中经过那样的困难才获得的他们对于历史任务的理解重新再模糊起来。

梅林对新康德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认识不足之处。如对新康德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朗格的评价上，梅林除了一些必要的批评之外，更多的是对他的赞赏和正面肯定。梅林说，朗格是一个“诚实和坦白”的年轻人，是“一个天生的教育家”，“一个博学的研究工作者”。又说，“在科学理论和实际活动方面，他是全面的，他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的形象”，“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私偏见”等等。这种评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过分地夸大了朗格的作用。

对于欧根·狄慈根杜撰、宣扬的“狄慈根主义”，梅林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它作了坚决的斗争。1909年10月，梅林写了《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详细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历史过程，深入地分析了狄慈根哲学思想的理论实质，批判了欧·狄慈根用“狄慈根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谎言。梅林说，狄慈根高出于费尔巴哈，是一位天生的辩证论者。“但是，如果说他不依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独立发现了他的辩证法，那也完全不是说他有什么地方超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并且可以‘补充’他们的辩证法。”^①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狄慈根的辩证法是无法比拟的。梅林说，“人们从《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些章节所能学到的东西，也比从狄慈根的全部著作中所能学到的多。”^②

梅林还对狄慈根的哲学思想和所谓“狄慈根主义”作了严格的区分。梅林指出，“狄慈根主义”和狄慈根哲学思想没有任何关

①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55页。

系，我们不是反对狄慈根，“我们进行的是反对自称‘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而实际上只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发生混乱的‘狄慈根主义’的斗争。”^①因为，“狄慈根主义”是欧·狄慈根违背狄慈根而杜撰出来的，它既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诽谤了约·狄慈根。梅林说，要是狄慈根本人现在还活着，看到鼓吹“狄慈根主义”，看到企图用“狄慈根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一定会叫它见鬼去的。

马赫主义同新康德主义一样，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马赫主义的创始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下，他们抛弃了康德的唯物主义，走向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创立了经验批判主义。当彼得楚尔特提出要用马赫主义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梅林严正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它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的伟大革命变革，它根本不需要任何“补充”的必要。“要认识它只能根据它的果实。如果它是不能成立的，那末一切竭力想巩固它的‘补充’，都无补于事，如果它是象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正确的，那末这种‘补充’反而会妨碍它获得胜利。”^②

（三）对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

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世纪50年代，庸俗唯物主义在德国境内流行起来。这种唯物主义标榜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们象“淘气的孩童恶作剧似地”到处大肆叫卖什么“思想对大脑的关系就象胆汁和肝脏或尿和肾脏的关系一样”，这表明资产阶级已无力对抗马克思主义，只用这种伪科学来教化、欺骗人民。

梅林指出，庸俗唯物主义理论“不仅落后于德国唯心主义，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59页。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63—164页。

而且也退回到法国唯物主义的较早阶段。”^①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等人不懂得正确区别哲学概念，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因此，在批判宗教神学的时候，不能打中要害，他们也写不出像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那样富有战斗性的著作。梅林指出，庸俗唯物主义不懂得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不了解意识是怎样产生的，不认识意识的作用和功能，因此，“他们在思维上栽了跟斗，正如唯心主义在存在上栽了跟斗一样。”^②说明了庸俗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就是混淆了物质与意识的界限，把意识等同于物质，取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梅林还指出，庸俗唯物主义当它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时，它就转化为自己最相反的对立物，即转化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甚至倒退回到“最陈腐的教会长老的怀抱里去了。”^③成为宗教神学的辩护士。

梅林分析了庸俗唯物主义在德国流行的原因。他说，这是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在德国的社会环境中的特殊表现。对于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本来是高兴的，但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日益广泛传播时，他们又感到恐惧害怕，因而不愿意看到唯物主义的发展。因此，只图享受、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就把庸俗唯物主义这个“可笑的鬼怪”，当作“饭后点心”和“时新玩具”。梅林说，资产阶级从它的需要出发，“随时都可以粉碎这个玩具，而当假虔诚比用假自由精神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好的时候，它就的确粉碎了这个玩具。”^④

四、梅林对哲学史一些问题的研究

梅林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熟练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①②③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29、230页。

④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31页。

法，使他在哲学史的研究和著述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他撰写的论文和专著都是内容丰富，见解精辟，独具一格。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是一位佼佼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第一个作者，其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更为深远。

梅林撰写的有关哲学史方面的论文有：《略论伏尔泰》（1894年）、《希腊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1901年）、《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1901年）、《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一点意见》（1901年）、《约翰·洛克》（1904年）、《伊曼努尔·康德》（1904年）、《康德和斯宾诺莎》（1908年）、《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908年）等。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梅林对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评述。他认为古希腊哲学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哲学，这是对整个宇宙作自然的解释；第二阶段是研究人的主体，人的认识能力问题。从而产生了诡辩论者，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第三阶段是希腊在外族入侵后，“哲学就从形而上学思辨的高空跌落下来，……分化为科学研究和实际的生活智慧。”从而产生了独断论和怀疑论。梅林还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是一种严整完备的唯物主义，他的原子论“包含着现代唯物主义（不论是自然科学的或哲学世界观的唯物主义）的几乎全部伟大原理的萌芽”^①；伊壁鸠鲁继承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成为所有古代哲学派别中最完善的一个；洛克是17、18世纪之交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性的典型人物；康德是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出发，发展出自己的时代的宇宙理论。梅林这些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给我们研究哲学史提供了方法论的意义。

梅林写的篇幅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和整

^① 梅林：《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77页。

理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著作遗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不但看到梅林对德国工人运动、对德国的近代史作出极其透彻和精辟的分析，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如何成功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来分析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是梅林的主要作品之一，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部以工人运动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著作。梅林在这著作中，深入地考察了德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研究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前提和开端，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探讨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梅林还从思想的继承性方面，概述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和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解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梅林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写作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伟大意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和有关丰富的手稿资料。《马克思传》是梅林晚年写的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梅林说：“由于以往多年研究而在我脑海里已经成型的卡尔·马克思的形象，变得更为鲜明突出了。因此，不由地想写一部传记来刻画这个形象。”^①他提出自己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在这本书中，梅林以极其细腻的笔调描述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世界观的转变、家庭生活、革命生涯及其理论研究等各方面的情况，十分出色地揭示了马克思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特点。梅林说：“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②这本书还刻画了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光辉形象，歌颂了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永恒

①② 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页。

的合作。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两部著作基本上是好的，大部分观点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错误，主要是对拉萨尔和巴枯宁的机会主义观点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

此外，梅林还对哲学史研究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

第一，哲学史研究要以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出发点。梅林认为，任何哲学都是由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该时代的经济生产之中。要研究一个时代的哲学史，首先是要研究那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状况。梅林说：“在传统的哲学史教科书里，现代哲学关于经济和政治所说的一切，通常都被推到后面去了，而认为关于政治、经济的抽象空论和各种各样的‘主义’具有头等意义，其实，这些空论和‘主义’并不是它们对待当时实际问题的实际态度的原因，而是其结果。”^①梅林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哲学家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只从思想出发，在头脑里面构造哲学体系，因此，严格地说，至今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哲学史。梅林说，必须把颠倒的哲学重新再颠倒过来，使它用脚站立着。并且，“建立起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哲学体系是相应于它的时代而发生、而发展的；那末，就可以写出一部作为人类通史中有意义、有教益的部分的这种哲学史来了。”^②

第二，哲学史研究要作阶级分析。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伴随现象，是人们在其中意识到这一斗争，并在其中把斗争进行到底的那些思想意识形态之一。”^③哲学是随着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哲学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梅林主张对哲学要作具体的阶级分析，才能分清哲学流派的实质。梅林说：“只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阐明似乎完全不可看清的各种哲学体系的大混乱，只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3页。

②③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2、191页。

有在它的光亮下，才能把那些哲学体系划分开来，归出类别来。到那时候才会发现任何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基本论点，老是在无数的哲学变种中重复而又重复，甚至最杰出的哲学家的最杰出的著作，都充斥着永恒的老调子。这一切，是多多少少不能被置身于早已剥去任何思想意识外衣的阶级斗争最中心的现代人所消化的。”^①

第三，哲学派别的划分必须坚持恩格斯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为标准。梅林认为，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精神和自然界那个是第一性的，那个是第二性的问题，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还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长期争论的中心问题，即使在中世纪的神学信仰中也不能把它完全置之不理。随着资产阶级时代的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日益发展，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也就更为突出。梅林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精神与自然界那一个是本源的这一哲学上重大的基本问题的互相敌对的答案。”^②从而形成哲学上对立的两大派、两条对立的基本路线，揭示了哲学斗争的实质。梅林特别反对用道德标准来区分唯心和唯物。他严肃地指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追求物质享受，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好世界”的信仰，这是神甫们和统治者的有意歪曲，这样做不但混淆了哲学的基本路线，同时也歪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意义。

五、梅林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失误

梅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闻名于世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由于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梅林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且有的错误还是相当严重的。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1—192页。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6页。

梅林在政治上对机会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因此，在一些问题上不但对机会主义作了无原则的让步，而且有时候对他们的错误作了理论上的辩护，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混乱和不良的影响。

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的机会主义派别，它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有着直接的严重的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这两个机会主义派别的反动实质，并号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但梅林却相反，他不但对机会主义温情脉脉，而简直达到美化的程度。他对充满机会主义观点的拉萨尔派的《工人纲领》，说成是“一部伟大的杰作”，是“反映德国状况的《共产党宣言》”。又说：“拉萨尔的观点在所及范围内都是正确的，它所及的范围很远，足以使德国工人明了，对他们来说现在和将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纲领在客观上也不是不真实的。在现实情况下，《共产党宣言》对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必然是一本难懂的书。按他们当时的理解程度来说，它至多只在德国工人阶级必然要走的历史道路上投下暗淡的光辉。相反地，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虽然只给德国工人阶级指出这条道路的最初几站，但指得却十分明确。”^①这是对机会主义观点作了无原则的吹嘘，对《共产党宣言》这部人人皆知的光辉著作作了不应该的贬低。

1857年，拉萨尔出版了《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马克思认为“根本是一部非常幼稚的粗糙的作品”，是象“小学生发这一类空空洞洞的议论”^②。可是，梅林却跟马克思相反，认为拉萨尔“这个著作是黑格尔的学生的优秀毕业论文，是他赖以走进生活大学的资格证明书。”^③

梅林为了袒护拉萨尔，把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看成是马克思与拉萨尔个人成见的斗争。他说，马克思与拉

①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3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7—98页。

③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55页。

萨尔的分歧是什么“最复杂的心理问题”，是个人“偏见”，

“同拉萨尔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马克思对他抱有难以克服的不信任态度而激烈起来。”^① 还说什么：“由于马克思一向对拉萨尔以及与拉萨尔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一切东西怀着不可抑制的厌憎，所以我们不必特别重视他对拉萨尔派的攻击。”^② 这样，梅林就把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严肃斗争和原则分歧取消了。

对待巴枯宁的阴谋活动，梅林也是采取袒护和开脱的态度。当马克思揭露巴枯宁用宗派主义来搞分裂的阴谋活动时，梅林却说：“即使巴枯宁确曾仅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企图把国际攫为己有，这也只能证明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只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分歧，就在于对这种群众运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须遵循的策略抱着不同的见解。不管巴枯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多大错误，他的观点毕竟和玩弄宗派把戏毫无共同之点。”^③

梅林在理论上的错误也是不少的。他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过分地夸大了费尔巴哈和斯宾诺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一些问题上，他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在表述上，有时他又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有时又称庸俗唯物主义，这是使用概念的混乱，混淆不同性质哲学的界限。梅林缺乏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研究，很少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简单地归结为唯物史观，这样他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

但不管他有多大的错误，梅林始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了终生，为反对修正主义、保

①② 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52、536页。

③ 梅林：《马克思传》，第595—596页。

卫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节 保尔·拉法格哲学思想

保尔·拉法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认为是法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一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拉法格的革命活动和思想转变

拉法格1842年1月25日出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1851年，在拉法格9岁时随家回到了法国，定居于波尔多。拉法格青年时代，正是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建立第二帝国并实行军事专制统治的时代，波拿巴的残暴反动统治引起了青年拉法格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864年，拉法格进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积极参加当时的进步学生运动，并成为反对波拿巴帝国进步学潮的领导人，同学们把他比喻为反对暴虐统治的一头“雄狮”。

1864年12月底，法国巴黎建立了第一国际支部。不久，拉法格就成为这个支部的一员。两个月后，他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到伦敦向国际总委员会汇报工作时，结识了马克思。这次会见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1865年10月，拉法格作为巴黎高等学校的代表出席了在比利时列日召开的国际学生代表大会。会上，他以“关于无神论、革命和社会主义”为题发表了旨在反对波拿巴第二帝国的演说，号召法国青年们团结起来，为推翻第二帝国进行坚决的斗争。法国政府为了报复学生的反抗，决定开除所有参加大会的学生。巴黎大学反动当局开除拉法格学籍，激起了巴黎大学生的风潮。马克思对这次风潮的评论是：“巴黎大学生尽管头脑

还很混乱，但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这是十分重要的。”^①

1866年2月，拉法格不得不离开法国到了伦敦。他一边在英国大学继续学医，一边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工作。3月，拉法格被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兼西班牙通讯书记。这时，拉法格虽是满腔热情地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但思想上仍然信奉着蒲鲁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66年7月，发表在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左岸》报上的《至圣的雅科宾教会的教皇通谕，专制政体的和三位一体的教皇通谕》一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拿破仑三世的反动僧侣主义的实质，同时也鲜明地反映出拉法格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情绪。这时，拉法格还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在哲学上只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用科学和理性来反对宗教，在对社会关系问题的了解，还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对拉法格的蒲鲁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曾进行过多次严肃的批评。1866年3月20日，马克思写给他的女儿劳拉的信中说：“拉法格以他的蒲鲁东主义来折磨我，而且我要是不用一根结实的棍子揍他的克里奥洛人的脑袋，想必他是不会安静下来的。”^②1882年11月1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又提到，“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③

拉法格的思想转变，可以说他是在伦敦生活时开始的。在伦敦的流亡三年时间，他受到马克思的直接教诲，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影响，逐渐成长为一位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组织家。1866年秋，发表在《左岸》报上的《社会斗争》一文，是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07页。

法格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文章，它向法国读者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同时也表明拉法格已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考察社会现实问题了。

1868年10月，拉法格和新婚的妻子劳拉·马克思从伦敦返回巴黎，他们把全部精力投身于法国工人运动中去。当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成立后，拉法格成为国际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在革命的斗争中，拉法格逐渐认识到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危害性。为了保证法国工人运动的健康成长，拉法格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他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为《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的出版，他在马克思和译者之间充当了联系人。特别是在马克思的要求下，重新翻译被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歪曲和篡改了的国际章程法译本，用真正马克思主义武装无产阶级。在团结、教育、组织法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方面，拉法格起了核心的作用。

1871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当时，拉法格居住在波尔多，为了声援公社的斗争，日夜奔忙，并于4月初，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到达巴黎，为沟通公社与国际的联系，为争取国内外对公社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接受了公社的委托，不辞劳苦地前往法国东南部地区组织群众支持巴黎公社的斗争。公社失败后，拉法格受到梯也尔反动政府的追捕，不得不带着全家离开法国流亡西班牙。

西班牙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小资产阶级却是汪洋大海，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人联合会受着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严重影响。拉法格面对这种混乱的思想状况，一方面找人翻译出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工人群众；另一方面对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揭露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阴谋分裂国际的罪行，把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从巴枯宁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马克

思和恩格斯对于拉法格在西班牙的工作给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曾说过：“拉法格在西班牙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做得很好”^①，“第一次把真正的科学奉献给西班牙人”^②。马克思也赞扬拉法格，说他在与巴枯宁分子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③。

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拉法格第二次侨居伦敦。这期间正值是巴黎公社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抽出时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协助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法国，他得到恩格斯允许后，用法文摘译了《反杜林论》的部分章节，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1880年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在巴黎出版单行本。拉法格还请马克思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导言，马克思称这本书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本书在法国广大工人群众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法格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如《阶级斗争》、《工人党与资本主义国家》、《进化——革命》等等，为在法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拉法格也非常关心法国的工人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不断地给以关怀。1879年10月，法国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马赛召开，拉法格不仅与盖得共同起草了《工人党纲领》，而且通过他的活动争取了马克思对法国工人党的多方指导，使法国无产阶级革命逐渐走上正轨。1880年7月，法国政府宣布对巴黎公社流亡者大赦，两年之后，拉法格回到了巴黎，专心致志投身于法国的工人运动。拉法格回国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的斗争。可能派是法国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害怕革命，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幻想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实行改良。马隆和布鲁斯不但反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法国工人党的正确路线，而且企图篡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56、427、455页。

夺党的领导权，制造党内分裂，另立新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拉法格和可能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写有《蒲鲁东主义已经过时》、《可能主义》、《工人党的目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解说》等文章，从思想上清算了机会主义的流毒。同时，还写了一些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谴责教会的伪善性的政论文章，如《懒惰权》、《庇护九世上天堂去》等。

法国工人党建立以后，拉法格长期致力于工人运动，他不但在广大工人中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代表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90年代初，他参加了法国国会议员的竞选，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进入资产阶级议会的人。他利用议会的讲坛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宣传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人们高兴地称拉法格为“社会主义推销员”。拉法格在议会斗争中取得重大的胜利，恩格斯认为，这是证明了普选权是很好的斗争武器，只要工人们能合理地利用它，就能使革命处于有利的地位^①。

拉法格晚年，特别注重理论的研究和著述。他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的特点，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种种谬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写作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如《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892年）、《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1896年）、《财产的起源与进化》（1895年）、《交易所的经济职能》（1897年）、《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1903年）。特别是他1903年的这部著作，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新现象，深入地分析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过程，预示帝国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及其特点，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了重大的补充，是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3页。

一书发表前，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作了独创性研究的著作。

为了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拉法格对哲学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先后写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1900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认识问题》（1910年）等重要著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了饶勒斯的唯心史观和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

此外，在文学批评、民俗学、语言学和宗教等领域，拉法格也有很高造诣。他曾写过《左拉的〈金钱〉》、《关于维克多·雨果的传说》、《浪漫主义的根源》、《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等文学、语言学著作；也曾写过《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关于潘多拉的神话》、《亚当与夏娃的神话》、《关于贞洁的受孕的神话》、《母权制》、《德国财产的起源》等关于宗教神话故事和原始社会史的著作。这些文章和专著不仅表现出拉法格理论研究的求实作风，更重要的是拉法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科学中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对于法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拉法格在理论研究中也产生过不少错误，并多次受到恩格斯的批评。但这些错误毕竟是局部的、次要的，而且有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斗争环境所造成的。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正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能得到马克思的言传身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的理解上，或在材料的把握上，拉法格比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更优越的条件，因而，他的作用也就更大些。

1911年11月25日，70岁高龄的拉法格和他的妻子劳拉逝世于巴黎。他在自己遗言中写道：“我怀着无限欢乐的心情死去，深信我为之奋斗了四十五年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取得胜利。共

产主义万岁！国际社会主义万岁！”^①

拉法格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为法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获得了法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无限敬仰和爱戴。

二、批判饶勒斯的唯心史观，捍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19世纪90年代，拉法格和让·饶勒斯进行了一场关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问题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可以不可以相互调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道德观念的变化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这场斗争是关系到捍卫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重大问题，它对法国工人党的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这场哲学斗争中，拉法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严肃地驳斥和批判了饶勒斯对唯物史观的种种歪曲和攻击。

饶勒斯是法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法国“独立社会主义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大学教授。1894年12月，饶勒斯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组组织的集会上，作题为《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讲演。在这个讲演中，他歪曲辩证法，否定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他说，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对抗只是一种假象和虚构，实际上，事物的发展过程可以导致对立面的调和及其和谐一致。饶勒斯提出，“对立面的综合、借助合理的和理想的同一性”^②就可以把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融合为一，就可以“找出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理解的基本的调和”^③。饶勒斯认为，在物质和思想的两者之中，找出谁

^① 《社会主义者报》，1911年12月3—10日，转引自《拉法格文选》（上）第10页。

^{②③} 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见拉法格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9、31页。

是第一性和谁是第二性是没有意义的，而应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综合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攻击和反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原理，并把这个科学的原理污蔑为形而上学机械论。

饶勒斯认为人类社会的更替和历史的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进步，而在于“博爱和正义的概念”。他说：“人类还在获得历史经验之前，还在组织这样那样的经济制度之前早就有了正义和权利的先验的观念，他们正是追求这个先验的理想，进入越来越高的文明状态；人类的进步不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机械的和自动的改变，而是由于人类模糊地或清楚地感觉到的这种理想的影响。”^① 饶勒斯歪曲历史，说什么不但唯心主义者重视道德观念的作用，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也在呼吁正义和权利的观念，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必然是正义和权利的更高度的实现。饶勒斯夸大了精神因素的道德观念的作用，认为人类对这种道德观念的追求和向往，就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因此观念本身是运动和行动的原则；理性的观念绝不依赖于经济的因素；相反地，正是经济因素在现实和历史中一步一步地表现，一步一步地体现人类的理想。”^② 这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真实关系，是典型而露骨的唯心主义。

饶勒斯认为精神、思想和观念是一种先天的形式，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先验地形成，并潜在于头脑之中。饶勒斯说，正是这种先天意识的原始因素的作用，一定的经济现象才能钻进人的头脑里去，如果没有先天的思想形式，社会经济就不能发展，人类历史也就不能前进。在社会生活中，饶勒斯认为人的意识和经济环境相互渗透，以致不能把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分开，因此不能说

①② 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见拉法格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38页。

“一切宗教、政治、道德的观点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这是饶勒斯用蹩脚的折衷主义来掩盖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拉法格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决批驳和揭露饶勒斯的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实质。他在1895年1月20日，作了与饶勒斯同样题目《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讲演，回答了饶勒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并且指出，和饶勒斯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必须把这场辩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

拉法格首先驳斥和揭露饶勒斯唯心史观的先验论性质。指出，饶勒斯把“正义”和“博爱”等道德观念看作是先天的，并且认为它们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时能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完全是错误的，也是和历史发展相违背的。拉法格指出，正义和博爱的思想不是人们头脑固有的，它们是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他严格地考察了历史，认为正义思想在原始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也不可能与社会发生矛盾，更谈不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了。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在思想上的反映。“文明社会的正义由两个来源产生：一方面是在人类的本性中取得自己的来源，另一方面又从建立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环境中取得自己的起源。情欲和观念在财产产生以前就已存在；由它所产生的利益、情欲和观念彼此互起作用 and 互相影响，最后终于使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在文明人的脑子里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①在私有制的社会中，随着阶级斗争和私有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同，正义和非正义观念也随之变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正义和非正义观念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拉法格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唯心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断言正义和道德的观念是在不断的进步之中。其实，这种言论是为了投合资本家的心意而制造出来的。资本家总是把他们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下同），第67、17—18页。

在工商业中的投机倒把、贪得无厌都说成是德行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需要，往往把一切有利于它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宣称为正义的、符合道德的。相反，把一切危害它的利益的统统都斥之为非正义的、不道德的行为。资产阶级用“正义”作为包头巾来为它的卑污和肮脏的行为辩护。拉法格说，过去和现在人们总是把正义思想美化，认为它能创造奇迹，它能引导人们去追求和平的和幸福的未来。“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一切社会的非正义的多产的母亲。在过去，正义使奴隶主有权占有人，像占有牲畜一样；现在它使资本家有权剥削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比剥削牲畜还要坏。正义把用来对付奴隶的鞭子交给奴隶主并点燃了他们的心，当他们用雨点般的拳头打在奴隶身上的时候，现在仍然还是它允许资本家强占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使他们在以微薄的工资来酬报那给资本家带来全部财富的劳动的时候竟然问心无愧。”^①拉法格的分析是极其深刻的，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切剥削阶级高喊正义的实质。同时，也历史地分析和说明了正义这道德观念只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不同的阶级，同一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正义内容的理解上也不一样，有的甚至是相反的。

至于博爱的思想，拉法格也作了深入的分析。拉法格指出，博爱的感情在原始社会就存在了，而且比任何阶级社会表现得更强烈、更自由。美洲的印第安人，好客在他们中间不被认为是美德，而首先认为是不容推却的义务。红种人对孤儿、寡妇和体弱多病的人的无微不至的关心，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应当共同属于一切人的结果。原始社会博爱思想的存在，这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没有我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7—18页。

的和你的私有财产，一切都是属于大家共有的。所以平等、博爱思想是自然而生，并成为人们共同生活联合起来的唯一的纽带。

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呢？为了彻底批驳饶勒斯的唯心主义，拉法格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历史考察。拉法格指出，唯灵论者把社会各种现象归因于神的意志，“上帝是一个机械师，他为了自己娱乐而构造了宇宙，他调节宇宙的运动；他制造人，他按照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计划来支配人的命运。”^①在唯灵论者看来“不是生存的物质条件、不是由它们产生的需要、兴趣、情欲和本能推动人们和各个民族前进，——而是上帝催促他们，并且引导他们沿着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道路走向他们所不知道的目标。”^②这样，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受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所支配。被认为是历史之父的意大利17世纪历史学家维科，认为人性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说，不是无私、宽厚和博爱，而相反地是残酷、吝啬和虚荣，创造和发展人类社会。这三种恶德控制着人类，从而产生出军队、商业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曾对上帝进行过无情的批判嘲讽，从而抬出“进步神”，也即是“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人道”等女神。一方面指望它来担负领导摆脱贵族的羁绊，另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的理性统治是天经地义的。拉法格指出，资产阶级的“进步神”、新的上帝是“思想”，“思想即力量”或者说是“没有重量的力量”。这是唯心主义者用理性来代替上帝，把流行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应用于历史。拉法格说，“进步女神”、“理性”也不可能引导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它倒是能“引导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走向生理的退化和道德的败坏。”^③

拉法格通过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历史考察，指出饶勒斯所说的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1页。

②③ 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40、45页。

“正义”和“博爱”等道德观念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笨拙表现，主要是夸大了思想意识的作用，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把理性当作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拉法格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是唯一科学地说明和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观的基本前提出发，在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时，必然承认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必然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政治的、思想的、宗教的和哲学的各种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力量却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因为“一切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受着生产方式对他们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生活的影响”^①，“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经济环境里。它们在经济的上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②拉法格认为，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不管它的作用有多大，它都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反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这里，经济生产是天，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理解社会生活的一把钥匙。就是饶勒斯所推崇的“正义”观念，拉法格说，它本身也是经济关系的产物。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对“正义”的理解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女神允许和批准企业主抢劫工人阶级，这种抢劫是在利润、利息、地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③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正义是把从雇佣劳动的生产者那里窃取来的财富归还给他们，而资本家所理解的正义却是保存这些窃取来的财富。“正义”这道德观念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正义的概念就是统治的和具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36页。

②③ 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39、46页。

有法律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正义本身。

拉法格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规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物质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引导着人类社会的前进，而决不是什么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正义道德观念的作用。“历史哲学家应当在经济的环境里——也只有在这中间——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①

拉法格还根据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指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体现。他说，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不是梦想家，我们是相信科学的人，我们不去发明新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已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和理想，它是从资本主义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现实的力量。“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不可避免地要把社会引到共产主义。”^②

拉法格把生产力、经济必然性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制度更替的根本原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原理，作透彻的了解和全面的发挥。

三、提出两种环境理论，阐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只有马克思才是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详细地论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拉法格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拉法格说，马克思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方式。马克思不是在社会之外，不是到神秘的思想领域之中去探究社会历史的缘由，而是在社会内部，在它的劳动活动这个人和社会存

① 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39页。

② 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22页。

在的基本条件中去寻找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拉法格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两种环境的理论，进一步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说：“人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经济的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人为的环境里。这两种环境的共同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进化。”^①拉法格所讲的两重环境，就是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种环境对人的肉体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什么是自然环境呢？这是人们生活于自然界的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是指自然界的无数的物质形态不自觉的相互作用所形成对人类生存活动的影响。拉法格认为，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它在空间上没有精确的界限。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它包括气候、土壤、地质构造、山脉、河流及动植物的分布等等。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脱离一定的地理环境的人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谈不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定的自然环境制约着机体的生存，每一个机体又是特定的特征的综合。不同种类的自然环境给人类、植物界和动物界带来差异，甚至不同的人种也是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结果，忽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不对的。

什么是社会环境？拉法格说，这是人们为了生活，为了使自己的机体免受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而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环境。它是“由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习惯，风俗，风尚和道德观点，常识和社会舆论，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等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

^① 《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168页。

们所组成。社会环境的这些成分在变化和互相影响中间产生出许多更复杂的和更宽广的社会环境的形式”^①。拉法格也把社会环境叫作人为环境或经济环境，这种环境是与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创造出来的。拉法格认为，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成份的变化发展改变着人类本身，制约着人的肉体 and 道德关系。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是经常处于不稳定的变化状态，从而使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要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就要掌握社会环境各因素的性质和特点。

拉法格比较了两种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大，并且对人种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来说，社会环境却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是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环境。拉法格指出，自然环境的进化是极其缓慢的，甚至在人们看来那些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植物和动物的外貌似乎是不变的。相反，人为的社会环境的进化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速。正因为这样，人类的历史和动物、植物的历史相比较却带有异常灵活的性质。拉法格指出，处于极不相同的自然条件的不同人种的民族，只在他们社会发展的同样水平和同样复杂程度的条件下，社会环境的样式是彼此很相像的，有着大致相同的家庭、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大致相似的意识形态。这是由于人为的创造的社会环境，消除了由自然环境所造成人种之间的差别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别。拉法格认为，否定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不对的，同样，片面地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也是不对的。

拉法格论述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根本区别，批判了社会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31页。

达尔文主义的错误。拉法格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达尔文关于自然界生物生存竞争的理论硬拉进社会科学，用有限的动物界的进化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必然遭受失败。因为人同动物、植物是生活在根本不同条件之下。人是动物这一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竞争的兽性社会。但“这还不足以证明生存竞争在人类中间起的作用同在公火鸡和牡蛎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①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宣扬的社会生存竞争，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以此来掩盖阶级斗争，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不可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要揭示人类历史的本质，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要地是研究对人类发展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环境。当然，并不是认识了社会环境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能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考察社会环境时只注意人的思想动机，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因于人的情欲和思想的冲动，把思想意识视为社会环境中主要的或基本的东西，这不能不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拉法格说，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能发现支配社会进化的规律，“这是因为他们徘徊在唯心主义的幻想的烟雾弥漫的黑暗中。他们轻视研究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他们忽视由这些条件所产生的欲望、需要和利益，他们认为人高于物质条件和认为人应该从自身或从超自然的上帝的身上去找寻自己的行动的原因。”^② 拉法格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考察社会环境时，主要地是把握住社会环境中最不稳定的、经常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且是社会环境各部分中最能动摇整个建筑的生产方式。只有了解生产方式，人们才能了解如何从事物质生产，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拉法格说：

① 《拉法格文选》（上），第167页。

② 《拉法格文选》（上），第150页。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方式不是人生产什么，而是他如何生产。举例而言，人还在有史以前的时期就开始织布，但只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才知道用机器来织布。机器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工业最本质的特征。我们在眼前就有着它的毁灭性的和不可摧毁的力量无与伦比的例子，它的这种力量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关系。”^①大机器的生产，使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在一个世纪之间就使日本由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变成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使它跻入世界强国之林。拉法格还指出，从生产方式中还可以探索出社会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发展的动向。因为生产方式总是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反，社会意识形态为了取得物质的和精神的生存资料，也不得不关心生产，用各种形式去影响社会生产。拉法格坚持唯物史观，科学地阐述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拉法格强调从社会环境中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坚持了历史发展的唯物论思想。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历史的辩证法。拉法格认为，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但这个过程不是形而上学机械式进行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和改变不仅要通过改变各种复杂的个人的肉体和精神，而且还要通过一个民族内部的斗争和民族的相互影响而发生作用。拉法格指出，一个民族生活中的历史事件取决于应该受到改造的社会环境和这个民族被自然环境以及遗传的和获得的习惯所创造的那种形态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如何。“同样的生产方式决不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性在一切靠它生活的民族中产生出同样形式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在一切的历史时期不会引起绝对相似的历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35页。

史事件。”^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拉法格根本没有把经济因素、生产方式看成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他是懂得历史的辩证法的。把拉法格的唯物史观思想叫作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是不恰当的。

当然，拉法格关于两种环境的理论不是很完美的。例如，对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立统一关系缺乏深入的分析；关于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注意不够，而且有简单化的倾向；坚持生产方式是社会环境的主要内容，它决定着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这种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对生产方式的论述时，没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入手，也没有提到“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因此，在揭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显得缺乏深入的论证。

四、论思想观念的起源

拉法格认为考察抽象思想的起源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彻底地批判唯心史观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拉法格说，抽象思想的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论，“开始它是由希腊的思想家提出来并加以讨论；而后又被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国18世纪的哲学家所采纳，而自资产阶级获得胜利之时起又从哲学作业的规划上被勾消了。”^②要了解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斗争实质，必须了解哲学的发展史。

拉法格说，在古希腊的哲学中，已经提出并试图解决抽象思想问题。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芝诺曾视感觉为知识的来源，柏拉图却相反，认为善、真、美的思想是先天的，不变的。完全是唯心主义地解释观念的起源。

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学者，在反对中世纪经院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37页。

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39—40页。

哲学的斗争中，对思想起源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从弗兰西·培根开始，经过托马斯·霍布斯，最后到约翰·洛克而形成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从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唯理论到荷兰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唯理论的斗争。拉法格揭示了这场斗争的意义，研究了有关思想观念的本质和起源。拉法格说，洛克的“白板说”和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的斗争，最清楚地表明了思想观念起源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洛克及其追随者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认为人的大脑刚开始时只是一块白板，思想观念是由感觉产生，在后天才印上去的，假如某物不首先在感觉里出现，就不可能在理性中存在。笛卡儿却相反，他是“从他的‘我’中像从某一口井中引出一切——在理性中找到了思想的出发点。”^①

拉法格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笛卡儿的唯心主义观念论的根源，指出笛卡儿是复活了内省法和苏格拉底式的“你认识你自己吧”的方法，从主观出发，“孤独地躲在他的‘我’中来认识宇宙，并从他的‘我’的深处去发掘哲学的原理”^②，因此把“实体”、“原因”、“本质”等等都看成是先天的、非经验的东西。拉法格指出，康德的先验论，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观念，看作是先天就有的，是纯粹理性的结构，它们的对象不是由经验提供，而是存在于理性之中，这是对笛卡儿“天赋观念论”的进一步的发展。莱布尼兹也一样，主张思想和观念是与生俱来的，认识不是对外界对象的反映，也不需要通过感官，只是心灵自身所固有的潜在观念的显现，这就象雕刻师在大理石上雕刻神像一样，神像早就“天赋”在大理石的纹路中了，只要雕刻师的加工琢磨，把多余的纹路去掉，神像便显露出来了。这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46—47页。

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44页。

唯心主义关于思想观念起源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它完全否认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来源，主张思想、观念、理性是人们头脑所固有的。拉法格总结了17世纪和18世纪英、法两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认为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孔狄亚克，以及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狄德罗，都是坚决反对先天观念论，为探讨思想、观念的起源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曾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但是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却抛弃了原来的信仰，“在自己的理性的宝座上恢复了永久的真理和最庸俗的唯灵论”^①，主观唯心主义逐渐成为他们思想路线的基础。

拉法格批评了唯心主义先验论者轻蔑地抛弃思想观念原始起源的研究。他们不知道思想是从那里来，就肯定思想是“自身”存在的、思想是发展的，并认为思想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拉法格说，这是从思想进化上去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像毕达戈拉斯那样，以为认识了数的性质就可以认识物体的性质一样。把思想、观念看作先天万能的东西，这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思想力”来代替上帝，把资产阶级的意志强加于历史。拉法格正确地指出，唯心主义先验论，在认识论方面的根源在于片面地夸大主观思想的作用，把它的相对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独立性，认为理性可以不依赖于感性，思想观念可以不来源于人的实践经验。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表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开始走向腐朽没落。

拉法格在总结哲学史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论述了抽象思想的本质，探讨了观念的起源。拉法格指出，思想、观念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只能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48页。

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既不可能存在于社会经验之外，也不可能存在于社会经验之前。“物体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而有关物体性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同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了接触才在头脑里产生出来。……我们只能判明为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并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①“进步、自由、正义、祖国等等思想也和数学上的公理一样不是存在于经验的领域之外；它们不是在经验之前就存在了，而是跟随经验才有的；它们不产生历史事件，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社会现象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正因为思想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才成为积极的力量。”^②我们的任务不是从头脑中去寻求什么先验的思想观念，而是善于去“揭发是什么社会原因产生思想并给予思想以影响某一时代的人类智慧的力量”。拉法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思想、观念只能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感性认识是进行抽象思维和理性概括的前提。当然，人们的实践所得到的经验也离不开理性的指导的，但是思想、观念的来源，如果否定了实践经验的作用，理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思想、观念一旦产生后，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同时它的发展也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为什么我们现代人的头脑中有些概念可以不直接通过实践经验而获得呢？拉法格说，这不是证明唯心史观先验论正确，而是因为思想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在人的世世代代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继承性的特点。由于“文明人的脑子是经过许多世纪耕作过和经过几千代播下概念和思想种子的一块田地”^③，所以在文明化了的社会里，“人一生下地就继承了传统的习惯，一有可能就获得这些概念。”^④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抽象的概念、思想本身是先验论，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2页。

②③④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3、54、53页。

是可以离开社会环境在人的头脑里自发生长出来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人类的祖先几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的结果。同时，现代人所继承前人的一些抽象概念，也只有在后天的经验中才能真正理解它、运用它。拉法格说：“以为抽象思想是在人的头脑里自发地生长出来，这同认为形式最完善的自行车或某种其他的机器是第一次就成功一样的糊涂。”^①拉法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得出了关于思想观念起源的辩证唯物主义结论：人“脑具有思维的机能，正如胃具有消化的机能一样；脑子只有靠观念才能思想，而观念则是它从自然环境和人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或人为环境所提供的材料中制造出来的。”^②

为了深入论证思想、观念起源于社会经验，拉法格历史地考察了抽象思想的形成过程。他指出，在原始社会里，原始人根本不懂得抽象思维，也没有抽象的概念。原始人的认识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也即是用物象的描写来代替物，或者借用一种具体的事物来代表一个思想，如狗是表现为狗的图画，树表现为树的图画等等。而后过渡到象征的文字，动物的全身只用它的某一部分来表示，如用动物的头来表现它的全身。而后又从象征文字上升到借喻文字，根据某物同被表现的思想有着真实的或假想的类似之点而作出描写：狮子的前部被用来表示首位的思想，前臂被用来表示正义和真理，兀鹰被用来表示母性之道等等。拉法格说，美洲的红种人用一头狮子比喻为一位勇敢的战士；用一只鹰比喻为一个眼光锐敏的人；为了肯定他已忘记了屈辱，他就声言把它埋入地下等等。这种表述，与红种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他们还没有文字，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人类在认识的开始阶段，往往是用一定的实物来表示一定的思想，经过许多世代人的反复社会实践，人的脑子里才逐渐地形成抽象的概念。

①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53、66页。

拉法格指出，抽象的概念被创造出来是表示一实物或它的某一实物的属性。所以概念、词等虽是抽象的思想，但其实是物的属性变成自身，转变为它的抽象的实质，抽象是不能脱离实物的。但是，实物又如何能在人的头脑中转变为抽象的概念呢？拉法格说：“这转变正是靠借喻来完成的；借喻是抽象思想借以钻入人脑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原始的借喻里说：洞口，火舌，因为口表现为一个窟窿，而舌有长的形式。就靠这样的方法，随着人们对这个需要的增加，便积累了新的比较的词。往往是物是最突出的属性。即在感官上引起最强烈印象的东西起了这些比较词的作用。”^①在野蛮人的脑子里还没有形成硬、圆、热等抽象的概念。因此，他们的语言中不说硬的，而说“像石头”；不说圆的，而说“像月亮”；不说热的，而说“像太阳”。野蛮人为什么这样表示呢？拉法格说，因为野蛮人还不懂得抽象思维，硬的、圆的、热的这些事物的属性在他们的脑子里还没有与石头、月亮、太阳等具体事物分离开来。在人的认识史上，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这是经历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人脑机能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在人的思维中才有可能把事物的性质和事物本身区别开来，抽象化出来，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才逐渐形成抽象的概念，这些抽象概念成为人脑形成抽象思想的记号。

数学公理、公式是人们认识中最抽象的记号了，它具有脱离个别人的特殊经验而独立存在的特点，唯心主义者一直把它赞美为先验主义的光辉。康德曾说过，数学、几何学的公理是天赋的，是先天知识的实例。拉法格写道，虽然数学基本上全抛弃了物体的物理性质，而仅仅研究它的某种特性，这样，在抽象的科学中观察和实验的工作成了多余的东西。但是，抽象的数学公式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61—62页。

也是来自实践和经验。拉法格说，数学是抽象定理、公理的体系，而且有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但是问题在于公理不是由理性给予的，而是由经验所提供的。数学公理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到的，同时也是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发展的。拉法格对数学的形成过程作了历史考证之后说：“罗马人就用鹅卵石——*Calculi* 来计算，由此而产生现代的（拉丁语系的）语言中的计算一词 *Calculus*；拉丁语的 *Calculus ponere*（放上石子）和 *Subducere Calculum*（拿掉石子）指出他们在增加或拿去石子时就是加和减。”^① 数学的原型是实物，在野蛮人的头脑里，数是有形的具体之物，“当他们说二、三、五时，他们要看见二、三、五个指头，石子或者不论其他的任何东西；在许多野蛮民族的语言中最初的五个数都带着五个指头的名称。”^② 有的原始民族没有五以上的一切数字的名称，那末十就是用两只手表示，二十就用两只手加上两只脚来表示。拉法格说，罗马数字是模仿手的形状而来的：“I是指一个手指，II是指两个手指，V是指三个中间的手指屈下而大拇指和小指伸直的一只手，X是指两个 V 或两只交叉的手。”^③ 借助手指头和脚指头来计算，这在原始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由于财富的增多，原始人不得不开始了记数或计算了。但当计算一百和一千以上时期到来时，就不可能再求助于人体的器官了，而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物了。后来，随着社会实践的需要，经过无数世代人们脑力的发展，才使文明人的脑子中的数失去与任何东西相似的一切形式，只保留着有条件的符号。数的符号是人们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离开了社会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任何抽象数的概念都不可能产生。拉法格说，即使是“最极端的唯心主义者没有词也不能思想，没有符号，也就是没

①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64、65页。

③ 《拉法格文选》（下），第55页。

有具体之物便不能计算。”^①

拉法格对数学的研究和考查，说明了数学不是先验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尼罗河的泛滥迫使埃及人发明几何学的初步原理，以便在河水泛滥淹没界标时有可能分配土地。”“群的计算大概巩固了数的概念和发展了计算的方法，分土地产生了测量的概念，而器皿的发明则引起容量的概念。”^②离开了社会实践的需要，数学这门科学既不能产生，更谈不上发展。

拉法格从抽象思想的形成，数学的产生和发展，说明人的智力和才能是由后天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所主张的生而知之是完全错误的。

五、拉法格的无神论思想

拉法格在年青时代就有着强烈反宗教的情绪，认为宗教是一切社会罪恶和灾难的根源，提出要把上帝和国家统统要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这时候的拉法格还只是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来批判宗教，没有真正认识宗教的社会根源，也找不出消灭宗教的科学办法。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拉法格，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考察了宗教的起源和宗教思想的发展，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拉法格认为要深入地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必须从认识论的高度揭示灵魂、上帝等观念的起源。对宗教的研究和对无神论思想的阐述，在拉法格的理论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拉法格指出，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与别的社会意识不同的特殊本质，是在于它以虚幻的、歪曲的、非现实的形式反映了客观现实及其过程。这种反映如同凹面镜一样，由

^{①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65、88页。

于镜面直径的曲率不同，从而在镜面上照出了不同程度的歪曲形象一样。宗教意识是非现实的，但它也是来源于现实，只有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分析社会关系的历史，才能弄清宗教的起源及其本质。

拉法格研究了大量人类学材料，指出灵魂概念最初是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产生，由于当时科学的不发达，原始人不能正确地解释做梦现象，分不清现实与梦境，认为梦幻的东西也是真实的。

“假如他梦见他旅行、战斗或打猎，那末他相信确有其事；但是当他一觉醒来并发现自己还在睡觉的地点，由此他得出结论，当他进入睡乡时，他的‘另外一个我’——照他们的说法是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离开了他的躯体，出去打猎或战斗；当这个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返回自己的住宅，即返回躯体的时候，这时他就醒了。”^①原始人为了解释睡眠和做梦的生理现象而发明了灵魂，认为灵魂就像空气一样不可触摸的看不见的精神性东西，它可以住在人的身体里，也可以离开人的身体而独立存在。这是灵魂观念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原始人认为灵魂有着非凡的力量，它能引起一切自然现象，能使人得病也能治愈病人。原始人把一切不幸的事故、伤损、疾病、衰老和死亡都归罪于灵魂，认为灵魂给他们带来灾难和恐惧。当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还不能解脱死者灵魂所引起的恐怖时，“于是他们便产生了给灵魂指定一块领土的思想”，让死者的“灵魂重新令人神往地过着自己的地上生活”。这是原始人思想中产生的天堂观念。

拉法格详细地考察了灵魂观念的历史演变，指出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不仅给人以灵魂，而且给兽以灵魂；灵魂是随同躯体而生长，而衰老的。在原始人看来，人生来就有灵魂，正像他们生来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21页。

就有心和手一样。这是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思想，凡是不可理解的事物，都是认为有灵魂的。后来，到了以父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里，家长是财产的主人，只有家长一个人才是灵魂的占有者，而家庭其他成员则失去占有灵魂的权力，妇女甚至不占有自己的身体，她们像牲畜一样被人买卖。拉法格说，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这说明了社会财产、权力的分化，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统治阶级按自己的意志来描绘灵魂和天堂，作为奴役和愚弄被压迫者的工具。既然地上生活极不平等，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在那里平等重新占统治地位，在那里穷人又变成富人。原始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就在死者的王国里重建起来”^①。拉法格说，如果说“灵魂对于野蛮人曾经是生理的需要，如今对于有产者却成了社会的需要”^②。统治阶级用虚幻的宗教意识来安慰受苦受难的群众，为的是使新的社会秩序成为可以理解的和可以忍受的，企图调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拉法格还指出，历史上对灵魂观念有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解释：一种是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灵魂是可以触摸到的物质性的东西。如德谟克利特用原子来解释灵魂的形成，认为灵魂是用微小的、圆的和光滑的原子组成，一切生命现象都是从它们的运动中产生出来。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宇宙一切因素的本质，同时也是灵魂的本质；另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解释，认为灵魂是一种超物质的精神性的东西。如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一种先于万物之前而存在的永恒不死的东西，这个没有物质界限的灵魂却是感性的欲望、情欲的起因和理性的基础。拉法格说，唯灵论派和柏拉图主义者抛弃了原始人用自然现象来说明灵魂存在的思想，给了灵魂

①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63、164页。

一张新的“出生证”，把原始人关于上帝观念是灵魂观念进化的终点颠倒过来，变成了上帝的观念是灵魂理论的出发点。这样，灵魂是从超自然的又主宰自然的上帝那里产生出来的，赋予上帝万能的权力。拉法格说，人民群众在本能上是唯物主义的，他们和唯心主义哲学相反，他们“决不愿意把灵魂中的一切物质的东西清除掉，相反地他们希望占有一个物质的灵魂，好在将来的生活中享受他们在人世间失掉了的一切快乐，而秘密神教许诺其信徒的也正是这些快乐”^①。

关于地狱观念，拉法格认为在原始民族和半开化人当中是不存在的，它是在私有制的社会中，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在秘密神教所复活的来世生活的理解上；所有这些神教都把幸福许给自己的信徒；而不信教者，即他们的阶级敌人，则应被投入泥沼和烈火熊熊的池里去”^②。统治阶级提出的死后惩罚的地狱观念，为的是对被统治阶级的约束，宣扬违反统治阶级的意志，死后就要受到地狱的惩罚。

拉法格在分析宗教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时深刻地指出，野蛮人发明灵魂为的是要解释梦景的现象，发明死后住所目的是解脱死者的灵魂。文明人保留着灵魂观念，被唯灵派哲学家和基督教创造的灵魂不朽、世外天堂的观念则是为了对付社会生活。如果说自然环境的“未知数”是原始人创造了上帝这个宇宙的指挥者，那末，社会环境的“未知数”是有产者保留上帝观念的原因之一。拉法格说，因为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社会的轴心是个人，要想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只得依靠个人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一些人的成功是与另一些人的失败为条件，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筑在另一些人痛苦的基

①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68、172—173页。

基础上。这样，人们不但需要物质上的追求，而且更需要精神上的寄托。拉法格指出，资产阶级从反对宗教到最后推崇宗教，都是出自阶级本身的需要。在反封建主义的时候，启蒙思想家曾大声疾呼地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但当革命狂热一过，罗伯斯庇尔用一道命令又恢复了“最高存在者”。胜利了的资产阶级认识到必须重新使用和雇佣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因为，从资产阶级的道德来看，“上帝”既可以欺骗工人，又可以满足自己的良心需要。为了使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甘当奴隶，许诺来世的幸福是满足人们精神寄托非经济性的办法。同时，在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交易所里的股票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正像赌博一样，人们的命运和前途、成功与失败，仿佛是依赖于运气和机缘，偶然性在起决定作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不可知的现象正像赌徒在赌场里一样占着统治地位。因此，阶级的本能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促使资本家相信有一种没有物质基础的、而且支配一切的超人类的上帝存在，同时这个上帝又能使他慰藉和精神上的寄托。拉法格说，资产阶级需要宗教，相信上帝的存在，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决定的。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资产阶级从寄生阶级变为生产阶级，并在科学的发展上不再有“不可知的”的社会秩序的时候，才能从人的头脑中消除上帝观念的存在。

拉法格指出，无产阶级不信教是由它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拉法格说，如果说资本家相信有一个关心他的神明，相信有一个上帝能帮助他占有无数的社会财富，使他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合逻辑的话，那末无产阶级不理睬神明的存在就更合逻辑。“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从早祈祷到晚，任何一个天父也不会赐给他每天的面包，他也不知道给他以生活必需品的工资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他很知道假如他不去工作，不管天上有多少‘善良的神’和地上有多少

慈善家，他还是要饿死”^①。拉法格深入地调查了伦敦和法国工业城市工人的情况，分析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指出工人在本质上是**不信宗教的**，对宗教的冷淡是现代工人的秉赋。因为工人是在大机器旁生产，对自然力的了解完全不同于愚昧无知的农民，工人不是屈从于自然力，而是控制自然力；工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没有像在有产者生活中的那样命运突变。“他作为雇佣劳动者而生，作为雇佣劳动者而活，作为雇佣劳动者而死”^②，像有产者那样相信迷信观念的偶然机会和不能预见的幸福运气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雇佣劳动者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明，不相信有什么上帝和救星。拉法格说，假如工人相信有个上帝存在的话，他也是怀疑到底上帝有没有正义，为什么只把劳动和贫困的命运赐给他；他感到上帝是可怕的和可恨的；上帝的模样和姿态正像有产的剥削者一样。

拉法格说，现代工人对宗教的冷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现象，表明了工人阶级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阶级，它不但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同时，在它的身上也体现了知识必将战胜愚昧，科学必将战胜宗教的历史必然性。

六、拉法格的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

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和阐发基本上是正确的，恩格斯曾把他比喻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③，他在法国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拉法格的理论著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其中有的也是严重的。他早年曾深受蒲鲁东思想和巴枯宁思想的影响，在文章和著作中有着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和教条主义的毛病。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①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2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8页。

教诲下，虽然有很大程度的克服，但未能完全杜绝其劣根性。在他晚年的著作中，特别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其观点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许多表述不确的地方。比如他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称之为“经济决定论”，没有彻底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界限，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攻击唯物史观以可乘之机，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否定思想观念的作用，说明拉法格对历史的辩证法缺乏研究，对恩格斯晚年在通信中反复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论述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原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认识论问题上，拉法格对不可知论的批判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的提法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误的理解。比如，他把人们的感性认识和通过科学工具得到的认识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主观的、不可靠的，后者是客观的、可靠的。这样，一方面是否定人的感性认识的客观性，否定感性认识作为一个认识阶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片面地夸大科学工具在认识中的作用。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拉法格同意法国物理学家彭加勒的说法：经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这不能不引起误解。因为对“经验”可以有唯物和唯心两种根本对立的解释。

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阐述是非常出色的，但有些提法也是欠妥的。比如，他把复仇思想说成是人的本性决定的，是人先天就有的，这不能不是先验论的残余。关于正义的思想，他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完全消失，也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拉法格参加过1871年巴黎公社的斗争，为宣传公社的主张，加强巴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做了许多工作。公社失败后，他遭到反动政府的追捕，不得不逃亡国外。但是由于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对公社的历史意义缺乏深刻认识。他认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不过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重演，看不到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看不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因此，

他很少去谈公社的意义和总结公社斗争的经验。

在民族问题上，拉法格也曾犯过严重错误，他曾同意蒲鲁东关于民族差异应当尽快地予以排除的观点，赞同蒲鲁东所宣称“民族”、“祖国”、“爱国主义”等概念是没有任何合理内容的提法。因此，在奥地利侵略意大利的战争问题上，拉法格是同意蒲鲁东主义的观点，否定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例会上，批评蒲鲁东的观点，同时也批评了拉法格的错误。

第四节 卡尔·考茨基早期哲学思想

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思想家和理论权威。在他的理论活动的早期和中期，也即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先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注释、解说马克思主义中做出一定的贡献。后来，也即是他的后期，堕落为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首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可耻的叛徒。

一、考茨基生平及其政治理论活动

卡尔·考茨基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当时属奥匈帝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63年，考茨基9岁的时候，随父母从布拉格迁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居住。1864年至1866年，考茨基在多瑙河畔的梅尔克的本笃会修道院上学。1866年在维也纳上中学，在这期间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捷克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1874年，考茨基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研究了哲学、历史、法学和政治经济学。上大学的第二年，他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党内的半无政府主义派别，随后又转入德

国社会民主党。如果从考茨基上大学并加入社会民主党时算起，他的理论活动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是他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从80年代到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38年他逝世是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时期。

在第一时期，考茨基主要是在大学学习的青年时期。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下，他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如乔治桑的小说、路易·勃朗和拉萨尔的历史著作，激发了他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同情和兴趣。在哲学上，他接受的是康德、孔德、斯宾塞、马尔萨斯和弗·阿·朗格等人的思想。他自己承认，达尔文主义对他思想影响最大。他说，我的出发点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是从黑格尔出发的，我比马克思更早地研究了达尔文，有机体的发展是先于经济发展的，物种的生存竞争则是早于阶级斗争^①。在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和朗格思想的影响下，1880年，考茨基写了《人口增殖对社会进行的影响》。1883年，写了《生物界中的社会本能》，企图以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把社会的发展说成是一种生物现象。同时，极力维护朗格关于人口规律是社会学的基础、“社会现象”根源于人的本能的唯心主义观点。这时期，考茨基虽然看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文献，但是他理解得很肤浅和模糊，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还是格格不入的。后来他在1899年写的《土地问题》一书中曾检讨说：“在我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期，我极不同情马克思的理论。我对于马克思理论曾采取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②

考茨基加入社会民主党以后，也曾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等人有过联系，1875年9月，曾用“辛马霍斯”的笔名在《人民国家报》上连

① 参见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1927年德文版，第1章。

② 考茨基：《土地问题》，1963年三联书店版（下同），第9页。

续发表了题为《从一个脑力劳动者的角度看社会问题》的长篇论文。恩格斯读了这组文章之后非常生气，写信给倍倍尔对考茨基的文章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恩格斯说：“辛马霍斯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所写的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内容的长得象绦虫一样的文章就是证明，这些人的经济学上的错误、各种荒谬观点以及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一无所知，都是彻底摧毁到现在为止德国运动在理论方面的优越地位的有效手段。”^①

1880年，考茨基大学毕业后，应赫希柏格的邀请，从维也纳迁居苏黎世，与伯恩施坦一起，从事《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政治经济论丛》的撰稿和出版工作。1881年，在倍倍尔的帮助下，在伦敦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久并担任了恩格斯的私人秘书，开始了考茨基第二个时期的理论活动。

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边工作，考茨基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此外，考茨基还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传身教，思想上的严格要求，帮助他逐渐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例如，恩格斯说，要帮助考茨基把在大学里所学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忘掉^②。对他理论上的错误，进行“毫不宽容”的、“无情的批评”^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下，考茨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这时期，他除了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的《新时代》杂志的主编之外，还撰写了大量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内容丰富而有较大影响的有：《婚姻和家庭的起源》（1882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年）、《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等。这些著作虽然有着不同程度的缺点和错误，有的还是相当严重的，曾受过恩格斯的多次批评，但是总的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54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5、343页。

初，它对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作出有益的贡献。有的著作曾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和北美广泛的流传。《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考茨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作系统的研究，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看作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并对它的基本原理和范畴作出卓越的通俗的阐述，这本书成为后来许多无产阶级革命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入门向导。

1889年以后，在恩格斯的具体安排和指导下，考茨基参加了马克思的遗著《资本论》第四卷的整理工作，在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在1905—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名，出版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这不能不说是考茨基的一个重大贡献，对于完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在这个时期，考茨基从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写作，担任了《新时代》杂志的主编，特别是担负了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工作，使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世界无产阶级群众中获得了愈来愈高的声誉，博得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成为德国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完全脱掉了“中派”的外衣，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同流合污，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辩护士，堕落为不可救药的无产阶级叛徒。从1914年直到他逝世，这是考茨基理论活动的第三个时期。这时他写了许多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著作和文章，如1914年写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1918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30年写的《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等。这些文章和著作，一方面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一方面是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咒骂俄国的十月革命，攻击和诽谤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在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发表不久，写了《无产

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对考茨基进行严肃的批判。1927到1937年，考茨基发表了两卷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他作为50年来理论活动的总结，也是他的修正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考茨基是企图用生物的进化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平静的进化，不应该是飞跃性前进，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的篡改和修正。

1938年，考茨基死于阿姆斯特丹，终年84岁。

对于考茨基一生的政治理论活动，列宁曾作为严肃的历史的评价。列宁说：“我们从考茨基的许多著作中知道，他是善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①又说：“考茨基虽然有过大功劳，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在严重危机时期能立刻站到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的人……”^②列宁对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作了严肃的批判。

二、用唯物史观指导经济学研究

自考茨基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后，开始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资本论》和《反杜林论》这样的大部头的著作。后来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从1885年到1890年这期间写了大量关于历史问题 and 经济问题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和《土地问题》（1899年）这两部著作最为突出。前者是考茨基用通俗的形式，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容，特别是比较忠实地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实质，对于引证马克思的原话，作了精辟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因此，在读者中取得了很大的声誉。这书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不断地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78页。

再版，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作出了贡献。后者是考茨基解释和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问题的理论，用大量事实分析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所正在发生集中过程，大农业经济产生的必然性，探索了农业发展的规律。这部著作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具有重大的作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作一个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和理解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方法。怎样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的基本思想呢？考茨基认为，最主要的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这部著作，历史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考茨基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中，解释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理论时指出：“首先不应该被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迷惑住，不应该把商品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当作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如果我们始终记住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生产，其中每个经济单位虽然不是共同地从事生产，但它们是为对方的需要进行生产，记住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掩盖在物质外壳下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记住所有这些事实，那末，我们就将知道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学术著作中的基本原理。”^①考茨基强调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强调了解商品的价值时，不能只看物与物的关系，而是要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做到这样，只能靠唯物史观的指导，否则就不可能了解经济关系中的各种复杂的现象。在解释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的理论时，考茨基认为也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他说，社会现象不但与自然现象不同，而且更加复杂，要想真正认识事物的内在规律，一方面必须摒弃直观的实验的方法，另一方面必须运用科学抽象，把引起各种社会现象的本

^① 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6年版（下同），第19页。

质原因与非本质原因、经常原因和偶然原因区别开来。

考茨基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思想，认为它是“创造了新的经济的和历史的体系”^①，使人对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现象有深刻透彻的了解。他还驳斥了当时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的种种歪曲和诽谤，捍卫马克思学说的纯洁性。考茨基说：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第一次研究了资本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他第一次证明当前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人们的良好发现某种‘永恒正义’后随便提出来的。”^②

恩格斯曾亲自审阅过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手稿，并作了一定的修改。在1888年1月5日的一次通信中，恩格斯曾表示对此书的满意。他说：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理论的提要，“或者确切些说，是对这些理论的独立叙述，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③。当然，这本书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缺乏认识，因而对《资本论》中所分析的经济关系了解得比较肤浅。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考茨基“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④

《土地问题》一书，是考茨基经济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著作。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下农业生产的集中过程，探索了农业发展的规律，预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农业发展的前途。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考茨基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经济的落后，小生产者的存在，并不说明它的合理性和优

①② 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11页。

越性，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地产的利益的特点决定的。考茨基说：“凡是资本主义大经济伴随着小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地方，小经济就不再起这种出卖农产品的作用。在这里，小经济就从产品的出卖者变为大经济‘生产得过多的’产品的购买者；而小经济自己生产得过多的商品，就是大经济特别需要的一种生产资料——即劳动力。”又说：“凡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地方，大经济和小经济就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条件，正如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为条件一样，因而小农也就日益具有无产者的性质。”^①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小农具有无产者的性质，考茨基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绝不应该像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用暴力去剥夺小农经济。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的说法，应该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使农民逐渐地自愿地走上大农经济的道路。考茨基还指出，大经济和小经济相比较，它“具有肯定无疑的优越性”^②，但大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不能错误地理解为越大越好。考茨基说，农业的发展虽然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并不是说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对立。恰恰相反，它们两者是向着一个目标进行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也必然要走大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在原始的农民生产中，农业是一个在经济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因素，那么现在这种关系颠倒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占着统治地位，而农业必须服从它的需要。工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农业发展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工业朝着社会主义前进，那么农业也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③

考茨基对土地问题的研究，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业问题的见解，对于确定党的农民政策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特别重大意义。所

①② 考茨基：《土地问题》，第199、144页。

③ 考茨基：《土地问题》，第349页。

以列宁非常赞赏考茨基这部著作，称赞它是“《资本论》第三卷以后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①。

当然，《土地问题》一书也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错误是，考茨基对农民缺乏全面的分析，认为农民愚昧落后，是等待无产阶级去解放的消极群众。对工农联盟问题，考茨基几乎没有提到。对于殖民地问题，考茨基也作了错误的分析，他认为殖民活动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一种自然而然的进步因素，这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扩张主义作了辩护。

三、哲学观点的阐发

考茨基在他的早期和中期的理论活动中，哲学的文章和专著比较少。晚年，他虽然写过比较繁浩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两卷集，但这是他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作。在哲学问题上，考茨基曾这样表白过：“在哲学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强者。我认为最好是不论及哲学问题，不过，我当然有自己的哲学信念，这就是以前就有的那些信念：我的老师的信念，辩证唯物主义。我只是在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新康德主义者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经济的学说。”^②这表明考茨基在哲学信仰问题上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他一方面要信念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想成为新康德主义者。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少有他自己的独立的哲学观点，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机械的或庸俗的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等观点的折衷和凑合。但是，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也作过有益的工作，其贡献也是不能抹煞的。

（一）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6页。

^② 转引自《格·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文学遗著》第2卷，莫斯科1973年版，第172页。

考茨基早年曾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他认为达尔文的名字为他的历史学体系提供了完整的纲领，生存斗争的理论是他研究自然和社会的指导性思想。考茨基在他的《达尔文和社会主义》（1875年）、《人类发展史概论》（1876年）和《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等著作中，引入目的论思想，研究如何使人的适合于目的的活动同客观规律并行不悖，人如何进入普遍的因果联系等。考茨基还从种族的生存斗争来研究历史，把人口发展的规律看作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由于考茨基用自然主义来研究人和社会，故此把自然界和自然环境等同起来，把人的语言和人的劳动工具仅仅看作是动物本能的延续，劳动分工则是动物群落开始的一种过程的继续，最后创造出剩余产品，就产生了为占有这些产品的争斗。这纯粹是用达尔文的有关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后来，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回忆说：“当时我以为人类的发展是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斗争的结果，我把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了解成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不是了解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观，而是了解为由不同类的生存斗争在人们身上培养出来的不同类的欲望。”^①由此可见，在80年代以前考茨基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他把社会关系自然化，把社会进程生物化。

80年代以后，考茨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特别是他读了《反杜林论》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达尔文的态度，抛弃了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观察社会生活。在1910年出版的《自然界和社会的增殖和发展》一书中，考茨基竭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他提出，人类社会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也即是说，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与自然有其一致性，同时人类社会又有它本身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1卷第1分册，第18页。

的特殊性。考茨基反复声明：他一方面反对排除自然的必然性，把社会的进化只看作是自由意志产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另一方面也反对否定人类社会的特殊本质，用动植物机体的发展规律来解释社会生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在这本书中，考茨基还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活动特点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等等，都有一定理论价值。

当考茨基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作了一些合理的解释。但是，他始终没有彻底抛弃自然主义的立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较多地注意是人如何适应环境而忽视人对自然的改造。人化自然，更是在他的视野之外。他曾错误地提出，唯物史观的重要问题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群落之间的类似之处。因此，考茨基的历史观不可能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有着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性质。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加以考虑的人性只是作为出发点的人性，就是说：作为那种在人和环境之间形成历史过程的辩证过程正题的人性。我们可以拿来作为这样正题加以考虑的不是一个结论，不是这种辩证过程的一个合题，不是经过历史发展变成了人的本性，而是人从那种历史过程开始时所具有的、从他的动物祖先遗传得来的本性。”^①他正是用人性、人的自然属性来解释人类历史的。

（二）对“必然”与“自由”的解释

对必然与自由的认识，考茨基类似康德提出两个世界的思想：一个是必然性的世界；一个是被自由主宰的世界。考茨基说，人们只有以客观必然性为前提，才能够认识世界，而人们在进行认识活动时，又要以一定的自由为条件。

什么是必然性呢？考茨基认为必然性就是规则性或规律性，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卷第2分册，第51页。

它是偶然性的反面。考茨基批评康德把时间、空间、因果性、必然性等概念看成是先天的。他说，必然性的概念是从人的认识中，从有意识的经验中产生和获得的，并不是从本能的感觉中产生的。“关于日月星辰的运行的规律性，首先是由观察星球的轨道而获得的。这种观察，在少雨地带如美索不达米亚或尼罗河流域，是可以特别容易地进行的，那些地方的夜间几乎经常万里无云。

考茨基反对把必然性看成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他指出，即使是得到了科学证明的必然性或规律性也并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它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效，随着条件的变化，规律性、必然性也发生变化。因为科学的日益发展，“总联系的扩大使我们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越来越可靠，也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认识都只是相对性的。”^①

关于“自由”，考茨基基本上同意恩格斯的解释。他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自由与康德心目中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自由是“从对必然性的洞察中产生出来的”，后者的自由是主观自生的。考茨基同意把自由解释为对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但他不同意恩格斯关于“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的飞跃”的提法。他说，我们最好不说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只说因果必然性王国内部自由领域的扩张，这个王国的界限是不容置辩的。考茨基认为自由总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就是在社会主义普遍实现以后，人类的自由也当然会仍旧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我们永远不会把自然界的一切问题一个不剩地探讨明白，也很难有一天能够预见到我们的社会行为的一切后果。其实，考茨基对恩格斯的话作了错误的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并不是说到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卷第1分册，第92页。

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彻底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矛盾。恩格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生产，阶级斗争最终消除了，生产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了，人们成了自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人们就向自由王国迈进了伟大的一步，人类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动物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人类可以达到绝对的自由，可以最终地脱离必然王国。反之，恩格斯是一再强调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这个飞跃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结。

在考茨基那里，对于自由的想法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在《伦理学和唯物史观》一书中，他认为自由是人的活动的心理前提，是一种“情感”。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又认为自由是一种求知欲，是“从事文艺和科学活动”、“从事最高尚的娱乐”^①。但是，不管考茨基从什么角度对自由定义，都是忽视实践的作用和意义，忽视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意义，所以他也提不出如何实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考茨基把自由与必然的范畴用于社会生活，提出经济必然性和意志自由的关系。他说：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要反对只承认经济必然性、规律，而否定意志自由的形而上学机械论；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否定经济规律，主张任意支配历史的唯意志论。考茨基指出，机会主义者所说的：“既然经济发展受一定规律的支配，那末它就是能动的个人无从插手的自动的、独立过程”，

“人的意志作为与经济并列并且超越经济之上的一个特别的因素”等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这是“那些光靠书本汲取知识并且极其抽象地玩弄这些知识、而对现实经济过程一窍不通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②考茨基提出：“生活条件决定着愿望的

①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版，第136—137页。

②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2年版（下同），第45页。

性质、活动的形式和活动的成功与否。这个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①这是说，在社会生活中，经济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主观活动的基础，它决定人的主观愿望、决定人的活动形式和结果。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就是历史唯心主义者。

但是，经济规律和主观意志不是两个彼此无关的因素。他说，“经济过程的任何表现都贯穿着意志”，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承认“经济必然性并不等于听天由命”，因为“经济必然性来自人的生活意志的必然性和人利用他们所处的生活条件的不可避免性。”^②考茨基认为，不能把经济同经济活动混为一谈。经济“亦即人及其彼此对抗的活动的社会合作形式”，也就是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是指“人利用原料和工具来按照自己的意思生产一定的物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它一定的规律，人们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的。

考茨基关于必然与自由的分析有其正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其中包含着形而上学机械论和唯心主义，有时又是两者的混合。

（三）宗教、伦理思想

考茨基对宗教理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基督教方面，他的第一部宗教专著是《基督教的起源》。后来，还写过《圣经原始故事的起源》、《耶稣—反抗分子》和《耶稣的最新传记》等著作。他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探讨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本质。恩格斯对考茨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肯定的。1883年9月8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一封信中说：“我高兴的是，您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选了圣经原始故事（即考茨基的《圣经原始故事的起源》——引者注）和殖民活动（即考茨基的《移民和殖民活动》——引者注）这类题目，在这方

^①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5页。

^②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9—50页。

面即使对详细情节进行较小程度的充分研究，也能做出点成绩，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论殖民活动一文，我很喜欢。”^①

《基督教的起源》一书，是考茨基一部比较好的宗教理论著作，它收集了大量有关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的资料和文献，对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经济状况等方面，都作了详细分析。对于犹太教、早期基督教、基督降世说、原始基督教材社制度的演变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为了解宗教意识史提供了根据。

关于伦理学，考茨基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主要的有《康德的伦理学》、《道德基础》、《生活、科学和伦理学》、《道德的起源》、《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等著作。特别是《伦理学和唯物史观》，这部著作有着重大理论价值，因为它不但研究了伦理学说史，考察了康德伦理学的特点及其错误，而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了道德的起源问题，重新评价达尔文主义。

考茨基在伦理学上的最大功绩是在批判新康德主义的斗争中，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康德的伦理学观点，尽管他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妥协的。因为当时新康德主义者企图用康德的伦理思想来论证社会主义，把康德说成是现代社会主义之父。考茨基指出，无论是康德本人，还是康德伦理学的鼓吹者，对于道德的起源问题都未能作出满意的回答；康德的“绝对命令”是具有狭隘性，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不适用的。

考茨基论证了恩格斯关于道德规范要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提出“道德理想是特殊的阶级斗争关系的特殊武器”^②的论断。他指出，道德理想是由于对现状不满而产生的希望和愿望的总和。它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力，作为团结进步阶级的力量和激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81页。

② 考茨基：《伦理学和唯物史观》，斯图加特1920年版，第14页。

他们反对现状的手段。他还认为，道德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也对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发生反作用，论证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考茨基在考察道德起源问题上，提出了关于社会本能的理论。考茨基认为，动物没有道德准则，不存在什么世界观和理想的问题，但动物世界存在着道德基础、社会本能。这样，研究从动物向人的演变的推动力，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当然，“社会本能”也只有在“新的原因——出现劳动的共同体、进行共同斗争——的作用”^①下，才能得到发展。考茨基还说，“社会本能”是作为最初的和原始的“生活意志”的表现，是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高尚美德。

但是，在道德问题研究上，考茨基还没有完全摆脱达尔文进化论的局限性。他曾断言：“道德规律无非是动物的本能”^②，“道德规律具有与遗传本能相同的性质”^③等等。因此，他认为道德规范是起源于动物界，认为动物也同样具有无私、勇敢、功名心等社会品质。这样，考茨基实质上是把人与动物等同起来，把社会的人同动物的本能混为一谈。

四、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分析

考茨基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其观点是基本上正确的。考茨基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识，是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否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盲目的、不自觉的。考茨基说：“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雇佣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是对我们这一世纪发生影响的动力。”^④“资本家阶级和工人

①②③ 考茨基：《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第92、63、67页。

④ 考茨基：《土地问题》，第13页。

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激起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并且促使工人政党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起来。”^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也即是“劳动的社会性与已经过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可避免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1891年，考茨基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和制定工作。1892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发挥了纲领的理论内容。特别是考茨基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考茨基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整个社会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初的性质已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它由社会发展的动力，变成了社会停滞和社会崩溃的原因。……它的灭亡是毫无疑问的。”^②考茨基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问题。考茨基说：“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全部资本集中到统治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的少数几个人手里，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荡不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愤慨的后果的不断加剧，不是建立在现存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③。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对纲领的解释中，考茨基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要性，指出政治斗争是社会经济改造的前提，工人阶级如果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考茨基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和写作《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

①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207页。

②③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第82、87页。

的作用，成为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机会主义制定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典范。

《爱尔福特纲领》和考茨基的纲领解说，都没有重视革命的主观作用，没有指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首创精神，只是片面地强调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人民群众也只能消极地遵从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列宁后来批评说：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发动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①

《社会革命》写于1902年6月，这是考茨基依据同年4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主义读书会的讲演稿修改写成的。在这本书中，考茨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和客观必然性。他说，为什么受压迫的阶级总要进行社会革命呢？这是因为这个阶级“迄今的社会地位是与它在政治上要居的统治地位相去甚远而且互相矛盾的。”^②考茨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过时，社会革命的时代也没有结束。因为“资本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③考茨基深入地分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激化；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中间阶级的日益两极分化。指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考茨基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到革命的时代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开始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取得政权的道路》写于1909年。列宁认为这是“考茨基最后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6页。

②③ 考茨基：《社会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9页。

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①。在这部著作中，考茨基及时地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预言随着战争的爆发，革命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考茨基认为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他号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好夺取政权的战斗准备。他说：“那个盼望已久的时机现在终于日益临近，政治停滞的僵局将被打破，充满斗争欢悦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沿着夺取政权的道路胜利挺进的进军将要开始”^②。

考茨基批评了机会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成熟”、“为时过早”的论调，把20世纪初的革命形势和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无产阶级状况作了对比，考茨基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更加平静地等待日益迫近的战斗了。既然无产阶级已经从现存国家基础吸取了它所能从那里吸取的全部力量，既然这个基础的改造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那末就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的革命了。”^③考茨基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不是建立政党联合这种外交手腕，而是群众的行动，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众的行动，才能使我们获得成功。群众性和组织——这是符合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武器，是无产阶级能够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取得胜利的唯一武器。”^④考茨基认为，这个时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斗争。他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采取同日益腐败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政策。他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社会民主党要参加国家政权，就只能向资产阶级政府出卖自己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争取到几个缔结卖身契的议员罢了。”^⑤但是有些问题，考茨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②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71页。

③④⑤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118、20、125页。

基也没有作认真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地表述。特别是对关于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等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性和实质性的问题，考茨基是避而不谈或躲躲闪闪。也是在这些问题上，使得考茨基在后来完全滚到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

五、对拉萨尔机会主义和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随着统治阶级某些政策的改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得到了较多的合法活动的机会，工人运动向更加宽广的方向发展。同时，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潮也在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泛滥起来。恩格斯在世时，已清楚地看到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他为了反击机会主义对工人政党的侵蚀，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决定发表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被压了16年之久的《哥达纲领批判》。1891年1月，考茨基在他主持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并反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对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责难，因而得到了恩格斯的赞扬，认为他“在整个事件中一直表现得很勇敢”^①。

1891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制定新的党纲工作中，考茨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错误的机会主义观点作了斗争。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曾起草了一个党纲草案。恩格斯看后很生气，当即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严厉地斥责了那种“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的机会主义观点。在讨论党纲草案的过程中，考茨基所领导的《新时代》编辑部，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

^①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3页。

草案共分四部分，其中前三部分关于理论原则是考茨基亲自起草的。恩格斯虽然也对考茨基的草案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认为要比李卜克内西他们的“正式草案好得多”^①。1891年10月14—2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纲领委员会根据《新时代》编辑部的草案制定出最后纲领草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党纲也叫做《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比70年代的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它基本上清除了拉萨尔主义和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也比较明确地阐述了党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它回避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公开地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始时，考茨基与伯恩施坦“深有同感”，从1896年10月起，在他主持的《新时代》杂志上不加评论地连续发表了伯恩施坦的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组修正主义文章。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的文章，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喜欢的，是他的工作的继续。因此，对伯恩施坦的批判上，考茨基在长时间内是态度暧昧和犹豫不决。后来，由于倍倍尔、普列汉诺夫、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左派的坚决要求和广大党员的压力下，考茨基才不得不在《新时代》杂志上展开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辩论。

18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了代表大会，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派在会上严厉批驳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谬论，批评了《新时代》编辑部无原则地发表了伯恩施坦的文章。但考茨基在发言中除了对伯恩施坦的某些明显的错误进行批评之外，更多地却百般为伯恩施坦的错误辩护。说什么伯恩施坦的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51页。

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他还表示不愿同一个“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进行争论，“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大会结束后，普列汉诺夫以题为《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在《萨克逊工人报》上发表了致考茨基的公开信，批评了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袒护。

由于党内外的压力，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利用伯恩施坦的立场向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从1898年12月起，考茨基才公开表示批判伯恩施坦，认为同他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考茨基这一举动是被迫的、温和的，而且不时地为伯恩施坦的错误解脱，但是，考茨基能公开表态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考茨基是当时第二国际正统的赫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的威望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着重大的影响。

1899年1月，伯恩施坦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政治纲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篡改，“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①。考茨基于同年4月在《新时代》和《前进报》上分别发表了《伯恩施坦与历史唯物主义》、《伯恩施坦与辩证法》、《伯恩施坦关于价值和阶级的理论》等文章，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同年秋天，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驳斥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反对伯恩施坦提出的把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变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党的要求。考茨基这本书，对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看到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建议他的夫人娜·康·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页。

克鲁普斯卡娅翻译成俄文，并亲自写了书评。倍倍尔读后也认为考茨基写得很出色，它严厉地谴责了伯恩施坦。但在这本书中，考茨基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问题，说什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考茨基这一错误痛加批判，认为他“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①。

此外，考茨基还写了《阶级斗争和伦理学》、《社会革命》、《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伦理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取得政权的道路》等专著和文章，批判了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等人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观点。在这些著作中，考茨基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批判伯恩施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外，还对他的一些哲学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如考茨基批评伯恩施坦妄图把宿命论强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批评伯恩施坦歪曲恩格斯晚年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还批评伯恩施坦对辩证法的无知，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歪曲为对社会生活的随意解释，说什么马克思关于思想意志和经济必然性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考茨基反驳说：“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这样的矛盾的。这不过是他的批评家们的头脑混乱、他们的无法摆脱的不可救药的昏聩的结果。所以说他们昏聩，首先是因为他们把意志和自由意志混为一谈。……此外，这种昏聩还基于对经济 and 经济发展的一种别开生面的观点。这些学者先生们认为，既然经济发展受一定规律的支配，那末它就是能动的个人无从插手的自动的、独立的过程。……只有那些完全用经院哲学的态度来看待经济的人，只有那些光靠书本汲取知识并且极其抽象地玩弄这些知识、而对现实经济过程一窍不通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②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3页。

②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5页。

由于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批判采取暧昧、调和、妥协的态度，使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进行到底。考茨基当时是第二国际中派的领袖和理论家，他竭力在缓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掩盖伯恩施坦主义的反动实质。列宁在揭露中派的实质时说：“中派是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僚。”^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完全脱掉中派的外衣，滚到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立场上去，与伯恩施坦主义同流合污了。

考茨基的一生，从来不曾真正理解革命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受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的严厉批评。马克思说他“是个天生的俗种”，恩格斯说他“是个纯粹的学究和经院哲学家”。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是有贡献的，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起过积极的作用，这些都不能因为他后来成为叛徒而否定的。这时期考茨基的许多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有关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探讨婚姻、家庭、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著作，都应该基本肯定，其中大部分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列。当然，在考茨基的早期著作中，有许多观点也是错误的，有的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歪曲的解释，对某些重要原理作了阉割和离弃。他早期理论的不彻底性，为后来发展到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联系。

第五节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哲学思想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55页。

家、哲学教授、第二国际时期的杰出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他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一、拉布里奥拉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年7月2日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诺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影响的中学校长，他具有丰富的历史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拉布里奥拉在其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从小具有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思想倾向。从中学开始，表现出对哲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强烈兴趣。

1861年，18岁的拉布里奥拉进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这所大学不仅是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学府，而且也是进步思想的交流中心，其中最有影响的那不勒斯左派黑格尔小组就设在那里。这个小组的学术讨论十分活跃，他们竭力摒弃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杂质，宣扬其辩证法思想。拉布里奥拉是这学派的杰出领导人贝特兰多·斯巴芬尼的学生，在这位老师的亲切教导下，拉布里奥拉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哲学思维的培养，开始了他的思想的演变和理论的建树。

由于家境困难，生活艰辛，拉布里奥拉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大学的学习时断时续，长达十年之久。1871年，在那不勒斯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哲学史副教授。这期间，拉布里奥拉在政治上接受了民族英雄加里波的思想的影响，从自由主义转向激进民主主义，在学术上，从最初信奉康德的先验哲学，转向接受海尔巴特和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对黑格尔的社会辩证法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拉布里奥拉从来不是一位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他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能满足现代意识的要求，也不符合时代的精神，因此不能把它作为新思

想的基础。可是，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则有助于正确地理解历史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地认识意大利和世界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拉布里奥拉主张把哲学和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社会问题。

60年代，拉布里奥拉在大学学习期间，写了两部著作。一部是1862年写作的《反对爱德华·蔡勒所宣布的“回到康德去”的口号》，这是以捍卫黑格尔的辩证法，反对新康德主义思潮为主题的作品；另一部是1866年写的《从斯宾诺沙〈伦理学〉看激情的来源和本性》，这是为应征那不勒斯大学奖学金而写的，它透彻而详尽地阐述了从苏格拉底到斯宾诺莎的激情学说，论述了社会伦理学的一般原理。从这两部作品中，已充分显示出拉布里奥拉善于进行哲学思维和分析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才能。

1871年，拉布里奥拉出版了《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苏格拉底学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哲学专著，荣获了那不勒斯道德学和政治学科学院一等奖。作者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方面来探讨道德和心理问题，通过这种探讨，把拉布里奥拉引向对赫尔巴特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他说，在赫尔巴特思想的影响下，他从哲学进到心理学，从个人心理学进到社会心理学。他提出在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时，必须坚持辩证法的分析方法，既要反对唯心主义非决定论，同时也要避免庸俗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后来，在赫尔巴特思想的影响下，拉布里奥拉还写有《论道德自由》（1873年）、《道德和宗教》（1873年）、《论自由概念》（1878年）等著作，表现出他的强烈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

1873年底，拉布里奥拉迁居罗马，次年任罗马大学教授。此间，意大利正获得独立，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拉布里奥拉从一位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主张在意大利建立民主制的国家，实行最广泛的代议制，并指出代议制是实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这时，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是被各

种空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所控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性质，但工人运动的规模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90年代初，拉布里奥拉在回忆他思想的转变过程时曾说过：“在我来罗马当教授时，我是一个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鲜明的反对者，诚然，只是出于抽象的想法，但后来，我研究了国家法、行政法和国民经济，而在1879—1880年左右，我已经成了社会主义观点的坚决拥护者了。”当然，这时拉布里奥拉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拉布里奥拉世界观的根本性的转变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在长期的工人运动中，认识到激进的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能克服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更新整个社会的机体。1890年，拉布里奥拉公开与激进派领导人决裂，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此，他与恩格斯开始了经常性的通信，讨论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1893年，在苏黎世的国际化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会见了恩格斯，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恩格斯长达五年的通信联系，拉布里奥拉得益非浅。他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简直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为了寻找一本《神圣家族》，先后多次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不惜任何代价购买，后来不得不求助于恩格斯，通过左尔格在美国买到此书。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拉布里奥拉不是单纯满足于掌握某一原理的个别结论，而是力求从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过程中更深刻地去理解这一理论体系的本身。在当时实证主义流行的时候，拉布里奥拉坚持独立思考，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1894年，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象您一样在思索，甚至把握了你的思维方式……”。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达到一定的深度，并把他的理解体现在自己的著作之中。

拉布里奥拉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唯物史观论丛》，一共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是《纪念〈共产党宣言〉》，于1895年4月写完，便立即寄给恩格斯征求意见。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仔细地审读了这本书，并于同年7月给拉布里奥拉写了复信说：“全部都很好，只不过有几处事实稍有出入，开头的一部分用语有些费解”，并表示“很希望看到其余的全部。”^①同时称赞拉布里奥拉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

1896年，拉布里奥拉发表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他的《唯物史观论丛》的第二部分，也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详尽的发挥。特别是他论证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使人类历史过程的客观化和自然化，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的生命所服从的规律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的起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拉布里奥拉还运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深入地分析了意大利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要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了解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找出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拉布里奥拉既批判了因素论者把人类历史看作许多孤立事件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批判了庸俗经济论者把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简单化和庸俗化。

1898年，拉布里奥拉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哲学丛谈》，这是他的《唯物史观论丛》的第三部分，是他对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错误观点批判的文章，因为是以书信形式发表，故此也称为《致索列尔的十封信》。在这十封信中，拉布里奥拉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以及同以往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什么奢望于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的绝对真理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72页。

系，它只是一般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因此，它不是与其他科学相对立的，而是相一致的。拉布里奥拉说，应该把哲学规定为“生活和世界的一般学说”，不应该把它理解为包罗万象的、最终的绝对真理体系。

拉布里奥拉晚年从事写作《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四部分，题为《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原打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特征作一次深入的分析研究，但是由于重病缠身，这部分只写了前五章，并在他逝世十年后才公开发表。

1904年2月12日，拉布里奥拉因患喉癌逝世于罗马，终年61岁。

二、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实质

拉布里奥拉为了阐述唯物史观的实质，首先考察了唯物史观产生的社会物质根源，并且着重从人类思想发展的角度，追述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过程，揭示这一科学历史观出现的客观必然性。

拉布里奥拉说：“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从梦中得到的。”^①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人类的认识和思维方法历史地发展的必然结果。拉布里奥拉说：“如果有人希望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产生的前提，他不仅必须研究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先驱的人（包括圣西门和更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研究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解剖生产商品的社会经济学家，还必须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本身，并且最后郑重地宣布，理论是它所说明的事物的再现。”^②这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这伟大学说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拉布里奥拉认为，唯物史观

①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91页。

产生的前提是以现代技术发展为代表的生产力，以及在商品生产对抗性竞争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以私人占有形式的资本积累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它每发展一步，同时也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拉布里奥拉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使得“这个社会由于自身运动的规律本身而暴露出它自己的内部结构，产生了起反作用的唯物主义观念。正象它产生社会主义，即自己的实际的否定一样，它使得一种新的历史学说作为这个社会的理论上的否定而问世。”^①拉布里奥拉强调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说清楚了唯物史观作为崭新世界观的产生的社会基础。

拉布里奥拉还指出，唯物史观的产生“不是两位作者个人的、可以商榷的意见，而是思维的新的胜利。这种胜利是新世界产生过程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后果。”^②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相应的新的思维工具。同时也表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拉布里奥拉追述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经历过无数艰难曲折，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历史过程，阐述了新社会观产生的必然性。拉布里奥拉说，“这种历史观赋予新的社会革命（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无产阶级的本能意识和它的激昂的自发运动中）的需要以理论形式，而且承认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从而改变了革命的观念。”^③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阐明历史发展的趋势，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同时，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工人运动，也提供了崭新的、生动的直接材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为他们制定新的世界观的理论。

①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93、92页。

③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3页。

拉布里奥拉还指出，唯物史观作为新思维形式的理论，它也是科学发展成果的总括。也即是说，没有科学的进步，没有对科学发展过程作出全面的考察和总结，唯物主义历史观也不可能产生。拉布里奥拉说：“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的成果，同时是科学形成的整个过程的完结；唯物史观作为结果和补充，也是整个历史科学和整个社会学的简化。”^①唯物史观是人类科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吸取了各种进步历史观的积极因素，概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所以，它能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拉布里奥拉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高，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这是唯物史观创立的科学条件。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以来，阶级斗争的巨大发展，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在法国“历史观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著作界的右翼也好，左翼也好，即从基佐到路易·勃朗直到谦逊的卡贝全都如此”^②，他们已经看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拉布里奥拉从科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唯物史观这新思想形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实现历史观上伟大变革的意义。

拉布里奥拉看到人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反对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他说：“由于存在几乎不间断的传统，我们现在实际上可以从我们的知识的总和中吸取不仅在新时代，而且在以前的历史，从古希腊（因为正是从古希腊开始，整个人类思维的自觉的、一贯的和有系统的发展才无疑开始带有继承性）以来所发现和证明的一切东西中最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利用早已发现的和经验过的手段，我们在科学研究领域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等于承认，每一代人都应当再返回到人类的童年，一切从头开始。”^③试图从人的认识过程，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97页。

②③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42、93—94页。

从思想史的继承性，探索唯物史观的产生，这无疑是深刻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成为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善于批判继承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史观产生的前提的论述是深刻的。他认为主要是想说明两点：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已经能够借助于本身的原则说明自己的起源，这是它成熟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①唯物史观既不是头脑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不是教条主义者所理解的绝对真理的总汇，也不是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形而上学的臆想。它只不过是对于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经验总结。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拉布里奥拉也有许多论述。他说：“唯物史观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试图借助一定的方式用思维来再现经历若干世纪的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复杂化。”^②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能从历史的客观实在出发，从纷繁复杂的、混乱不堪的各种历史观念的迷宫里，引出正确的思想，揭示社会的真正本质，“揭示任何人类发展……的真正原则和动力”，使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的说明“客观化和一定意义上自然化”。拉布里奥拉解释说，使历史的自然化、客观化这是包含着对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因为唯心史观的前提是：劳动和人的活动同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和自由愿望构成一个整体的，是自由意志起决定性的作用。拉布里奥拉还指出，把历史发展过程客观化、自然化，把它看作第一性的因素，但绝不是把它简单化和“标准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教条，不是按一定逻辑规律的推理而自然地把人们的感觉和思想变成固定的、僵硬的范畴。唯物史观是普遍的世界观，它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05页。

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4页。

的问题提供了钥匙。

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

社会形态的理论，在拉布里奥拉的著作中叫做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拉布里奥拉对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的阐发时，有他自己的独立的见解。

社会形态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作了全面的阐发，论述了五种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的历史过程，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90年代以后，恩格斯以书信形式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深刻地揭示社会形态内部的各种因素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完整的系统的。

拉布里奥拉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是唯物史观中的主要内容。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一些深刻见解。拉布里奥拉指出，人类既不是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在一条事先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人类创造了历史，同时也就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即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一种人为的环境。因此，人类社会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变化发展的复杂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各种因素，如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社会的、心理的……都在起着作用，并且它们之间也发生交互作用。拉布里奥拉认为，要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要对社会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的考察，尽可能分析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拉布里奥拉说，“我们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的形式决定他

们的社会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这一论点是无可争辩的。”^①这是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必然得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拉布里奥拉分析社会生活“在发展劳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种种条件的基础上”，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消费品的生产方式在这种人为的环境中直接规定着社会成员的全部其余的实际活动，以及这种活动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过程中的不同形式的发展。这就是阶级的形成、冲突、斗争和消灭，法和道德领域的协调关系的相应发展，以及一些人通过暴力和强力控制另一些人的种种原因和形式，也就是所有最终构成国家的基础和本质的东西。第二，经济结构规定着艺术、宗教和科学领域中想象的和思想的方向和（一定的程度上是间接的）对象。”^②拉布里奥拉所说的“劳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种种条件”，这是指社会生产力，它是社会经济结构中最低层的又是最基本的层次，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所说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即消费品的生产方式”这是指社会生产关系，或是社会的经济基础。

拉布里奥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两条重要结论，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申明的唯物史观的两条根本性的原理。这是说，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艺术、宗教、科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拉布里奥拉在1895年写的《纪念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在批判唯心史观时也曾深刻地表述这思想。他说：“经济本身融化于发展的过程中，在许多形态不同的阶段上表现出来，而在每个阶段上，经济

^{①②} 拉布里奥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3、110页。

都成了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总而言之，问题不在于，象我们的对手所想象的那样，把用抽象的方法孤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因素扩展到所有其他方面去，问题首先在于历史地理解经济，并以它的变化来阐明其他变化。”^①

拉布里奥拉一再申明，对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应作辩证的理解而不能作形而上学的歪曲。他认为经济关系只直接决定着社会成员的全部其余的实际活动及其在历史中的不同形式的发展，对社会意识形态如艺术、宗教和科学等则只有间接的规定性。也就是说，经济关系只是规定着社会意识形态想象和思想的方向，一定程度上间接地规定了它们的对象。拉布里奥拉认为国家、法和道德是由经济关系直接决定的，称之为“第一级的产物”；艺术、宗教和科学等这些思维和想象的造物是由经济关系间接地决定的，称之为“第二级的产物”。拉布里奥拉说：

“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产物，由于它们造成一定的利益，产生一定的习俗，把人们联合在一起并规定人们的愿望和倾向，所以具有作为独立的现象巩固下来和孤立起来的倾向。”^②这是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拉布里奥拉认为既要唯物地又要辩证地理解唯物史观，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简单化。他指出，把唯物史观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这是把经济基础当作一把唯一的万能钥匙，靠这把钥匙就能打开生活的所有奥秘。拉布里奥拉指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正象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要把整个历史科学降低为单纯算术一样。拉布里奥拉说，在研究社会历史的时候应当防备烦琐哲学引诱人们用演绎的方法得出艺术和宗教所反映的历史活动的成果。经济唯物主义者认为经济关系是无条件地决定一切，把道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48页。

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10页。

德、艺术、宗教和科学等意识形态看成是经济条件的直接产物，是“经济条件的不同范畴的标志”，是“物质利益的点缀品、辐射和反映”。拉布里奥拉说，这是“用非常粗糙的和直线的方式表达的说法，……并给那些把这些说法当作方便稻草人的唯物主义的敌人帮了忙。”^①

拉布里奥拉指出，我们在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时要坚持从经济关系出发，但又不能把所有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坚持从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来研究上层建筑及其社会意识形态，但又不能把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基础。拉布里奥拉说：“谁认为只要举出对历史所作的经济解释就可以理解一切，那就错了。”^②拉布里奥拉强调要深入理解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观点：“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③拉布里奥拉说，恩格斯的论述是非常清楚的，说明了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原始的起因和最后的基础，它对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但是，历史又不是赤裸裸的经济范畴所操纵的傀儡，而是以经济关系为主的人类活动的各种现象的综合。拉布里奥拉强调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说，经济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机体，不是从他那里直接地、自动地产生出制度、规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态。从这一基础转到所有其他东西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有时是隐晦而曲折的，也不总是能把它解释清楚的。历史不是单一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21页。

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的，而是一个紧跟着一个出现的彼此有着密切联系的事件的总和。人的一切活动是受着一定经济关系的制约，但又不是经济关系所支配的奴隶。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宗教、艺术和哲学等意识形态，一方面根源于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拉布里奥拉说：“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而不论这种意识是以迷信或经验为基础，是以直接感受或反射为基础，是充分发展的或不彻底的，是心血来潮的或自我控制的，是幻想的或纯理论的。”^①正因为是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丰富多采的历史画面。

为了深入地研究社会形态，拉布里奥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第一次引进了社会心理学。他说：“为了从构成基础的结构过渡到一定的具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历史过程，必须求助于概念和知识的综合。由于找不到另外的术语，我们把这种综合称为**社会心理学**。”^②拉布里奥拉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意识的一定的和具体的形式”，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特殊意识，是构成每一具体的历史时代或时期的人们的特定社会心理状态。某一时代的社会心理学是某种特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通过该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头脑加工，或者以生动的形象，或者以严密的理论体系，凝结在他们的著作之中，成为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拉布里奥拉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环节，借助于它就可以对一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上升到各种生动形式的历史过程的认识。不了解它就不可能完善地说明人们活动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过程，不能完善地说明种种复杂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及其作用。

①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3、62页。

拉布里奥拉对社会结构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分为五个基本的层次：第一是生产力——“劳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种种条件”，也即是劳动和劳动工具；第二是生产关系——“生活资料的某种一定的生产方式”，也即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第三是国家、阶级、政治、法律和道德，这是直接由经济基础所规定的上层建筑；第四是社会心理学，它部分直接为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所规定，部分间接地为社会经济基础所规定；第五是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等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间接规定，同时很大程度上也为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学所直接规定。拉布里奥拉认为，在社会结构的五个层次中，第二层次，也即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主要的、基本的，它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社会层次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着，使社会结构形成一个复杂的、多变的有机体。在全面阐述社会形态五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拉布里奥拉着重指出，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是完全等量的。他认为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要密切些，许多道德观念是由经济关系直接规定的。而宗教、艺术和科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却疏远些，它们是由经济关系间接地规定，其相对独立性更为突出些，它们本身的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及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拉布里奥拉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分析、阐述是比较全面的，而且有他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可以说关于社会五层次的理论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发展。

四、对历史辩证法的阐述

拉布里奥拉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和分析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和文章，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却闪耀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通过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阐发，表现出他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刻

的见解。他认为辩证法是一种新型思维形式的科学，要深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就必须掌握辩证方法；要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要客观地唯物地了解历史，而且要把历史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看作不断地变化发展的过程。

拉布里奥拉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整个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拉布里奥拉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外部批判转向内部批判，从主观思想批判转向社会自我批判。这是“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者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吸取的**历史辩证法**。”^①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在本身内部就产生矛盾，然后通过向新的形式过渡来克服矛盾。这个矛盾注定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不管无产者本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正象他们的贫困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存的明显的条件一样，无产阶级本身和他们的贫困则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②拉布里奥拉完全赞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消除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拉布里奥拉说《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叙述了两个阶级斗争的形成过程，确定了它的发展的节奏，预言了它的最终结果。

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一章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究和分析，他得出三点重要的结论性意见：第一，“直到目前为止，矛盾是一切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动力。”^③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而造成的社会生活的统一，不是按照事先拟定的规划、计划和预定的方案发展的，相反，“是通过斗争和冲突（它们总和起来构成一大堆矛盾）来发展的。”^④第二，历史的运动“是一条真正的曲线。”他提出历史

①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99页。

③④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46、145页。

的运动不是笔直的运动，而是前后左右摇摆的，“它经常改变方向并重新中断，有时似乎向后转，有时向前伸展，并远远离开了自己的出发点”^①。第三，历史的发展，共产主义是必然要实现的。他详细地引证和解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著名论断，并指出“这些论断包含着对未来的唯一可能的预见”。“这些原理就象结论一样，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得出的实际结论。它们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把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的直接结果。”^②

拉布里奥拉对于辩证法的重要性是极为重视的，在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他对历史辩证法思想的论述是充分的和深刻的。但对辩证法问题的理解上，他也不是都是正确的。比如在使用“辩证法”和“辩证方法”等概念问题上，拉布里奥拉有过错误的理解。他认为辩证法一词，是被归结为修辞艺术和律师艺术，容易跟诡辩论混淆起来。他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把“辩证法”这概念改为“发生法”。拉布里奥拉说：“你使用辩证方法和形而上学方法两个术语作为对立的术语。我在意大利这里，为了说明同一个东西，应当说发生方法而不说辩证方法。辩证法一词，按一般通用是被归结为修辞艺术和律师艺术，而变为Scheinbeweiskunst（诡辩——编者注）。这里，人们对于黑格尔的传统别无所知。”

“我认为发生概念这个名称更明确些，当然它是包罗更广的，因为它既包括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实在内容，也包括把这些事物理解为形成中的东西的逻辑形式技巧。辩证法一词只是指形式方面（对于黑格尔这个思想家来说，形式就是一切）。如果说发生概念，那么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对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的其他一切解释，都有了具体形式并取得了自己的地位。”^③拉布里奥拉要求改变已为大多数哲学家所承认的辩证法

①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46、148页。

③ 转引自教尼克等：《哲学史》，第3卷（下），三联书店版，第569页。

概念是不必要的，同时也表明拉布里奥拉对辩证法与诡辩论的本质区别缺乏了解。同时，拉布里奥拉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恰当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虽是唯心主义的，但不能说他的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黑格尔在与形而上学斗争的时候，他是特别反对脱离思维内容来谈思维形式。恩格斯严肃地批判了拉布里奥拉的错误观点，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五、论社会意识的根源性和独立性

拉布里奥拉很重视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应唯物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任何的割裂都是错误的。他批评唯心主义者，片面地夸大法律、道德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把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的独立性，否定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他也批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把人变成由经济范畴操纵的傀儡，认为社会意识只不过是社会存在的被动的机械的反映。

拉布里奥拉说：“思想的历史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历史决不囿于那些自我说明的思想的恶性循环。问题在于把事物上升为思想。这是整个问题之所在”^①。这和列宁后来所讲的从物到感觉到思想的认识路线是一致的。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对话》中讲得更加明确，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神经。又说，是从生活到思想，而不是从思想到生活，从作为活动认识的劳动到作为抽象理论的认识，这是认识的道路，是真理的道路。为了说明社会意识的根源性和相对独立性，拉布里奥拉对道德和科学作了重点的分析。他说：道德不是自行产生和自己制造的，它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道德水平同一定的社会状况相适应，即归根到底同这种或那种经济条件相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31页。

适应的说法才是有价值的。”^①他特别反对唯心主义者把道德看作各种伦理关系的无所不包的基础，看作是脱离经济结构约束的自由意识。同时，他也坚决反对把道德和产生它的经济条件的适应性绝对化。拉布里奥拉说：“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某个人的道德是同他的物质地位丝毫不差地相称的。这种说法不仅在经验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质上也是荒唐的。”^②拉布里奥拉以道德观念为例，对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一定倾向的思想、见解、信仰、观念、意向和原则，也即各种意识形态，并使之上升为教义问答、教条和体系，并使各种意识的形式，经过抽象化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而给人们一种印象：“这些意识形态形式似乎脱离了其生长的土壤，它们好象居于人们之上，成为无上的命令和典范。”^③其实，这是社会意识一旦它形成以后所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以一定的形式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但唯心主义者却是把相对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独立性，使主观思想的东西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宰。

关于科学的起源及其本质，拉布里奥拉也作了深入的考察。他说，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统治，科学史写得相当幼稚，只不过是每一门学科作单独的叙述，或者把系统材料的总和分解为逐渐形成的各个因素，然后按编年史的方式重现已经出现的定义，这是不可能了解科学的本质的。拉布里奥拉说，要真正揭示科学的本质，“任务在于弄清楚，真正的科学史是怎么产生的，对科学的需要的根据是什么，以及是什么东西正好从根源上把社会发展总过程中的这种需要同其他需要联系起来了。”^④他认为科学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的产生和发展是需要经过科学家的抽象、推理、综合等思维加工，但是最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实践的需要。他说：“如果我们总地考察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26页。

②③④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25、126、127页。

一下标志着科学发展的各个时代，并对比一下可能被唯心主义者称之为科学思维的进步时期和退步时期，那么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促进和阻碍科学发展的种种社会原因。”^①他认为从17世纪开始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精神本质，也充分暴露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性和动力，在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拉布里奥拉认为，所谓科学史应是反映并记录人类探索和征服自然的历史，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史。他说，只能从认识史的角度来编写科学史，才能真正揭示科学的起源及其本质。

拉布里奥拉还谈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反对把科学与哲学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说，除了神秘主义哲学和神学之外，“哲学绝不可能是脱离真正的和具体现实所固有的事物的科学或学说，哲学对构成经验领域的事物来说不折不扣是思维的程度、形式和阶段。”^②他认为哲学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它可以使科学研究提供一般预见，也可以使科学成果得到总结和叙述。

六、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拉布里奥拉指出，唯物史观的最大特点是既唯物地又辩证地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既避免了唯心主义的臆想性，又克服了形而上学的机械性，从而能够掌握和理解历史运动的最内在的原因，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最科学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

拉布里奥拉指出，运用唯物史观只能把它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而不能用它来取代具体的历史过程的探讨。否则，就把它变成主观的、片面的方法，割裂了历史的整体联系。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把任何一个思想发现变成刻板的因素和新的烦琐哲学，认为可以用抽象的证明、解释和推理来研究历史，这样，“唯物

^{①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27—128、128页。

主义历史观点也可以变成抽象推论的形式并使得旧的偏见以新的形式复活”^①。拉布里奥拉说，我们只有把唯物史观当作指南，坚持从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既看到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障碍性，又不是拿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标签到处乱套，就可以避免新的形而上学。

拉布里奥拉说，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情景，而是丰富多采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的历史发展是具有不同的形式，就是同一民族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向上的，但是它每前进一步又是艰难曲折的。他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似乎都处于一个很长的阶梯的各个不同的台阶上，或者处于一条表示长期的和复杂的发展过程的曲线的各个点上。历史的发展形式对一切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样的。普通的世代交替永远不是发展过程的稳固性和强度的标志。时间作为经过大致相等的时间间隔的年代和世代相传的抽象尺度，不会提供任何标准，不会指出任何规律或过程。”^②因此，用一个机械的、永恒不变的公式来衡量人类的历史，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来。

拉布里奥拉指出，唯物史观不是什么固定的公式，它只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只有跟实际结合，对事物进行具体地研究，才能显示它的科学力量。他说：“如果我们象我们正在做的那样把经济结构这一社会基础的形式改变（包括最简单的标志——生产工具的改变）看作是一条指南，从而打算洞察发展到现代的历史事件，那么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的一切困难，因为这不是单纯地认清事件的流向问题，而是要花最大的思考力来了解直接的经验给我们提供的复杂的丰富多采的画面，以便把它的基本因素归纳为一个起源系列。”^③他反对用抽象的原理对社会历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72页。

②③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76—77、80页。

史现象进行主观的演绎。

为了使唯物史观不致成为教条，拉布里奥拉提出在具体运用唯物史观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对某一时代思想史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了解该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状况，同时还要了解该时代的社会心理，既要弄清思想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也要弄清思想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否则，对思想史的描述，就会产生主观化和简单化的倾向；第二，在历史本身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估计到“旧的倾向经久不衰，而且作为顽固和残余继续存在下去”的事实。也就是说，要注意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注意它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第三，对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地是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即政治、经济的影响，研究各种意识形态的交互作用。但是，不要忽视自然环境的影响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因为“人们生活在交往中，同时也生活在自然界”，“自然界始终是人为环境的直接基础”^①；第四，注意思想发展的继承性。不要割裂历史，要善于吸取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特别是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把它作为我们研究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辅助手段。以上四点的分析，拉布里奥拉作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研究，在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方面是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拉布里奥拉说，我们研究人类社会，要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历史的骨架子。要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而不要抽象化，要记叙和解释整个历史，而不是仅仅把它分解为一些单个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这样做的时候，始终有个方法问题。拉布里奥拉认为应是“要从现象和事实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来了解它们的交错和综合；从表面深入内部，再返回表面；在分析激情和意图中发现它们的动力，从最近的动力到最远的动力，然后从激情、意图和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32页。

它们的动力出发，从离它们最远的一定经济条件中引出它们——这就是唯物史观应当掌握的困难的方法。”^①拉布里奥拉在这里所讲的方法，实质上是辩证逻辑的研究方法。这是从现象到本质，又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他既反对经院哲学家的那种脱离实际的繁琐的论证方法，也反对经验主义历史学家的简单的历史现象的罗列。他说：“我们不当象经院哲学家那样，在海岸上教人游泳，光讲游泳的理论定义”，我们也应反对经验主义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胡乱罗列一大堆人物和事件、客观存在的需要和主观的影响”^②。因为这些研究方法，不但使人不得要领，更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他提出，在研究历史事件时，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具体的事实来论证思想的内容，进行真正的历史论述。

七、拉布里奥拉的理论错误

拉布里奥拉在宣传、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理论观点上他也有不少失误的地方。比较严重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错误。拉布里奥拉曾错误地把民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积极的民族；一类是消极的民族。他认为积极民族对消极民族实行殖民统治是有好处的，可以有利于消极民族的社会进步。他认为东方社会、前亚细亚和埃及虽然曾是古代的文明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现在却表现出落后的和僵化的社会形式。怎样才能使落后的民族繁荣起来呢？拉布里奥拉说：“落后的和停滞不前的民族的改造过程可以通过外部影响来实现和加快，这一事实在印度得到证实。这个自身还有活力的国家，现在在英国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国际活动，甚至提供

^{①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38、138—139页。

自己的精神创造的成果。”^①拉布里奥拉虽然说这种做法不是具有现代历史特点的唯一对比，但他理论上却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落后的民族，只有直接地或间接地接受了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征服，才能重新获得新生和活力。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服务。

由于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错误，1902年以后拉布里奥拉曾发表多篇文章为意大利反动政府的殖民扩张主义辩护。认为意大利政府的殖民政策是符合意大利民族利益的，因为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加速发展会导致那里的工人发展，从而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社会主义者应支持政府的行动。这一严重的错误，后来曾受到普列汉诺夫、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肃批评。

第二，对不可知论的本质缺乏认识。拉布里奥拉认为，人们要彻底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不可能的，宇宙中总是存在着人类的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的领域。他还认为不可知论也有可以肯定的方面，也会有积极的作用。拉布里奥拉对不可知论这种笼统的评价是不确切的，而且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当然，不能把不可知论等同于唯心主义，在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中，它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一个中间环节。不可知论不是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也不可能超越唯物唯心之上的第三条哲学路线。拉布里奥拉对不可知论本质的模糊认识，跟他对辩证法的片面了解是有一定关系的。

拉布里奥拉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理论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与他的成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在意大利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业，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陶里亚蒂所继承和发展。

^①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73页。

第六节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肖莱马等人的哲学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中，除了狄慈根、梅林、考茨基、拉法格和拉布里奥等五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做出较大的贡献之外，其他人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肖莱马等人，他们虽然没有写出哲学专著和文章，但在他们的革命实践中，为宣传、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贡献。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工人领袖，在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化学家肖莱马，他不但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提供自然科学依据，而且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对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取得重大的成就。

以下，简要介绍一下他们三人的理论活动。

一、李卜克内西的理论活动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恩格斯认为李卜克内西在革命的真正决定性的关头，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一边的^①，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称李卜克内西是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②。

李卜克内西长期来曾担任过报刊的编辑工作。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后，他曾担任党的机关报《民主周刊》的主编。1875年，德国两大派工人团体的合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后，他担任了党报《前进报》的主编。1878年以后，俾斯麦实施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2、416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2页。

“反社会主义法令”的非常时期，李卜克内西不畏强暴，兼任了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李卜克内西在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和报刊的主编工作中，为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七十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与杜林主义的斗争中，李卜克内西在开始时有过模糊认识，但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和杜林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并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文章。

李卜克内西虽然没有写过哲学专著，但他写过有关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和著作，比如《法国革命史》、《社会民主党人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期望什么》、《纪念三月十八日》、《论土地问题》、《反对军国主义和新税》（与倍倍尔合著）《回忆卡尔·马克思》等。在这些著作中，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李卜克内西这些著作，属于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重要文献，是无产阶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卜克内西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斗争的战略策略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倍倍尔的理论活动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才智献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列宁对倍倍尔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一位在工人中间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因为倍倍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和政治活动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体现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①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0页。

倍倍尔的一生主要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主义活动家出现历史舞台，而不是理论家。他写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大多是政论性的，主要是有关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有：《德国议会及邦议会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傅立叶传》、《社会民主党和普选权》、《我的一生》、《妇女和社会主义》等。倍倍尔曾说过：“我的所有大部头著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是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些著作中，倍倍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恩格斯曾这样评述倍倍尔：“倍倍尔具有杰出的理论才能，但党的实际工作只能让他在运用理论到实际活动中去这方面表现他的这种优良素质。”^①又说：倍倍尔是德国党内“最有远见、最精明、最刚毅的人物”^②。恩格斯的评述是中肯而确切的，倍倍尔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注重于实践的活动，而未能成为理论家，但是在实际斗争中，他努力贯彻、实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却是成绩卓越的。

倍倍尔坚决拥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反对形形色色的各种唯心史观。他在《论伯恩施坦》一文中，评价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伟大意义时说，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及其制度所创立的东西，同达尔文为自然史所作的对支配生物发展的规律所确定的东西，有同样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人类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他在《论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提出要公开反对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这种历史观是无视人类社会真正的发展规律，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随心所欲的、是个别的、天赐的人物的杰作，人类在他们的面前只能是毕恭毕敬、俯首帖耳或卑躬屈节。倍倍尔认为，只有彻底清除唯心史观，人民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有保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2页。

《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是倍倍尔全部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唯物史观思想运用和表述最突出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在1883年出版，到了1895年共出二十五版，被译成十五种文字，从中可以看到它的作用之大影响之广。恩格斯曾说，他津津有味地把这本书读完，认为“其中有许多好东西”，“谈到德国工业发展的那些地方，写得特别清楚，特别好。”^①倍倍尔自己说，这本书开辟了他一生的道路^②。

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是利用当时历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丰富材料，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地考察了国家、家庭、道德和宗教信仰等问题，控诉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的凌辱和压迫，探索妇女解放的真正道路。倍倍尔认为，国家、家庭关系等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国家的本质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国家，最大的有产者是国家中最有权势的人，他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治理国家。倍倍尔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只是一小撮资本家的国家，他们以“社会的主人”自居。这个国家没有减少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而是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导致了阶级之间的战争。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了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到来。家庭关系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倍倍尔认为，考察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能离开国家和家庭的关系，也就是不能离开一定的经济关系。他说：“任何社会依附和社会压迫，根源都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经济依附”^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遭受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的原因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妇女的解放获得平等的地位，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89页。

②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59年版（下同），第10页。

③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14页。

度才有可能。倍倍尔说：“不去怀疑统治阶级的特权并最后消灭它，是永远也不能医治病入膏肓的世界的”，所以，“半途而废和小小的让步完全无济于事。”

倍倍尔指出：“妇女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等权的确定，是世界上一切权力所不能阻挡其实现的一种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而这种目的，只有在人类统治人类——即资本家统治工人——的社会消灭的时候才能实现。”^①也即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压迫消灭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才能免受剥削和奴役，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解放。因为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创造出人人有利的生存条件，对每人给以同等的发展自由，使人类间再没有牺牲他人以满足自己利益的事态”^②。这样，妇女的平等和解放才会完全实现。倍倍尔认为，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对立的消灭，国家也开始渐渐地消亡。宗教意识也开始消失，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关系也将得到完善和发展。倍倍尔说，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人类历史的进步，非有完全自由的思想不可。人类得到完全发展的机会，这就是人类社会构成的目的。这时候，人的个性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挥，这是共产主义的新人。

倍倍尔还运用唯物史观，对宗教这种意识形态作具体的分析。他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对各种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人类最终摆脱宗教的途径。倍倍尔指出，“宗教在任何时代都是当时社会状态的反映。人类发展，社会变化，宗教亦随之而变化”^③。他认为宗教的教义、宗教的信仰、宗教的感情以及相适应的宗教的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不过，它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所以，

①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320页。

②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328页。

③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442页。

倍倍尔得出结论说，基督教“和一切别的宗教一样，它是人的创造”，是人创造神，而不是神创造人，鲜明地表述了倍倍尔的无神论思想。倍倍尔还提出，宗教虽然与社会主义、与科学相对立的，但也不能主观地、任意地消灭宗教，强迫群众不信教。他说：只有达到“人类社会大多数对于真的幸福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时，宗教便会消灭。”^①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意识，才能最后消亡。倍倍尔的无神论思想，和对宗教本质的科学分析，为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倍倍尔跟李卜克内西一样，在革命实践上和在理论的表述上，都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比如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杜林主义都曾有过模糊的认识，在反对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曾表现过犹豫的立场。倍倍尔的一些失误，并不妨碍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实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三、肖莱马的理论活动

卡尔·肖莱马（1834—1892）是德国卓越的有机化学家、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871年被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8年又选为美国哲学会的会员。自60年代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后，他们一直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和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建立了伟大的友谊。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肖莱马，认为他“是整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仅居马克思之下的最著名人物”，“在他的专业——单烃（石蜡及其派生品）化学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②。

肖莱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学习，他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

①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4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2页。

义指导化学研究，认为“化学的过程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进行的”。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开始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的矛盾得到启发。他也运用从个别到一般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化学，从而得出碳氢化合物——脂肪烃（ C_nH_{2n+2} ）是有机化学体系的“细胞”，从中衍生出一切有机化合物。肖莱马说：“碳氢化合物（烃）不只是最简单的碳化合物，从理论观点看来，它们还是最重要的碳化合物，因为一切其他碳化合物都是由烃中借其他元素取代氢而衍生出来的”。“因此我们把通常称之为有机化学的那一门科学，可以定义为烃及其衍生物的化学”。恩格斯在评述时指出：“肖莱马挑选了这些有机物中最单纯的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①。因为这些最单纯的有机物原来仅由碳和氢构成，如果用其他单纯的或复杂的物质来代替碳氢化合物中的氢原子时，就能制造出具有各种不同性能的完全不同的物质。这完全证明肖莱马把碳氢化合物看作有机化学体系的最基本的“细胞”是正确的，从个别到一般的科学方法对研究化学理论也是完全适用的。

肖莱马还用量和质的辩证法阐述了有机化学的发展。他在1889年重版的《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中指出：“有机化学正以巨大的步伐向前迈。大约五十年前，知道的烃只有12种，而十二年前已增加到将近200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400种以上的烃，其中许多烃及其衍生物已被详细地研究过”。

恩格斯对肖莱马应用辩证法于化学领域的研究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肖莱马“完成了在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成了现代的科学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4页。

肖莱马还运用唯物辩证法，花费很多时间研究了理论化学，研究了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种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之间的联系，研究了自然科学史。他提出科学的发展和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一样，都是以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为原则的。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科学的概念、理论也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肖莱马正确地提出：“化学的发展是按辩证法的规律进行的。”“我们现在的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按辩证法的规律在不断地变化着。”唯物辩证法成为肖莱马化学研究和自然科学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方法。恩格斯对肖莱马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的研究，给以很高赞赏，认为他是重视学习黑格尔的结果。恩格斯说：肖莱马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都轻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一点。”①

此外，肖莱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狭隘经验论方面，批判神秘主义的“活力论”，通过合成蛋白化合物来研究生命之谜等方面都做出重大的贡献。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在他们导师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逐渐成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宣传、解释和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4页。

命实践相结合作出了典范。他们的哲学思想，有着时代的特点，也有着民族的特色，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他们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不能不是他们理论上的重大缺陷，也是他们后来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失误以至于犯错误，个别还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三卷)

作者 =

页数 = 6 2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